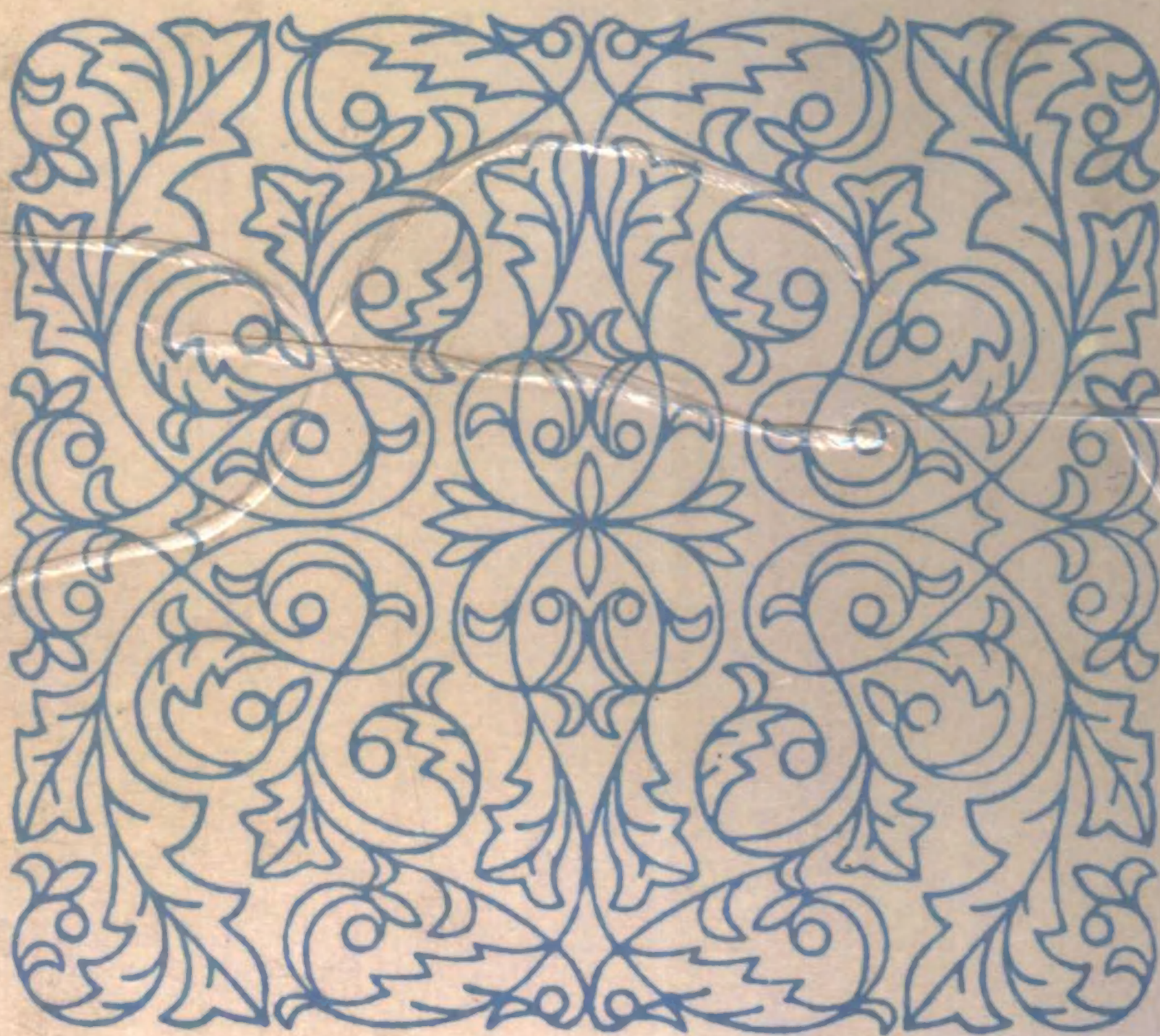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40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40 ·

理化、教育、體育類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

明日之中國文化

歐化東漸史

西學東漸記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

方 豪著

張君勱著

張星烺著

容純甫述

馮瑤林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全冊

每冊定價國幣六千元

著者 陽江馮瑤林

校對者

門人 楊昌星
梁國泰

發行者 馮志椿

各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張序

馮君是書共分十五章，舉凡中國儒學佛學醫學繪畫書法音樂印刷術雕刻品組織品輸入日本之情形，莫不胥事求是，詳爲敘述，以零星之材料，組成系統之篇章，斯已勤矣。

抑馮君固研究哲學者也。今又兼治史學何哉？曰：道並行而不悖也。黑格爾德之哲學家也，而於希臘哲學史有詳晰之研究；老子道家也，而漢書藝文志謂道家者流出於史官，然則以哲學而兼治史學，二者匪特無抵觸，且有助於哲學之精進也。

今與馮君相別，忽忽十餘年矣。馮君力學弗輟，十年如一日，吾觀是書，而知其學問，進乎技矣。

羅 序

予留日多年，見日本之文化，雖中更明治維新而不變；顧其風俗習慣，尙沿中國古風。竊有去魯書，以考其朔。既而黃澤禍起，風雲變幻，匆及歸國，謙讓未遑也。歸國後，呼號奔走，無暇著述，滯延數載，卒未成書。去年夏，奉長陽江縣篆，問知此邦二三君子暢談文學，乃獲結交於馮瑞林先生。先生固好學深思之士也。曩著黑格爾羅輯，已爲海內學者所贊許。今又先我而著中國文化輸入日本攷。夫以中國人著日本之書，而能詳叙日本之典章制度者，昔蓮憲之日本國志是也。而能歷攷其文化淵源之所自者，則馮先生此書是也。是書積數歲而成，博引旁搜，條理清哲，洋洋二十餘萬言。誠學術中之佳構，而予亦無庸縉貂矣。抑馮先生之著述，豈獨是書而已。先生兼治訓詁，近依章太炎新方言之例，創著鹽州方言故訓，綴摭閭里俗語，釋以秦漢古音，其考古功多，審音精確，俟異日刊行，其功在學術，豈曰小補之哉？

大埔羅 賢序

序

一個容止麗都的美女，如果把她抹上的脂粉和穿上的冠裳淨盡除去了，贖下的祇是一個赤裸裸的可羞可恥的肉體而已。

日本今雖失敗，然仍不失為世界文明燦爛之邦，這似乎不能否認的。大家以為日本能够得到這樣的成績，是由於明治維新之後，吸收歐洲新文化而成，殊不知凡一國文化之發展，必有其歷史的悠久性，決非一蹴可舒其峰的。故就日本的歷史背景看來，日本之有燦爛的文化，實由於二千年來接受中國文化陶冶之所致。回溯自先秦以迄於遼清時代，日本因為朝貢中國的關係，留學中國的關係，或因兩國僧侶之往來，或因華人之東渡，以至於中國之儒學，佛學，文學，政治，法律，醫學，歷學，貨幣，音樂，繪畫，陶器，織造物及風俗習慣等，無不跟住各時代的關係先後輸入日本。日本學者太宰春臺（一六八〇——一七四七年）曾舉出日本語言根本上沒有仁義道德孝悌忠信等概念，直至與中國交通之後，傳入中國聖人之道，然後明曉這些道德的概念，然後社會上的人能明禮義重廉恥，而有以異於禽獸。太宰春臺的話，是合乎事實的。又阿賓德（Abenid）在他著的日本不能征服中國一文中（轉載在密勒氏評論九十卷第七號）說：「日本的文明文學以

及其藝術多從中國得來」。韋爾斯的世界史綱說：「日本民族之原始的，無論若何，其文化文字文學及美術之習慣皆得自中國，則顯然無容置疑」。芬納斯的日本小史說中國文化對於日本影響甚大，便說日本所以有名震全球之資格，全因受了中國的影響所致也不爲過」。這麼一來，日本文化是得自中國，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了。如果日本在歷史上沒有中國文化之輸入，則日本豈不是一個赤裸裸的可羞可恥的野蠻國家嗎？日本文化豈不是一種赤裸裸的可羞可恥的原始文化嗎？

日本文化既得自中國，則日本人應飲水思源，十二分感謝中國。乃竟數典忘祖，於九一八之時，發動侵略中國，欲以日本的文化，消滅中國的文化。殊不知中國是文化之母，日本是文化之子。日本侵略中國豈不像一個孩子成年之後，便反對生鞠養育的父母？其趨滅亡，實自作孽。

本書是從歷史方面說明中國文化輸入日本情形，藉此，可以知道日本之文化即是中國之文化，亦可知中國文化富於感化力，雖兇悍之日本人，無不甘心受其陶鑄也。

這書出版多謝曾紀綸先生爲之鼓吹，門人鍾良永黃昭燊姚兆張希文曾紀孚黃可燊何雅強許祥駒等爲之抄錄。開版時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馮伯璜瑤林序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目錄

第一章

日本國名異稱考

第二章

日本種族與建國

第三章

日本的原始文化

第四章

中日歷代交通之路線

第五章

儒學之輸入

第六章

佛教之輸入

第七章

醫學之輸入

第八章

繪畫之輸入

第九章

書法之輸入

第十章

音樂之輸入

第十一章

印刷術之輸入

第十二章

雕刻品之輸入

第十三章

織造品之輸入

第十四章

他種文化之輸入

第十五章

日本人生活之中國化

第一章

日本國名異稱攷

當我國隋代以前，我們的東鄰沒有所謂日本國。日本國的名稱，是當我唐代纔有的。但我們研究中國文化輸入日本時，從歷史的連續性看來，自然還要追溯到日本國的前身去。既要追溯到日本國的前身去，那末，關於日本國的名稱問題，實有先行提出研究的必要。

關於日本國的名稱，日本史裡沒有詳細的記載，因為日本在上古時沒有文字，沒有書籍。那兩本最古的史書古事紀和日本書紀作成的時間，距離日本建國時代頗遠。日本建國於西元前六百六十年，即當我周惠王之十七年。古事紀作成於西元七百一十二年，即日本元明天皇五年，當我唐睿宗太極元年，距離日本建國之時，隔過了一千三百七十二年之久。日本書紀作成於西元七百二十年，即日本元正天皇養老四年，當我唐玄宗開元八年，距離日本建國之時，隔過了一千三百八十年之久。因此這兩本書對於日本史前時代的事實，自有許多疏漏之處。所以關於日本國的名稱問題，在日本史裡，是找不出充分材料的。

在日本古史裡，既找不出充分的材料，我們不得不以中國古史和日本近代學者研究所得的材料為根據，并加以自己的見解，以為研究這篇題目的材料。我們詳細考查中國歷代史書的記載，知道日本國名是有幾種名稱的。即是：

（一）邪馬臺國

魏志倭人傳說：

「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居」。

後漢書東夷傳說：

「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女王卽是卑彌呼，卽是神功皇后，足見那馬臺是日本國古代的名稱了。

（二）倭面土國

日本內藤虎次郎博士著的倭面土國考（藝文第二二年第六號）認漢安帝時之師升是倭面土國王。他說：

『古版後漢書及通典（北宋通典）等，並未備載「倭國」二字，如日本書紀纂疏所引東漢書中則爲倭面上國國王師升，經日本紀開題所引後漢書中則爲倭面國。唐顏師古撰通鑑所引通典中，則爲倭面土地王師升，異稱日本傳所引通典中，則爲倭面土地王師升，圖書寮所載北宋版通典中，則爲倭面上國王。是知倭面上爲倭面土之誤，倭面土並應讀作「倭面」。（大和）。』查今各本的後漢書及通典等都沒有倭面土國的名稱，這名稱是日本學者根據傳入日本之古版後漢書及通典而來的。則倭面土國是日本古代的名稱了。

（三）倭奴國

後漢書東夷傳說：

『建武中元（光武年號）二年，（日本垂仁天皇四二年西元五七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

李延壽等上史倭國傳說：

『漢光武時，遣使入貢。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

魏徵等隋書倭國傳說：

『漢光武時遣使入貢。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

劉昫等舊唐書倭國傳說：

『倭國者，古倭奴國也。』

脫脫等宋史日本傳說：

『日本者，古倭奴國也』。

宋濂等元史日本傳說：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

張廷玉等明史日本傳說：

『日本古倭奴國』。

可知倭奴國又是日本古代的名稱了。

綜上看来，可知邪馬臺國倭面土國倭奴國，都是日本古代不同的名稱。究竟所謂邪馬臺國倭面土國是怎樣的意思呢？有的日本學者以爲倭面土國應讀爲倭之面土國，即倭是日本全島民族的總稱，而土是倭族中之一小國，即北九州之地，如木宮泰彥即是如此之主張。但魏志倭人傳所載女王所屬三十國之中，沒有面土國之名，便知讀爲倭之面土國是錯誤的。日本內藤虎次郎博士及稻葉君山均主張『倭』字之古音與『移』字之古音相同，（見詩經爾雅等書）皆讀爲^ヨ，倭面土乃魏志所謂邪馬臺之舊稱，『倭』與『邪』同音，『面』與『馬』同音，『土』與『臺』同音，倭面土即是邪馬臺一證之轉，故倭面土即是邪馬臺，均應讀爲 Yamato。這種考證，可謂精確之極，由此可以斷定倭面土即是邪馬臺，毫無疑義了。

但倭奴又是怎樣的意思呢？『倭』字的意義怎樣？『奴』字的意義怎樣？漢書地理志如淳注說：

『如墨委面』。

這說是不對的，臣瓚及顏師古已駁過了。臣瓚說：

『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

顏師古說：

『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

顏師古謂倭非以墨委面之委，意義上是對的。但謂倭與委異音，音讀上是不對的。不知倭委兩

字古音同在歌戈韻，而又互相通用的。故倭連即是委夷，此說常見於中國書籍。至內藤虎次郎及稻葉君山謂倭讀爲移音，移古亦入歌戈部，與委倭同韻。是委倭本無二音之證，不過委字的意義，卻不像如淳所謂以墨委面，故謂之倭而已。

倭既不是以墨委面之意，然則倭當作如何解釋？魏畧說：

「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

這便證明倭是種族之名了。又「倭」既與「委」同音，所以中國古時常以「委」爲「倭」：如漢光武御賜「漢委奴國王」的金印，竟刻上這個「委」字即是其證。又隋書倭國傳及北史等書都刻「倭」爲「倭」，都是聲音相同的關係。

至於「奴」字的意義，又是怎樣的呢？這又有三種不同的解法。（一）當日志是梅天皇天明四年，即我國高宗乾隆四十九年，西元一七八四年，在日本九州筑前那珂郡志賀島發現漢光武御賜「漢委奴國王」的金印一顆，文曰：「漢委奴國王」。日本學者三宅米吉做了一篇漢委奴金印僞作說之批評（史學雜誌第三篇三十七卷）主張讀爲漢之委之奴國王，即認「委」是日本全島民族之總稱，奴國是委中之一小國。所謂「奴」即書紀中所見之「難」，即後世之那珂郡，在今九州筑前「餘」縣地方。三宅米吉認「奴」即是奴國，這一說已有內藤虎次郎反對過了，毋庸再加駁斥。（二）當發現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後，稻葉君山以爲應讀爲漢之委奴國王，即以爲「委」與「移」同音，「委奴」讀爲「移」之音，「移」是「移」之音之轉，是與大和之「和」相當，因爲日本人讀大和之「和」爲「Wa」，其考證見於漢委奴國王印考。以此觀之，稻葉君山以「委奴」即是「倭面土」即是「邪馬臺」，又即是大和。稻葉君山認「委」與「和」同音是對的，但以「倭」是「面土」之轉音是不對的。故（三）近今學者認「奴」字的意義，即是「人」字的意義，「倭奴」即是「倭人」。因爲「奴」字的聲音是「Wa」，而不是「Wa」由「Wa」決不能急轉爲「Wa」？我以爲「倭」是那馬臺或倭面土之省稱，「奴」是「人」之義。因爲古代日本語言叫「人」

「爲」一「奴」(ゴ)，故中國史學家就日本古代語言聲音的關係，譯爲「倭奴」就牠的意義關係，則譯爲「倭人」所以中國古史裡往往有「倭人」的名稱，「倭人」即是「倭奴」，「倭奴」即是「倭人」，二者是二而一的。

古代日本人叫「人」爲「奴」，是可於各史傳中查出來，考古代日本各部落的名稱，大多數有「奴」字結尾。據魏志倭人傳所載，有所謂彌奴國，姐奴國，蘇奴國，鬼奴國，烏奴國，狗奴國，華奴，蘇奴國，都是日本古代語言聲音的關係，而不是意義的關係，他們的語言雖是「奴」，但他的意義却是「人」。所謂彌奴國即是彌人國，姐奴國即是姐人國，蘇奴國即是蘇人國，鬼奴國即是鬼人國，烏奴國即是烏人國，狗奴國即是狗人國，華奴即是華人國。又日本人叫日本島的土著爲可羅頗克奴「可羅頗克」是居在樹枝下之意，「奴」即是人，可羅頗克奴即是居在樹枝下的人。他們又叫蝦夷人爲阿夷奴可知古代日本人叫「人」爲「奴」，了無疑義了。

不但居在日本島的古代日本人叫「人」爲「奴」，即留居在朝鮮半島的古代日本人，也是如此說的。據魏志高句麗傳所載，有所謂涓（一作消）奴部，飽奴部，順奴部，灌奴部等等。所謂涓奴部即是涓人部，飽奴部即是飽人部，順奴部即是順人部，灌奴部即是灌人部。因爲考古學者的研究，所謂「原日本人」由西伯利亞經由朝鮮半島渡過日本島時，仍有一部份的「原日本人」逗留於朝鮮半島居住，不再渡海，所以古代日本人與古代的朝鮮半島之日本人，語言仍有相同之處，如叫「人」爲「奴」，便是其例。可知古代日本人說「人」爲「奴」，至此又得到了一個有力的證據了。有些不明奴字意義的人們，望文生義，以爲倭奴的「奴」字，是與奴隸之「奴」同其意義，是中國人都視日本人所加上的一个不美的名稱。殊不知漢光武御賜委奴國王的一颗金印，尚刻上了一個奴字。試想這顆金印在國體上是十分隆重的，安有鄙視的意思包含在內？所以我們敢大膽地斷定，所謂「奴」確是古代日本人語言的聲音關係，古代日本人對於「人」的稱謂，

其聲音是「奴」，其意義實是「人」，決不與我國文字上所謂奴隸的「奴」同其意義。

(四) 大倭與大和

古代日本國雖有邪馬臺倭面土及倭奴等不同的名稱，然皆是聲音轉變而已。邪馬臺轉音而爲倭面土，再省而爲倭，並加上一個奴字，而遂爲倭奴國。至第三世紀，日本人乃把倭奴省去「奴」字，加上一「大」字，稱爲大倭國，後又改爲大和國。據王輯五先生於倭國考（師大月刊三十二周年紀念專號）以爲自卑彌呼死後，女王壹與年十三歲立時，遠非狗奴國（即熊襲族）之敵，於是實行東遷，遷至於大和，把畿內及大和統一起來，並征服前時盤據於畿內及大和兩地之秦人系大陸民族（即銅鐸民族）。倭政府因此妄自誇大，加上「大」字於「倭」字之上，自稱爲「大倭」，被又審知「倭」字的音義不雅，遂由「大倭」改爲「大和」，於是「大和」政府宣告成立。可知改稱「大倭」，旋又去「倭」而改稱「大和」，是在第三世紀時之事。「和」是「山徑」之義，「山徑」二字，古代日本人讀爲 *yamato*，即與「倭」同音，即與邪馬臺及倭面土同音。以此，便知日本古代所謂邪馬臺，倭面土，大倭，大和，都是聲音相同相轉或省稱的關係。

(五) 日本國

日本人後來又把大和改爲日本國。這種改變，究竟始於什麼時候呢？丹徒陳恭祿著的日本全書以爲改稱爲日本之時，約在隋唐以前。然考諸隋書倭國傳，記日本遣使上隋煬帝的國書，祇稱爲日出處天子，沒有稱爲日本國天皇，魏徵等撰的隋書也祇標題爲倭國傳，不標題爲日本傳，足見日本當我隋代之時，尚未改稱爲日本國了。至劉昫等修舊唐書時，始標有日本傳，是把大和改爲日本，當我國唐代無疑。究竟當我唐代那個時候纔改稱爲日本呢？明史日本傳說：

「唐咸淳初，改爲日本」。

這說仍是欠正確的。考咸淳是唐高宗的年號，咸淳元年，即日本天智天皇（六六八——六七二）九年，即西元六七〇年，在那一年中，日本人不過把日本國加上了了一個「大」字，稱爲大日本

國而已。所以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日人平常總在 *Nippon*（即日本）二字之前，加上一個形容詞『大』。這個指定。大約在西歷紀元後六七〇年，才初次正式採用。』

哥溫所說的年代，正與明史所載的咸淳初年代相合，是在那一年，日本人把日本國加上一個大字，稱為大日本而已。其實把大和改稱為日本國，是在孝德天皇即位那一年。孝德天皇於西元六四五年即位，即於那一年舉行政治上的大改革，歷史上稱為大化改革。于是把國名改稱為日本，這時即當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的時候，於是我們可以斷定，在孝德天皇元年才把大和改稱為日本國，至天智天皇九年，才稱為大日本國。但就稱為日本的理由怎樣呢？舊唐書日本傳說：

『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故名日本』。

宋史日本傳說：

『自以其國近日，故以日本為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

明史日本傳說：

『以近東春日出而名也』。

據著者個人的見解，我以為由大和改稱為日本，是有兩種理由的。（一）因為日本接近東海日出之處，所以名為日本，誠如中國古史之所說的（二）考日本古代的神話說，太陽女神把劍，寶鏡三件寶器賜予他的子孫說：『這是萬國傳世之寶』。是以日本歷代天皇都自稱為太陽女神的後裔，自認他們的國家是由太陽女神所賜予的。北畠的神皇正統記說：『大日本是一個神聖的國家。我們國家的基礎，起首由一個神聖的始祖建立而成，這是由太陽女神傳給伊的萬代後裔的。這種情形，完全非外國所有，所以這國家的土地，可以稱為神地。唯有我們的國家，自開天闢地，至今能保持皇室的系統，相傳而不斷』。從這種情形看來，故日本人為紀念及證明他的國家的來源起見，遂改為日本。『日』即是太陽女神的象徵，『本』即是原本，日本即是說他的國家是

本諸太陽女神而來的意思。

以上那兩種理由，是以後一種較合理。因謂日本人的傳統思想是崇拜太陽女神的。故所謂日本即是說他的國家是本諸太陽女神而來的意思。至於「日本」二字是中國的字而日本人採用之。自從意大利馬可孛羅東遊之後，西方人始知道東方有日本國，於是把日本國譯為 *Chippangai*，馬來人讀「日本」兩字的聲音為 *Japan*，日本人讀這兩字的聲音為 *Nippon* 或 *Nihon*。今英文譯「日本」兩字的聲音為 *Japan*，是由馬可孛羅 *Chippangai* 一字而來的（到底 *Chippangai* 一詞是馬可孛羅自己採用的呢？還是熱那亞的作者採用的呢？未能斷定。（熱那亞是一本述馬可孛羅東遊的書名）綜合看來，我們根據上文所述，知道日本在上古時叫做那馬臺國，或倭國土國，或倭奴國，至第三世紀以後，叫做倭國。旋又改為大和國。唐太宗以後，即日本孝德天皇時改稱日本國。但劉昫等的舊唐書有倭國傳。又有日本傳。并且說：「日本是倭國之別種」。這樣看來，好像倭國是一國，日本又是一國。舊唐書為什麼有這樣參差不一的說法呢？因為自從孝德天皇舉行大化改革，改易國名之後，日本使者來到中國，不再用倭國的名稱，只從新用日本國的名稱，以致中國人不明白，起了懷疑，試再看舊唐書日本傳說：

「或曰：日本舊小國，倭倭之地，其人人剽者，多自誇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所謂「中國疑焉」，即懷疑日本與倭國是否就是一國的問題。既有了懷疑，於是劉昫等作舊唐書時不敢斷定，疑而存焉。故有倭國傳又有日本傳。并附會說：「日本是倭國之別種」又用「或曰」說明之。其中倭國是日本在大化改革以前的國名，日本是大化改革事以後的國名，兩國是二而一的。

除上述之外，日本還有好幾個不同的名稱。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不過還有別的指定的形容詞，最多的在詩詞中。一個是大和（山門）（已見前）在木居（*Muro*）著名的詩中用熱的。另一個文雅的名稱是大御國（大嚴莊國）。還有幾個

幾個誇大的怪異，使人難於記憶的長名稱，例如『豐葦原四千五百秋四瑞穗國』，又『萬千秋四千五百秋四瑞穗國』，在這個名稱之內，是要用二十四個日本語音。

除了上述之外，中國人又稱日本爲扶桑國，這個名稱是當南齊朝有扶桑國的僧人慧深到來中國說出來的。這說似不甚可靠。但日本人也用過這名稱。明史日本傳懷良對明使者趙秩說有『吾國雅處扶桑』之語。是日本人自稱爲扶桑國了。

關於日本國名的變更問題，經已說完了。下文便接續著研究日本種族與建國的問題。

第二章

日本種族與建國

我們在前說到中國文化輸入日本之前，先要明白日本的原始文化。想明白日本的原始文化，又須先明白日本種族的來源及其建國的年代。

新渡戶稻造所著日本國書裡八十九頁引海梅先生的話說：『世界上種族的混亂，總找不出比日本更甚的了』。這樣看來，便知日本的種族是異常複雜的。然大約有下列各種。

(一)可羅頗克奴。日本人根據阿夷奴的傳說，當阿夷奴未移植到日本島以前，已先有可羅頗克奴在那裡居住了。但可羅頗克奴是什麼種族呢？近代學者對這問題雖經不斷的研究，然總沒有確定的主張。有人說他們是儒士據摩人，這說是未足置信的。惟這種人形狀短小，野處穴居，完全沒有文化，阿夷奴叫他們做『洞人』。日本人叫他們做『矮人』，或叫做可羅頗克奴。因爲他們不懂建築屋宇，祇知穴地而居，他們把大樹的枝葉遮蔽在穴頂上以避風雨。所謂可羅頗克是古代日本語『大樹枝葉下』的意思，所謂『奴』是古代日本語所謂『人』的意思。合此二義而言，可羅頗克奴，就是古代日本語所謂『大樹枝葉下的居人』。但在古代史傳裡，又叫做『土蜘蛛』。日本古事記有一段故事說，有一天神武王子曾到了一個『土蜘蛛』的居留地，他們歡迎神武

王子到來，在洞穴裡開設宴會，宴罷，神武王子跑出洞穴外，唱出一條歌，唱到約定的歌句時，神武王子的八十個兵士一齊動手，把洞裡的土蜘蛛殺掉淨盡了。土蜘蛛既是惡毒的入，自然敵不過『原日本人』，所以後來便漸漸淘汰了。

(二)阿夷奴。阿夷奴的來源，據傳說亞洲有一個皇帝生下了三個兒女，那最幼的一個，後來長大了，便同她的情夫戀愛，他們怕被人責罰，便一齊潛逃到日本北方之島居住，子孫遂漸漸蕃衍。這雖是無稽的傳說，但說明他們的來自亞洲，則為近今考古學者所承認。近代考古學者以為阿夷奴是一種白人。海同(○. Houton)在他的『人種論』八十九頁裡說：『阿夷奴的確是古時一羣白波形髮中頭顱人種向東移殖時所遺留。他們在亞洲並沒有留下的代表者。雖則旅行家時時要將阿夷奴與俄羅斯農人的形狀相比較』。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阿夷奴最初是白種人頭部的形狀，在長和短間，頭髮是光滑的，捲的。他們大概是由歐西鄰處遷居而來』。可知阿夷奴是由亞洲而來的。至於他們來的時代，大約是當新石器時，由西伯利亞東進，住於西伯利亞東陸，距今約有三四千年以前，繞渡過庫頁島與華太島，後來移殖到本洲全部，南邊散布到薩摩，而且奄美太島和沖繩各小島都有他們的踪跡。進至『原日本人』到來之後，憎恨他們，叫他們阿夷奴。阿夷奴是日本古語所謂『犬』，『奴』即是『人』。後來他們被『原日本人』征服，遂退回日本北部各島去，因為他們是由北部而來，故失敗後，遂退回他們的舊家鄉。

阿夷奴過的生活，是新石器之末期的生活。他們祇懂得使用石器和土器，後來漸知使用木器，還不知道使用金器。

他們不曉農耕，故主要的生活方式就是漁獵。現在日本北方各島沿海一帶，仍留存着幾千年前堆積下的貝殼堆，據考古家的考證，是阿夷奴古時堆積下來的。這便是阿夷奴古時漁獵生活所留落的遺跡。

阿夷奴好角力，每年舉行角力一次，以為角力的大機會。故每當春風和暖的時候，阿夷奴各村

落的獵人，大家都要跑到叢林裡去，找尋一隻小熊，回家交給婦女飼養。迨至小熊子肥大了，便各把他關閉在囚籠裡。到了熊節時候，獵人們自持着棍棒弓矢刀矛等在囚籠邊環繞着，戲弄那小熊。那困在囚籠裡的小熊，因為幾天來沒有東西吃，已經憤恨之極了，又被那班獵人戲弄，怎能忍受？於是大發雄威，死力掙扎，衝破囚籠，向着獵人們突擊，獵人們亦持械向小熊還擊，結果把小熊殺死了，於是把熊體切斷成塊，各領入各執一塊，大開熊節的娛樂會。阿夷奴這種行為就是角力的表示。因為他們以爲熊獸是孔武有力的動物，能夠殺死熊獸，便是表示自己一種英雄勇敢的行爲。

阿夷奴也有宗教。他們認爲赫赫的天上有一位最高的上帝，他們稱之爲神（在上者）。他們認爲人之意志與神之意志是能夠溝通的。神人能夠溝通是藉着一位神名叫「阿夷具」以爲介紹。他們又崇拜穀神及大神，因為他們是以漁獵爲生活，穀是很少得到的。既得了穀，遂認爲奇異之珍，而以爲是神賜予的。因此便崇拜穀神。火是最活動的，能燃燒萬物，故又崇拜火。又他們在家裡也崇拜灶上的祖先像。他們做這個像時，是先把塊堅硬的木，用刀石刻成了一個粗粗人形，安在泥灶之上，遂向他們祈禱以使全家獲福。

阿夷奴又崇拜太陽，不崇拜太陰。他們認太陰是太陽的妻。他有一段傳說的事，大意如下：太陽與太陰是一對夫婦。太陽是男，太陰是女，故太陽行於日，太陰行於夜。太陽是兩人中之雄大者。他穿着很漂亮很華麗的衣服，發出熱烈的光明，照耀世界，爲全球所共仰。至於太陰穿着黑白相間的花裳，有時出現，有時隱閉，因爲他是去找尋丈夫的。總之，太陽強而太陰柔，太陽管理日間的事情，太陰管理夜晚的事情，故太陽比太陰爲尊，值得我們崇拜。

阿夷奴既與「原日本人」離處，究竟對於「原日本人」的血統有無混雜呢？有些學者以爲阿夷奴與「原日本人」通婚，不能生育，故二者之血統必不致混雜。又有些學者以爲在事實上「原日本人」的確曾與阿夷奴結婚，形成混合的血統。後一說似較爲可靠。因爲「原日本人」征服阿夷

奴之後，往往把他們的男子變成奴隸，女子變為妻妾，則二者血統之混雜，乃是不能避免之事。總之阿夷奴的文化，比較于著可羅頗克奴高些。因為「原日本人」初時移殖到日本島，往往被阿夷奴同化，即現今日本地理的名稱，有些還是保留阿夷奴原有的名稱。例如富士山這兩個字，有人以為是從中國字「不死」與「無匹」兩個意義取來，但比較確切的語言學家却主張富士二字，實是阿夷奴所謂「火」的意思，故富士山即是阿夷奴所謂火山。又日本自一種布名叫「厚子」，也是由阿夷奴遺留下來為一種工藝品。

阿夷奴又叫做「毛人」，因為他們毛髮很多，叢生的鬍子，一直垂到腹下。又叫做蝦夷。這個名稱，就意義來說，是因為他們鬍子之多，有似蝦之須；就聲音來說，則蝦與阿音近，故中國人叫阿夷奴為蝦夷。是音義均應的。蝦夷當我周代曾入貢中國。文獻通考說：「蝦夷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持箭於首，今人戴之而立，數十步，無不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臣入朝。」但蝦夷不能發展其文化，強大其種族，後則漸被「原日本人」驅逐到北海道庫頁島去了。現今千島庫頁島等地方，仍有十餘萬的阿夷奴在那裏居住，查他們的生活與古代仍無大異。

(五)原日本人 原日本人是通古斯的種族。但尼尤(Engel)在他的「人種論」裡說：「日本人身體長細，頸長面長，男子眼光直，女子眼光斜。有蒙古氣象，鼻薄而凸出，或懸直」。因此學者遂認原日本人是通古斯族移殖而來。他們移殖到日本島，考古家認為是當西元前五世紀的時候。他們移殖的情形，並不是於同一時間一次移殖過來的。他們第一次移殖的時期，大約與阿夷奴同時，距今約有四十餘年。他順着寒流通過關宮海峽，渡至日本島，在出羽及越後一帶之地居住。第二次在滿洲方面的通古斯族，起了南下運動，先經過朝鮮半島，一部份留在朝鮮居住，因此古代高句麗的言語是與古代日本相同的。例如叫「人」為「奴」便是一個好例證。其他不留於朝鮮的通古斯族，順着日本海的左旋回流直渡過日本島，在出雲一帶居住。即日本上古史所

雲民族。至於第三次呢，即留居在朝鮮的通古斯族，渡過對馬海峽在九州上陸，向日向一帶伸張勢力。第一次渡來的，即是上古史所謂津國神，第二次渡來的即是上古史所謂出雲民族，第三次渡來的即是天孫族。又第一第二兩次渡來的原日本人，文化低劣，往往被阿夷奴所同化。他們祇懂得使用石器，所過的生活，是漁獵的生活。後來乃漸漸知道低農的耕農，又漸漸由使用石，轉入使用鐵器，再後勢力日強，與阿夷奴鬥爭，把阿夷奴趕走到北方去。第三次渡來的，文化較高，他們的生活狀況與朝鮮南部的人民甚相似。現在挖掘日本地中的古墓，尚發現許多綠玉。這種裝飾品，極類上古時代朝鮮人的裝飾品。至於那時日本人的短兵武器，與古朝鮮的武器尤為相似。足見天孫族初時留居朝鮮，再由朝鮮渡過日本，故那時天孫族之文化與古朝鮮有極相似之點。這一族蕃衍於日本，勞力極大，文化優好，遂成為日本國的創造者。

(四) 印度支那族，中國的苗族，自從被中華民族驅逐到南方去了之後，苗族遂散布在安南一帶。後來他們並向各處移植，有一部份順着暖流乘舟由海路在日本九州北部上陸，在那裡居住建立國家。日本西村真次氏以為即是邪馬臺國。這是大錯特錯的。魏志倭人傳明說邪馬臺是女王卑彌呼之所居，豈得謂是印度支那族的國家嗎？但他們在日本成為熊襲族。他們懂得農耕，又懂得青銅的使用。日本人知道耕種是由他們傳來的。這一種族初時極。勢力。但到了第五世紀時，已被日本征服了。

(五) 印度尼西亞。也稱爲「原馬來人」。他們本來是在婆羅洲蘇門答臘西里伯及菲律賓羣島居住的。後來移植到日本去，趕走九州裡的阿夷奴，再和印度支那族經過幾次的戰爭。他們的根據地是薩摩。他們的文化對於日本人也有些影響。日本人所穿的犢鼻褌，雖採自中國，但也受這族的影响，因爲印度尼西亞人，是常時穿著犢鼻褌的。

(六) 馬來人。也稱爲巫來自由人，也簡稱爲巫人。因爲他們住在馬來半島，所以總稱爲馬來人。這種人是極好移動的。據德國史學家海爾密德之研究，知道他們移動的印跡，由馬來島而

此說丁，連台灣而至日本島，這一族的人，身蓋毛縮，鼻子扁平。今日本人之混有馬來人之血統，已爲人類學者所公認了。

(七)漢族。據古代日本人到中國朝貢時，自稱是吳秦伯之後，此說雖未盡是實言，但中國人移殖到日本一定是很早的。相傳秦始皇二十九年（西元前二二〇年）徐福帶了三千男女到日本，此事已爲日本學者所公認了。王莽時代又有漢人移殖日本去，因爲近今在日本海濱，現發了王莽的貨幣之故。至到第四世紀之初，在樂浪郡方百郡的漢人大量移去日本，這班移植之人，乃弓月君（或通君）帶來之秦人，與阿知使主及其子部加使主率來之漢人也。弓月君或是秦始皇的五世孫，或謂是十三世孫，阿知使主或謂是漢靈帝的三世孫，或謂是四世孫，都及有史實的根據。弓月君及阿知使主率來之秦人漢人確有多少呢？諸說紛紛不一，茲以木宮泰彥之說爲較可靠，引之如下：

『應神紀』與古語拾遺謂弓月君率百二十縣之民衆來歸，此必非百二十縣之民全來也，意謂此等人所由來之地，多至百二十縣耳。即作此解，雖數亦未免過多，漢書地理志與後漢書郡國志，前漢之樂浪郡只二十五縣，後漢時只十八縣（後漢末，其南部七縣爲帶方郡）再觀姓氏錄山城國諸蕃條，有『百二十七縣伯姓』一句。同書左京諸蕃條，有『二十七縣百姓』一句，兩相參考，蓋原作『伯二十七縣百姓』其後百字二字互誤也。秦人之原住地，恐即伯（高句麗）所居樂浪郡之地。魏志東夷傳謂辰韓乃秦之亡人，避苦役投韓而建國者，然則入日本之秦人等，或者來自辰韓之地與？但魏志所以謂辰韓爲秦人之後者，殆因辰韓之音相似，乃爲此附會之說耳。此與謂倭人爲吳太伯之子孫，謂匈奴爲夏后氏之苗裔相似，皆漢人之中國思想，殊不足信。

『阿知使主率來者爲十七縣之民，彼等自後漢滅亡時，移居帶方郡，居住既久，——』

「弓月君率來之秦人，阿知使主率來之漢人，爲數甚多，乃有數百人至數千人之事。據『舊紀』並姓名錄說，雄略天皇時，秦人等有九十二部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新紀』亦云：『天皇元年，秦人等之部數，七千五十三。』古語拾遺云：『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爲計。』姓氏錄中又常見有姓大秦公宿禰，秦連秦忌寸，秦造等家。漢人之來，除古語拾遺云可以爲斷外，坂上田麻呂奏章中，亦謂大和國高市郡之住民，殆皆漢人也，他族不過十中之一二云。姓氏錄所載之木津忌寸，池邊直，栗棲直，火無直，石尖忌寸，藏人，檜前忌寸，等尾漢人。高安忌寸，坂上大宿禰，粟井宿禰，平田宿禰，內藏宿禰，路宿禰，佐大宿禰，谷宿禰，故大宿禰，續紀所載之倭漢忌寸，木津忌寸，續後紀所載之山田造，大藏忌寸，內藏忌寸，三代實錄所載之坂上伊美吉等皆漢人也」。

秦人漢人移入日本之道路，則由南韓渡過對馬壹岐兩島，先至肥前郡之松浦附近，自此由九州北岸，瀨戶內灣，逐漸東上，在難波津附近登陸。

自弓月君阿知使主率秦人漢人東渡日本之後，至雄略年間，帶方郡之漢人繼續渡至日本者甚多，其著名的，有阿部高貴，鞍部堅貴，重部國爾，我，錦部定安那錦，譯語卯安那等。此外又有手人部，衣縫部，穴人部，穴人部亦稱客人部，即烹割肉類之部氏，書記稱他們爲新漢人，乃對於應神天皇時之舊漢人而言。這班新漢人對於日本之陶器繪畫建築等皆影響，對於日本之飲食，亦有影響，故日本烹飪法因之而見改良。

日本種族之複雜既如上述，自然對於日本文化影響甚大。所以海梅先生說：『雖得有什麼種族對於日本沒有貢獻的。高加索族蒙古利亞族馬來族，甚至南方和太平洋中羣島上的尼格利脫族（黑人）也有一些關係』。這語是不錯的。

日本種族雖然複雜，但建立國家統治全島的，却是天孫族。關於天孫族之建國，沒有史實做根據，只靠神話而已。古事記關於建國時的神話大意如下。

在天地未曾判判之前，渾然一氣，混沌如鴉子一般。那氣之輕清的，上浮而爲天，重濁的下沉而爲地。那時地上還沒有人類，祇在高天的平原上有許多神男神女自成配偶。其中有一對著名的就是男子伊裝諾奇和女子伊裝諾美。這兩個神男神女後來便是日本的神父聖母。他們初時想造出幾個島嶼來，不過初次僅造成一個泡沫的小島。後來伊裝諾奇立在天上的浮橋（虹）上，把他的長矛插入海水裡，這提起長矛後，便在矛尖上滴下了一個凝滴之島。同時伊裝諾奇又疊成了幾座高山。他於是把幾座高山當作階梯，由天的浮橋降居地面。其他的山川草木亦在地面依次造成。後來他的妻伊裝諾美死了，伊裝諾奇悲傷不已。便斬了他的兒子的首。可是由他的兒子的血化成了許多神仙。未幾伊裝諾奇又死了，但他死在地下，受了許多痛苦，故又從地下走出。他走出時，把身上的穢物一一消除淨盡，當他解去那件不潔的衣服時，洗了一個澡，洗澡時動作十四次，不意每次都生出一個神來。例如他洗着左眼，便產生天照大御神，即是光亮的太陽女神。他洗着右眼，又產生月神，他洗着鼻子，又產生暴風之王素盞鳴。後來月神殺了食神，食神從口裡吐出許多米和魚，於是爲太陽女神所不滿，因此日月分離，不能會合。但食神雖被殺，還繼續吐出牛馬米稷暨桑豆麥之類，從此人類得以生活。未幾太陽女神與素盞鳴意見不合，起了紛爭，刀劍與飾物，接觸有聲，從碎片裡生出許多神仙。但素盞鳴力大，把太陽女神的花園毀壞了，把他的糟田堤岸衝破了，而且從女神屋頂上的洞中，拋下一匹有斑點而剝了皮的馬，以恐嚇女神。此時女神又被自己的梭子擊傷，只有躲入洞府裡去，一時大地光明消滅。於是乎有八百萬兆的神請求女神出來維持宇宙。女神答允了，纔出至洞府的門口，那時有一位有力的神叫牛力雄滾了一個大石，塞住洞府門口，不讓女神回來。於是女神從此長生不老，用他溫和的慈仁，笑嘻嘻的照耀大地。

至於素盞鳴爲了自己犯罪，從天上放逐下來，住在出雲地方。素盞鳴的六代子孫叫做大日靈，勢力日弱，被女神所迫而退位。於是女神的子孫瓊瓊杵（或稱米多王子）自天降下，來統治日本全島。

是爲後代之所謂天孫族。太陽女神於是把三件寶器——劍、鏡、璽——賜給他的子孫說：『皇統不興，壽比天地，萬祀一系，垂及無窮。』從此那三件寶器便成爲日本傳國之寶。

太陽女神賜完了寶器之後，再升上天上，而天上飄渺的浮橋，因此收去，地下與天上遂成永遠分離了。

米多王子登寶之後，生下了三個兒子，即是大升王子、大烈王子、大殘王子（這是象徵太陽每天升沉的三個階段）。大殘王子同海龍王的女宮玉結婚，生下一個兒子名叫不合葺，不合葺又生了四個兒子，那最小的一個就是大和盤余，即是神武天皇。神武天皇約在四十或四十五歲的時候，和他的三個長兄同出征服各處的夷人，因他最長的哥哥在途中死了，他的父親指定神武爲太子。後來於西元前六六〇年（當我周惠王十七年）建立國家。所以日本史家斷定神武天皇是日本最始的天皇，即是日本建國之始祖。神武天皇做了七十五年的天皇，活了一百二十七歲（或說一百三十七歲）他的陵墓就是大和國（是畿內之地與稱日本國之大和不同）於旁山的東北。到現在每年四月三日，國家常派員到前掃祭以爲紀念日本之始祖。

總之，日本的種族，雖極複雜，然大約分爲：可羅頗克奴、阿夷奴、原日本人、印度支那族、印度尼西亞、馬來人及漢人七種。建立國家的乃是原日本人、天孫族。其建國的經過，雖是滿紙神話，但他建國的年代，是在西元前六百六十年，即當我周惠王之十七年。乃是歷史家所公認的。

第三章

日本的原始文化

我們既明白了日本的種族與建國之年紀，接着便可以研究日本的原始文化。日本建國之後，各族雜居，各自建國，牠的種族既如此之複雜，則牠的文化必受了多方面的影響。哥溫在日本歷史大綱引海梅先生的話說：『雖得有什麼種族對於日本沒有貢獻的。高加索族、蒙古利亞族、馬來族甚至』

在南方和太平洋中群島上的尼格利脫族，也有些關係』。這樣則日本的文化型成一個化合品了。但我們要研究日本的原始文化，一定要抽去他採自外國的文化那些成份。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我們還要將那牠們本土發生的文化和外國採來的文化，分別開來。』既把牠採自外國的文化的成份分別起來，剩下的便是日本的原始文化。日本自神武天皇建國之後，經過許久的時間，還是部落的社會，所以先把各部落的文化說明之後，再說及日本原始時一般文化的現象。

(一) 對馬國

魏志倭人傳說：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得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獸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

對馬國，宋本三國志作對海國誤。對馬國即現今的對馬島。這國的疆域僅方四百餘里，人口僅有千餘戶，這是一個小小的酋長國。所謂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獸徑，又足見牠是遍地荒蕪。人民稀少，儼然一個洪荒的世界了。所謂無良田，食海物自活，又足見牠的人民還是過着漁獵時代的生活，尚未進化到農業時代的生活。

(二) 一支國

前書續說：

『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支國。原作一大國誤，官亦曰卑狗，副亦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兼有田地，耕種猶不足，亦南北市糴。』

一支國，即現今對馬島兩島之地。這國的疆域比對馬國小些。國內的官名，也和對馬國相同。

，便知這兩個部落的語言是相同的。但多竹木叢林，也是離不開洪荒時代的現象。可是牠的人民，懂得耕種，則他們的文化自然比對馬國稍高一點。因為對馬國人民過的生活，是漁獵時代的生活，一支國便由漁獵生活漸漸進化到農業的生活了。

（三）末盧國

前書續說：

「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蛤，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

末盧國之地與古事記所說之筑紫末羅縣及日本書紀所說之肥前杵浦縣相當，即今之九州肥前杵浦郡地方，今仍為日韓往來船隻碇泊之所。這國的人口比較上述兩國多些。但以捕魚為業，不農不耕，仍是離不開漁獵時代的生活。行不見前人，則他的文化是和對馬國相同，而比不上一支國了。

（四）伊都國

前書續說：

「東南陸地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謀。舩舩。有千餘戶。世有王，皆伊都女王國，郡使來往常所至。」

伊都國即古事記所說筑紫伊都縣之地，即今筑前怡土郡的地方。這國只有千餘戶，也是一個小的部落。但他的文化定比上述各國為高。（一）因為這個國有王，則政治組織，較為完備。（二）統屬於原日本國，（女王國即原日本國）則兩國文化必有溝通的機會。（三）郡使常有往來。所謂郡即是帶方郡。帶方郡的使者既頻頻往來於伊都國，定由中國輸入許多文化的。因有了這三種情形，所以他的文化比上述各國為高。前書續說：

「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兒馬舩，副曰卑奴母離，有萬餘戶。」

「東行至不彌國，官曰多模，副曰卑叔母離，有千餘家」。

「南至沒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

「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畧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

「次有斯馬國，次有己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功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

在日本國內，當時有這麼多的部落國家，然他們的文化都是極其簡陋的。前書又說：

「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

狗奴即是熊襲族，與倭種不同，所以不屬女王。前書又說：

「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

「又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

「又有裸國黑齒國」。

綜看上述的情形，日本在古時，種族是極其複雜的，部落是極其繁多的，各部落的文化，是極其簡陋的，這不過是就其各部落的特殊情形來說。至於日本原始文化的普遍現象，又是怎樣的呢？今把古代日本的地畧文化及人文文化的情形分述於後。

(一)氣候

後漢書東夷傳說：

「氣溫暖，冬夏生菜茹」。

本古代亦有之。山海經說：『歐絲之野，生大蠶，有女跪採樹歐絲』。所謂大蠶東，是指日本而言，是日本上古時已有蠶絲了。至於『橘』這樣東西，是在崇仁天皇朝（西元前二九——後七〇年）有大臣田道間守航行到大陸，帶回橘樹的種子，是為日本有橘果之始。所以魏志及南史所說的橘，實不是原始時代的土產。又魏志說『日本歷代有棉，是不足信的。因為日本到了西元八百年，才由印度輸入棉花而已，日本當我三國時代，那得有棉呢？日本古代沒有牛馬，這是事實。』古代留求也沒有這些東西。隋書留求傳說：『有熊羆豺狼，才多豬獠，無牛羊驢馬。』近代的地質學者也說日本古代沒有駒馬。後來百濟國朝貢日本，常獻良馬。是牛羊馬都是後來的舶來品。又宋史日本傳說：

『土宜五穀而少麥。……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多織絹，薄皮可愛。』

三國志和後漢書說沒有牛羊，而宋史說有牛羊，可知牛羊也是舶來品。至宋史說：『有五穀而少麥，』也是原始時代的情形。因為麥是宜於旱田的。日本古代少旱田，所以麥是稀少的。但後來旱田也漸開墾了。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說：

『向者農業以稻為主，故多水田，迨桑田已興，領土獲利頗大，而旱田日多。』

日本是濱海之國，海產極其豐富，故魏志倭人傳說：

『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

又隋書倭國傳說：（北史同）

『……文身，沒入捕魚。又以小環掛鰓鰓頭，今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

因為海產豐富，所以日本原始時代沒有畜牧屠食之習慣。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說：

『古時生活，專賴海魚山獵而生活。日本無畜牧屠食的習慣，雖或因為神道佛法之嚴戒，然亦因海魚野獸之多，供肉食滋味而有餘耳。』

以上所說，是日本原始時代的物產情形。

(三) 居室

住在日本的可羅頗克奴的土著，穴地而居。是用樹之枝葉遮覆穴上的。阿夷奴也是穴居野處。至於日本人則有屋宇。後漢書東夷傳云：

「有城柵屋宇。」

晉書倭人傳說：

「有屋宇。」

但日本原始時代的屋宇是很簡陋的。日本國志說：

「始有宮室，於地之中央立柱，上以叉字形木，交互結縛，而覆以茅，名曰冰木。古之伊勢神宮及大嘗祭殿皆如此。至顯宗仁賢之際，始覆以蘆葦，結以葛藤。」

哥溫日本歷史大綱說：

「人所住的房屋，是極端的簡單和脆弱。甚至所謂調臺的建築，也是草草從事，而像薄紙一般。材料無非是些樹木。鋪了地板，開了煙窗，就是非常奢侈的了。」

自然畧天皇十二年（即宋明帝泰始四年西元四六八年）因為有中國建築家到了日本，於是始有樓閣。但那時原始時代的形式，仍未盡改除。舊唐書倭國列傳說：

「居無城郭，以木爲柵，以草爲屋。」

不但日本古時的屋宇簡陋，即現代的日本人，也是住木屋的。這是原始文化留存到現在的痕迹。

(四) 飲食

原始時，日本已知火食。因為上古有灶神，澳津彥澳津媛之名，又古事記謂饗大女神以燧白燧杵鑽火爲炊，此爲火食之證。然主要食品爲稻。但少麥類，即上文所說的地產五穀而少麥。至於畜物則沒有牛羊馬，即上文所說的「其地無牛羊馬」。其他如菓等物，古時也是沒有的。地產亦

爲主要食品，即上文所謂沒入水捕魚蛤的情形。今日本尚有許多古代堆積下來的介殼，便是其證。至於日本古代飲食的方法，則如魏志倭人傳所說：

「飲食以手，而用蓬豆。」

蓬豆是中國人飲食的器物，是在先秦時代傳入日本的。日本原始時，不過藉以樹葉而已，所以隋書倭人傳說：

「俗無盤俎，藉以樹葉，食以手鋪之。」

隋書所說，正是日本人原始時代飲食的方法，流傳至於隋代的。

(五) 服飾

日本的原始衣服，是與神道有關係的。相傳日本在太古時，有以幣獻神之例。所謂幣即是神衣，天照女神時，曾親自縹絲以織神衣，沿至後世有所謂神衣祭。這種神話，未可據之爲史實，當天照女神時，未必發明縹絲之事。縹絲之事，似在垂仁天皇之時（漢光武時）始有之。垂仁紀之小註，謂加羅王子都怒我阿羅斯額上牛角，來至角鹿（敦賀），垂仁天皇說：「可以先帝崇仁天皇之諱御間城爲加羅國號，於是始有任那國號，此點曾賜予赤縹絹。但仍不足以爲證據。然魏志倭人傳謂：『倭人有縹麻縹桑縹績出細縹縹綿』」此係魏使出使倭國直接見之，故甚爲可靠，是日本之有縹絹，當在第三世紀時代。但據神代紀所說，那時抽縹之法，是以繭含於口中，一一從口吐出而抽之，其方法極爲幼稚。總之日本原始時代的衣服，實在陋劣不堪。所以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說：

「當未受中國文化影響時代，日本曾作何等縹物，服何等衣服乎？欲明瞭此事，雖甚困難，然其縹物，大概以麻楮穀等植物質之縹維縹成極粗劣之布耳。」

日本原始時，其縹造品固已粗劣，然其衣服亦特殊。魏志倭人傳說：

「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暮無縫。婦人……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
後漢書東夷傳說：

「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衣如單被，貫頭而穿之」。

觀此，則日本原始時衣服之陋劣，足見一斑。至雄略時代，有新漢人錦部及衣縫部到了日本，日本之養蠶事業，頓成發達，畿內地方之貴族社會衣服，面目為之一新。迨漢織吳織由吳國來，中國南部之華麗織造品，亦次第倣造，兄媛弟媛來，裁縫之技術，亦日增改良，至當我隋時，服飾丕變，大有可觀了。隋書倭國傳說：

「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故時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婦人亦裙襦，皆有襪」。

所謂「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這是由中國傳入的形式。因為在漢代以後，中國婦女嫁時，以漆畫屨，以五采色爲系，是以繩繫之於脚趾之上的。足見當我隋代，日本人之服飾，大染了華風。至於唐代爲中國文化輸入日本之最盛時期，日本人之服飾，尤受中國的影響。

舊唐書倭國傳說：

「以布帛蔽其前後……婦人衣純衣，裙長，腰襦。」

舊唐書日本傳說：

「長安三年（武后年號，日本文武天皇慶雲元年，西元七〇四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曰部尙書。冠連德冠，其頂爲花，分爲四散，以帛爲腰帶」。

觀此則日本衣裳楚楚，儼然衣冠文物之邦，較諸原始時真有天淵之隔了。

日本原始時之裝飾，雖有其特徵，但在上古時，已用着裝飾品。古事記有一段神話說：

「伊弉諾奇跑到了一條溪流洗澡，把他的衣服和裙子脫下去，並把他的手鐲和項圈也丟下去」。

這神話雖未必十分可靠，然日本原始時代有手鐲及項圈的裝飾品則無可疑。因爲近代日本學者曾在日本古墓裡發現許多殉葬的東西，其中有用線做成的手鐲和項圈，可知日本原始時確有這種

裝飾品。此外又有包金色銀的黃銅紅銅的卷環。這種卷環，是戴在耳朵之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之上，這便見日本原始時裝飾之異點了。至第三世紀，他們的裝飾也有特異之處。魏志倭人傳說：

「男子皆露紒，以木絲招頭，……婦人披髮屈紒……以丹朱塗其身，如中國之用粉也」。至當隋代時，日本的裝飾是有階級之別。隋書倭國傳說：

「人庶多跣足。不得金銀爲飾，……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之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練爲之，以金銀繡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后」。

舊唐書倭國傳說：

「以幅帛蔽其前後。貴人帶錦帽，百姓皆椎結，無冠帶。婦人……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數枚，以明貴賤等級」。

所謂至隋其王始制冠，則知日本在原始時代是沒有冠的。故日本國志說：「古之冠，不爲禮服，但以巾裹頭上耳。至推古帝始定冠位，分十二階，曰德仁禮信義智各有大小」。是知日本原始時祇以巾包頭而已。至於垂髮於兩耳之上，即所謂美珠羅的裝飾。日本國志說：「上古男女分髮爲二，左右結之，飾以貫珠，命爲美珠羅。故神功紀云：后沐髮分爲二，作男子裝云。今農家所種豆，莖細而長，兩分垂地，亦曰美珠羅，蓋像髻名之也。日本紀注，古俗年少兒十五六間，束髮於額，十七八間分爲角子額髮，古事紀稱爲抱花。後世名爲髻福」。綜而言之，日本原始時的裝飾，是以手帶鐺項帶環，耳朵上帶卷環的。男無冠帽，以木棉招頭，又分髮爲二，名爲美珠羅。女子則披髮屈髻，并以丹朱塗其身。

(六) 階級

日本原始時的社會組織分爲四個階段。野澤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這時的日本社會分作了三個階段。第一等是神別或稱神系的國家，他們雖然缺少著落政治的權力，他們却是神族的領袖。次之爲國別，或稱皇族的子孫。自神武天皇以下的諸皇

族、都在其內實。際上這是最高等的階級、代表克昭從前大和諸酋長的家族。第三爲蕃別或平民，代表着那些外國人和移住的子孫。在這三個階級之下，還有一個奴隸階級，稱之爲「三」，都是戰時俘虜的子孫，和因犯罪罰作奴隸的囚人的子孫。（乎按日本之奴隸是可以買賣的，至持統天皇於六九九年方始禁止）。社會上各種組織，都以民族爲單位，每民族的長對於族中人，差不多有絕對的權力。這個族長傳事時代，是在第七世紀之前，家族有組織的一致，而國族亦復如是。後來在分土封建時代，國族不過是感情上的東西而已，直到後來，才有國家的觀念」。

上文所引，是日本原始時社會組織的情形。

（七）神道

日本神道的歷史，可分爲四個時代。（一）原始的神道。（二）與佛教混合的神道。（三）理想化的神道。（四）政治化的神道。即是受了木居和真淵的影響，而含有哲理意思在內的神道。即是將神道當作一種政治哲學，諄諄的叫人忠於皇家。這已經完全沒有宗教的臭味了。現在所說的是原姓時代的神道。日本原始時的神道是自然教和精靈教混合的簡單形式。在中國字裡是「神道」二字，在日本的語意，則爲「神之道」。他們認神是表現在自然界，一切自然界之物，都有神爲之主宰。神是有意識的，日本人於太古時很敬重神，設有神祭，及神衣祭。凡國家遇到人物的災難，就要到此地祈禱。神所居之廟爲大字，這大字在佛教未輸入之前，都很簡陋，並沒有什麼裝飾。走進去的門口，稱爲「鳥居」，他的意思就是「鳥棲木」，都是暗指着天照女神話中一個雄鷄所居之地而言。日本原始時神道的大畧情形是如此的。待佛教輸入後，遂成爲神佛合一了。

（八）祭祀

日本對於神常設有祭祀的。國家大祭在新皇登極時舉行。此外又有神衣祭，及新嘗祭。新嘗祭是在每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的。因爲天皇每年初次享用新米，要獻給一些於神。他們以爲每

年禾穀豐登是由神賜予的，所以有新嘗祭。此外另有一種新嘗祭，是於十月十一日在伊勢的大廟向祖先舉行的。這種祭祀，又叫做感恩祭。是感謝祖先賜穀的恩典的。在祭神的各種儀式中，一種叫做「大淨禮」，就是一年兩次，大家藉此將半年來所有的污穢浣個乾淨，他們將所有的罪過，移到了剪成人形的紙片上，然後把他們帶到海邊去，沉之海底。還有一種朝山進香的儀式，各人必須步行，行到了便可以得到許多福利。日本原始時各種祭祀的情形，是大概如此的。今其俗猶然。

（九）刑訟

日本古代的刑訟，日本國志說：

「日本古無刑法，上古有罪，去爪髮，誦禳詞而已，神武已平東國，使天種子命拔除人民所犯罪，害陰陽，污齊殿，謂之天罪。姦淫蠱毒，謂之國罪。皆從其輕重微贖物，使請神祈而降除之」。

這是神道化的刑科，與我國古時天討五罪，五刑五服之思想相似。又魏志倭人傳說：

「犯罪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

因為那時日本征服阿夷奴，恐其造反，故有如此的嚴刑。又舊唐書倭國傳說：

「其所訟，匍匐而行」。

這即是日本古時階級制度的表現。否則無須匍匐而行的必要。又魏書倭國傳說：

「其俗，殺人強盜及姦必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其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詰究訟獄，不承認者以木壓腰，或引強弓以弦鋸其頭，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探之。云曲者即手爛，或置蛇虺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

日本當我隋代所定的刑法。有許多是中國傳入去的。所謂流刑杖刑即是中國的法律，而日本取之而已。至於沸鍋之刑。是允恭天皇所定的。因為允恭天皇時（西元四一二年）（或說是無神時）日本的貴族名稱，尚在混亂狀態，那時貴族中有自稱爲神之宗支，互爭權位，允恭天皇於是沸水置大鍋裡，叫爭訟的人，放手於鍋，焦灼的則敗訴，但放手於沸鍋中，無有不焦灼之理，於是人人自危，不敢爭訟，這是一種息訟的手段，并無所謂刑法。

（十）文字

古語拾遺說：

「上古無文字，惟事口聞相傳而已」。

隋書倭國傳說：

「無文字，刻木結繩」。

可知日本原始時代，是沒有文字的，有人以爲日本古代有「肥人之書」「陸人之書」這是後來傳托的，原不足信。按日本國志說：「考漢籍來來之先，固無文字，然亦有形體以記事者。世傳有肥人書，陸人書。如一二五作「川」之類。今猶有存者。蝦夷之地，今尚沿用。其五字之外，或亦有變換點畫，如羅馬數字或書作○口，或作鳥獸草木形之類。然俱不可考」。如此則謂日本原始時有文字，乃是附會的話。

（十一）日曆

魏志說

「其俗不知正歲四時，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

可知日本古代是沒有日曆的。以後的歷象，皆是因襲中國的。

（十二）兵器

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軍械的用具，都是最原始的樣子，并不和阿夷人用的相像」。

考阿夷人的弓矢施有毒藥，日本則沒有，故兵器比不上阿夷人。

芬納誤日本小史說：

「戰士上陣，都帶着刀子和弓矢，最古的矛頭和箭鏃，是大石做成的，然此大約是犬夷人和穴居者的遺物，至日本雖常用石斧來伐木和造房，可是他不知道利用金屬去製造刀劍鈎等物」。

後漢書東夷傳說：

「有弓稍斧弩，漆皮爲甲，骨爲矢鏃」。

可知日本原始時，雖有兵器，然不及阿夷兵器之犀利。

(十三) 醫術

日本原始時的醫術是怎樣的呢？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說：

「日本原始有療痛之方，以醫書生，定履歷之法，以防昆蟲鳥獸之災。其所謂治病及履歷之術，雖屬荒唐，具有神道色彩，然實爲日本醫術之萌芽。且於神時代亦有水治及瀉止之法，此是固有之醫學，非傳自中國」。

日本原始時雖有固有之醫術，但陋劣非常，且具有神道的色彩。

(十四) 舟船

日本古代已有船舶，却是無可疑的。不過據日本史所載，原始時的船隻却是獨木船，後來則受了大陸木工的改良，才有進步。哥廷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日本古代的船隻也不過是獨木船。後來進步頗速，大概是受了神功皇后出征的影響。應神時代，野野船的故事，是特別有興味。這艘船入水二十六年之後，已沒有用了，就將那些老朽的木料，燒作煎鹽之用。而要將那煎出之五百斤鹽運到各省去的時候，纔帶就帶出一

一個命令，要造五百條新的船。造船的人沒有這許多，只好差人去高麗招請。因為那時的高麗，是東方最著名的造船者。他們來了工作的時候，他們自己結了一個團體，成了日本最有力量的社會之一。老唐野的最後一塊木料，則製成了琵琶。』

可知日本原始是獨木船，後來造船的技術，則是由高麗傳入去的。

（十五）禮俗

魏志倭人傳說：

『尊卑各有差等，足相臣服，……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恭敬。……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

後漢書東夷傳說：

『俗皆跣足，以蹲踞爲恭敬。』

至父子男女相處的習慣，據後漢書東夷傳說：

『父子兄弟異處，惟會同男女無別。』

魏志倭人傳說：

『母父兄弟，臥息異處。』

（十六）文身

文身的習俗，在我國古代的蠻夷都有之。南洋中的古國亦往往有之。日本古代的種族，有的是印度支那族，印度支那族，即我國古代的苗族。苗族是文身的，所以古代的日本也有文身的習慣。他們須要文身的理由，是因為濱海居住，經營漁業，沈水時爲避免蛟龍侵害起見，所以要文身，其後遂因之而成俗。魏志倭人傳說：

『男女皆黥面文身，以其左右大小定尊卑之差。』（後漢書東夷傳同）

隋書倭國傳說：

「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入捕魚」。

日本文身的習慣，尚留存於後代。日本國志說：「文身舊俗，今猶有存。胸背手足，刺爲鳥獸鱗介花草果木之形，亦或繪人物故事，涅之以藍，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其像蛟龍者，作其鱗之而，軒騰若生，云入水可避水怪，困人僕御，十人而九，士夫以上，罕爲之者」。此文身習俗留存至今之證。

(十七) 黑齒

日本又有黑齒的習俗。日本國志說：

「婦已嫁，則涅齒黑如漆。魏志漢書有黑齒國名，此風久矣。明治初年，下令革舊。今則齒如貝齒，眉如蛾黛矣」。是日本黑齒的陋習，相染最久，直至明治時然後革除。

(十八) 婚姻

自諾冊二尊見容今飛鳴，始制婚禮。然日本原始時的婚姻儀式，是男子先要到女家居住，因爲日本人崇拜太陽女神，女神是一個女子，所以女子後來地位頗高，故結婚時是男子先要在女家居住的。後來男權高於女子，婚姻制度遂改變了。魏志倭人傳說：

「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婦人不淫妬」。

因爲日本人征服了外族，把外族的男子變爲奴隸，女子變爲妻妾，且不許女子會淫，及不許妻妾間互相妬忌，這是多妻者自私自利的方法。古代日本人的婚姻，也有階級的限制，這是與神道有關係的。因爲天皇自稱爲天神的子孫，皇族不得與臣下爲婚，官吏不得與平民爲婚，恐怕清其子孫，被他沾染了神權的。又日本原始時婚姻不擇同姓，如帝子男爲親王，女爲內親王，惟親王許娶內親王。後來又變更了。隋書倭國傳說：

「婚姻不娶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人嫁夫，必先跨火（一作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

所謂不娶同姓，是因為受了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而不是日本原始時的婚姻制度，至於跨火，乃與夫相見，雖不能確知其意義如何，然大概是表示吉利之意（這是日本人原始時代婚姻的特例）（十九）喪葬

日本原始時埋葬之棺槨，還是石器時代的形式，日本國志說：

「垂仁帝時，建真利根始造棺獻帝，帝賜姓曰石，作大連宮。後多用石棺」。

「考九州地方，當西曆紀元前後，無營壙印者，當時只有考古學者之所謂甕棺（屬彌生式系統之無軸大甕，以口部相合而為棺）與粗製式石棺（數石板并立作長方形之區別，上部以平石覆之）埋於土中耳」。

然魏志倭人傳：

「其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其死停棺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肉，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按此為拔除不祥之意）。

又說：「卑彌呼死，作大冢，徑百餘步」。

北史倭國傳說：

「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棺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車」。

魏志所謂封土為冢及作大冢。這是受了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故日本國志說：「古帝陵，大者周圍七八里，小者亦過千步。穿塹注水，使人迹不能至」。又古代日本有殉葬的惡習。芬納謨的日本小史說：

「日本古時的葬俗中有一種是十分兇殘可怕的，一個大人物死後，他的隨侍者和他的馬，都要和主人一同埋葬。這種風俗，直至第十個皇帝垂仁天皇時，（漢成帝建始四年——漢

明帝永平十三年（即西元前二九——西元後十七年）方可打破」。垂仁是個最有仁德的人，紀元前二年，他的兄弟死了，要葬，圍着皇屍者是一班殉葬的活人。這是可憐的人，身子直埋土中，只留頭部在外，任其餓死而不救，他們的呼號，感了崇仁的心，便把這惡事廢去。當時由他一個諫官，提倡以泥人爲代替」。

這個諫官就是野見宿禰。他雖然建議用泥人代殉葬者，可是此風仍未改變。試看三國志倭人傳說：

「卑彌呼以死，作土冢，徑百餘步，殆葬者奴婢百餘人。」
是殉葬之風到然功皇后時仍然未改。至孝德天皇大化改革時才真正廢止。

（二十）歌舞

日本的歌舞，多由唐而來。然原始時亦有其固有的歌舞。相傳伊弉諾奇與伊弉諾美感情篤厚，互相唱和，有「研哉」之歌。素盞鳴尊也有「八雲起」之歌。天祖人神屏居於天石窟時，天鈿女命乃作神舞，以助其愉快。產火火出見之時，火開降命誓爲俳優之民。時遇天稚彥尊死，火開降命入弔時，演歌舞以慰天稚彥尊九原之魂。這雖是傳說，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既有感則不能無聲音，既有聲音，則形於動靜，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以知日本在原始時代，一定有其固有的歌舞。其用之朝會祭祀的，有五節舞。所謂五節舞，是淨御原帝之所制。相傳帝御吉野宮，日暮彈琴，俄頃之間，前岫之下，雲氣忽起，好似高唐神女應曲而舞的一樣。這個神女，他人不能見，獨帝見之。因爲神女起舞時，舉袖五變，故謂之五節舞。又有來目歌。據神武紀：神武征東國，其兄彥已伏誅，弟彥理擬牛酒饗軍士，帝設宴作來目歌。來目歌後變名爲久米舞。又有田舞，吉志舞。三代實錄謂：貞觀元年，天皇御豐樂殿廣廂，宴百官。多治氏奏田舞，安倍氏奏吉志舞。木居中長說：吏部王記云：昔安倍氏先祖伐新羅有功，報命會大嘗，因奏此舞。故相傳爲大嘗會舞，至民間風舞，亦有華人風舞歌舞，猶生秀曾說：古者

諸國風俗歌舞，其國造常於朝觀時奏之，如七歌所之職，集諸國之歌以知其風俗，此隼人所奏風俗歌舞，其陸摩大隅之歌舞也。又有筑紫舞。續日本紀說：天平三年，定雅寮雅樂生員，筑紫舞二十人，諸縣舞八人。又日本紀，寶龜元年三月，葛井船津文武生藏六氏，男女二百三十人供奉歌垣。其服皆著青摺細布衣，垂紅長紐，男女相并，分行徐進。每歌曲折，舉袂爲節。續日本紀說：天平六年，天皇御朱雀門，覽歌垣，男女二百四十餘人，五品以上，有風流者皆交雜其中，正四位下長田王等爲頭，以本末唱和，令都中士女縱觀，極歡而散。賜供奉歌垣男女等各一差。又天平二年，帝御大安殿，百官主典以上，陪從踏歌，且奏且行，引入宮裡。日本國志說：考和歌本民間歌謠。上古無文字，口語相傳，迨伊呂波乃併漢字音填之，句長短無定，今通行五句樂。三十一言之歌，始於素盞鳴尊八雲詠。初五言，繼七言，繼五言，繼又七言，其聲哀而怨。古歌本以合樂，其後乃校文字工拙，萬葉集所載，有歌仙歌聖之名，今內廷尚有歌會，每月合詠，或名之曰國詩曰國風，這是風俗的歌舞。其曲有難波曲。日本紀：天武四年，勅大倭河內等國，選所部百姓能歌男女而貢。上谷川氏曰：蓋采其國風，所謂難波曲，每部曲，近江永莖之曲之類是也。又有淺茅原曲，八雲刺曲。總之日本國有的歌曲跳舞，其大畧如是。至隋七部，謂樂有倭國伎，其聲容若何今不詳。

（二十一）迷信

古代日本人關於迷信的有下列幾件事。第一是迷信天神。當佛教初次傳入的時候，適遇天花流行，日本人以爲犯了天神之怒，於是把那佛像佛寺毀拆了。其次是迷信太陽之神。當日人和敵人打仗的時候，日本人總要設法讓日光從他們的陣後射出，經過他們的肩，照到敵人的面上。他們以爲有了這樣的陣勢，方能得到太陽女神的幫助。下面的故事，便是這信念的例證。有名的神武天皇有一個兄弟帶一隊兵去征土蠻，可是忽然失順，被敵人射了一箭，當時這位日本的皇子向着日光喊道：『我以太陽女神的兒子的地位，反向着日光打仗是不對的，因此，我便受了敵人的害』

○足見日本人是迷信太陽之神的，再有一件可笑的事，古事記說：

「婦人產子，居於黑室，不得通透日光，亦無人侍問，若通透日光，則謂遭天神譴責，而侍問者亦不祥」。

古代日本人又信卜筮。芬納謨日本小史說：

「日本出發打仗或遠征之時，必先用卜占術去問神的意思。最古的占卜法，是用一塊鹿的肩胛骨，把上面的肉完全消盡之後，便把來放在火上烤炙，到火把骨炸裂，神祇的意思便從裂紋的形式和方面中看出。到了後來，却用龜甲去代替鹿骨」。

因爲用了龜甲，所以三國志倭人傳說：

「其俗舉事往來，所有云爲，輒灼骨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文所

占兆」。

又隋書倭國傳說：

「知卜筮尤信巫覡」。

其實卜筮是由中國傳入去的。

古代日本還有一件迷信而可笑的事情。三國志倭人傳：

「其往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則僱以財物，其有疾病遭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日本人又以鹿爲神物。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鹿在日本是認爲一種神，其地位遠在神之上。殺了鹿就得死罪。我們讀日本古傳中說：常見有關於此等鹿，饒有趣味的記載。每家在早起時，必先到門外去看一看，有沒有鹿死在大門外，如果有的，那末就趁大家沒有起來時，拖到他家門口，這樣到最後總有一家橫遭不幸」。

這就是神鹿的故事。總之古代日本人各種迷信是極為可笑的。

(二十一) 民性

(一) 恬靜

魏志說：

「人性恬靜，罕爭訟，性率直，有雅風，……雖有兵，無征戰」。

環瀛志畧引海國聞見錄：

「立法嚴，人少鬭爭，犯法者輒走山谷自殺，呼童僕鳴掌則息」。

(二) 好潔

環瀛志畧引海國見聞錄：

「性尚潔，街衢時時掃滌」。

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古代日本人性好整潔，日不聞人聲」。

(三) 好勇

據說野見宿禰和他的敵人當麻蹶速在崇神天皇（西元九七——西後三十年）面前，舉行角力，結果當麻蹶速就很慘酷的被野見宿禰踢死了。這是古代日本人好角力的習俗。又日本開國五十年

史說：

「山林爲狩獵之場，獵者得以此競武勇。雄畧天皇慕姿雄邁，曾獵於葛城山，偶有野豬狂躍向帝，帝以弓射之，復蹴殺之，蹴殺者角力之術也。獵已畢，帝欲新怯退者，皇后諫之乃止」。

因爲古代日本人好角力，所以後來形成武士道之風。

(四) 好酒

魏國志倭人傳說：

「人性好酒」。

這是古代日本人好酒的事實。

芬納模日本小史說：

「製的米酒却是人人共嗜。今古如一，日本故事中常說：他們的神只喜飲米酒，而成焉的米酒，却是敬神最妙之物。每個日本人都飲米酒，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皆然。直至今日，仍是他們最歡喜的飲料」。

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例如講到飲酒，我們將下列有詩意的大話，放在應神皇帝的口裡，我以為 Sushikori 蘇婁的美酒所沈醉了，我以為撫慰人的酒微笑着的酒所沈醉了」。

日本國志說：

「應神時，有酒人名仁菰，自外國來，釀酒獻帝，帝喜作歌，於是釀酒始精，然殊少佳品，今通行者色如今之紹興酒，而味又不如。然倭人嗜飲酒，每釀產酒值銀數千萬元，課稅可得五百餘萬元」。

可知日本人好酒的習慣，是古今相同的。

總之，日本的原始文化，都是陋劣可笑的。若無中國文化的輸入，則恐日本雖有進步，永不能脫離野蠻的國家。

第四章

中日歷代交通之路綫

我們想說明我國文化輸入日本，又先要明白中日歷代交通之路綫。在原始的時代，中日隔了汪

洋的大海，航術又未發明，而謂古時中日兩國有聯絡之路，驟觀之，似屬謬妄。然明白日本海古代有左旋的回流，則這問題，易於解決了。我們於是先要把日本海左旋回流的情形來說一說。

回溯中生時代，亞洲南部陸地是與南洋羣島、澳大利亞連結成塊的。後來滄海桑田，變幻無常，故到了新生時代的初期，亞洲、台灣、呂宋和菲律賓連結成塊的。後來滄海桑田，變幻無常，故到了新生時代的初期，亞洲南部陸地，被地殼變動及海洋衝破之結果，於是有海洋之凸出，而我國南部陸地與南洋羣島澳大利亞，遂被南海隔開了。東部陸地，也被地殼變動及海洋衝破之結果，於是有海洋之凸出，而我國東部陸地與菲律賓呂宋琉球日本，遂被東海隔開了。中日既隔了一大海，交通似為不便。然海洋固可以阻隔交通，亦可以聯絡交通。日本內田博士國史總論說：『海之為物，能使國與國相隔，又能使國與國相連絡，遠距離之交通，航海反易。故古代海上之交通，亦意外容易，且往來頻繁。』這是不錯的。原始時，人民渡海，大都是乘獨木舟隨着海洋的自然潮流漂浮而去。所謂自然潮流者，因海洋受溫度之影響。故海洋有寒流與暖流之分別。又由其流於水面與否，而有皮流與潛流之分別。普通的海洋雖皆為皮流，但和他種海流衝突時，那溫度低和比重大的海流，則成為潛流。溫度高和比重小之海流，則成為皮流。寒暖二流衝突，既成潛流，則潛流必伏流於暖流之下。迨至暖流盡處，又浮出而為皮流。日本海內之自然潮流有二。一為寒流，一為暖流。寒流起源於開宮海峽之利曼，沿着俄屬東海濱省東岸，及朝鮮半島東岸南下以至日本。暖流起源於呂宋，沿着台灣琉球北上以至日本島。南下的寒流，與北上的暖流相會於對馬海峽之間，互相擊撞。其結果溫度低，及比重大的寒流潛伏於溫度高及比重小之暖流之下，於是沿註其周圍陸地，而成為左旋回流。此種向左旋轉之對馬海流，沿着山陰北陸海岸東北行，到了津輕海峽及宗谷海峽，遂分為小支流，逐漸微弱，直至庫頁島西岸而消滅。

日本海的潮流既有如此的狀態，所以日本古代的阿夷奴種及通古魯民族得由西伯利亞乘獨木舟渡過開宮海峽順寒流而至日本北部。印度支那族、印度尼西亞人及馬來人得順着暖流北上渡至日本。

九州的地方。中華民族則順着左旋回流渡過對馬海峽而至日本。可知左旋回流是古代中日交通之一條好好的自然路線了。可惜古代歷史家對於地理學沒有認識，不懂得日本海有左旋回流的状态，故沒有史乘可徵，至一九〇六年，日本和田雄治博士受了日本水產調查會之委託，於是開始用投瓶方法去測驗日本海之海流，那時和田雄治投瓶的地點是在朝鮮半島西岸仁川及東北岸關門江之間，尤側重投於釜山與清津之地帶。他投了許多瓶，貼以號數，投於海面，任其漂流，迄至一九一二學止，一共投了七百五十個的空瓶。後來發現漂至海岸的有一百三十五個。一九〇八年，日本海軍省水路部為研究日本海流起見，也曾投瓶測驗，一共投去了五百五十個空瓶。後來在海岸發現了二百零七個空瓶，總計和田雄治及海軍省水路部投瓶之結果，竟在日本海岸發現三百三十九個，其中漂流至日本之山陰北陸沿岸的，佔了二百七十四個。又一九〇四或一九〇五年，即明治天皇三十七至三十八年日俄戰爭之際，據日本海軍部之發表，日俄所安置於海底之機械水雷，發現漂至日本海岸的有三百五十七個，其中漂至山陰北陸海者約佔二百四十八個。這麼一來，足見日本海確有左旋回流之實力，是古今不變的，至關於水雷及空瓶之發現地點，據和田雄治之調查報告（見歷史地理雜誌第二十卷第三十四號和田氏之日本海流）其結果如下。

山陰道	水雷五一	投瓶三一
北陸道	水雷一九七	投瓶二四三
東海道	水雷一八	投瓶一
南海道	水雷二	投瓶一
西海道	水雷一	投瓶無
北海道	水雷四四	投瓶四五
千島海岸	水雷無	投瓶一
庫頁島海岸	水雷一	投瓶二

朝鮮東海岸

水雷六一

投瓶一四

琉球海岸

水雷無

投瓶一

由這種調查結果看來，水雷及空瓶以潮流至山陰道北陸道爲佔多數，又足見日本海有左旋回流的力量，了無疑義。所以先秦時代之徐福是由山東半島渡過辰韓，由辰韓順着左旋回流而渡至日本。統言之，凡先秦時代的文化都是順着這種自然的海流之路線輸入日本。日本海左旋回流對於日本文化之貢獻可謂大矣。

至西漢時代，即西元前後二三世紀時，中日之交通路線，據近代日本考古家在日本九州筑前博多灣一帶的地方，發現了許多銅劍銅鐙。在筑紫郡海邊又發現了許多王莽時代的貨泉，在九州志賀島叫崎地方又發現了漢光武時御賜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後漢書東夷列傳又說：「倭在韓東南大海中，……自武帝滅朝鮮，使騁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又說：「遼東太守祭彤，威懼北方，聲聞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由後漢書及發現古物的地點綜合看來，便知在兩漢時代，中日的交通路線，是由中國的閩都是安或洛陽起點，假道於朝鮮半島，再由朝鮮半島渡過對馬海峽而達至日本的九州，筑前，博多灣一帶之地。

到了三國時代，中日的交通路線，據三國志倭人列傳說：

「從郡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瀟海，至一支（原作一大誤，隋書倭國列傳作一支）國，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東行至奴國，百里，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

這裡所說的郡，即是帶方郡，即現今朝鮮京畿道南部之地。狗邪韓國即現今朝鮮半島金海之地。對馬國及一支國，即現今對馬島及壹岐島之地。末盧國即現今肥前松浦郡之地，伊都國即現今筑紫怡士郡之地，奴國即現今筑紫那珂郡博多之地，不彌國即現今筑前宇漕之地。是則在三國時

中日交通的路線，是由魏都洛陽起點，歷朝鮮京畿道之南，經金海之地，始渡對馬海峽，然後至日本之肥前松浦郡。筑紫之怡士郡，筑紫之那珂郡博多灣，再至筑前之宇瀨，才至於邪馬臺國。至南北朝時代，中日的交通路線，據日本書紀雄略紀所說：

「雄略天皇八年（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西元四六二年）二月，遣身狹村主，檢限民使博德使于吳國。十年九月，身狹村主携吳所獻二鵝抵筑紫」。

「雄略天皇十二年（宋明帝泰始三年西元四六七年）四月，身狹村主青與檢限民使博德出使于吳。十四年正月，身狹村主青等共吳使携吳所獻手末才伎，漢織吳織及縫兄媛弟媛等泊於住吉津」。

宋書蠻夷列傳所載倭王武（雄略）所上的表文說：

「道經百濟，裝治船舫，而高句麗無道，罔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

日本書紀所謂吳即是劉宋，日本通聯于南朝之路，一則曰道經百濟。由宋歸國時，一則曰到九州之筑紫，一則曰泊於畿內之住吉津。是日本這時通中國之路，是由難波河之住吉津起航，沿瀬戶內海至於九州之筑紫郡，再北經對馬海峽渡過百濟。但到百濟時有高句麗之掠抄，於是不能通過遼東，只由百濟橫過黃海沿山東江蘇海岸，始入宋都之建康。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說：「倭人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可知在南北朝時，中日之交通路線與前代不同。南北朝以前，一定要經過遼東，南北朝時，則由百濟浮海沿山東江蘇海岸，而入宋都。由宋返日本，也由此路經過百濟渡對馬海峽至九州之筑紫郡沿瀬戶內海至難波河之住吉津而入大和。

至於隋代中日之交通路線，據隋書倭國列傳說：

「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即裴世清）使于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經都

斯麻國，迤在大海中。又東至一王國，其人同華夏，以爲夷州，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于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

竹島即朝鮮金羅南道珍島西南之一小島，耽羅即今濟州島，都斯麻國即今對馬島，一支國即今壹岐島，竹斯國即今九州之筑紫，秦王國即今周防之地。日本書紀又載裴世清於推古十六年四月抵九州筑紫，于推古十六年九月自難波啓程歸國之事，可知那時中日之交通路線，是由隋都長安起程過山東，渡過百濟至朝鮮金羅之南，又渡對馬壹岐兩島，然後至九州之筑紫，再至周防經過難波，始入大和。

至唐代二百八十八年（六一八——九〇六年）之間，中日之交通極盛，內中除了兩國商船往來貿易之外，照中日的史書所載，日本之遣唐使共有十四次之多，送唐使共有四次，兩國之交通可謂盛極了，因爲交通既繁，則交通之路線必多。關於唐代之中日交通路線，王輯五的中國日本交通史已有了詳細的說明了。現在把王先聲的話抄錄于后。他說：

「遣唐使之入唐，概分南北二路，北路亦名渤海路，已始於遼隋使時代，至唐代初葉仍沿用之。南路始於中唐以降，七〇一年，（武后長安元年）第六次遣唐使始通行之。北路自難波解纜經瀨戶內海，至九州博多，更經壹岐對馬，沿朝鮮半島西南岸，橫斷黃海或渤海，至山東半島登岸，至其詳細路程如次：

北路 難波三津浦——瀨戶內海——下關海峽——筑紫大津浦（博多）——百濟沿岸——黃海——登州——萊州——青州——兗州（或濟南）——曹州——汴（開封）——洛陽——函谷關——潼關——渭南——長安（唐都）。

南路 初自博多沿筑紫西岸南下，經高島橫斷東海而至長江口。自唐代末葉以降，則不經由南島，逕由筑紫之值嘉島，橫斷東海而達長江口者，至其詳細路程如次。

南路 難波三津浦——瀨戶內海——下關海峽——筑紫博多——南島——值嘉島——東海——長江口——揚州

（高郵）（楚州）（淮安）（廣濟渠）（通濟渠）（徐州）（彭城）（汴）（洛陽）（以下與北路同）（長安）（唐都）。

按南北兩路，在水路方面，南路短於北路，北路多碇泊所，所費日數亦多於南路；在陸路方面，南路亦短於北路。揚州距長安二千七百五十三里，登州距長安三千一百五十里。且南路實於水運之便，由長江口至汴，殆不踏陸地一步，惟當時造船航海術幼稚，橫斷東海，殊多危險性，然自唐代中葉以降，卒冒此危險，取道南路，而拋棄安全北路于不顧者，是何故耶？蓋當時新羅勢強，已滅百濟高句麗，而統一半島，更乘勢無禮於日，威脅其入唐航路，故自七〇一年第六次遣唐使以後，入唐使船概不通過新羅領海。遂舍北路取道南路也。唐書日本傳謂『新羅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貢』。是遣唐使取道於南路之左證矣。自唐代中葉，多瀨（種子島）夜久（屋久島）奄美（大島）度威（德之島）等島，概服屬日本，南島既歸日本勢力範圍，故斯時之遣唐使，漸沿筑紫西岸南下，經夜久吐火羅（寶七島）等島西航，橫斷東海，而至長江口附近也。

王輯五對於唐代中日交通之路線，可謂說得周詳無漏了。

至於宋代，兩國往來之僧人固多，兩國之貿易亦盛。宋船至日貿易，概先入九州博多港，即舊國所稱唐太宰府，太宰府即派人查驗，呈報京都，并安置宋商於博多之鴻臚館。南宋時，中興會時代，日本亦以筑前之博多及肥前之平戶為外商寄泊之所。但查貨之權，則由太宰府移於鎮西守護少貳氏藤原為泰行大友氏之手。兩宋之對日貿易則在明州，而日商也有至秀州泉州貿易的。所以南宋之中日交通路線，則由博多灣起點，渡東海而至明州泉州。

元代之中日交通路線，則由博多平戶以至福州泉州寧波（即明州）。

明代之兩國交通路線，分為中國路與南海路。中國路是由兵庫博多值嘉島以至寧波徐州蘇州鎮江揚州淮安濟寧天津通州北京，向南往則至南京。南海路是由堺至幼津寧波徐州蘇州鎮江揚州淮

安濟寧天津通州北京，向南去則至南京。

清代的兩國交通路線，則由長崎渡至浙江之普陀山，以至南京寧波温州福州廈門漳州廣東等地。歷代中日交通之路線，既如上述，所以中國文化輸入日本，都是沿着這種路線的。

第五章

儒學之輸入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是始於徐福之東渡，而儒學之輸入，亦始於徐福之東渡。但古今學者對於徐福東渡之事，常起懷疑。所以我們想說明中國儒學是否由徐福輸入日本，先要說明徐福東渡那一回事是否足信？現在把徐福東渡的事，研究一下。史記封禪書說：

「……秦始皇併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至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史記秦始皇本紀說：

「齊人徐市（市讀爲蔽蒂甘棠之蒂，古輕唇音歸重唇，蒂與福同爲重唇音，讀若逼，故徐市即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等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方士入海求仙藥，數歲不得，意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說：

「昔秦絕先王之道，……又使徐福入海求仙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臣，言曰：汝國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悉具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鉤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始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

人，資之五穀，賴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前漢書郊祀志說：』

『……及至秦始皇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後漢書東夷列傳說：

『……又有夷洲及澶洲。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
吳志孫權列傳說：

『黃龍二年春二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海浮求夷州及亶州。亶州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州不還，世相承，其土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

日本松下見林之異稱日本傳說：

『其所止謂平原廣澤，不言地名，後漢書亦謂夷洲澶洲，北史及隋書以秦王國爲夷洲云，不能明也。』

據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本紀及前漢書郊祀志所說，是徐福未能抵達三神山，已返回報告秦始皇說明求藥不得的原因，是爲大風及鯨魚所阻的。然據史記淮南衡山王列傳，則謂徐福不復返國，止居於平原廣澤。據後漢書東夷列傳及吳志孫權列傳，則謂徐福止居於夷州亶州，而且世世相承，子孫蕃衍，時到會稽貿易，則徐福之未曾返秦，是有事實的根據。究竟夷州亶州，雖不能說明是什麼地方，然必是日本之地。所以日本的史書，多載徐福至日本之事。日本通鑑說：

『孝靈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

考孝靈天皇在位，是由西元前二百九十年至二百一十五年，其間共爲七十五年，孝靈七十二年

●即秦始皇二十九年。即西元前二百二十年。徐福於始皇二十八年（孝靈七十一年西元前二百一十九年）東渡，至始皇二十九年抵達日本，是日本通鑑所說是與史記所說年代相同的。又日本神皇正統紀孝靈天皇之條說：

「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長生不死之藥於日本，日本欲得彼國之五帝三王遺書，始皇乃悉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彼國因焚書坑儒，孔子之全經遂存於日本。」
林羅山的羅山文集說：

「徐福之來日本，在於焚書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想蝌蚪篆籀漆竹牒，時人知者鮮矣。其後世世兵燹，紛失亂墜，未聞其傳，嗚呼惜哉！」
松下見林之異稱日本傳說：

「夷洲瀆洲皆稱日本海島，相傳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之地，有徐福墳。又曰：熊野新宮東南有蓬萊山，山有徐福祠。近沙門絕海入明，太祖皇帝召見，指日本圖問海邦遺跡，勅賦熊野詩，絕海賦曰：熊野墳前徐福祠，滿山草藥雨餘肥。祇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御製賜和曰：熊野墳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昔日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見蕉堅蒿木）所謂徐福祠者，謂蓬萊山祠也。此祠屬熊野大權現，熊野大權現者，神代明神書於國史，式條昭昭也。徐福觀國之光來止，脫于虎豹之秦，死為神，在熊野之間，亦匪直人也。或曰：歐陽永叔日本刀歌曰：徐福行將經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劉氏引原始秘書曰：日本之學始於徐福，然則其德可稱之而為始，我則不信也。」

新井君美的同文通考說：

「今熊野附近有地曰秦住，土人相傳為徐福居住之舊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其間古蹟參差，相傳為其家臣之塚，如斯舊蹟，今又相傳，且又有秦姓諸氏，則秦人之來往，乃必

然之事也』。

和山歌縣所撰的和山歌縣史蹟名所誌說：

『秦徐福之墓在新宮町。墓前有石碑一，上刻『秦徐福之墓』五字，傳爲李梅溪所書。相傳往昔秦始皇帝時，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穀種類及耕作農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浦登岸，從事耕作，養育童男童女，子孫遂爲熊野之長，安穩度日。又徐福所求不老不死之仙藥地之蓬萊山，在由此向東三町許之地，樹木蒼鬱繁茂，山形如盆，自成仙境之觀焉』。

野崎左文所撰的日本名勝地誌說：

『舊城東之海岸，熊野之田園下，有老樟二樹，德川賴宣建一坊，題曰：『秦徐福之墓』。去墓三町，有小壘七，爲徐福從者之墓。鄰郊東南半婁郡木町之東，有秦須浦（亦稱波多須浦）爲徐福船泊於矢賀磯而暫居之地，後雖移居新宮，惟秦須浦尚有秦氏』。

除上所引述之外，其他如仁井田好古氏之徐福碑，高谷瀨夫之日本史，紀伊續風土記，寬文雜記等書，都有說及徐福東渡之事。獨賴襄作政紀，乃將徐福東渡之事刪除之耳。又我國的瀛環志略說：

『泉州陳資齊提軍（倫炯）少時嘗附商船遊日本，言其風土甚悉云：日本人皆覆姓。單姓者徐福配合之童男女也。徐福所居之地，名徐家村，其塚在熊指山下云』。

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孝靈在位的時候，正當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時候。相傳秦始皇所差遣到海外求仙的專使徐福果然到了這裡。這位專使奉秦始皇之命，帶了一般的童男童女來尋長生不死之藥的。他失敗了，不敢再回中國去，所以他就在日本住下，據說因此却保留了許多帶來的書籍。沒有給秦始皇燒去』。

綜合上文所引的中日及其他的史書看來，則我們對於徐福東渡日本之事，是用不着懷疑的。況

查現存日本紀州牟婁郡新宮町裡，徐福與其從者的墳墓，巍然屹立着，秦姓諸氏仍然恭行於新宮及秦須浦。日本人之單姓者皆徐福之後，則徐福東渡，尤信而有徵。所以至明治初年，我國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之日本雜事詩，有吟及徐福遺跡的。其後又有我國駐日公使黎庶昌之訪徐福墓記。和山歌辭（舊熊野地）文學之士，爲紀念徐福東渡的史蹟起見，曾組織一個徐福史蹟保勝會。至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〇年）由該會舉行一次徐福來日本二千年的紀念大會，以示不忘。是徐福留居於日本，到了現在仍爲日本人所深信。

但徐福東渡日本，所經的路線是怎樣的呢？王輯五的中國日本交通史說：

『然則徐福等秦人羣東渡之事，其所經由之路徑若何？是否利用日本海之左旋回流，經由半島渡至日本？實有論討之必要。按山東半島與朝鮮半島僅限咫尺，東西對峙，齊人徐福等由山東半島登舟東渡，不難漂至朝鮮。當時朝鮮南部，三韓鼎立，馬韓位於西，辰韓位於東，弁韓居其南。後漢書東夷傳韓國之條謂：『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七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別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是知辰韓領地爲馬韓所割與，因其多避難於半島之秦人，故亦稱之曰秦韓。徐福等秦人羣之入海求仙，據史記之淮南衡山列傳所載，亦爲逃避始皇虐政而東渡者也。此由山東半島東渡之徐福等秦人羣，亦不能謂其絕對不能漂至辰韓，更不能謂其絕對與辰韓無關，果辰韓即秦韓，乃爲徐福等秦人羣所組成之一集團，則住於此半島東南部之秦人集團，爲滿足其擴張慾及探險慾起見，自不免苟什後繼，三三五五乘獨木舟任其漂流，卒因日本海左旋回流關係，均前後漂至日本山陰地方，至徐福本人漂至日本否，竊以爲尚非重要之問題也。』徐福東渡所經之路線若何？雖沒有事實以爲證明，然就當時交通的情勢看來，大約是由山東半島漂流至辰韓，再由辰韓乘獨木舟而至日本山陰一帶的。

既已證實徐福確有東渡之事，則徐福對於日本文化之影響，是怎樣的呢？據日本國志說：

『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又周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于祭，有罪則誦禳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當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徒黨與』。

又據日本神皇正統記羅山文集及歐陽修日本刀歌所說，則我國的典章制度書籍是由徐福等輸入日本的。我國書籍既由徐福等輸入日本，則這一次便是我國儒學輸入日本之始。

到了日本應神天皇時代，一班秦人漢人到了日本。據日本姓氏錄所載謂由樂浪帶方二郡移來之中國人，乃弓月君（融通王）率來之秦人，及阿知使主並其子都加使主率來之漢人也。弓月君事，見應神紀十四年，阿知使主事，見應神紀二十年。可知他們之入日本確在應神時代。他們到了日本之後，對於儒學亦有輸入。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

『秦人漢人等所用之語言文字，乃以數千年之漢人文化為背景，而有假雜之內容者。彼等帶來之思想中，蓋含有儒家思想』。

足見弓月君阿知使主等之來日，中國儒學亦因之而輸入日本。又入宋僧人齋然攜來的日本年代記說：

『應神天皇甲辰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

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儒教篇說：

『應神帝之朝，百濟王遣阿直岐至日本。阿直岐善談經典，尚言其國有王仁者，勝於己。帝即徵王仁。翌歲，王仁來朝，獻論語聖卷，千字文一卷。是在踐阯十六年之時。太子菟道稚郎師事王仁，而得通曉於典籍』。

日本國志說：

『日本之習漢學，蓋自應神時始。時阿直岐自百濟來，帝使教太子菟道稚郎以經典。帝

謂阿直岐曰女國有愈于女者乎？曰：有王仁者邦之秀也。十五年又徵博士王仁。仁始齋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而來。」

關於這事，後世學有曾發生兩個疑問。即：應神天皇的年代問題，及千字文是否由于應神時輸入的問題。據日本那珂博士的上世紀年考，則謂應神天皇時代，當西元三百六十三年至四百一十八年，其在位時間共五十六年。據日本星野博士的本邦上古紀年私考，及吉田博士的日韓古史衡，則謂應神天皇時代，當西元三百零三年至三百九十四年，其在位時間為九十一年。木宮泰彥則謂為大約在第四世紀中葉至末葉之間。岡藤勝二的國語史畧則謂漢文傳入日本，在應神十五年，即西元二百五十年。然那珂星野吉田木宮泰彥等所說的年代似乎太過。因為當西元三百年以後，已是仁德天皇的時代了。（仁德繼應神之位，享國九十餘年）岡藤勝二所說的年代又似乎太早，因為西元二百五十九年，即魏廢帝正始四年，那時神功皇后尚未逝世，則西元二百五十年還是神功皇后的時代，何得謂即應神天皇十五年？但考其他各書，我可以斷定應神十六年，即西元二百八十五年，因為應神是神功皇后之子，神功皇后于西元二百六十九傳位於應神，則應神十六年，即西元二百八十五年，加上十六年，即西元二百八十五年。以此推算，則應神十六年即晉武帝太康八年。既斷定應神十六年即晉武帝太康八年，則千字文斷不能於那時輸入日本。因為王羲之生於晉元帝太興四年，死於孝武帝太元四年，即由西元三百三十一年至三百七十九年。周興嗣編王羲之千字草書為韻語，是在梁武帝天監年間，即由西元五百零二年至五百一十九年。當應神十六年，不但周興嗣編的千字文尚未成書，而且寫千字文的王羲之還未出世。這樣看來，日本史謂于應神天皇時代從百濟國得到千字文是不足信的。但千字文是有兩種。一是王羲之所寫周興嗣所編的千字文，一是鍾繇所創王羲之所寫的千字文。尚書故實說，千字文，梁書南史皆以為王羲之之書。景園齊帖題曰：「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于是知日本所得的千字文，是鍾繇的千字文，而不是周興嗣的千字文。

論語千字文既傳入日本之後，那時日人學習的情形是怎樣的？日本國志說：

「自王仁齋論語千字文來，帝使教太子，以言語珠用，前立文字，各指示實物以教之。如教草木則指草木，教禽獸則指禽獸，一切有形之物，皆指喻而後能通。然後加之以音，教之以義，教之以訓，蓋其難矣。漢籍之來，僅十餘年，高麗王上表，表文不遜，皇子稚郎子讀而怒裂之，即能通文義矣。」

可知日人學習漢文，是經過許多困難，方能通曉的。

自應神之後，至繼體天皇七年（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西元五一三年），有五經博士段楊爾由百濟來日本，傳授儒學。繼體十年（天監十五年西元五一六年），五經博士漢安茂來代段氏講學，這時日始有五經之名。所謂五經，據日本紀所說，即禮樂書論語孝經。自此之後，日人更通漢學，故至履中四年（晉安帝元興二年西元四〇三年），遂置國史於諸國以記時事。欽明十五年（梁元帝承聖三年西元五五四年），又有百濟五經博士王柳貴馬丁安，易博士王道良至日本，講授經學。以上所說的，都是當我南北朝的時代。在這時代中，儒學雖然輸入，然日本人並不普遍學習，祇令王子大臣學習，及行於官府而已。又那時的儒學，祇是間接由百濟輸入。但間接的輸入，異於隔霧看花，見不到儒家的廬山真面目。

迨至我國隋代，隋文帝收統一之效，兵威遠播於遼東，高麗百濟等國，相繼入朝，於是日本有使節之派遣。有隋一代，僅歷三主，凡二十八年，即由西元五百八十九年至六百一十七年，日本使者入朝於隋，共有四次。隋使至日本也有一次。那時適當日本推古天皇在位，由聖德太子主理政治，聖德太子在國家制度上，欲以儒教為立國之大本；在人民信仰上，欲以佛教為涵養性情之圖策，於是除了派遣使臣及通譯員外，又派有十二個學生入隋留學。這學生的姓名如下表：

附留隋學生一覽表

人 名	入 隋 年 代	歸 國 年 代	留學年代
倭漢直福因	推古十六年隋大業四年西元六〇八	推古三十一年唐武德六年西元六二三	十五
奈羅譯語惠明	同上	?	
新漢人惠齊	同上	推古三十一年	十五
惠 光	?	同上	
醫 惠 日	?	同上	
重 雲	?	舒明四年唐貞觀六年西元六三二	
新漢人晏	推古十六年	同上	
勝 島 養	?	同上	二四
惠 雲	?	舒明十一年貞觀十三年西元六三九	
志賀漢人惠隱	推古十六年	舒明十一年	五一
高向漢人玄理	同上	舒明十二年貞觀十四年西元六四〇	五二
南淵漢人簡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新漢人大國	同上	?	?

這班留學生歸國之後，對於日本的儒學影响頗大，大有「廣惠於天下」之勢，到了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西元六四五五年）日本舉行大化改革，參加改革運動之代表人物爲高向漢人玄理及斯漢人旻。這兩人在改政時被舉爲國博士，大化改革之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鎌足曾受過留學生南淵請安之學，他們兩人皆以玄理爲維新顧問，籌畫改革事宜。大化改革之政制，如收土地爲公有，建立中央集權制度，設置八省百官，實行班田賜祿法，又分刑法爲笞杖流徒死五等，編定戶籍，效唐行租庸調的徵兵法，都是這班留學生建設的成績。新漢人旻在大化元年因舉爲十師，而重雲及惠雲亦各被舉爲十師之一。可見這班留學生歸國後，在日本煽動儒風了。然這班留學生留學於隋的時間，雖間有三十餘年之久，但這種初次的留學，當然達不到美滿的成績的。

到了唐代，我國武功顯赫，文教興盛，威震四夷，德被四表，異族之間風慕化者，絡繹不絕。東夷日本，對於唐代的文化尤爲欽仰，於是派遣許多使臣及留學生來中國。按有唐一代，享國共有二百八十八年，（日本推古天皇二十三年至醍醐天皇六年西元六一八至九〇六）據新舊唐書及日本史冊所載，遣唐使不下十八次。自唐之初葉，即自唐開國至高宗之末，約六七十年，遣唐使之組織，尚無一定。自唐中葉，即自武后至安史平時，約七八十年，遣唐使之規模擴大，與使者同來的人員，多至五六百人，內有大使四人，副使五人，判官錄事各數人，下有翻譯醫師，陰陽師，船師，船匠，射手，水手等職員，并有學問僧留學生來學。學問僧留學生之內，又有還學生還學僧之別。還者往而復返之謂也。復有請益生請益僧之別。請益者，已受教而又有所請之謂也。唐之末葉，即自安史之亂平定後至唐亡，約一百四五十年，遣唐使仍絡繹不絕。所以我國文化之東渡，實以唐代爲最盛。那班留學生以及學問僧實爲變化之直接的移植者。故木宮泰彥的中國交通史說：「日本中古之文化，全係由唐移植之文化，無論何人，決無異議，其直接移植之文化者，則赴唐留學生也」。誠哉是言。

日本在唐代，何以要派遣多量的學生入唐留學呢？因為日本入隋留學的學生惠齊惠光等返國後，對日皇說：『唐禮義之國也，宜常相聘問，學生在唐者皆已成器，願召還之』。於是日本始知隋滅唐興，而又知唐文化之盛，因之召留學生之派遣。

日本留唐學生姓名一覽表

人 名	入 唐 時 間	歸 國 時 間	留 學 年 數
巨勢臣 蘇我	白雉四年唐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		
冰連老人	同上		
知 辨	同上	白雉五年永徽五年西元六五四	一
石 積	同上		
高 黃 金	同上		
智 宗	同上	持統四年唐中宗嗣聖七年西元六九〇	三八
筑紫君薩野馬		天智十年唐高宗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	
韓島勝婆娑		同上	
布師首磐		同上	

土師宿彌甥	天武十三年中宗嗣聖元年西元六八四		
白緒史實然	同上		
淨願	持統四年中宗嗣聖七年西元六九〇		
吉備真備	養老元年唐玄宗開元三年西元七一二	一七	
大和長岡	同上	一七	
阿部仲麻呂	同上		
素行			
金文學			
藤原刷雄	天平勝寶四年唐天寶十一年西元七五二		
膳大丘	天平勝寶間		
船連夫子	天平勝寶六年		
高內弓	天平寶字七年唐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		
諸山人			

朴山人			
伊豫部家守		孝德九年唐代宗大歷十三年西元七七八	
栗田鮑田麻呂		延慶二十四年唐順宗永貞元年西元八〇五	
攝逸勢	延慶廿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西元八〇四	大同元年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	二
春苑宿禰玉成	承和五年唐文宗開成三年西元八三八	承和六年唐開成四年西元八三九	一
菅原梶成	同上	同上	一

石積即坂合部連磐積，歸國之後，奉天武天皇朝勅，撰新字一部，凡四十四卷，此事見於日本紀。

大和長岡在中國學刑名之學，歸國後，與吉備其備同刪定律令四十四條，此事見於日本續書紀。余文學的原名不明。文苑英華有沈重頌送金文學還日東詩，異稱日本傳謂他即吉備真備，未必足信。

藤原刷雄是藤原仲麻呂第六子，因仲麻呂之亂，流於隱岐，後被放，桓武朝為大學校長，此事見於續紀。

膳大丘任長安國子監學煙史，歸國後，為大學助教，後為博士，神護景雲二年（唐代宗大歷三年西元七六八年）七月，奏請尊孔子為文宣王，許之。日本奈良朝儒學之興盛，實由於他努力提倡之功。此事亦見續紀。

朴山人原名不明，文苑英華有賈島送朴山人歸日本之詩。

伊豫部家守在中國研究五經大義，說文及切韻，歸國後，建議定孔子之享坐爲南面，舉爲大學助教。事見國史紀事本末。

攝逸勢在長安歷訪明哲受業，唐之文人呼之爲攝秀才。事見文德寶錄。

春苑宿禰玉成爲遣唐陰陽師陰陽請益入唐，傳入難及一卷，以教陰陽寮諸生，事見續後紀。

以上是留學生中之鐵中錚錚者，而尤以阿部仲麻呂及吉備真備爲最有名。阿部仲麻呂即是仲滿，在中國最久，易名晁卿，仕於唐，官至散騎常侍，鎮南都護，對於詩學甚爲嫺熟，常與中國詩人唱和，當時詩人如王維包佶儲光義趙驥等，見仲滿歸國，都作詩送行，推爲詩仙的李太白聽見仲滿泛舟過風的消息，即有哭晁卿行詩一首『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遶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可見仲滿在中國爲文人所推重了。吉備真備歸國後，即仿中國文字創立片假文字，是爲日本有文字之始。吉備真備又携有下列的書籍及器物返國。

唐禮一百三十卷

測量鐵尺一把

露面添四節角一張

大衍歷立成十二卷

樂書要錄十卷

射甲箭二十隻

大衍歷經一卷

鐵如方響竇律管聲十二條

平射箭十隻

銅律管一部

馬上飲冰冰角弓一張

絃續漆角弓一張

以上是就留學生來說，至於入唐之學問僧，如最澄圓仁空寂惠覺等，都携有許多儒教的書籍回日本。最澄携回的有：

趙模千字文

開元神武皇帝書法

真草千字文

安西內出碑

台州龍興寺碑

王獻之書法

大唐聖教序

兩書本一卷

王羲之十八帖

古文千字文

歐陽詢書

真草文

梁武帝書評

天台佛窟和上書法

圓仁携返的儒書有：

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內族吉凶書儀二十卷

阿安集一卷

鄭餘慶重修定開元詩格一卷

百司舉要一卷

祇對義一卷

駱賓王撰判一百條一卷

祝融曆詩集一卷

杭越定和書集一卷

詩評集五卷

法華經二拾八品七言詩一卷

以上之書是由揚州搜集而來

杜員外集二卷

雜詩一卷

莊翺集一卷

嵩山集一卷

宗敎携回的儒書有：

都利聿斯經一部五卷

七曜穰災決一卷

七曜二十八宿歷一卷

七曜歷日一卷

兩京新記三卷

皇帝拜兩郊儀注一卷

丹鳳樓賦一卷

詩格一卷

杭越唱和詩一卷

進大章解集一卷

僕郎集一卷

李張集一卷

白家詩集六卷

以上之詩是由長安搜集而來

削繁加要書儀一卷

西川印子韻一部五卷

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其他的學問僧携來的儒書亦不少。江陵抄載金澤文庫所藏之白氏文集卷三十三後註說：

『會和四年（日本承和十一年西元八四四年）五月二日夜，奉爲日本國僧惠萼上人寫此本』。

是惠萼入唐攜回白氏文集之明證。按白居易會昌五年五月一日自撰長慶集後序云：初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之序；成後集二十卷，自爲序；又成續後集五卷，亦自爲序，前後七十五卷，即詩三千八百四十首云。據本宮泰彥則謂前此傳於日本而爲嵯峨天皇所珍重之白氏文集，是前著之長慶集五十卷，其後新著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似未携往日本。

學問僧與留學生既携返多數書籍於日本，故日本的經史諸書頗多。至奈良朝之末，經史諸書傳遍各地。續紀神護景雲五年（唐代宗大歷四年西元七六九年）十月條說：

『太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會也。子弟之徒，學者稍多。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正本，涉獵之人，其道不廣。伏乞列代之史，各給一本，傳習管內，以興學業。』

詔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本。

到了平安時代，日本的儒書更多。據日本後紀延歷十八年二月乙未條，謂有和氣廣世者，藏內外經書至數千卷，本逸史謂淳和天皇長元年（嵯穆宗長慶四年西元八二四年）勅參議滋野貞主等編次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八年乃成，此即秘府畧一千卷也，爲漢學以來所未曾有之大編纂。是書乃根據唐之華林遍一畧，北齊之修文殿御覽，唐之藝文類聚，初學記，北齊書抄及白氏六帖等書而編纂的。這書比諸宋太宗時所編之太平御覽尤爲詳盡。惜此書後來散失無存。日本藏中國的書籍，到了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唐僖宗乾符二年西元八七五年）冷泉院火災，所有圖書，付之一炬，此儒學之一大劫運。至室多天皇寬平（唐昭宗時）藤原佐世奉勅撰日本現在書錄目，是爲後醍醐天皇之書錄目錄。按此目錄亦可見日本所藏中國書籍之豐富了。

日本不但派遣學生入唐留學，而且派遣學生留學新羅。因為那時新羅的文化，不啻是中國之一支店。留學新羅學生姓名如下表。

姓 名	入 新 羅 時 代	歸 國 時 代	留學時代
觀 常	天武十四年唐中宗嗣聖二年西元六百五		
雲 觀	同上		
智 隆	持統元年唐中宗嗣聖三年西元六八六		
明 聰	持統三年唐中宗嗣聖五年西元六八八		
間人連御廐	同上		
觀 智	同上		
依網連稚子	同上		
山田御史形	持統朝		
辨 通			
神 敷			
義 法	慶雲四年唐中宗景龍元年西元七〇七		

義	基	同上	
槐	集	同上	
慈	定	同上	
淨	達	同上	
行	善	養老二年（ <small>宗開元六年西元七一八年</small> ）	

這班留學新羅的學生，以神寂及山田御史形爲最有名。山田御史形歸國後，教授生徒，又爲周防守。（見續紀）他長於詩歌，其詩歌見懷風藻萬葉集。至於神寂續續紀所說，則與入唐之學問僧道慈同爲釋門之秀。

綜之，這班留唐留新羅之學問僧及學生，歸國時或携書籍而返，或回本國鼓吹儒教，影响所及，日本教育事業遂因之而興了。於是日本於這時設有五經博士之名。至天智天皇時代，（當我唐高宗時西元六六二——六七〇年），日本乃創辦大學，是爲日本有學校之始。再到文武天皇時代（當我唐武后時西元六九七——七〇七年）始定令典，在百師設立大學寮。在學寮裡，分置校長博士和助教等職。校長總理校務，博士則專任教授，助教則幫助教授，助教升級則爲博士。大學所開的課程，經學則以七經爲主。所謂七經，即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及左傳，而兼習論語孝經。各經皆立之學官，易立鄭康成王弼注，書立孔安國鄭康成注，三禮毛詩立鄭康成注，左傳立服虔杜預注，禮記左傳爲大經，儀禮毛傳周禮爲中經，周易尚書爲小經。孝經立孔安國鄭康成注，論語立鄭康成何晏注。（寶字元年（唐肅宗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年）持初天下家藏孝經一本。若有不孝不順者，配諸陸奧出羽。貞觀二年（唐懿宗咸通元年西元八六〇年），勅孝經用

明皇御注。敕曰：大唐開元十年，撰御注孝經。作新疏三卷，考世傳鄭注，比之他經，義理殊非。又稽之鄭志，康成不註孝經。安國之本，梁亂而亡，今之所傳，出自劉炫，事義紛沓，誦習尤難。故玄宗爲之訓註，冀闡微言。乃敕學士會議可否，若德儒林，咸共嗟伏。應自今立諸學官。又日本惟公穀二傳不列於學官，後有遣唐使直講博士伊與部家守傳二傳以歸。於是家守初講二傳，然未建以爲例，延歷十七年，式部省奏，竊以唐令，易詩書三禮三傳各爲一經，今請以二傳准小經，永聽教授，詔允之。是公穀乃爲日本後起之學也。此外有算學，算學以孫子五曹九章，海島六章，綴術三開重差，周髀九司，各爲一體。有書學，以巧秀爲宗，不講字體，有音學。日本傳漢經，有漢音吳音之讀。漢音是王仁假揚雲所授的。吳音則傳自百濟尼法明，初來對馬，以吳音讀經，故又呼爲對馬讀。有唐人袁晉卿於天平初年從遣使來日，他通爾雅文漢音，因授以大學音博士。延歷十年，詔令明經之徒習吳音。十七年又詔諸讀書，一用漢音，不用吳音。其學級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其學生則取五位以上的子孫及東西史部的子弟，年齡由十三至十六的，四百人，使入大學肄業。所謂東西史部是謂漢河內中首各姓之類。漢直之先，爲阿知使主，女首之先爲王仁，皆出劉漢之後，累世繼業。或爲史官，或爲博士，因賜之姓，總爲史部，所居在帝城之左右，故分東西史部。學子之待遇，則于大學置勸學田數百町以資費用，於大炊寮每日百斛，一石五斗，以賞其勞。除京師設大學之外，各國亦有國學。每國設國博士一人，學生則大國五十人，上國四十人，中國三十人，下國二十人。國學生取郡司子弟以補於國司，國司既試，則隨朝集史造於官，至則引見於辨官，并附式部，試而得第。而朝廷之上，上有帝王，以至公卿皆喜爲學。大學國學，皆以歲時祀先聖孔子。初稱孔宣父，復從膳大丘之請稱爲文宣王。大學以配先師的爲顏子，從祀者九座，則閔子騫，冉伯牛，冉有，季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國學專祀先聖先師。惟太宰府學三座，爲先聖先師閔子騫。

除大學寮之外之外，還設有專門的學校。如典藥寮是專門研究醫學的，雅樂寮是專門研究漢樂

大和樂及外國樂的；陰陽寮是專門研究陰陽天文及歷數的科學的。在諸國的國學裡的教師叫做博士，國學之內又設有醫學。可知日本當時的教育是全屬中國化的。

但那時的教育是貴族的教育。至平安時代，一當我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起西元八〇〇年起）學校漸漸擴充，教育漸漸普及，那時便有私立學校之創辦，如和氣廣世所設的弘文院藏書幾千卷，藤原氏的勸學院，源氏的淳和院，攝氏的學館院，雖以教貴族子弟為主，但也包有平民階級在內。淳和天皇五年（唐憲宗元和七年西元八一二年）設立一間叫做綜藝種智院，教授平民子弟，這是日本有平民教育之始。

日本入唐的留學生歸國後，發展日本的教育，既如上述。到了醍醐天皇七年，（唐五代梁太祖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年）因為中國內亂頻仍，管源上天皇書，請罷遣唐使，天皇許之，於是中國文化輸入日本的機會，便暫告停止了。

到了我南宋時代，有宋商劉文仲於近衛天皇久安六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年西元一一五〇年）來日本，獻東坡指掌圖二帖，五代紀十帖，唐書十帖於左到臣賴長。（見百練抄）

總之，由隋唐以來，是中國儒學輸入日本之第一期。這期以經學為主，故可以說是經學輸入日本的時期。

至宋寧宗慶元五年（日本土御門天皇正治元年西元一一九九年），至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日本後陽成天皇慶長七年西元一六〇二年），其間四百零三年，是理學輸入日本的時期。理學叫做道學，又叫做宋學。理學家以為漢代訓詁之學，支離破碎，不關經旨，于是倡言心性之說。他表面上雖則以孔孟為依歸，實際上是融合儒道釋三家思想而成的，所以這一種學說，可以叫做新儒學。自中國提倡宋學之後，這種學問，不久便引起了日本學者研究的興趣。但理學於何時始輸入日本？考泉涌寺僧祐在臨終時，獻鐵相公史丞相樓參政楊中郎等一班博學之士，時有往來。歸國時攜回儒道書籍二百五十六卷，這一次或有理學的書籍在內，故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

『此在日本宋學發達史上，爲不可忽視之事。不可棄法師傳中僅記儒道書籍二百五十六卷，其書名不詳。考當時宋之朱熹，集宋學之大成，所著大學中庸章句，與論孟集注刊行之時，恰當俊菴歸國之嘉定四年（日本建應元年西元一二二一年）。彼所齎備書，殆即四書之類，多關於宋學者與？其結果遂令日本有志於宋學者次第興起』。

俊菴雖似把理學的書籍帶回日本，可是他所携回的二百六十卷儒道書，其書名不詳，故不能據之以斷定俊菴的確是輸入中國理學的第一個人。

但正式傳入理學的是始於一山一寧。因爲當我元代，日本雖派中國，元世祖屢征失利，至於元成宗大德五年（日本保元伏見天皇正安元年西元一二九九年）三月，乃遣普陀山僧一山一寧隨商船赴日本。初錄倉執政北條貞時，置一山一寧於伊豆之修善寺，後知他是個有道的僧人，乃迎他至鎌倉在建長寺住了三年，後移居於圓覺寺二年，再回住建長寺，未幾又移住淨智寺。最後宇多上皇慕其高風，下詔關東以禮待之，迎住南禪寺。一山一寧以老病故，乃遷居越州，後寧移上皇常慰問，竟禪寂於花園天皇又保元年（元仁宗延祐四年西元一三一七年）。上皇賜以國師號，使全權大納言源有房作安祭之。又勅建塔於龜山廟側，賜『法雨』之額，上皇親製相贊曰：『宋建萬人傑，本朝一國師』。可見其爲日本人所尊重了。

一山一寧不但闡揚佛學，而且發揚宋學。虎關師練，中歲，夢寢皆是他理學中的弟子。一山園師妙慈弘濟大師行紀說：

『某（關虎）智薄識淺，每見叔揚之說，不能盡解，老師（一山一寧）宏材博學，賴以質所疑』。

可見一山一寧確在日本講授宋學，而虎關師練又是日本宋學的先驅者矣。虎關師練有一篇勸人讀書的書狀，舉出下列的書目。

毛詩

左傳

老子

荀子

孫子

廣雅

神仙傳

尚書	公羊傳	莊子	墨子	呂覽	玉篇	孝子傳
周易	穀梁傳	列子	揚子法言	戰國策	先賢傳	列女傳
禮記	論語	史記	文中子	山海經	群書治要	
周禮	孝經	前漢書	東皋子	爾雅	太平御覽	
儀禮	淮南子	後漢書	吳子	廣韻	太平廣記	

以上共三十九種書。在這三十九種書中，未見舉出理學之書，很為奇怪。但虎關師練雖研究宋學，惟不滿意於程朱之說，故不列舉出之耳。

中巖雖學宋學，亦不滿意張子程子之學說。

夢憲則不言程朱。但他的弟子堂義，則排斥漢唐訓詁之學而主張宋學。他認宋儒的學說勝於訓詁之學，蓋以訓詁之學，過於破碎，於經旨無關故也。

當時與虎關師練同在京師講宋學的，還有玄思，政尚，惟肖，桂庵南浦等。自這班人提倡宋學之後，影響所及，遂形成德川時代理學發達之時期。

理學初次傳入日本，是靠著那班僧侶之力的。尤其是以五山之僧侶為最重要，所以當時講理學的，總不能離開那班僧侶。

自日本土御門天皇正治元年至德川慶長七年，其間四百零三年，是理學輸入的初期。自德川慶長八年（明萬曆三十一年西元一六〇三年）至應慶三年（清同治七年西元一八六八年）其間二百六十五年，是理學興盛而漸至復古派的時期。當德川時代，有第五位德川將軍綱吉信奉孔教。他在上野這地方造成一座孔子的神龕。主從林信篤講授孔學。且把孔學去教誨貴族階級。後來又有一位學者藤原惺窩講述朱子之學。藤原惺窩生於正親町天皇永祿三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西元一五六〇年）歿於後永尾天皇元和五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他是播磨人，名肅，字欽夫，號惺窩。他是一個僧徒，後見海內喪亂，日尋干戈，後乃還俗，研究儒學從事於漢

學社之運動，力倡朱子學說，排斥王陽明學派。他對於學年循循善誘，又把四書五經加上了日本的標點符號，使學生容易誦讀。他對於朱學雖沒有新異的貢獻，但在學術界的地位很高。物茂說：「在井寬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而後民始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嵯和氏而後知稱天孫聖，四君子者，雖世尸於學宮可也。」。觀此，可見其爲人所推崇了。他著有四書大全頭書二十卷。尊師其說的共有一百五十人，最著名的如下。林羅生，名忠，字子信，號羅生，西京人。學于正親町天皇天正十一年（明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年），歿于後西天皇明歷三年（明永十一年西元一六五七年）。他是藤原肅的高足弟子。學問頗深造，當時尚未有續講授宋學的，羅山年十八，遂聚生徒講朱註于西京，學博士舟橋秀賢曰：自古無敕許，不得講書，朝紳猶然，況處士抗顏講新說乎？議欲逐之。家康聞之曰：林某可謂特達之識，遂召見，爲德川所重視。歷仕四朝，凡律令之制定，官府之文書，皆參加丁作，當時擬爲漢之叔孫通。著有大學解二卷，大學要旨一卷，大學抄一卷，大學解二卷，五書五經要語鈔三卷，論語摘語一卷，論語解無卷數，中庸解三卷，春秋劈頭論一卷，四書集注鈔三十卷，周禮三卷，儀禮三卷，孝經一卷，孟子養氣知言解一卷，周易手記六卷，四書集注鈔三十卷，七書講義私考八卷，三禮彥詁二卷。凡一百五十卷之多。其學問宗旨，是排斥陸王而尊奉朱子，其所奉行的朱學，作爲幕府教育的中心思想，而對於日本民教育有絕大的影响。羅生的子爲春勝，名起，字之道，號鵝峯，繼父業。著周易本義首書七卷，周易私考十三卷，孟子講解，論語諺解，易啓蒙私考，大學諺解，詩經私考，書經私考，春秋，禮記，周易各私考，周易程傳翼，周易新見等書。林春勝傳其學于子信篤。信篤字直民，號鳳岡。當時文藝之士皆是僧徒。僧徒強信篤削髮，信篤堅持不肯。德川氏乃以信篤爲制外之徒，免其頭，不列于士，信篤慨然以爲儒之道，即人之道，人之外，非有儒之道，而斥爲制外，可謂傲俗，此請于德川常憲，始許種髮，此元祿十四年正月十四之事。自信篤變僧服爲儒服，稱大學風，于是儒教日尊了。羅生八世孫林衡亦傳其學。

藤原惺窩還有一生杜永尺五。杜永尺五的門人有木下順庵乃貝原益軒。木下順庵生於後水尾天皇元和七年（明熹宗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年），歿於東山天皇元祿十一年（清康熙三十七年西元一六九八年）。他的學問雖沒有偉大的貢獻，但他的道德很令人欽佩。他講學多年，桃李滿天下。如新井白石，室鳩巢，雨森芳洲，三宅觀瀾，祇園南海等，都是他著名的弟子。新井白石生於後西天皇明歷三年（明永明王永曆十一年西元一六五七年），歿於中御門天皇享保十年（清雍正三年西元一七二五年）。他居於江戶，幼時，每天要學三千個漢文，每晚則加習一千個。他讀書時，在身旁置有幾桶冷水，迨精神疲倦時，便把冷水澆上頭上，藉以振奮精神。他是漢學社一個代表人物，把中國學術教家信將軍。家信執弟子禮甚恭，當聽講時，在夏天不敢拂蚊，冬天則以紙拭鼻涕。白石長於歷史故實制度詩文，著書一百六十餘種。屬大本的著作是日本藩王史，這書包括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至靈元天皇延寶八年凡八十八年的故實，對於那時主要人物之性品行爲與習慣，都有詳細的敘述。其學問可謂精博了。貝原益軒初師事杜永尺五，後又結交木下順庵，傳朱子的學說。著有《大疑錄》、《慎思錄》、《自娛集》等書，並在教育上關於種牧與地理方面，作了許多論文，後又著成一本《女大學》。他生於明正天皇寬永八年（明崇禎四年西元一六三〇年）歿於中御門天皇享保十年（清雍正三年西元一七二五年）。

朱子之學，初傳入日本之後，極爲一般學者醉心研究，後則漸趨於衰落了。至光格天皇寬文年間，（清高宗至宣宗時，西元一七八九——一八五〇年），日本嚴禁百家之學，表章朱學爲正宗，於是朱子學說，乃如日仄之再中了。當時繼承順庵之志而倡朱子學說的，有紫野栗山（一七三四——一八〇七）尾藤二洲（一七四五——一八一三）古賀清里（一七五〇——一八一七）；後再有賴山陽，其講學以關洛二派爲依歸。

朱子學說，出於藤原惺窩門下之系統的，雖對於朱學沒有新義之發明，然他們的德性溫和，頗得宋儒「涵養須用敬之主」。

別有一派與藤原惺窩不同系統的，名為南學系朱子學派。初時提倡這派的雖是土佐，其實是淵源於梅軒，而谷中時爲之附和，谷中時的門人是山崎闇齋。他生於後水尾天皇元和四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西元一六一八年），歿於靈元天皇天和二年（清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他初時是一個僧人，後則背釋歸儒，但他不敢提倡新奇理論，祇注重實踐，主張敬內義外之說。晚年又以理性太極陰陽五行之說解釋神道。他的門人分爲四派。（一）是淺見剛齋（一五六二——一七一二）（二）是佐藤其方（一六五〇——一七一九）（三）是三宅尚齋（一六六二——一七四一），（四）是玉木葦齋（？，一七三六）。除了玉木葦齋是傳受山崎闇齋的神道學說之外，其餘三派，雖見解各有出入，然皆是主張朱子學說的。至出於山崎闇齋之門，而不屬於上述四派的，尚有米川操軒，藤井懶齋，谷泰山等。

主張程朱學派的，尚有留居於日本的朱舜水。舜水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西元一六〇〇年），歿於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日本靈元天皇天和二年。他名曰之瑜，字魯璣，別號舜水。浙江餘姚人也。與王陽明同里同時。當清兵入關的時候，有許多中國人避居於日本的長崎。當時中國人居於長崎的，對於日本的变化，極有幫助。如劉一水的子孫彭城宣義傳唐音清語於日本，從學術上造成唐音直讀的長崎派。高天濤，林道榮，則影響日本的書法，陳德明，北山道長，高壽覺等影響日本的醫學。但影响日本文化最大的就是朱舜水。舜水目擊清兵入關，不忍祖國之淪亡，於是奔走於南洋安南日本之間，欲藉海外華僑的力量，組織救國同胞，恢復明室，後因大勢已去，無可奈何，於是於明永明王永曆十四年（日本後西天皇萬治三年西元一六六〇年），停止政治活動，寓居日本。日本人那時正偏排外的論調，祇長崎素爲商埠，纔准外人居住。舜水孑然一身，在長崎住了十多年，修身以道，以其人格及學問感動日本人，日本人乃漸知敬重他。當時有許多研究漢學的人們，都拜他爲先生。日本水戶藩主德川光伯在朝攝政，聞舜水之名，遣人迎舜水晉京，以賓師之禮待之，從此舜水便住下東京了。德川光伯每遇舜水之門，立下車馬

，以示敬意。舜水有病，德川光伯常臨床問候。可知舜水在日本之聲價了。舜水在長崎以講學爲。閒暇之時，便在園中種菜。他講學的宗旨，不限於一家。他主張朱子而又不反對陸象山，不滿意王陽明良知之說，而又推崇王氏的功業。他以尊尊德性與道學問並無矛盾，生知學知安行利行同歸於一。博學審問之人，不可囿於一家，偏於一說，否則失之狹隘。他見當時日本學者黨同伐異，入主出奴，高談理性，不切實踐工夫，大爲不滿，於是一方面排斥佛家的虛無思想，一方面推崇儒家的實踐倫理，以補救日本學術之失。他又見日本王綱不振，陪臣執國命，乃於講學時，辨王霸，定名分，申尊王一統之義，以陰折陪臣之權。後來日本陪臣歸政於天皇，對於舜水講學之功，是不無小補的。

舜水之在日本，對於日本之修史書，是大有幫助的。那本名叫大日本史，是於日大後西天皇明歷三年（明永明王永歷十一年西元一六五七年）修成的。以朱舜水的門人安積覺爲第一任總裁。書中雖見起倒，是仿朱子通鑑綱目而來的。內中包含尊王絀霸申明一統之義。以神功皇后列入后妃傳，以南朝爲正統。這書歷很久的時間始告成功。共二百四十卷。修史的人物，以朱子學派的佔多數，如栗山潛鋒，三宅觀瀾，立原聖軒，藤田幽谷，藤田東源，會宅，正志齋等人，雖則後分派別，但當時還是朱子學派爲人物，而藤田幽谷及其子東源會宅，正志齋等都是水戶學派，故朱舜水在日本造成水戶學派的系統，其對於日本學術之貢獻甚大。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

『舜水興起水戶學風，開修史之運，並建築聖堂以垂模範，木下順庵，林鳳岡，山鹿素行等當時多數學者，直接間接無不蒙其感化。其對於日本儒學界影響之大，毋待絮述』。

梁啟超的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說：

『現在我們可以說，日人所以有二百年太平之治，實由舜水教化而成；即中國儒學化能爲日本社會道德基礎，也可以說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極高尚嚴峻，所以日本智識階級受其感化甚深……。廿幾年日本人開舜水三百年紀念，非常熱鬧，可見其感化力之深歷久』。

如一。蓋先生之學術專以人格堅強高尚爲主，在最近三百年內，能把中國日本打成一片，實在是先生的功績。」

以上是朱子學派影響於日本學術的情形。除了朱學之外，尚有王陽明學派。王陽明的學說，是主張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王陽明學派傳入日本，沒有確實的年代可考，然而在日本首倡王陽明學說的人物，是中江藤樹，他名原，字惟命，號藤樹，近江人。生於後陽成天皇慶長十三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西元一六〇八年），歿於後光明慶安元年（明永明永歷二年西元一六四八年）他當十一歲時，一日讀大學，至盡是皆以修身爲本，慨然曰：聖人豈不可學而至乎？他原是信奉朱子學說，後則背朱而奉王，晚年在近江大倡陽明良知之說，謂良知之說，可以發明個人之性能，可以辨明世界之實在。他不注重於空說的提倡，專注重於道德之實踐。又以孝經爲標旨，獨由愛敬的二字以教門人。他能以德服人，嘗遇盜，告以姓名，賊皆投刀羅拜。又往東師，途中與與夫說以心學，與夫爲之流涕，所以他有「近江聖人」之稱。

他的門人有熊澤伯煥。（西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一）他字子介，號菴山，西京人。他著有大學小解一卷，中庸小解二卷，論語小解七卷，孟子小解七卷，孝經小解二卷，易經小解附卦原七卷，大學或問二卷，孝經外傳或問二卷。他極力鼓吹王學，由是王學之在日本，遂風行一掃了。後又有大鹽中齋（一七九四——一八三七）提倡王學尤爲不遺餘力。故中江藤樹，熊澤菴山，大鹽中齋二人，實爲王學的本三大臣子。

王陽明學派在日本之勢力，比不上朱子學派之大，但影響日本政治方面，則又比朱子學說爲深，因爲日本主張王陽明學說的人們，均知道人類行爲一以良知爲依歸。我們做事合于良知的，當勇敢直前；而容畏蕙，所以王陽明學說之在日本，實足以振奮日本人大無畏的精神，改變他們怯懦羸弱之志。後來日本一班有志之士，如橫井小楠（一八〇九——一八六九）德久圓象山（一八一——一八六四）真水保臣（一八一——一八六四）春日繼庵（一八一——一八七七）

西鄉南洲（一八二六——一八七七）等，皆受王陽明思想的影响，而日本政治上之維新運動，也隱然的受了王陽明鼓吹的力量。

以上是王陽明學說輸入日本及其影响的大畧情形。

總之：自朱子學說及王陽明學說輸入日本之後，分門別戶，各立宗派；正如這兩派在中國的情形一樣。中國理家主張朱子的，即反對王陽明。主張王陽明的則反對朱子，兩者沒有調和的餘地。日本學者對於這兩派也有入主出奴之見。然這兩派學說之在日本，支配了日本學者全部的思想，使日本學術思想朱子化，使日本學術思想陽明化，乃是不可否認之事。

在日本的學術史中，除了朱子兩派之外，尚有所謂古學派。古學派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定宋代的理學。第二階段是否定中國輸入一切的學術，而推崇日本的國粹主義。因爲理學初期傳到日本時，日本學者舉動若狂，醉心研究，成爲日本宋學發達的時期，此則佛家所謂『生相』與『住相』。然物極必反，後來日本學者對於理學，起了厭倦的心理，謂理學是混雜佛道兩家的思想而成，失了孔孟的本來真面目，於是從而唾棄，而上溯到孔孟去。理學至此時便衰落了。此則佛家所謂『異相』與『滅相』。最後則連孔孟而反對之，而提倡日本的固有學術。其實中學術上之在日本，是有很大的功勳，即就反對中國學術思想支配日本的人們來說，也受了中國學術之益不少。既得了中國學術的益處，今不但不尊重之，乃從而反對之，嗚呼！日本人不知飲水思源，數典忘祖，於此可見。

提倡古學派的，是山鹿素行，伊藤仁齋，物茂卿，太宰春臺，賀田東齋，賀茂真淵，木居宣長，中田篤胤諸人。

一，伊藤仁齋，他字原佐，號仁齋，名維楨，西京人。生於後水尾天皇永寬四年（明熹宗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年），歿於東山天皇永永二年（清康熙四十四年西元一七〇五年）壽七十八歲。他潛心宋學，後則漸起懷疑，乃參伍出入，沈思有年，恍然曰：大學之書，非孔氏之書，凡明

鏡止水冲漠無朕，靡靈不昧，以及體用義諸說，皆佛老餘緒，非聖人意也，於是追溯到孔孟之說，其學以論語為主，孟子次之。他平生教學者，以明道術達治體，爲有用之才，而以流於記誦，入於空文爲戒。故所謂修養，是實際的行動，而不是靜寂的態度。靜寂祇合于佛，修養則合乎聖，故修養是希聖的唯一方法。他的學說，信之者則以爲問世偉人，疑之者則以爲陸下餘說。但他居乎其間，是非毀譽，怡然不顧。專以懷往開來爲己任。他復古思想，是由宋學而回溯孔孟的學說的。他著有大學定本，中庸發揮，論語古義，孟子古義，論語字義，周易乾坤古義，易林獨步等書。他的子東涯繼承其說。父子同居京都堀川，故有堀川學派之稱。

二、物茂卿，名雙松，字茂卿，號徂徠。江戶人。其先有仕南朝爲物部者，以官爲族，稱物部氏，或單稱物氏。他生於後西園天皇寬文元年（明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二年）沒於中御門享保十二年（清雍正六年西元一七二八年），壽六十七歲。初雖植倡古學于平安，茂卿乃其園隨筆以距古學，既而讀明人李王之書，有所感發，乃于四十九歲時，主張復古，以古文詞爲古經階梯。其言曰：古言不與今言同。遍求秦漢以上古言，玩味六經，則宋儒之妄，章章乎明矣。

又曰：道者文章而已，六經亦此物，舍此而他求，後儒所以不知道也。又曰：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教則詩書禮四樂術。自子思孟子與諸子爭，乃降爲儒家者流矣。他嘗就岡島冠山學唐音，請唐文應以唐音直讀爲合理，用大和音訓讀之，是爲錯誤。他教人讀書，六經之外，專重史漢，謂其言近古，易識古人之意。他的詩文專宗李王，步趨盛唐，視宋元文章如仇敵，所著論語微辨道群名之書，大畧宋儒，並及思孟。他與仁齋的宗旨有異。仁齋以修養爲希聖之法，重仁義，茂卿則謂禮樂可以陶冶人之性情，注重禮樂。仁齋謂道之大原出于天，他則謂道由於聖人之偽。仁齋有似孟子，茂卿有似荀子，他門人安藤東野山繼周南之徒，鼓盪其學說，聲譽震撼一世。嘗題孔子贊自稱曰：日本國夷人物茂卿拜手稽首云。

五、太宰春臺名純，字德夷，處春臺，信濃人。生於靈元天皇延寶八年，（清聖祖康熙十九年

西元一六八〇年）歿於櫻町天皇延享四年（清高宗乾隆十二年西元一七四七年）。他是物茂卿高足弟子。物茂卿的學說，經大宰春臺發揚之後，更爲光大。物氏的學說是主張性惡的。惟用禮樂可以矯正人之惡性使歸於善。春臺於其師說，發揮不遺餘力。他以爲人無智慧賢不肖，都也有惡的觀念於心中。若不把這觀念加以矯正，即成惡人。但矯正惡念的方法，就是防之以禮，導之以樂。所以禮樂在道德中是極其重要的。但人類心中何以有惡念呢？因爲惡念是與生俱來的，而不由於外鑠的。這便是他自然性之說。這種學說極受荀子的影響。但中國的學者，沒有人主張荀子之說，而在日本裡，物徂徠倡之於前，太宰春臺和之於後，此荀子學說在日本大放異彩也。

他著有論語古訓外傳，詩書古傳，朱氏詩傳膏肓，周易反正，易道撥亂，古文孝經孔安國傳，古文孝經正文，論語古訓，易占要畧，春秋三家異同，春秋擬釋例，六經說畧，春秋歷等書。

春臺又反對日本神道之說。他謂日本本無『道』的觀念。日本人謂神道是日本固有之道，是後世虛誕之說而已。就日本語言上研究，日本根本上沒有仁義道德孝悌等術語。自與中國文化接觸傳入中國儒術後，日本人始知這種概念，修養這種道德觀念然後人類才異於禽獸，而成爲君子。他又主張以堯舜之道治國，吾人當效君於舜堯，乃爲忠臣。這是春臺思想的梗概。

四、山鹿素行生於後水尾天皇元和八年（明熹宗天啓二年西元一六二二年），歿於靈元天皇貞享二年，（清聖祖康熙二十四年西元一六八五年）。他雖是林羅山的門人，但思想與其師有異。林羅山是信奉朱子學說的。山鹿素行初雖信奉朱子，後則背棄而主張古學。但他復古思想亦分兩段。第一是由理學而追朔至孔孟仁義之說，第二反對孔孟及中國一切學術思想而提倡日本的國粹主義。素行於靈元天皇寬文六年（清康熙五年西元一六六六年）著聖教要錄三卷，極力排斥宋學，他謂聖賢道統之傳而宋而泯滅，於是倡孔孟仁義之說。但當時宋學盛極一時，素行因此得罪當局，竟逐放逐，那本聖教要錄之刊板，亦被毀盡。後又見日本人推崇中國學術，那裏日本國粹，大不滿意，乃於寬文九年（康熙二十七年西元一六八九年）在中興聖學序文中說：

「恒觀滄海者不知其大，常居原野者不知其廣，此乃久狃於此之教也。豈惟滄海原野而已？生於中華文明之土，而不知其美，專嗜外國之經典，嚙嚙然信仰其人物，何其喪心病狂，一至於此耶？豈由於好奇？抑尚異之故也？我中國水土阜爾於萬邦，人物精秀八紘，故神明洋洋，聖沾綿綿，文物煥然，武德聖化，可以比於天壤也。」

這篇序文中所謂中華中國，是指日本而言，所謂外朝是指我中國而言。則其排斥我中國之文明，而提倡日本國粹的思想，可見一斑了。

五、賀田陳潛，生於靈元天皇寬文八年（清康熙七年西元一六六八年），歿於櫻町天皇元文元年（清乾隆元年西元一七三六年）。提倡國粹主義，除了山鹿素行之外，其思想敢趨於激昂的便是賀田陳潛。他極端反對中國學術，而主張研究日本之古典主義。他以為中國學說是邪說異端，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對於日本之世道人心，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凡是日本人應研究日本之政教，以求找尋日本文化之新出路，這是東隱思想的梗概。

六、賀茂真淵，生於東山天皇元祿十年（清康熙三十八年西元一六九七），歿於後櫻町天皇明和六年（清乾隆三十四年西元一七六九）。他著有萬葉考、冠辭考、祝辭考、國意考等書。他是反對漢學社而提倡和學社之一人。他以為日本一切的罪惡，都是由於研究中國學術而來的。他更斷定的說，一種產生如此效果靈哲學，忠定是立於虛偽之上的。所以應廢棄中國學術，提倡大和固的學術。

七、木居宣長，生於中御門天皇享保十五年（清世宗雍正八年西元一七三〇年），歿於光格天皇享和元年（清仁宗嘉慶六年西元一八一一年）。他是賀茂真淵最著名的學生，他是這派的集大成者。著有古事紀傳、葛花、玉勝間、直毘羅等書。他以為中國之所謂道，乃是虛偽之理，而不切實際的。日本則自古以來，即有順乎人情自然之大道。所以在日本則皇統綿延，自中國則篡奪相繼。他於是主張把日本古代的信仰和人格，恢復起來。他有一首詩描寫日本人的精神說：

要是有人問你：

大和島的

心是什麼！

這是在晨曦中吐著香氣的

山上櫻桃。

這書見於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照這書看來，可知其極力誇耀日本的精神了。

八，平田篤胤生於櫻桃園天皇安永五年（清乾隆四十七年西元一七七六年），歿於仁孝天皇天保十四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西元一八四三年）。他大肆厥辭以攻擊中國的學術，把和學社的旗幟高懸起來。他著有古史傳，入學問答，古道大意，玉鐸，鬼神論，靈能直柱，神道大意，神宇日文傳，古史疏衷，古史微，伊吹於呂志，仙境異聞，古今然然考，及西籍概行等書。

此外尚有折衷派，獨立派，及考證學派。折衷派不偏於一方面，祇在於取各家之所長，而棄其所短。獨立派之代表人物，為三浦梅原（一七二三——一八七九），二宮尊德（一七八七——一八五六）等，然無特別的貢獻。考證學派不知何時傳入日本。然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

「天保十三年（道光揮二三年西元一八四二），幕府令十萬石以上之諸侯，獎勵刻書籍。此種輸入翻刻之書籍，入日本學士文人之手，致各地文運大興，而清之考證學風，亦由是風靡於日本學界」。

可知日本人亦注重考證學了。

第六章

佛教之輸入

創立佛教雖始於印度，但發揚佛教却在于中國。因為自佛教輸入了中國之後，佛教在印度的勢

力日觀新式樣，在中國日形發達。蓋以中國人能夠把佛教的妙諦撈括透闢，闡明新義，標立門戶，開創宗派，成爲一家之言。所以我們認佛教輸入日本，即認爲是中國文化之一支輸入日本，是未嘗不可的。

但我們欲說明佛教由中國輸入日本的情形。要先說明佛教由印度輸入中國的情形。佛教本來是印度釋迦牟尼所創立的宗教。釋迦牟尼大約生於西元前五五十七年。即當我周靈王十五年他出家之後，深覺一切有情的世界，變動不居，生滅無常，忍受了生住異滅的四相，何等痛苦！我們非達到真如無幻涅槃世界，不足以爲安身立命之場，滿足人生最後的欲望。於是把王宮美女，棄如敝屣，決意出家，創立佛教，教訓弟子，以期普渡衆生，以渡淪津，以超苦海，以開覺路。釋氏於西元前四百八十七年（一作四七七），即我周敬王三十二年禪寂，壽享七十。是年他弟子在王舍城集會討論教義，確定正大的宗旨，推行佛教，後又在毘舍離開了第二次會議，對於佛教條律頗有改訂。大約在西元前二七二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輸迦。纔定佛教爲國教，並差遣許多熱心的教徒到外國宣傳教義。但那時的佛教，已分爲大乘和小乘兩派，小乘向印度之南傳播，傳入於緬甸暹羅錫蘭等地；大乘則當印度塞種人，諸朝的時候，經由印度北方各道路傳入了中亞細亞。直至度印帕爾提王貢多福魯的時候，即漢明帝永平十一年（西元六八年），有中國人蔡愔等使於西域，以白馬馱經而歸。漢明帝乃建白馬寺以藏之，是爲佛教傳入中國之始。

佛教既輸入中國後，經過了二百餘年之久，復由中國傳入於朝鮮。因爲自箕子於周成王十四年（西元前一十一）封於朝鮮之後，朝鮮已受了中國文化的薰陶，以後朝鮮半島諸古國如政務，雖時有變化，但繼續接收中國文化，故凡中國之政治制度學術工藝等，無不輸入朝鮮半島諸古國去。佛教既輸入中國，自然容易由中國輸入東夷，是以當我晉孝武帝寧康元年（日本仁德六年西元三七二年）佛教遂由中國輸入朝鮮了。

朝鮮與日本僅隔一衣帶水，佛教既輸入朝鮮，又何難越雷池一步而輸入日本？但佛教于何時

輸入日本記。據宋史日本列傳的日本年代紀說：

「欽明天皇即位十三年壬申歲，始傳佛教於百濟國，當中國梁承聖元年（西元五五一年）。」

這是佛教輸入日本之始。扶桑略記卷三，延歷寺僧祥泰記說：

「第二十七代繼體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大唐漢人僧部（鞍部）村上司馬達於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結草堂於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歸依禮拜。」
敏達紀說：

「十三年鹿深臣佐伯建齋佛像自百濟還。蘇我馬子復創佛寺，造塔於大野邱北。」
此是日本造塔之始。敏達紀又說：

「天皇十三年，蘇我馬子遣跡作村官司馬達等於四方，以索修行者，在播磨國得高麗之還俗僧志使。達之女島，年十一，就惠使出家，名善信尼。」

這是日本善女尼之說（當時從之爲尼者尚有二人，即禪藏血慈尊）。但扶桑略記謂司馬達於繼體十六年信佛，敏達紀則謂司馬達於敏達天皇十三年信佛，二說不同，究竟誰是誰非呢？其實扶桑略記之說，是一望而知其謬誤的。考續體天皇十六年，即西元五二二年，佛教於五五二年，乃傳入中國而已，豈有於五二二年，司馬達出家爲僧之事乎？故以敏達紀之說爲可信。敏達十三年，即西元五八四年。佛教於五五二年輸入日本，於五八四年日本入出家爲僧爲尼，乃是可能之事。至司馬達者，元享釋書則以爲是中國高麗人而歸。本書。這是謬說，木宮泰彥已糾正了。本宮泰彥謂司馬達等之上，冠以鞍作之名，乃斷定其爲雄略天皇時來歸鞍部子孫，木宮泰彥的中國史通史說：

「故予以爲乃雄略天皇時來歸之鞍部子孫。鞍部等居河內國瀧川郡鞍作村。世世從事製鞍，故其家世多不聞於世。後因司馬達等來信佛教，與蘇我馬子相親，乃顯名于世。其女

島乃日本之始爲尼者，其子孫多須奈亦於用明天皇沒時出家。一家均爲熱烈之崇拜者，故素其從來之製鞍業，而專從事於製作佛像。因佛教之興隆，佛像之需要益增，加以彼等熱烈之信仰心，故其技益精。」

木宮泰彥謂司馬達是雄略朝來歸之鞍部子孫，出家爲僧，捨製鞍而造佛像，其說是對的。至多須奈之子爲遂爲推古時製造佛像之第一個工人。試觀推古紀十四年，天皇勅鞍部島之勅語說：

「朕欲興隆內典，方將建佛刹，肇求舍利時，汝祖父司馬達便獻舍利。又于國無僧尼，于是汝父多須奈爲檀越日天皇出家，恭敬佛法。又女媛島女，初出家爲諸尼導者，以修行釋教。今朕爲造丈六佛，汝之所獻佛本，則合朕心。又造佛像，既訖，不得入堂，諸工人不能計，以將破門戶，蓋汝不破戶而得入，此皆汝之功也。」

足見司馬達是雄略時鞍部的子孫，其子多須奈孫島對於佛教影响之大了。

到了崇峻天皇元年（陳後主禎明二年西元五八八年），據書紀所載，百濟國遣僧人惠實等九人，獻舍利及迦藍罐瓦諸貢工。

以上所述，是佛教輸入日本初期的情形。但佛教初期輸入日本，不若儒教輸入之順遂，是須要經過許多波折的。何以故？因爲日本本來沒有儒教，故儒教之傳入，並不發生學術上的衝突，故大爲日本人所歡迎；日本本有固有的神道，佛教的傳入，便發生宗教上的矛盾，故大爲日本人所排斥。當欽明天皇時，百濟王聖明遣人獻佛的時候，并附表稱頌大佛的功德說：「佛教最顯高深，是勝過儒教的，所有信佛教的國家無不興盛，研究佛學，可明哲理，近三韓人士盡慕信之。云。那時欽明天神在殿上接見使者，叫人把表譯出來讀了一遍，便神龍色舞道：『我未嘗聽過呀，很好很好，』于是叫朝臣接受佛經論議等東西。可是那時物部氏與蘇我氏兩族相爭，物部氏掌握祭祀和兵權，蘇我氏則掌握政權。而這兩氏對於佛教的傳入發生很激烈的爭執，物部氏說：『本國有固有的神道，天神是本國固有的宗教，祇有祭祀天神乃可以獲福。佛是蕃神與天

神是不能相容的，今接受佛像定然招天神怨怒，貽禍於國家哩」。但蘇我氏是想藉佛教的勢力去削弱物部氏祭祀之權的，所以蘇我稻目極力贊成接受佛經佛像。欽明天皇於是把佛像等賜給蘇我稻目，稻目于是禮佛于家裡，物部氏大不滿意。未幾適由高麗傳入了天花痘症，人民被害不少。物部氏便乘機奏道：「現天花流行，定是觸犯神怒的結果，必須把佛像毀碎才可以息天神之怒。天皇迫于無奈，准許物部氏的要求，于是到蘇我氏的家裡搶出佛像，投于難波河。後來百濟國王又差遣使向天皇獻上佛經僧侶和工匠，敏達天皇因鑑于前次天花流行之故，這一次就不禮于百濟的來使。未幾有百濟人鹿深獻彌勒石像于蘇我馬子（稻目之子）馬子作殿宇于石川安置之，聚集僧徒，設置齋戒以禮佛。可是不幸得很，國內又發生疾病，死了不少的人。物部氏又乘機向天皇攻擊馬子，私奉佛教，聚僧成衆，請毀佛像，拘繫僧徒。天皇迫于無奈，又准許物部氏的要求，於是又把佛寺佛像毀碎了，同時那班僧侶也被拘繫了，未幾蘇我馬子害了病，纏綿不治。於是奏天皇請准祈佛禳災，天皇准許他，并放還其僧侶，於是佛教至此始稍稍有立足的餘地。到了用明天皇即位，因為用明帝的母親是蘇我稻目的兒女。稻目崇信佛教，他的兒女也因之崇信佛教，影响所及，以致用明帝也崇信佛教。因用明帝即位的初年，忽然害了病，想着念佛以求生，於是延引法師入宮中祈禱，因之的病果然全愈了。佛教至此時，始為用明所篤信，以首一切反佛派的勢力，都煙消雲散了。這是佛教初期傳入日本的情形。

用明帝死後，他有一位太子叫做聖德太子（本名廐，因為他生於御廐的門外，故以為名，聖德是他法師的名稱）生有異慧，七歲悟佛法於菩提寺。迫他長大起來，即偏向於蘇我族的方面的。○那時蘇我氏與物部氏仍然鬥爭着，聖德太子幫助蘇我氏去攻擊物部氏的首領守屋，那時守屋正在帶兵攻擊蘇我馬子，當兩家打得激烈的時候，聖德太子大聲叫道：「不祈禱，我們不能做什麼事。」于是把了四金剛的像放在甲冑之內，并誠心祈禱，謂如果打勝了仗，定造一座廟宇獻之於佛。後來果然勝利了，太子乃造寺宇來安置那四大金剛，四大金剛，即是印度之神名聖德太子。

由此篤信佛法。至推古天皇十五年（隋煬帝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七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入隋來學佛法，所以隋書倭國傳說：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木居宣長的取我慨言說：

『聖德太子聽政時，因求佛法，屢次遣使』。

考推古十六年，有志賀人惠隱入隋住了三十一年，新漢人惠齊入隋住了十五年。惠隱歸國後，於舒明天皇十二年五月大齋會時，奉勅講說無量壽經。

推古既遣使入隋求佛法，時有使者得法華經而歸，聖德太子加以注疏。聖德太子乃定神佛合一之教，並以佛教爲一國政務之本，以尊神佛兩教那彌冰炭不容的情形，至此便如水乳之相融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佛教能盛行於日本，大半是靠住聖德太子維護之力，那時的佛堂佛像比當時增加了許多，男女的信徒，成羣結隊的皈依於蓮花座上。各寺院中最大的就是大和的法興寺和難波的天皇寺。在天皇寺裡面設有教田院以爲信徒之所，並附設施藥院及療病院以醫治貧民。此外復有悲田院，以恤養孤兒寡婦痼疾殘疾的人民，所以聖德太子在當時有神德大師之稱，而佛教自輸入日本後遂以此時爲最盛。當我隋代佛教已盛行於日本，至當我唐代時，佛教在日本更有之燦爛光輝的現象，因爲當有唐一代，日僧入唐的人數甚多，內中分爲學問僧還學僧及請益僧幾種。學問僧是學佛教的僧侶，還學僧是學成歸國之意，即隨遣唐使而往，復隨遣唐使而還之意，請益僧是已經受教而復有請益之意。這班學問僧歸國之後，於是佛教的大量經典，各家的宗派，唐式的經幢，寺院的建築法，無不傳入日本。兼諸赴日的唐僧鼓吹佛學，對於日本佛學發達史上也是極重要的一回事。現在爲閱覽便利起見，先把入唐的學問僧列成一覽表如下。

人 名	入 唐 年 代	歸 國 年 代	在唐年代	學得之宗派
道 展	孝德白雉四年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			
道 通	同上			
道 光	同上	天武七年高宗儀奉三年西元六七八	二 五	律宗
惠 施	同上			
覺 勝	同上		歿于唐	
辨 正	同上			
惠 照	同上			
僧 忍				
知 聰		淹中死于海上		
道 昭 (道照)	同上	齊和七年高宗顯慶元年西元六六一年	八	注相宗的第一傳又學禪
定 惠 (貞慧)	同上	天智四年高宗麟德二年西元六六五年	一 二	
安 達	同上			

智 藏	道 久（文）	智 達	智 通	法 勝	妙 位	義 通	智 宗	智 囧	惠 妙	義 向	道 福	道 觀
天智朝		同上	齊明四年高宗顯慶三年西 元六五八				白雉四年唐高宗永徽四年 西元六五三			同上	同上	同上
持統朝	天智十年高宗咸亨二年西 元六七一			同上	白雉五年高宗永徽五年西 元六五四	溺死於海	持統四年中宗嗣聖七年西 元六九三	死于唐	死于唐	溺死于海	溺死于海	
							三八					
三輪宗第二傳		法相宗	法相宗之第二傳									

行	玄	玄	普	榮	理	勝	玄	智	智	智	道	辨
賀	法	朗	照	叔	鏡	曉	昉	雄	鸞	鳳	慈	正
太平勝寶四年天寶十一年 西元七五二	同上	同上	同上	天平五年開元二十一年西元 七一六	養老元年		養老元年開元五年西元七 一七	同上	同上	大寶三年嗣聖二十年西元 七〇三	文武天皇大寶二年中宗嗣 聖十九年西元七〇二	大寶中
孝德天平神護元年代宗永 泰元年西元七六五			太平勝寶五年天寶十二年 西元七五三	致於唐	天平八年開元二十四年西元 七三六		聖武天平六年開元二十二 年西元七三四				元正天皇養老二年玄宗開 元六年西元七一八	致於唐
一三			二〇		一九		一七				一七	
學唯識法華兩宗	同上	同上	同上	從學於鑑真			法相宗第四傳	法相宗第三傳	同上	法相宗第三傳	三論宗第三傳	

金剛三昧	圓基	靈仙	空海	丹福成	義真	最澄	善藏	鑒禪師	智藏	得清	戒明	永忠
		同上	延歷二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四年西元八〇四			桓武延歷二三年德宗貞元二〇年西元八〇四					同上	寶龜初仁宗大歷五年西元七七〇
			桓武大同元年憲宗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二	同上		延歷二四年貞元二一年西元八〇二						桓武延歷初德宗建中三年西元七八二
			二			一						一二
			真言宗密宗			天台宗及密宗	三論宗				華嚴宗	學經論及音律

圓 覺	伴 始 滿	仁 好	圓 載	丁 維 萬	性 海	惟 曉	惟 正	真 濟	圓 仁	義 澄	常 曉	圓 行
			承和五年唐開成三年西元 八三八		承和十二年唐武宗會昌六 年西元八四六				同上	同上	同上	仁明承和五年文宗開成三 年西元八三八
			途中溺		同上				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 西年元八四七九	同上	同上	永和六文宗開成四年西元 八三九一
					一				九	一	一	一
		法相宗							法相宗及密宗	法相宗	密教	法相宗密教

圓修						
順昌						
仁濟						
惠萼 (入唐三次)	第一次承和八年第二次承和十一年第三次貞觀四年	第一次承和九年第二次承和十四年第三次貞觀五年				法相宗
惠運	承和九年唐武宗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	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西元八四七	五			真言宗
圓珍	文德仁壽三年宣宗大中七年西元八五三	文德天安二年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西元八五八	五			天台宗
閑靜						
幼良						
物忠宗						
大全吉						
豐智聰智						
真如法親王 (高邱親王)	清和貞觀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西元八六二					真言宗
賢真	同上	貞觀五年唐懿宗咸通四年西元八六三年	一			真言宗

弘 舉	好 真	三 慈	濟 證 (齊證濟證)	以 船	中 璽	壹 演	惠 池	禪 念	安 展	宗 寂 (宗容)	忠 全
		元慶六年傳宗中和二年西元八八二	開成天皇元慶元年乾符四年西元八七四	貞觀十六年唐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貞觀七年唐咸通六年西元八六五	同上
										三	一
		天台宗	天台宗	真言宗		真言宗				真言宗	真言宗

這班入唐僧人，其携回書籍及歸國後之情形如下。

道光歸國後，著有四分律抄撰錄文。

惠施歸國後，於文武天皇二年三月任爲僧正。

道昭歸國時，携來經論甚多，置於平城大京禪院，建禪院於元興寺東面隅居之。致力於鑿井修橋之社會事業。文武天皇四年歸寂，大葬於栗原，日本大葬之俗自此始。

道慈是研究三論宗者。與神寂同爲釋門之秀，著有愚志一卷，倣唐西明寺之形式建築大安寺。玄昉在唐學法相宗於泗洲僧智周，智周是玄奘的法孫，歸國時携回經論五千餘卷及佛像多尊。勝曉於養老四年與唐僧道榮同訂正轉經唱禮。

行賀在唐研究唯識及法華經，歸國時携返聖教要文五百餘卷，筆削法華經疏弘贊畧唯識金藏四十餘卷。

永忠學經論及音律，歸國後，住近江梵釋寺。

戒明學華嚴宗，携聖德太子所著之勝鬘經義疏與法華經義疏入唐。

最澄名傳教大師，延歷中創立止觀院於比叡山，入唐學天台宗及密宗，歸國時，携來經論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真言道具等十餘種。

空海即宏法大師，從國野朝臣游唐，受法於慧果學密宗。歸國時，携來新譯經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卷。梵字真言贊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論疏章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並佛像。歸奏建真言院于宮中，賜東鴻臚地建東寺，又創金剛峯寺，此寺在今之高野山。

圓行學法相宗與密宗，歸國時，携來經論章疏六十九部，一百二十三卷及佛像。

常曉學密宗。歸國時，携來經論三十一部六十三卷。又携大元帥本身將部曼荼羅一鋪，大元帥大悲身像一軀，大元帥忿怒身像一軀，大元帥化身像一軀，外佛像數軀，佛具數種。

圓仁學法相宗及密宗。在揚州求得經論一百二十八部，在五台山求得三十四部三十七卷，在長

安求得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並在揚州求得胎藏金剛兩部，曼荼羅諸尊，壇樣，高僧影真及舍利等二十一種。在長安求得胎藏金剛兩部，曼荼羅諸尊，壇樣，道具等二十一種。

惠運學真言宗，歸國時，携來真言經軌共一百八十種。

圓珍學天台宗。歸國時，携來經論四百四十一部一千卷。並真言道具十六種，曼荼羅教鋪。

宗叔學真言宗。歸國時，携回經論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真言道具八種，曼荼羅圖樣等十餘種，佛舍利七十粒。

這班僧人携回之佛書固多，而各人在唐時所學之宗派亦不同，他們歸國後，遂把各宗派傳入於日本。佛教在日本之有宗派，是始於推古天皇時代，至奈良平安兩朝而大興盛。茲將各宗派畧述於後。

(一)成實宗 當推古天皇二十八年(唐高宗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年)有百濟僧人觀勒在日本講授成實宗，是為日本有成實宗之始。

(二)三論宗 原由龜茲國之鳩摩羅什傳入於後秦國，至隋代吉藏始將該宗教義發揚光大。到了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唐高宗武德八年西元六二五年)有高麗僧人慧灌來日本講授三論宗。慧灌者，吉藏之弟子也。是為日本有三論宗之始。至天智天皇時代，日僧智藏入唐，在吳越向就高學尼三論宗，歸國後，為三論宗之第二傳。至文武天皇大寶二年(唐中宗嗣聖十九年西元七〇二)，道慈入唐，在長安學三論宗，又謁見善無畏，在唐凡十七年，歸國後，在東大寺衍其法，是為三論宗的第三傳。文武天皇大寶三年(唐嗣聖二十年西元七〇三年)智鳳入唐學三論宗，歸國後，亦三論宗的第三傳。善護是道慈的弟子，亦學三論宗之學。

(三)法相宗 該宗是玄奘於唐太宗時代由印度傳入中國的。那時玄奘在長安大慈恩寺極力講經布教，門徒多至三千，達者三十，高徒四人。至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唐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年)日僧道昭入唐，曾就玄奘學法相宗，又奉玄奘之命而學禪，於齊明天皇七年唐高宗龍朔

元年西元六六一年歸國，始傳法相宗於日本，道昭並傳入因明學，是爲日本有因明學之始。至齊明天皇四年（唐高宗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年），智通入唐，在長安就玄奘窺其學無性衆生之義，歸國後，傳法相宗，是爲法相宗的第二傳。智達與智通同時入唐，歸國後，亦爲法相宗的第二傳。智鳳智鸞智雄三人，同於文武天皇大寶三年（唐嗣聖二十年西元七〇三年）入唐，就濮陽智周學法相宗，歸國後，皆爲法相宗的第三傳。玄昉於元正天皇養老元年（唐開元五年西元七一七年）入唐，亦就濮陽智周學法相宗，於聖武天皇天平六年（唐開元二二年西元七三四年）歸國，是爲法相宗的第四傳。

以上是奈良時代的法相宗。至平安時代，日僧圓行於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文宗開成三年西元八三八年）入唐，越年歸國，傳法相宗。義澄與圓行同入唐，亦傳法相宗。圓仁於承和五年入唐，在揚州就宗叡學梵語，又至長安就元政，義真學密教。承和十四年（唐憲宗大中元年西元八四七年）歸國，並傳法相宗。性海是圓仁的弟子，承和十三年（唐武宗會昌六年西元八四六年）入唐，翌年歸國，傳法相宗。仁好是圓載的從僧，亦傳法相宗。惠萼入唐三次，歸國後，傳法相宗。

（四）俱舍宗 此宗本是法相宗的附宗。是由智通智達等傳法相宗時並傳入這宗。是爲日本有俱舍宗之始。

（五）律宗 唐初是玄奘宗法相宗金威的時代，繼此而興起的有律宗及華嚴宗。當曹魏之時，有印度僧人曇摩訶羅及曇諦始傳律宗於中國，這不過是律宗的開端而已。唐高宗時，道宣出而律宗始盛。至日本孝德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年），日僧道光入唐學得律宗而歸，是爲日本有律宗之始。日本當奈良時之佛教，深受律宗之影响，其中如鑄造東大寺之盧舍那佛，便是受了律宗影响之具體表現。聖武天平八年，（唐開元二四年西元七三八年），唐僧榮寂普照赴日本，館於大安寺之西唐院，講授其帶來之律藏行事抄，是爲日本弘通律宗之先驅。至鑑真赴日本，先設戒壇於東大寺，受律者四百餘人，孝謙天皇竟捨身入寺。鑑真又在日本造唐招提寺，與其

弟子講授戒律而開律宗，律宗之義大行，故孝謙天皇頒布禁律，不許人民宰生，孝謙以此獲得一個「慈悲女神」的美稱。

(六)華嚴宗 此宗是於隋末由杜順(帝心尊者)傳入中國，至唐武后時，法藏(賢首大師)出而此宗乃盛。武后於萬歲元年(持統天皇朱鳥十年西元六九六年)，詔法藏開示該華宗旨。聖歷二年(文武天皇三年西元六九九年)，譯成於闐國傳來之梵本法華經八十卷。長安三年(文武大寶元年西元七〇一年)，又令法藏在長生殿講授新譯之法華經。足見那時法華宗之盛行。華嚴宗者因法華經而得名也。然則傳華嚴宗於日本，當為何人？聖武天平八年(唐開元二四年西元七三八年)來日之唐僧道璿曾帶來華嚴章疏，又與道璿同時來日之中天竺婆羅門教僧正菩提亦曾誦華嚴經。天平十二年(唐開元二十八年西元七四〇年)，有新羅僧審祥曾入唐從法藏學華嚴經，他在日本講授華嚴經義。

以上說實三論法相俱舍律華嚴六宗，是奈良朝的六宗。史家稱為古京六宗。或稱南都六宗。佛教在日本既有了宗派，於是佛教教徒，發生入主出奴之見，不能得到調和，桓武天皇想找着一個調和的方法，使差遣最澄和空海入唐之西安學佛。這兩位名僧回國後，又成立了平安朝的天台真言二宗。

(七)天台宗 這宗是以天台山而得名。天台山在浙江台州。初時有僧人智顗感了一個靈夢，進入此山開天台一派。隋大業元年，為智顗開國清寺，兼賜寺額，以為天台宗之根本道場。唐初此宗不振。及六祖湛然出，發揮智顗的純粹精神。此宗乃漸隆盛。考聖武天平八年(宗開元二十四年西元七三六年)來日之唐僧道璿雖為律僧，亦為天台學者。孝謙天平勝寶六年(唐天寶十五年西元七五四年)，來日之鑑真，又帶來摩訶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小止觀，六妙門等，夫白章疏。隨鑑真來日之法進，如實，思托等，皆是天台學者，曾在唐招提寺說法。不過那時天台宗在日本還未成一宗派。至平安朝之最澄自唐返國後，著有天台付法錄起三卷，大偏天台之

義，於是日本乃有天台宗派。以後圓珍濟詮三慧等皆是天台學者。

(八)真言宗 傳此宗者爲空海。空海即弘法大師。他歸國創設真言宗，充任高野山著名大寺的方丈。這寺在紀州與大和間的峻嶺中，每年參香者以萬數計。空海極爲香客所信仰，故這班參香人叫他爲弘法大師。空海之後，著名之真言宗學者，有惠運，真如法親王，賢真，忠全，宗叔，壹瀨，以船等七人。

在平安朝，最澄之天台宗與空海之真言宗，稱爲北京二宗，或平安二宗。但這兩宗，雖由中國傳入，可是入了日本之後，大起質的變化。因謂日本人把這兩宗配合神道垂跡之說，以爲日本開國的天神就是佛之化身，故佛即天神，天神即佛。嗚呼！橘逾淮而爲枳，雖入水而爲蜃，至此所謂佛教遂成爲神道化的佛教了。

佛之宗派既傳入日本，因之唐式之寺觀亦因之傳入。茲就奈良朝之都市佛寺來說。奈良朝之都市佛寺，是模倣唐代長安佛寺的形式而來的。長安實爲唐代的佛教中心。隋文帝時已在長安建立興善，觀音二寺(唐景雲二年改觀音寺爲青龍寺)。唐太宗以其舊宅建立興聖寺，以慶善宮爲穆太后建立慈德寺，又爲穆太后建立弘福寺。爲文德皇后建立大慈恩寺，爲皇太子建立普光寺。高宗爲皇太子建立西明寺。武則天則於隋煬帝舊宅建立薦福寺，中宗又加以修飾，長安佛寺之盛，可見一斑。入唐之日僧，目擊這種情形，大爲欣羨，歸國後，乃倣長安城之形式以營造平城京。遷都之時，亦遷興福，元興，藥師，大安各寺於平城，蓋取其肖長安也。遷移大安寺時，是由道慈設計建築，故續紀天平十六年條說：「遷造大安寺於平城，勅法師道慈勾當其事。法師尤妙工巧，構作形製皆稟其規模，所有匠手，莫不嘆服焉」。考大安寺緣起說：「道慈在唐時，拙繪長安西明寺之圖，歸國後按圖建造」。唐之西明寺是唐高宗所建，內有大殿十三所，以著名僧人遺像律師爲上座，並選京師之大德居之。是日本平城之大安寺是由道慈模倣長安之西明寺而成者也。至日本國分寺之建立，亦仿唐制而成。考我國各州建立寺塔，是始於隋代。隋文帝仁壽元年

（推古九年西元六〇一年），令雍州以下十三州，各建寺塔，分置舍利。翌年又令五十一州建塔，分置舍利。隋高祖立舍利塔詔說：「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並散官各一人，黃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諸王子孫等，及內官外人，一切庶民，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並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以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壯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陳宣。」這是隋高祖令各州建塔寺的明令。當時建塔之寺如下。

（一）雍州仙遊寺。（二）岐州鳳泉寺。（三）涇州大興國寺。（四）秦州靜念寺。（五）華州思覺寺。（六）同州大興國寺。（七）蒲州棲巖寺。（八）并州舊無量壽寺。（九）定州恒嶽寺。（十）相州大慈寺。（十一）鄭州定覺寺。（十二）嵩州開居寺。（十三）亳州開寂寺。（十四）汝州興世寺。（十五）秦州岱嶽寺。（十六）青州勝福寺。（十七）年州巨神山寺。（十八）隋州智門寺。（十九）泉州大興國寺。（二十）揚州西。（二十一）蔣州棲霞寺。（二十二）吳州大禹寺。（二十三）蘇州虎邱山寺。（二十四）衡洲衡嶽寺。（二十五）桂州緣化寺。（二十六）番州靈鷲山寺。（二十七）交州禪衆寺。（二十八）益州法聚寺。（二十九）康州法興寺。（三十）瓜州崇教寺。

以上各州諸寺，皆於仁壽元年十月十五日午時，安設舍利。翌年又下令於正月二十三日分送舍

於五十一州。是年四月八日午時，安設舍利。按書說：『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寶，八舍利直形猶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苦纏，重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安德王雄百官等慶舍利感應表示說：『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舍利塔。今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庶常務七日，請僧行誦經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謂五十一州，即恒州、瀛州、黎州、魏州、絳州、秦州、兗州、曹州、晉州、紀州、徐州、鄧州、安州、趙州、豫州、利州、明州、衡州、汝州、毛州、幽州、宋州、懷州、汴州、洛州、幽州、許州、荊州、海州、楚州、莒州、營州、杭州、漳州、潞州、洪州、德州、鄭州、江州、蘭州、慈州、廉州、陝州等。

到了唐代，又令每州建立寺院。內分三時期。

第一期爲高宗乾封元年（天智天皇五年西元六六六年），舊唐書高祖本紀說：『天下諸州置寺觀一所』是也。

第二期爲武后天授元年（持統天皇朱鳥四年西元六九〇年），今每州建立大雲寺。故舊唐書則天武后本紀說：『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咸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今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二亦說：『天后臨朝稱制，是爲則天，明年（天授元年）七月，沙門十輩詣闕上大雲經，咸稱則天當即定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瓶袋，頒經於天下郡國，各建大雲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

第三期爲中宗之神龍元年（文武天皇慶雲二年西元七〇五年），二月，令天下諸州，建立中興寺，中興觀。此可由舊唐書中宗本紀所謂『諸州置寺觀一所，以中興名』一語而知之。至神龍三年，乃改中興寺觀爲龍興寺觀。至玄宗開元二十六年（聖武天皇天平十年西元七三八年），令天下諸郡，建立開元寺。故釋氏稽古略說：『開元二十六年，詔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紀年

爲號，額曰開元寺』。舊唐書玄宗本紀說：『天寶三年（聖武天平十六年西元七四四年），勅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

以上是隋唐今每州置寺之明證。州中各寺，最能給予入唐日僧之激勵。故圓仁入唐，曾住於青州之龍興寺，唐州及趙州之開元寺，又宿於萊州龍興寺而嘆其荒廢，又曾至益州開元寺佛殿，見壁上有日本天平寶字三年，進入唐大使高元衡等同一人所描寫西方淨土及彌陀菩薩淨土之壁畫。是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條，有『每州有開元寺路龍興寺』之語，足見他羨慕唐代的州寺了。

入唐的日僧，既羨慕唐之州寺，於是歸國之後，以便仿效唐制，在日本建築國分寺。

日本建築國分寺，也是分爲三個階段的。

第一據續紀所說，聖武天皇天平九年（唐開元二十五年西元七三七年），三月，丁丑，令各國造丈六經迦佛金銅像一軀，並旁侍之菩薩二軀。但那時還沒有國分寺之設立。然而今各國造釋迦佛像，已是國分寺之濫觴了。

第二，天平十二年（唐開元二十八年西元七四〇年）六月，令境內各國各抄法華經十部，建七層塔。這便是國分尼寺之始。

第三，天平十三年（唐開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年）三月，詔每國置僧尼兩寺，僧寺設僧二十人，寺名爲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尼寺設尼十人，寺名爲法華滅罪寺。前者乃據金光明最勝下經四天王護國品第十二之說，蓋欲被消除國家所厄瘟疫，而祈四天王庇祐者也。後者則爲誦法華經之比丘尼滅罪作善而設也。

是知日本設立國分寺，即仿唐在各州設寺之制。然則日本國分寺的相模，是模仿何寺而來的？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

『惟日本之所模仿者，爲龍興寺乎？抑開元寺乎？似謂爲模仿龍興寺者安。何則？開元

寺之建立，只先於日本國分寺者三年。日本於建立開元寺之前年，即天平九年（七三七），曾令各國建立釋迦佛金銅像，則已立國分寺之基礎矣。大抵唐代之事移植於日本者，普通皆在數十年之後……，故日本國分寺，與其謂模倣開元寺，寧謂爲模倣龍興寺也。日本所以建寺而不建觀者，以日本無道教之故。唐無國分尼寺，而日本有之者，則因提倡建立國分寺者爲光明皇后之故。

是日本的國分寺是模倣龍興寺而來的。前書又說：

「然則傳龍興寺之制於日本者，爲何人乎？則當爲是時入唐之學問僧，而道慈似爲其中最有力之一人。道慈在入唐學問僧中，較玄昉稍先，爲奈良朝初期興隆佛教最有力之人。彼於大寶二年，從大使粟田真人入唐，在長安學三論宗法相宗並密教者十七年，養老二年歸國，其在唐之時，恰值唐之各州龍興寺完成之際，最堪注意。其在唐時，以學業穎秀聞，故特選入宮，講仁王般若兩經，優加賞賜。歸國後之翌年養老三年十一月，與新羅學問僧神寂均以德受賞。詔云：道慈法師，遠涉蒼波，認真聞於絕境，遐遊赤縣，研妙機於祕記。余跡象龍，旅蕙秦漢，並以戒珠如懷滿月，慧水若瀉滄濱。倘使天下桑門皆行如此者，豈不植善根之福田，渡苦海之寶筏？朕每嘉歎不能已也。宜施食封五十戶，並標揚優賞，用彰功德。又當時有『釋門之秀，唯道慈法師與宗寂法師二人』之語，據此則其時如何見重，可以想見。……其住大安寺時，其得朝廷信任，故得參與建立之議，而在唐所得之知識，遂得大供參考。續紀天平九年十月丙寅條云：講金光明最勝王經於大極殿。朝廷之儀一同元旦。講律師道慈爲講師，暨藏爲讀師，聽衆一百，沙彌一百，金光明最勝王經，與金光明經同本異譯。……其後最勝無量三藏譯，前者唐義淨三藏譯。故金光明經，早行於日本。自持統天皇八年始，日本各處，每年正月皆誦此經。而金光明最勝王經，至奈良朝始傳入，聖武天皇神龜二年，詔用以代金光明經。道慈回秦勅講此經於大極殿，可知其精通此經。而始傳此經於日本者，必爲

道慈矣。何則？金光明最勝王經。係道慈入唐之前年久視元年（七〇〇），義淨奉武后勅在東都翻譯，乃最新之經典也。總之，道慈弘流布金光明最勝王經最力之人，且與建立國分寺有重大關係者無疑。蓋國分寺乃據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六，四天王護國品第十之說而建立者。又續紀天平十六年冬十月辛卯條，就道慈所著之愚志記載如下：著述愚志一卷，論僧尼之事。其畧曰：今察日本素縉，行佛法執模，全異大唐道俗傳聖教法則，若慎經典，能護國土，如違憲章，不利人民。一國佛示萬修善，何用虛設？豈不慎乎？愚志一書，今已不傳，不能知其詳細；然據此文，可知建立國分寺乃得從經典之教。欲祈國土之安寧，民之幸福者。此亦道慈與建立國分寺有關係之旁證也。

據木宮泰彥的考證，則傳龍興寺之制於日本是道慈之功。

日本建立國分寺，是由模倣唐之龍興寺而來，已如上述，至日本東大寺之盧舍那佛，則亦由模倣司馬坂的大佛像是武則天時鑄成的。武則天子久視元年（即武天皇四年西元七〇〇年）在洛陽北邙山白司馬坂鑄大佛一尊，使天下僧尼每日出錢一文以助其成，雖經過狄仁傑張廷珪李嶠等前後進諫，但畢竟造成。至日本的東大寺盧舍那佛，則在白司馬坂之大佛像後四十年。然則移植司馬坂佛像於日本的，實以道慈及玄昉為重要人物，而赴日本之唐僧，亦有關係。但小野玄妙氏謂東大寺盧舍那佛鑄之刻畫，其圖樣亦梵網經所說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須彌之圖。遂以東大寺盧舍那佛大像，擬梵網經所說華嚴世界蓮花臺上之盧舍那本身；以諸國分寺本尊丈六釋迦佛，為華嚴中分身之釋迦，後繼真來日，在東大寺建立戒壇院，亦謂東大寺之盧舍那佛，非華嚴之教主，乃是梵網之教主。然盧舍那佛關眼供養之際，講讀師同登高座，講說華嚴經，又每年春東大寺舉行華嚴大會時，亦講說華嚴經，這樣看來，則東大寺之盧舍那佛，確為華嚴之盧舍那佛無疑矣。道慈及玄昉赴日之唐僧，見白司馬坂大佛像之偉麗，故模倣之以成東大寺之盧舍那佛。東大寺之盧舍那佛，是由模倣白司馬坂之佛而來，已如上述。至日本之山嶽佛寺，也是

由於模倣天台山五台山的佛寺而來的。天台山在浙江台州，智顗在此山開天台一派。惟此山近於明州，明州是中日交通的孔道。故入唐日僧如榮寂、普照等曾從鑑真巡拜此山聖迹。但自嵯峨入唐之後，入唐的日僧多巡禮此山，平安朝之天台學問僧請益僧等，未嘗是山的，僅圓仁一人而已。除了天台山外，入唐的日僧亦遊五台山。按五台山是以中台、東台、南台、西台、北台而得名。山在山西代州，相傳此山是文殊菩薩的靈場。故華嚴經說：『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故現在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為說法』。又文殊經說：『若人聞此五台山名，入五台山，取五台山石，踏五台山地，此人超因果聖人，為近無上菩薩者』。此即說五台是佛教的靈場也。惟其如此，故當時北天竺之佛陀波利於唐高宗儀鳳元年（天武天皇白鳳五年西元六七六年），巡拜此山，遇文殊菩薩所化之老翁，從其教訓，取尊勝陀羅尼來，在長安翻譯流布。後再入此山，以終其天年。故世人相傳為靈山，於是在這裡建立清涼寺、竹林寺等十二大寺，許多堂塔伽藍，唐皇每年勅使齋衣鉢香花等，施十二大寺，設齋營千僧供養，沿而咸例。至入唐之日僧，巡拜此山之聖迹者不少。考桓武朝之學問僧靈仙是入此山之第一個人。靈仙於元和十五年（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西元八二〇年）巡禮五台山，在這山金閣寺堅固菩薩院住了二年，到了文宗太和元年（淳和天皇長四年西元八二七年），歿於此山靈境寺。圓仁與其弟子惟曉惟正，行者丁雄萬亦遊此山。其他圓覺、惠達、惠萼、宗叡、齋然、寂昭、成尋等亦遊此山。綜之天台五台之聖迹既多，於是日本之貴族階級，對於這兩山，極為羨慕，或托入唐僧人，或特遣使，入此兩山之佛寺，施以袈裟，寶幡，黃金等，以資供養。例如承和五年（唐開成三年西元八三七年）圓載入唐，橘皇后付以袈裟，使供養天台山智者大師之像，承和十一年（唐武宗會昌四年西元八四四年）橘皇后又以親制之綾衣袈裟施天台山之僧，并以寶幡鏡奩施五台仙之佛，宗叡啓天台依朝廷之旨，在大華嚴寺，舉行千僧供養。濟詮入唐，日皇及各大臣多捨黃金以為五台山文殊菩薩供養之資，是其例也。

至於天台五台之佛寺，與日本之山嶽佛寺有什麼影响呢？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

「天台五台之崇拜與日本平安朝之山嶽佛教，有密切關係。天台真言等平安朝新佛教，每喜在深山幽谷之地，建立寺院者，因欲遠避腐敗之都市，以便嚴守戒律，專事修行也。空海以弘仁七年六月十九日，上表奏請高野山之地，而以日本高山峻嶺，無修行之所為憾，欲從禪經之說，為修行者葺夷荒蕪，建立一禪院云。故日本建立寺院於上山，亦倣天台五台之例也。弘仁九年，最澄告諸弟子曰：『我尋法華圓宗之元由者，初需驚丈大蘇，後天台，并皆於山說。修學解悟矣。是故我宗學生初修之頃，當為國為家，山修山學，利益有情。興隆佛法』。其後圓融天皇大元五年（九八二）肅然入定詣五台山歸國後，請以愛宕山擬五台山，稱其山為五台山大清涼寺，又其一證也」。

這麼一來，日本之山嶽佛寺，實由模倣大台五台兩山的山而來，是很明顯的。

入唐的日僧，對於日本的佛教，既有了種種的影响，至於歸日之唐僧，對於日本的佛教，亦有極大貢獻。歸日唐僧之著名的有：

（一）道明 他於奈良初期歸日，為大和長谷寺開基之僧。據七大寺年表所說，道明於元正養老二年（唐開元六年西元七一八年），造十一面觀音，在日本密教發達史上，有很大的貢獻。因十一面觀音為秘密佛教之一尊也。

（二）道榮 他於宣布佛教時，常以漢音宣布。續紀養老四年十二月癸卯之詔說：「釋典之道，教在甚深，轉經唱禮，先傳恒坦，理合遵承，不須輒改，比者，或僧尼自出方法，妄作別音，遂使後生之輩，精習成俗，不肯變正，恐汙法門，從是始乎，宜依漢沙門道榮，學問僧勝曉等，轉經唱禮，餘音並傳之」。是道榮在日本專以漢音讀佛經也。

（三）道瑤 他於聖武天平八年（唐開元二十四年西元七三六年）隨從遣唐大使中臣名代來日本，館於天安寺之西唐院，講其所撰來是律藏行事鈔。為日本弘通律宗之先驅。他來日本時，又携有

嚴章疏，故華嚴宗之盛行於日本，實是道璿之力。他又是天台宗之學者，故最澄所著付法緣起謂道璿爲弘通天之匠。他又參謁普寂修禪。普寂者北宗禪之祖神秀之弟子也。故凝然所著之律宗瓊鑑章第六說：「大德（道璿）戒律，華嚴，台教，北禪，窮其幽旨，啓彼宗途」。可知道璿對於日本佛教之律宗天台宗華嚴宗都有極大的影響。

（四）鑑真 他是揚州龍興寺的僧人。當唐之時，戒律盛行，不持戒者，則爲僧人所排斥。故安祿山之亂，古儀射裘冕用權計，於大府內各置戒壇度僧，稱其稅緡爲香水錢，以充軍費。寧見宋高僧傳。據此，便知戒律之盛行矣。日本原興寺僧隆尊，嘆日本傳戒律之無人，於是使僧榮瑤，普照，就學於揚州龍興寺以講律戒之鑑真，且迎他赴日，鑑真乃於唐天寶十三年（孝謙天平勝寶六年，西元七五四年）赴日。同時隨鑑真而往的，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托，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衡州靈耀寺僧法載，賓州開元寺僧法成等十四人，藤州通惠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潘仙童，胡國人安如寶，崑崙人軍法力，勝波國人華聰等共二十四人。凝然的律宗瓊鑑章謂隨從鑑真之弟子，顯名於後代的，有仁韓，法進，曇靜，法顯，思托，義靜，智威，法載，法成，靈耀，懷謙（此十一人在唐受具足戒）如寶，惠雲，惠良，惠達，惠常，惠喜，（此六人在日本受具足戒）沙彌，道欽，等十八人。鑑真等赴日時，挫折至五次，徘徊於逆旅者十餘年，備嘗辛苦。其携往日本的經典，有摩訶止觀，法華玄義，法華，夜句，小止觀，六妙門等的天台章疏，蓋以其是律僧而兼天台學者也。故其在日本，在東大寺建戒壇外，復講天台宗之經義。唐紹興寺碑題名集載：

「從三年（天平寶字）八月一日，初講讀四分律並疏等，又玄義文句止觀等永定不退軌則。兼和上（鑑真）天台教觀，稟法進僧都，如寶少僧都，法進思托等和上化，講天台，代代相承而於今不絕。桓武天皇追慕和上鑑真之嘉德，重以莊嚴於遺基，構五間四面精舍一字，安闍陀三尊（自百濟而來），勅於此寶殿講玄義文句止觀永代不絕」。

鑑真等並傳密宗於日本，故其携品有彫白旃檀千手像一軀，續千手像一鋪，唐招提寺的金堂內又有如寶所作的千手觀音，留於後代，足見他也是傳密宗於日本的。

鑑真等復於淳仁天平寶字三年（唐肅宗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年），建造唐招提寺。蓋鑑真對於造寺造佛之藝術頗長，據戒律傳來記上卷所說，他在唐時，曾修建古寺有八十幾所。他同來之弟子，或為建築家，或是彫刻家，故建唐招提寺頗為容易。考唐招提寺堂塔之建立，佛像建造之次序如左：

（一）金堂 如寶率有緣之檀主建立。

本尊丈六金色盧舍那佛坐像。建立緣起謂為義靜作，緣起拔書集畧謂是思托曇靜作。畧錄及千歲傳記謂是思托作，據千歲記謂此像內為竹篋，外以布及漆塗之，凡十三層云。

左脇侍丈六藥師像 建立緣起謂是如寶作，畧錄講是思托作。

右脇侍丈六千手觀音像 建立緣起謂是如寶作

梵天帝釋西天王 如寶作

（二）講堂 平城之朝集殿，施為講堂。內有丈六彌勒像，是法力作

（三）東西近廊並八角堂二基 義靜建立。

（四）食堂 藤原仲麻呂之家屋施入者，安置障子藥師淨土：

（五）綱索堂 藤原清河之家屋施入者。內有不空絹素像，是鑑真携來的。

（六）文殊堂 建立者不明。內有赤旃檀文殊像，是鑑真携來的。

（七）不動堂 義靜建立。內有不劫明王像，緣起拔書畧集謂是義靜作，千歲記謂由唐傳入。

（八）地藏堂 如寶建立。內有地藏菩薩像，是空海居此所形成的。

（九）御影堂 內有鑑真像是思托作。

（十）禮堂 內有鑑真携來之毘首羯磨所作之釋迦像。

(十一) 經緯 或謂如寶建堂，或作義靜建堂。

(十二) 鐘磬 如寶建立。

總之，唐招提寺是鑑真與其弟子建立而成。此寺初名建初禪寺，多取範於唐之律寺，後乃改名唐招提寺。此寺之建築極為壯麗。試看特別保護建築物及國寶帳解說這書評說：

「金堂乃其徒如寶率有緣之檀主建立者。實今日遺存天平時代最大最麗建築物。堂為單層七間四面，立石椽上，前面通一間皆開放，為他時代所無。以豐肥之柱，雄大之斗拱，承遠大之出簷。屋蓋為四注，大棟兩端高舉鴟尾，呈莊重之外觀。斗拱用所謂三層斗拱式，乃最發達而達於完美之域者。鴟尾可為當代遺制之唯一標本。內部中央有石築佛壇，安置本尊盧舍那佛及脇侍梵天，帝釋天，四天王等像。其天花板則為複形窮隆之最麗者，豎條間描佛菩薩寶相花，格間作藻彩文樣。當初佛壇後壁，畫三千佛，柱上橫木亦施彩繪，今已剝落難辨矣。外部皆塗丹土，今斗拱之豎條間，猶存彩畫之痕迹，要之此堂為今日所存天平時代佛殿之最完備者，其構造裝飾，足以代表當時最發達之式樣手法。」

昔書又批評其佛像觀：

「此為天平時代末的偉大精巧之彫像，已為眾所共許。其金形之格式，可謂權衡盡善。所設衣襪，甚為自由，不失寫生之體，較三月堂式之乾漆，手法已大進步。千釋迦之大光背，猶不失巍然之舊面目，可令人想見東大寺大金堂五丈三尺遮那尊位時之偉觀也。」

觀此便知唐招提寺建築之偉大及彫像之優美了。鑑真既建立這寺，乃於此講律義。他寂時又使法進管領東大寺之戒壇院，使法載，義靜，如寶三弟子在唐招提寺努力弘通戒律。要之，鑑真之在日本，對於日本之天台宗密宗律宗固有貢獻，而對於佛寺之建築，尤存不朽之作也。

入唐之日僧及赴日之唐僧，對於日本佛教之貢獻，已述其梗概了。到了五代時，朱金忠就唐昭宗，都於汴，國號後梁，這是日本醍醐天皇延慶七年，即西元九〇七年之事。後梁歷二世，凡

十六年而亡。其後有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合稱爲五代。五代的時間短速，不過五十三年而已。又其勢力之所及，祇限於中原之地，其割據一方而稱王的，有甘肅，後蜀，楚，荆南，吳，南唐，吳越，閩，南漢，北漢等十國，是爲五代十國。這時中日之交通，已不如唐代之頻繁。而日僧渡海者亦少，史上著名的，僅下列各僧。

(一) 寬建 他本是興福寺僧，醍醐延長五年（後唐明宗天成二年西元九二七年）來中國，同伴者有從僧三人，童子四人，近事二人。鴛珠抄卷六引齋然在唐記則謂寬建同伴爲十一人。寬建欲巡禮五台山，乃請來中國，日皇乃賜旅費黃金百兩，并賜以管原道真，紀長谷雄，橘廣相，都良香之詩集九卷（管記兩氏各三卷，橘氏二卷，都氏一卷），并以小野道風之行草書各一卷付之，使傳布於中國。寬建後則死於建州浴室。

(二) 寬輔 他入中國，中國賜以弘順大師之名。洛陽本無真言教，寬輔乃在洛陽傳密教，授法者有三十餘人。

(三) 澄覺 他於醍醐延長八年（後唐明宗長興元年西元九三〇年）來華，詣五台山，遍訪各方聖迹，又遊鳳翔長安洛陽等地。他長於漢語，講唯識論上生經，御賜紫衣，授資化大師之名。

(四) 寬延 他的事蹟亦不明。惟天台宗成尋延久二年正月十一日呈請入宋護照書裡說：「天慶寬延，天歷日延，天元齋然，長保寂照，皆蒙天朝之恩許，得禮唐家之聖迹」。祇是提及其名而已，或謂寬延即寬建，因延建兩字形似而誤，未知然否。

(五) 日延 據寶篋印經記所載肥前國司之言說：「當洲沙門日延，天慶中入唐，天歷之抄歸來」。又驚尾順政氏古經跋語所載古版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剛傳之識語說：「天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延歷寺沙門日延（大唐吳越州）日賜紫衣，光大師初傳持寫之得焉」。觀此便知日延是肥前國人，比數延歷寺之僧，天慶中渡海，天歷末歸國者。歸國時，曾携返寶篋印塔，此塔乃吳越王弘微，數時育王塔故事，作八萬四千塔，內藏寶篋印心呪經，頒行各地者。關於寶篋印經記之金

文，詳見下雕塑章，此不再述。此外尚有長安，超會二人。

五代時來華之日僧，雖有七人，但對於日本之佛教，除日延外，無大貢獻。

北宋一百六十餘人，入宋僧有齋然，成算，祚壹，嘉因，寂昭，元燈，余致，覺因，明道，紹良，慶盛，成尋，賴緣，快宗，聖宗，惟觀，心賢，善久，長明，仲回，等二十人，但最著名的是齋然寂昭紹良成尋四人。

(一) 齋然 他本是東大寺僧人，因獲得東大寺與延歷寺入宋之牒，乃于圓融天皇永觀元年（定太平興國八年西元九八三年），偕計弟子成算，壹祚，嘉因等乘宋商陳仁爽，徐仁滿等之船入宋。其入宋之志願，據本朝文粹卷十三齋然上人入唐時爲母修善願文說：

『齋然天祿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方貢之使而不遣，入唐間待商賈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齋然願參五台山，欲達文殊之即身，願次詣中天竺，欲禮釋迦之遺跡。得到朝唐，有人問我曰：汝是何人？捨本土朝巨唐，有何心有何願乎？答曰：我是日本國，無才無行，一羊僧也，爲求法不來，爲修行即來也。』

可知他入宋的目的，是在修行的。他入宋後，先詣天台山，繼入京都，謁宋太宗，又詣五台山，復歸京都，繼歷洛陽龍門等佛蹟，在宋三年，於花山天皇寬和二年（宋太宗雍熙三年西元九八六年），乘宋商鄭仁德之船，攜有宋太宗所賜之印本大藏經而歸。此大藏經曾藏于京都法成寺，迨此寺荒廢，此經亦散佚不傳。齋然得太宗所賜之新譯經二百八十六卷，後亦藏於法成寺，然他所攜物品之最著名的，就是後來存于嵯峨清凉寺之旃檀釋迦像。此像之來歷，謂天竺優填王，當釋迦在世時，使毘首羯摩造其像，後傳于西域龜茲國。前秦苻堅使將軍呂光伐龜茲，攜至中土，歷代王室珍藏之，至宋太祖安置于汴京開寶寺永安院，太宗又迎入大內之滋福殿。後又移入啓聖祥院。齋然入宋拜其像，命佛丁張榮模塑而攜返日本。至其弟子祚壹攜齋然三年而歸，亦携返藥師如來儀軌一書，這書是五代時由寬輔攜入中國的。

(二) 寂昭 他俗名是大江定基，是源信的弟子。他亦爲巡禮五台山而入宋。日本紀畧及百鍊抄之長保四年三月十五日條說：『入道前三河守大江定基卜狀，向大宋國巡禮五台山』。便是其證。宋昭於一條天皇長保五年（宋真宗咸平六年西元一〇一〇三年），自肥前出發入宋，九月到明州，翌年入汴謁真宗，賜名圓通太師，後遊天台山，訪四明傳教沙門知禮，詢問其師原信所記之天台疑問二十七條。是時蘇州人三司使丁謂見寂昭而大悅，請寂昭赴蘇州。後寂於杭州清涼山。其弟子與寂昭同時入宋的有元澄、念教、覺因、明遠等，寂昭雖歿於宋，未携何物返國。然治部卿源從英贈寂昭書說：『所諮唐歷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使風爲望』。據此，則寂昭必寄有許多佛經於日本矣。又其弟子念教於長和四年（宋大中祥符八年西元一〇一五年）歸國，後復入宋，藤原道長曾以金百兩交寂昭代購一切經論諸宗章疏等，則寂昭必寄有佛典于日本，此又一證也。

(三) 紹良 他繼寂昭入宋。故釋門正統卷二說：『智度傳，日本國師源信，嘗遣學徒寂昭持十七問，詢求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厥後廣智嗣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人，齎金字法華經，如贊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于輪下，三載其道大成，還國大弘其學，曾魯公碑其塔，具道之』。紹良入宋之時代雖不明，然入宋時就學于四明廣智，三年而歸，則對於日本之佛教，亦不無影響。

(四) 成尋 他是大雲寺僧。後三朝天皇延久四年（宋神宗熙寧五年西元一〇七二年）入宋，偕行的弟子有賴緣、快宗、聖秀、惟觀、心賢、善久、長明等七人，入宋遊天台五台聖蹟，在洛陽受神宗厚待，延久五年，其弟子賴緣、快宗、惟觀、心賢、善久五人，携宋帝致日本國書及金泥法華經而歸。成尋則寂于宋。成尋雖不返國，然曾交許多新譯經典寄此五人携返日本。又當他在太平興國寺傳法院時，曾請賜齋然前次求經後之新譯經典，得顯聖印本新譯經共二百七十八卷，蓮華心論迴文偈頌一部二十五卷，秘藏詮一部三十卷，道遠錄一部一十一卷，緣識一部五卷，景

佛傳燈錄一部三十三卷。胎藏教三冊。天竺字源七冊。天聖廣德錄三十卷。共四百十卷。卷冊。以上皆顯聖寺印本。此外又得有未雕刻之經典。交其弟子携返日本。則成尋對於佛教之輸入日本。也有功勳。

南宋時代。日本入宋僧極多。茲就其可考列表于下。

人名	入宋年代	歸國年代	在宋時間	宗派
重源	六條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西元一一六八	同年九月	五月	
榮西	○同上○文治三年再入宋即孝宗淳熙十四年西元一一八七	○同上○建久二年宋光宗紹熙二年西元二九一	同上四年	禪宗之祖
覺阿	高倉承安元年宋乾道七年西元一一七一			
金慶	同上			
練中	後鳥羽文治五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			
勝辨	同上			
俊蒨	正治元年宋寧宗慶元六年西元一一九九	建歷元年宋嘉定四年西元一二一一	十二	律宗兼禪宗
安希	同上	同上	十二	
長賀	同上	同上	十二	

安覺良祐	承元元年宋寧宗開禧三年 西元一一二〇七	建保二年寧宗嘉定十年西 元一一二一四	六
法忍淨業	(一) 建保二年宋嘉定七 年西元一一二一四	第一次安貞二年宋紹定元 年西元一二二八	十四年
(入宋二次)	(二) 天福元年宋理宗紹 定六年西元一二三三	第二次仁治二年宋淳祐元 年西元一二四一	八年
慶政			建保五 年直宋
(勝月房)			
行一			
戒覺			
志遠			
元要			
思齊	建保五年		
幸命	同上		
開陽湛海	(一) 嘉貞末	(一) 寬元二年宋淳祐四 年西元一二四四	第一次 七年
(入宋二次)	(二) 寶治時	(二) 建長七年宋寶祐三 年西元一二五五	
明觀智鏡	曆仁元年宋嘉熙二年西元 一二三八		

目性道玄	同上		
隆禪		貞應二 年在	
明全	據阿貞應二年宋寧宗嘉 定十六年西元一二二三		
希玄道元	同上	四	曹洞宗之始祖
摩然	同上		
亮照	同上		
圓衍	四條天皇嘉貞元年宋理宗 端平二年西元一二三五	六	
神子榮尊	同上	三	
性才法心		九	
大歇可心			
隨東湛慈			
無外獨然 (應通禪師)			
琳上人			

承 性							
天祐思願							
大 和							
一翁院豪(圓 覺佛演祥師)	寬元二年宋理宗淳祐四年 西元一二四四						
印 上 人	同上						
妙見道祐					寬元三 年在元		
悟空敬念					同 上		
心地覺心(法 隆圓明國師)	建長元年冬宋淳祐九年西元 一二四九	建長六年宋理宗淳祐二年西 元一二五四	六				
覺 儀							
觀 明							
證 上 人							
俊 上 人							
覺 上 人							

無關普門	建長三年宋淳祐十一 元一二五一	弘長二年宋理宗景定三年 西元一二六二	十一	
無象靜照	建長四年宋淳祐十二年西 元一二五二	龜山文永二年元世祖至元 二年西元一二六五	十三	
台上人				
源心			建長五年 年在宋	
寒山義尹	建長五年宋理宗寶祐元年 西元一二五三	文永四年元世祖至元四年 西元一二六七	十四	
約翁德倫	建長中入宋		八	
無隱圓範				
樵谷惟僊	建長未			
寂菴上昭				
常禪房				
東道房				
山史惠雲	後深草正嘉二年宋寶祐六 年西元一二五八	文永五年元至元五年西元 一二六八	十	
南州宏煒				

微通義介	後深草正元元年宋理宗開慶元年西元一二五九		
南浦紹明			
智光			
海月明心			
寂巖了		文應弘長 寺在宋	
忍禪 忍		文永元 年在宋	
東林忍			
巨藏主			
藏生順空	弘長三年宋景宗四年西元一二六三	文永六年元至元六年西元一二六九	七
一關祖丘			
不退德溫	文永中入宋		
宗英 (入宋二次)	一，文永中二，弘安二年元至元十六年西元一二七九	同年歸國	一
圭堂瓊林	文永中		

真翁智悅			
覺 祖			
慈 心			
圓 海	文永三年元至元三年西元 一二六六	弘安二年元至元十六年西 元一二七九	十三
白雲惠曉			
無傳聖禪			
巨山志源			
林叟德瓊			
道 意 身		建治三年元至元十 四年西元一二七七	
北溪德悟		弘安二年元至元十六年西 元一二七九	
龍峯宏雲		同上	
無及德全	安二年元至元十六年西 元一二七九	同年歸國	
重 果 一本曉房		同上	

重源 南宋時代，禪宗盛行，所謂徑山、靈隱、天童、淨慈、育王五山，皆有禪寺。所謂中竺道場，蔣山、萬壽、雪竇、江心、雪峯、雙林、虎丘，國清十刹，亦有禪寺。重源入宋，見其大，曾遊育王山。後育王山在明州。晉武帝大康二年，劉薩訶在這山發現印度阿育王八萬四千塔之一，同名阿育王山，東晉安帝始勅構塔寺，梁武帝普通二年，賜阿育王寺之額，宋文帝元嘉中，賜名廣利寺。此寺改爲禪寺，即始於此時。重源入宋，慕中國之禪風，曾瞻禮於此。他嘗說：「吾所圖之木料，建築此寺之舍利殿。後他返國時，曾攜返宋本大藏經，於建久六年（宋寧宗慶元元年，西元一一九五年）施於醍醐寺，又於笠置之般若寺施宋本大羅若經一部。又東寺金剛藏，亦自宋版般若心經及般持心經誦誦抄各一帖，中有黑書『奉渡日本國僧重源』八字，則這書是重源携返的無疑。除了經典外，重源又携返觀音勢至像，唐本十六羅漢像十六軸。又受法然、法惠之托，携返墨鸞、道綽、善導、懷感、少康、淨土五祖畫像，這五祖像，後存於京西巖城之二華院，其筆勢及衣金紋，確是南宋的名畫。」

榮西 他第一次入宋，遊天台、育王山，第二次入宋，欲入印度不果，乃轉參黃龍八世之法孫廬菴懷敏而轉臨濟宗。懷敏移住天童山，又從至天童山以嗣其法。宋孝宗賜以千光佛師之號。其第一次之携來品，有天台之新章疏三十餘部六十卷，并傳入茶禮。第二次歸國後，其弟子源賴家之皈依，在京都建建仁寺，在鎌倉中興禪寺。大儒程頤，爲日本禪宗之始祖。當時，其弟子覺阿，他是比叡山之僧，與其法弟金慶入宋，學臨安靈隱山佛海慧遠之法而歸。高宗天育間，其德風，召入宮中，詢以禪要，後居比叡山不出。

練中勝辨 二人皆是大日能忍的弟子。練中勝是師之命入宋，贈食幣於育王山，拙菴德光，呈其所悟，德光證之。授法衣及贊達摩像。

俊篁 當奈良孝謙之時，唐僧鑑真赴日本，一時律宗在日本大爲興盛。至平安朝，律宗漸衰，式微。至後醍醐時，弟子土居長卿二人入宋，訪明州，尋得律宗三藏。乃於明州之寶雲寺，建

山學禪。又至嘉興府華亭縣超覺院。就北峯宗印學天台。又到臨安與禪，教，律，諸名德論道，在宋十二年而歸。携回經論甚多。後得高僧後鳥羽順德諸帝之皈依，在京都東山開創泉涌寺。安覺良祐 他決志寫成藏經一部，在宋十餘年，成其一半。他寫藏經時，在文治三年，至孝貞二年。凡四十二年而成。經卷四千數百卷。後存於筑前宗像郡田島村興正寺。

法忍淨業 他是京都戒光寺開山之祖。就中峯之鐵翁學戒律，理宗賜以忍律法師之號。在宋十四年。撰大藏經而歸。在京都建戒光寺。於是泉涌戒光二寺，爲學律者的淵藪。

開陽湛海 他是俊賴的弟子，入宋兩次。第一次經兩浙，遊太湖，學於晦巖，又住明州白蓮教寺，帶回經論甚多，而爲佛教之戒律者。第二次，因慕白蓮教寺之佛舍利而入宋。以其營還白蓮教寺之門廊殿閣有功，得佛舍利，。又遊臨安府之上天竺下天竺。携白蓮教寺之佛舍利而歸，供奉於泉涌寺，每年九月八日開舍利會，永以爲例。

明觀智鏡 是俊賴之法孫。在 與蘭溪道隆厚交，勸道隆赴日，歸國後復住泉涌寺。目性道玄 定舜之弟子。在宋遍訪律匠，諮尋戒疏，歸住泉涌寺，著比丘鈔解一卷。

希玄蓮元 在宋訪天童山徑山等。後來天童山之長翁如淨，學曹洞禪。歸在山城深草開興聖寺，在越前開永平寺，爲日本曹洞宗之始祖。

圓爾辨圓 在宋訪天童，相慈，曹隆各寺，參智識後，登徑山，學無準師範之法，歸京都東山開東福寺，受藤原道家之皈依。

神子榮尊 與圓爾辨圓同入宋，遍訪江南禪林，學無準師範之法，歸在肥前國開興聖萬壽寺。性才法心 學無準師範之法而歸，在陸奥松島開圓福寺。

大歇了心 入宋之年代不明，歸住壽福建仁二寺。詳見清規。日本禪院雖創於榮西，惟衣服禮典，至了心而大備。

隨乘湛慈 又名隨乘坊。學無準師範之法而歸，在筑前無榮福寺。請圓爾辨圓開堂說法。

無外爾然 即應通禪師、歸國在三河開寶相寺，請圓爾辨圓爲第一祖。承性 歸國在建長寺從蘭道隆學法。

天祐思順 入宋學止關居間之法，在京東草河開勝林寺。大和是其弟子。

一翁院素 即圓明佛演禪師，學無準師範之法。歸住卜野長樂寺，當宋僧元菴普寧與無學祖元赴日本，他曾就之請益。

妙見道祐 在宋學無準師範之法，歸隱於北京之妙見堂。

悟空敬念 是圓爾辨圓之弟子，入宋學無準師範之法，歸遊鎌倉。謁元菴普寧，其弟子東巖惠安，在京東建福庵時，請其開堂說法，後隱於筑前之首羅山。

心地覺心 即汝燈圓明國師。入宋遊徑山育王山，後嗣臨安府護國仁王寺無門慧海之法，歸在紀伊之由良開興國寺。

無開並門 即大明國師佛心禪師，亦即無門房。圓爾辨圓的弟子，入宋時到淨慈嗣斷橋妙倫之法，歸住東福寺，又得龜山上皇所依，在京都開南禪寺。

無象靜照 入宋參徑山，學石谿心月之法，歸創白都之佛心寺，丹後之寶林寺，常陸之興禪寺。又主持筑前之聖福寺，著興禪記一卷。

寒山義尹 在宋參明州之無外，淨慈之虛堂，肅隱之退耕，歸在肥前開大慈寺。

無隱圓範 即覺雄禪師，蘭溪道隆之弟子，入宋遍訪江南之禪林，歸住建仁圓覺建長等寺。

樸谷惟僊 入宋遊天童育王等山，歸國開安樂寺。

山史惠雲 即佛智禪師，又名道空房。圓爾辨圓之弟子，在宋學斷橋妙倫之法，在陸奥開勝滿寺，後隱居東福寺。

南洲宏海 即眞應禪師，歸謁建長寺之元菴普寧，而嗣其法，住淨智寺。微通義介 道元弟子，在宋遍歷諸方，歸而爲永平寺之第三世。

南浦紹明 參淨慈之虛堂智愚，傳其法。

禪忍 蘭溪道隆弟子。擢大覺禪師語錄入宋。在宋雕板。請虛堂智愚校勘，上天竺之佛光法師法照作序。

藏山順空 即圓鑑禪師，又名無量房。圓備辨圓之弟子，入宋參徑山之偃溪，廣問等老宿，後參石林輩，所得甚多。歸在肥前開高城寺。

不退德溫 蘭溪道隆之弟子，在宋謁希叟紹曇，爲時宗求法語。

宗英 入宋二次。第一次歸國時，以圓鑑獻蘭溪道隆。第二次則迎無學祖元來日本。

圭堂琳林 在宋學徑山虛舟普庵之法，歸住京東草河之勝林寺。嘉元中，以虛舟和尚語錄，附商船入宋刊印之。

真翁智侃 即佛印禪師，又名正智房。初參蘭溪道隆，後入宋歷參智識，歸而傳圓備辨圓之法，年豐後開壽寺。後隱於東福寺。

覺 摠 初參元菴華寧，後入宋參叩名宿，歸在越州開淨福寺。

圓 海 歸在京城開佛心寺，請無象靜照主持。

白雲真曉 即佛照禪師，又名道顯房。圓備辨圓之弟子，入宋學瑞巖希叟紹曇之法而歸。無傳聖禪 圓備辨圓之弟子，入宋學徑山荆叟如珏之法。

巨山志源 登徑山學虛堂智愚之法，歸住鎌倉之禪興寺，以宗乘詩偈聞名於禪林。

林叟德瓊 即覺興禪師，蘭溪道隆之弟子，歷訪江南禪林，歸住鎌倉之禪興寺。

宏覺禪師 即桃溪德悟，蘭溪道隆之弟子，入宋謁育王山之頑極行彌，宋僧無學祖元來日本，隨之而歸。

無及德全 蘭溪道隆之弟子，迎無學祖元來日本。

綜觀此班入宋的日僧，影响日本佛教之士者爲律宗與禪宗。如俊賴與其弟子安秀是賀比學律宗。

法忍淨業亦學律宗。於是日本之律宗始盛。

考禪宗已由入唐僧傳入日本。如道昭曾就相州隆化寺之慧滿學禪，來日之唐僧道璿，嘗參湖南崇山之善寂學禪，最澄亦就台州禪林寺之修然學牛頭禪。圓仁亦在山東省青州居士蕭慶中訪禪法，入宋僧圓然亦曾鼓吹禪法。但禪宗雖屢次傳入日本，實未顯盛。蓋此時之禪宗祇隨附從其他宗派而來，絕未引起世人之注意，且奈良平安兩代之僧，祇以研究經典及祈禱法會為佛教，而禪宗則無經典可依據，亦無可祈禱之對象，故當時不能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中國禪宗，至五代北宋而大盛，至南宋則達燦爛之期。然自覺阿金摩練中勝辦倡導禪宗之後，於是禪宗乃引起日人之注重，迨蔡西歸國，在博多開聖福寺，在京都開建仁寺，力倡禪學，然後日本之禪宗大盛。至若明全，道元，寒岩，吳尹，徹通義介，圓爾辨圓，神子榮尊，悟空敬念，心地照心，無開辨門，山與惠雲，無外爾然，白曉雲忠，無傳聖禪等，皆是禪宗學者。

入宋的日僧，對於日本佛教，固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來日的宋僧，對於日本佛教，尤有很大的貢獻。來日的宋僧其表如下。

人 名	赴 日 年 代	歸 國 年 代	在 日 年 數
蘭溪道隆	宋理宗淳祐六年日本寬元四年西元一二四六		歿於日
義翁紹仁	同上		同上
龍江	同上		同上
了然法明			同上
元菴普寧	宋理宗景定元年日本文應元年西元一二六〇	元至元二年日本文永二年西元一二六五	五

他是高麗人

古澗門泉	宋理宗嘉定時日本文應時	元至元初日本文永初		
大休正念	元世祖至元六年日本文永六年西元一二六九		歿於日	
西澗士景	元至元八年日本永八年西元一二七一	元至元十五年日本弘安元年西元一二七八	七	
無學祖元	元至元十五年日本弘安二年西元一二七九		歿於日	
鏡堂覺圓	同上		同上	
梵光一鏡	同上			

蘭溪道隆 即大覺禪師，本是天陽山無明慧性之法嗣。他赴日的原因，是因為他與入宋的日僧明親智鏡交情頗篤，已有東渡之志。後來他居明州天童山，適聞有日本商船泊於來遠亭，乃往浮橋頭觀之，忽有神人告他說：『師之緣在東方』。道隆大悟，乃同弟子義翁紹仁（轉覺禪師）龍江等赴日本。他由博多灣上京都，訪明親智鏡於泉涌寺之來迎院，再往鎌倉。時北條時賴執政，請道隆住於栗船之常樂寺，翌年建立佛堂，這是鎌倉有禪宗道場之始。道隆在常樂寺開堂上堂時，曾說：『種件依唐式行持』。時賴老早想在鎌倉建一大伽藍，及得道隆，乃於建長元年擇定巨福呂地獄谷之地為寺址，於建長五年建成，以道隆為開山祖，這便是巨福山寺建長寺。時賴并在此寺鑄一巨鐘，道隆為之銘，署名『建長禪寺住持宋沙門道隆』。是為日本禪寺之名之始。以前日本之禪宗，是與天真台宗相混，非純粹的禪宗，故禁西國提倡禪宗而遭天台學者之妬，以至請求禁止淨摩宗。自道隆得了時賴的保障，力倡禪風，禪宗乃得脫離天台真言兩宗而獨立。故道隆感謝時賴說：『予依大檀那之力，成此大叢林，正如順風使帆』（見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可見其

鼓吹禪宗之順利也。元僧一山一寧至日本，稱道隆爲「此土禪宗之初祖」，可謂篤論。

元菴普寧 是宋南禪福聖寺僧，無準師範之法嗣。蘭道溪隆在蔣山及徑山時，與他有厚交。他因道隆之函勸，遂赴日本，由博多至京都，訪法弟圓爾辨圓於東福寺。後應時賴之請，下鎌倉。住建長寺。時賴喜其氣宇軒昂，言行脫俗，甚爲器重，於是名聲大噪於時，佛徒之來學者頗多。文永二年，忽留一偈而歸宋。偈說：「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路頭活」。因爲時賴於弘長三年十一月卒，天台宗之教徒妬忌他，故決心返宋，普寧在日本五年，他的法嗣祇東岩惠安，南洲宏海等，惟能感化時賴，致使鎌倉武士與禪宗結合，其功頗偉。

大休正念 即佛源禪師，是徑山石溪心月的法嗣。他到日本，道隆讓他住禪興寺，後住建長，壽福，圓覺等寺。北條時宗常從之學禪，鎌倉武士歸之頗多。

西澗士曇 即大通禪師，是天童山石帆惟行之法嗣。他赴日時，僅二十三歲，不肯主持一刹，歷遊京都鎌倉諸寺。在日本七年歸宋。後又於元成宗大德三年（後伏見正安元年西元一二九九年）同一山一寧赴日，住圓覺建長等寺。

無學祖元 即佛光國師，是無準師範之弟子，在宋負有盛名。太傅賈似道曾請住台州真如寺。後來此地被元兵侵佔，乃往明州天童山。依托法兄環溪惟一。是時日本北條時宗以蘭溪道隆已死，乃自作諄帖，使德詮，宗英入宋迎祖元來日本。祖元遂與法姪鏡堂覺圓弟子梵光一鏡赴日本。住鎌倉之建長寺，與住壽福寺之大休正念對峙，十倡禪旨，北條時宗舉族從他學禪。後在鎌倉開圓覺寺，請他爲開山第一祖。

鏡堂覺圓 即大國禪師，是天童山環溪惟一之法嗣，在日本住禪興淨智圓覺建長建仁等寺。入宋之日僧與赴日之宋僧，對於日本之佛教，影响固大，而對於日本當時之武士及佛寺之建築，亦皆有極大的影响。茲先述禪宗與武士之關係。

北條時賴雖獲得全國政權，而教權實不在握。當時諸大寺既集中於京畿，貴族寺院的人物，又

是皇族公子。鎌倉幕府。深爲不安。時賴欲使鎌倉幕府政治與宗教之中心，決志學佛。然當時之天台眞言淨土日蓮各宗，又爲舊人物所支配，時賴欲創新派，乃採用純粹唐式的禪宗，故寶治元年（一理宗淳祐七年西元一二四七年），七月，使人到越前永平寺迎希玄道元至鎌倉，迎希玄薩土戒。且建莊壯麗之山莊以居之，道元居此而去。時賴乃迎至鎌倉，築建長寺，使爲開山第一祖。但當時之日本僧徒，以縱情私利爲主，而禪僧則以宣揚爲宗，是以鎌倉武士咸被其感化。又時賴以矩之器正，亦爲市禮節尚武氣之武士所歡迎。故那班武士誠心皈依禪法。後在建長寺山內，再建日明寺，時賴降開堂說法。時賴乃交其時權於武藏守長時，親就道隆落髮，專心修禪。後乃就元菰並靈禪。弘長三年十一月卒於日明寺。彌留之際，著契契，安坐繩牀，述偈語而逝。

時賴既卒，時宗執政，亦就道隆，正念，參究，又請德溫，由英入宋，求其印契，以爲禪之機緣。後又有作時帖，佈施論，宗並迎龜山祖元來日，其對於禪學之修養，諒非淺鮮的，故其休心參禪時說：『半半殿（時宗）幼其西來古指之宗，早悟即心即佛之旨』。

除時賴時宗之外，又武藏守宗政，左馬權頭貞時，武藏守左近大士時村，時河守時時，越後守顯時等，皆係氏之一族，中亦禪學，而宗政最爲熱心，故佛源禪師語錄載正念的話說：『北條那武州刺史（宗政）切切以生死大事爲樞樞，孜孜以而來祖意爲直歸』。龜山禪師語錄亦載顯時的話說：『惟我故武州明公（宗政法名），乘悲願力，現宰官身，深悟西來直指之宗，早悟即心即佛之旨』可見其對於禪宗之有心得了。

北條時代，女子亦有參禪者。如時宗卒後，他的夫人就祖元，改髮，將賴朝叔母所贈的鎌倉道心寺，改名東慶寺，終身居此學禪，其法名爲覺山志道大師，影响所及，一時女子之修禪者頗多。北條幕府之武士，既熱心參禪，則對於其精神，必有極大的影响。據修禪者說：所謂禪之智識，能悟到非有非無，有無俱存，有無俱空，即所謂色是空，空是色之境界。祖元的佛光禪師語錄

說：『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着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衆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驚賊中。魔賊皆降伏。』可知能悟一切皆空，則萬事絕不足以擾其心，置死生於度外故道元之說：『一生一時也，死亦一時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又佛源禪師語錄中正念與時宗之法語：『堅碎生死牢關。便見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所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方可出生入死，如同遊戲之場，縱奪卷舒，常有泰然安靜，胸中不掛寸絲，然立處既真，用處得力。』他既有這種犧牲性命的精神，故處事鎮定，不畏艱難，如蒙古攻日本時，時宗能以從容之態度殲滅國難，實得力于修禪，而日本後來武士道的精神，亦受禪風之影響。以上是就禪宗與武士的精神來說。至於入宋僧與赴日僧，對於日本的佛寺，亦有影響。當時由宋傳入的禪寺建築法，有兩種新式，一爲天竺式，一爲唐式。天竺式是由重源傳入。重源初次入宋，巡禮五台山之聖蹟，其後入宋二次，研究建寺之式樣，準備回國建築佛寺。他入宋時，以周防之良材運宋，建立育王山金剛佛，以作實地試驗，返國後，即重建東大寺大佛殿，此即依天竺式而建築的。

唐式的禪宗式。始傳禪宗式於日本的是榮西。榮西在宋，修造天台山萬年寺之兩廊，又修智者大師之塔院，又助成天童山千佛閣之工程。返國後，在博多建聖福寺，在鎌倉建壽福寺，在京都建建仁寺，皆是模倣宋制而成的。又道元在山城所建之興聖寺，圓爾辨圓在京都東山所建的東福寺，亦爲禪宗式。

但日本此時無純粹的禪宗，乃是與天台真言相混合的禪宗。故此等寺刹，亦非純粹禪宗之寺刹，乃含有天台真言之思想也。光明寺入道前關白道家公處分狀東福寺條說：

『東西迴廊各二十六個間（合五十二間瓦葺）。』

東西壁畫圖繪，西天二十八祖，震旦六祖，并真言八祖，天台六祖等行狀。

庫頂堂一字（五間四面兩在禮堂，號莊嚴藏院）

奉安置兩界曼荼羅各一鋪

八祖師像各一鋪

寶藏二字（各三間二面瓦葺）

一字 密宗章疏并寶書等

二字 顯宗章疏并俗書等

東福寺之有天台密宗章疏等，則非純粹之禪宗明矣。

然則純粹禪宗式之佛刹，當爲蘭溪道隆所建之鎌倉建長寺。建長寺草建入佛記之古寫本中，記此寺創建之規模說：

「法堂十七間四面，高三丈二重二丈五尺，本房方丈十間八間半 客殿十二間九間半 庫裏八間五間半 經堂五重八間四面，高六丈二尺 山門高二丈半五間橫三間半，中門高二丈五尺平七間橫四間半 經堂十間七間 鐘樓五間四面 修樓八間四面 食樓五間四面 日本之有純粹的禪宗寺，實始於建長寺。自此之後，禪興，興福，圓覺，淨智等寺，皆由道元正念，祖元計等劃其工程，倣效宋禪刹而成的。

又宋代之五山十刹對於日本之寺院，甚有影響。五山即：

一徑山 臨安府徑山 興聖萬壽禪寺

二靈隱 臨安府北山 景德靈隱禪寺

三天童 明州太白山 景德禪刹

四淨慈 臨安府南山 報恩光孝禪寺

五育王 明州育王山 廣利禪寺

十刹即：

一，中竺 臨安府 天寧萬壽永祚禪寺

二，道場

湖州烏程縣

護聖萬歲禪寺

三，蔣山

建康上元縣

太平興國禪寺

四，萬壽

平江府

報恩光孝禪寺

五，雪竇

明州

資聖禪寺

六，江心

瑞安永嘉縣

龍翔禪寺

七，雪峯

福州侯官縣

崇聖禪寺

八，雙林

婺州金華縣

寶林禪寺

九，虎丘

平江府

雲岩禪寺

十，圓清

台州天台縣

教忠禪寺

此外又有敕院五山十刹。五山即臨安之上竺下竺，瑞安之龍仁寺，明州之白蓮寺，十刹即臨安之集慶、演福、普福，湖州之慈感，明州之寶陀，紹興之湖心，平江之大善、北寺，松江之延慶，建康之瓦官。

五山十刹之制，既傳入於日本。故日本在鎌倉建長，圓覺，壽福，淨智，淨明五寺，名爲鎌倉五山，○在京都建天龍，相國，建仁，東福，萬壽五寺，名京都五山，又建南禪寺居於五山之上，是倣宋五山制而來的。

禪宗既盛行於日本，日本亦倣宋之叢林，刊行經籍。考宋叢林中，凡高僧上堂，（上法堂或僧堂，講說法要也，又名大參）小參（對大參而言，元旦，結制，（四月十五日），解制，（七月十五日）冬至等四節前晚，誦法）普說（雖似上堂，惟不焚祝香，不搭法衣，中國稱上堂爲陞座）法語，偈頌，佛祖贊，自贊，小佛事，題跋，書簡等。概由侍者編纂，募緣付梓，廣爲流布，雖海外嗣法之弟子，亦托便贈之。如宋理宗淳祐二年（四條仁治三年西元一二四二年），天童山以如淨禪師語錄贈日本叢前永平寺之道元，（見建德記坤卷），元成宗時（日本嘉元中），徑山以

虛舟和尚語錄，贈日本京東草河勝林寺之圭堂瓊林（見虛舟和尚語錄序）。是其例也。宋之禪宗既如此，而日本禪宗亦效之，刊行禪籍，使廣為傳布。鷲尾順敬博士之鎌倉武士與禪之一文中，已曾言之。其刊印之書籍，將見於本書下印刷術之輸入一章，此處不必詳舉。

總之，入宋之日僧與赴日之日僧，其影響於日本之佛教者為禪宗，為禪宗式之佛寺，為禪宗之書籍，及禪宗與武士人格之修養，其功可謂偉矣。

到了元代，即日本鎌倉元末期。入元之日僧，雖因元世祖東征而絕斷，然至成宗初年，即日本足利時代之初期，自元僧一山一寧至日本後，入元的日僧大見增加，茲列表於下。

入元日僧一覽表

人 名	入 元 年 代	歸 國 期	在 元 年 數
可恭圓慧	永仁四年元成宗元貞二年 西元一二九六	延慶元年延武宗至大元年 西元一三〇八	十二
愚直師侃	永仁中		
龍山德見	嘉元二年元成宗大德九年 西元一三〇四	正平五年元順宗至正十年 西元一三五〇	四五
無夢一清	嘉元中	同上	
道溪祖雄	德治元年元成宗大德十年 西元一三〇六	正和元年元仁宗祐祐二年 西元一三一六	十
祖繼大智	正和二年元仁宗祐祐元年 西元一三一四	正中元年元泰定元細西元 一三二四	
雪村友梅	德治二年元成宗大德十年 西元一三〇六	元德元年元明宗天歷二年 西元一三二九	二二

嵩山居中	○延慶二年武宗至大二年 西元一三〇九	○未幾歸國	五	入元二次
復恭中己	○文保二年元延祐五年西 元一三一八	○元享三年元英宗至治二 年西元一三二三		
無隱元晦	延慶三年元武宗至大三年 西元一三一〇	元享三年元英宗至治二年 西元一三二三	十二	
孤峯覺明	同上	真歷元年元泰定二年西元 一三二六	十六	
石室善政	○長元元年元武宗至大四年 西元一三一八	真歷元年元泰定二年西元 一三二六	八	
寶翁聰秀	○仁宗元年元延祐五年 西元一三一八			
靈光周微				
月心慶圓				
無崖仁浩	元享元年元英宗至治元年 西元一三二一			
月林道皎	元享二年元至治二年西元 一三二二	元德二年元寧宗至順元年 西元一三三〇	八	
鐵牛景印	○事申在元			
金珠	○事申在元			

中巖圓月	正中二年元泰定二年西元 一三二五			
鈍夫全快				
無鑿良緣				
寂室了光				
天岸慧廣	正中中	元德元年元天歷二 一三二九		
安(禪人)	嘉曆元年元泰定三年西元 一三二六			
瑞興	同上			
不聞契聞	同上	元弘三年元順宗元統元年 西元一三二三	七	
古源邵元	嘉曆二年元泰定四年西元 一三二七	正平二年元至元七年西元 一三四七	二十	
正堂顯	嘉曆三年元天順帝致和元 年西元一三二八			
友山士偲	同上	興國六年元至元五年西元 一三四五	十七	
平田慈均				
交(侍者)	元德元年元天歷二年西元 一三二九			

古先印元	文保二年元延祐五年西元 一三一八	同上	八
業海本淨	同上		
明史齊哲	同上	同善玖	八
寂室元光	元應二年元延祐七年西元 一三二〇	同上	六
可翁宗然	同上	元德二年寧宗至順元年西 元一三三三〇	十
鈍庵俊	同上		
物外可什	同上	元德元年元明宗天歷二年 西元一二二九	九
別源圓旨	同上	元德二年元寧宗至順元年 西元一三三三	十
大朴玄素	元應中	延元四年元順宗至元五年 西元一三三九	
了偉位			
東洲至道			
秀崖宗胤			
綠首座		元應三 年在元	

靈 栖			
演 禪 人			
友 石 清 交			
古 鏡 明 千			
東 傳 正 祖			
宗 侍 者			
夫 藏 主			
大 象 宗 嘉			
虎 溪 道 士			
子 建 淨 業			
空 叟 智 玄	建武元年元至統二年西元 一三三四	延元四年元至元五年西元 一三三九	五
無 文 元 選	延元四年元至五年西元 一三三九	正平五年元順宗至正十年 西元一三五〇	十一
元 通	同上		

愚中周反		興國三年元至正二年西元一三四二	正平六年元至正十一年西元一五五一	十
密(禪人)				
森(禪人)	與愚中周反同時入元			
泉(侍者)	同上			
關(禪人)	同上			
頓(侍者)	同上			
裔 節	同上			
瑞(侍老)	同上			
宗(侍者)	同上			
裔 訓	同上			
策(侍者)	同上			
雲(禪人)	同上			
裔 澤	同上			

真定性忠	同上			
南海寶洲	同上			
鳳(禪者)				
智(藏主)				
麟(知客)				
琛(禪人)				
性海靈見	興國三年元至正二年西元一三四二	正平六年元至正十一年西元一三五一	九	
大拙龍能	興國五年至正四年西元一三四四	正平十三年元至正十八年西元一三五八	十四	
此山妙在		興國六年至正五年西元一三四五		
大本良中		同上		
金山明昶				
鐵舟德濟				
太虛元壽				

元 榮	守 一	元 東	致 柔	祥 麟	圓 薰	大功績	無我省吾		善 慧	約 卷 德 久	古 劍 妙 快	大 岳 妙 積
							○正平三年元至正八年西元一三三六 ○正平十八年元至正二十三年西元一三六三		正平元年元至正六年西元一三四六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正平五年至正十年西元一三五〇				正平五年元至正十年西元一三五〇		正平二十年元至正二十五年西元一三六五	
十一									五		二十	
							入元二次					

竺 芳 裔	良 樹	碧 巖 璨	義 南	特 舉 妙 奇	正 憶	妙 愚	智 燈	祖 麟	寬 珍	清 安	裏 淨	自 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觀中中諦	月心慶圓	信中自敬	儀禪人	輔(侍者)	宗猷	濟(知客)	僊(侍者)	易(侍者)	大初啓原	椿庭海壽	謙溪令裕	無格良標
正平十九年元至正二十四 年西元一三六四	同上	北朝廷文中						正平七年元至正十二年西 元一三五二	正平六年元至正十一年西 元一三五五	正平五年元至正十年西元 一三五〇		
										文中二年明洪武六年西元 一三七三		
										二三		

仲（藏主）	正平二十三年明洪武元年 西元一三六八				
寒中元志		正平末年明洪武二年西元 一三六九			
目岩光					
獨芳清曇		弘和中			

入元之僧雖多，然大多是庸碌之徒而已。姑擇其畧為知名者述於下。

可菴慧圓 他在元時，遍遊江浙各禪林，歸後在三河創願成寺，請其師應通為開山祖。

愚直師侃 他是圓通寺僧，歸國之時代不明，但長居於京都之圓通寺及三聖寺。

龍山德見 一山一寧之弟子。入元參天童山之東巖。到慶元（明州），因我國對日人警戒嚴重，不許入城，德見乃於夜登城，偶墮入某富家之室，被捕。乃索筆述其入元游天童山之志願。適

其家主人夫婦，是曾參天童山東岩和尚的。白官赦其罪，乃得掛錫於天童山，謁天童山之竺西，

繼謁虎丘之東洲，古林，靈巖之平山濟川等。元人請住隆興之兜率寺。歸國受足利尊氏直義之皈依，歷住南禪天龍等寺。

無夢一清 在元謁廬山之龍巖，雪峯之樵隱，百丈之東陽等。得徑山之古鼎贊而歸。歸住齋中

寶福寺，後住東福寺。

雪村友梅 一山一寧之弟子。十八歲入元，曾謁道場之叔平隆，元人疑為間諜，下獄加刑，他

毫不畏懼，且誦佛光禪師之偈說：『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

影裡斬春風』。卒獲赦免。文宗即位，請住長安聖微寺。賜寶覺真空禪師之號。歸住信濃慈雲寺

，京都西禪寺，豐後萬壽寺。後因赤松圓心之請，在播磨建法雲寺。又住京都萬壽建仁等寺。又

，京都西禪寺，豐後萬壽寺。後因赤松圓心之請，在播磨建法雲寺。又住京都萬壽建仁等寺。又

長於詩，著有岷峨集。

嵩山居中 第一次入元，參天童山之東巖日，第二次入元，參見永福之古林茂，天童之雲外軸，後謁將山之曇方忠。歸住兩禪建仁圓覺等寺。後結室於圓覺寺側居之，號瑞雲菴。大本禪師，即其法名。

復菴宗已 入元師事天目山之中峯明本。歸後，開常陸之法雲，筑波之禪源，結繩之華藏，古內之清音等寺，爲東關之叢席。當時江湖雲衲，不至其輪下，則不爲過參僧，寺衆常以二千人無隱元晦。即法雲普濟禪師。入元謁天目山之中峯明本。歸住聖福圓覺建長各寺，後存壹岐開安覺寺，足利尊氏曾就問禪理。

孤峯覺明 即三光國師。入元參天目山之中峯明本，再參元翁古林斷崖雲外無見諸名僧。歸在出雲創雲樹寺。後醍醐天皇在伯耆時，召至行在所，受其法戒，賜國濟國師之號。後村上天皇又加賜三光國師，後拜泉州開大雄寺。

石室善玖 入元參見建康鳳台之古林茂清，歸住武藏開平林寺。

古先印元 即正宗廣智禪師。入元謁華頂之無見親，又謁天目山之中峯明本。歸住甲斐之惠林鎌倉之淨智圓覺建長等寺。

寂室元光 入元謁天目之中峯，徑山之元叟，保寧之古林，雞足之清拙，靈隱之靈石，般石之絕學，華頂之無見，天目之斷崖。歸開永源寺。

可翁宗然 入元參天目山之中峯，又參古林元叟無見等。歸住筑前崇福寺，京都萬壽建仁等寺。在泉州建禪通禪，又住南禪寺，善畫丹青，世多珍之。其法名爲普濟大聖禪師。

物外可什 即真照大定禪師。入元遍遊江浙禪林，在淨慈寺與中巖圓月同居。歸國後，大友賴高請住筑前崇福寺，後住建長寺。

別圓源旨 入元參謁鳳台之古林，天童之雲外，天目之中峯，本覺之靈石，華頂之無見，東林

之古智，圓通之竺田。妙果之南楚，龍岩之鹿首座。般若之誠菴主。歸後越前朝食氏之請，開創弘祥寺。南遊寺之東林永嶼。精與分座均法。後又表某府之命，住真如寺。他長於詩，著有南遊東歸集。

大朴玄素 即直覺庵慧士師。入元，住於山中。岑古林霞石月江等，歸在播磨開圓通寺，又住豐州之崇祥寺。

無礙妙謙 即佛直禪師。高峯顯日之弟子。入元，謁雪村友梅，天竺慧廣。并遍訪江浙之禪林，後歸天目山之中峯溫本。歸在伊豆開國清寺。

無雲義天 鏡堂圓禪之弟子，入元上天童山，爲本師求安牌牘語。歸住播磨之法雲，京都之安國建仁南禪等寺。

見山崇喜 即佛室禪師，無學祖元之弟子。歸住淨智南禪二寺，後在信濃開創興禪寺。

密翁聰秀高峯顯日之嗣。入元，遍訪禪林，歸住淨智建長等寺。

霞光周徹 入元，參建康鳳台之古林清茂。歸嗣夢窗疏石之法，在播磨開瑞光寺。

月心應圓 是日翁元相之嗣，入元，元人稱爲大乘菩薩。歸住美濃定林建仁等寺。有賀元享釋書入藏之偈。

與崖仁浩，入元參蘇州建康諸名僧，歸住鎌倉東勝寺，京都建仁寺。

月林道皎 即華光士懷國師，入元師事鳳台之古林清茂八年，嗣其法。元文白賜以佛東智鑑大師之號。歸在京都開長福寺，花園上皇皈依之。常招致宮中說法要。

鐵牛景印 入元，謁謁靈石芝，獨孤明。月江印，古林茂，體真，明極俊等。歸在伊豫開觀念寺，而爲該寺之第一祖。

中巖圓月 即佛嗣慧濟禪師，入元，謁古林茂竺田心靈石芝等。歸住萬壽建仁名寺，著有語錄及東海一漚集詩集。

純夫金快 入元參靈隱之月江印。歸在信濃開善庵寺。後住圓覺建長二寺。

無著良緣 入元謁古林茂一山。筑清拙淨等。歸住建長西經二寺。長於詩。有集名新羅箭。

天岸廣慧 入元巡天目天台天童及徑山。參見古林清茂。歸住淨妙寺。因足利尊氏之父家時之請。在相模建報國寺。有詩集名東歸集。

不聞契閑 遊天台山靈隱淨慈等寺。歸住祝嚴之麻瑞。駿河之清見。相模之金山等寺。後又主持圓覺寺。

古源邵元 入元謁華頂之無見觀。天目之斷崖義。龍山之下巖長。又久居嵩山少林寺。在大都時。元朝選僧百員於禁中讀大藏經。邵元亦入選。歸後訪寶疎石爲天龍寺之前堂。唯住京都之大聖寺持東福。播磨之法雲等寺。

友山士德 入元參西浙之名僧。久事松江之空林果。後於承天之南楚說會中。任後版之職。住田斐淨居寺。京都安國寺。在山崎開正續寺。後住東福臨川寺。

平田慈均 入元參鳳台之古林茂。天目之中峯明本。河山之月江印。又遊天台山。歸住播磨之應。京都之普門院南東福等寺。

一峯通玄 入元時。命見由巖圓月。歸住京都之普門寺。山雲之安國寺。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五年。元享釋書奉勅入藏時。禪林諸師賀以偈語者五十餘人。一峯通玄爲之首跋。

古鏡明千 清拙正澄之弟子。從雪峯之樵隱遠而嗣其法。歷住京都之真如。信濃之開善。京都之壽等寺。正平十一年。基緣印勅勅修百丈清規。

大象宗嘉 大德寺徹翁義享之法嗣。歸住大德寺。

虎溪道士 宗峯妙超之法嗣。在元時。開妙超之計。曾作偈欲終於元。徹翁義享使僧招之。歸住大德寺。

清深清微 在元遍訪江浙之叢林。達三十餘年。歸嗣夢憲疎石之法。歷任京都之臨川天龍南禪

等寺。又受光嚴院之皈法，曾講碧巖集。

空叟智玄 歸國後爲遠光平田寺之第二世。

無文元選 入元到温州，余見福州大覺寺之古梅友。天寧之楚石琦，本覺之了菴欲。天目之千巖長。建康龍翔集慶寺之笑隱訢。歸國後，得醍醐天皇之子，在遠江與山開方廣寺。元選爲開山第一祖。

性海靈見 在元謁下寮之空海念。維摩月江印即休了竺源遠而蒙其嘉獎，又上徑山納其師虎關師練之牌於正續菴而歸。受足利義滿之依，住三聖寺東福寺，又管理天龍寺二次，領南禪之席三次，晚年隱居於東福寺之退耕庵。

大拙祖能 入元參江心之無言宣，雙林之東陽輝，得嗣天目千巖長之法，又參月江印，了菴欲。行叟泰，無用耆等諸老。歸國後，風化九州地方，次移關東，在常陸笠間開楞嚴寺，來學者達三萬餘人。

金山明祖 住播磨之圓應，淡路之安國，駿河之清見等寺。又在但馬開宗鏡寺。後住東福寺。鐵舟德濟 在元時，元順宗慕其法高，賜以圓通大師之號。歸國後，嗣夢窗疎石之法，住萬壽寺。善草書，著有閑浮集二卷。

太虛元壽 約翁德儉之弟子，入元謁靈石芝，月江印，竺田心，以其師之語錄，請元名僧題跋，又請上天竺之悟菴講主，作佛燈圖師（其師之法名）之塔銘而歸。住攝津之福巖寺。

大岳妙楮 入元參楚石琦，住鎌倉淨妙圓覺二寺。

古劍妙使 入元參恕中愜，楚石琦，穆菴康。光明院在伏見大光寺時，召之詢法，賜官茶及御製之詩，住建仁建長二寺。

特峯妙奇 高峯顯日之法嗣，細川賴之迎至丹波，開慧日寺。

義南 入元參天目之中峯明本，元順宗賜以菩薩號。歸而在關西大偈禪風，以機鋒孤峭聞

碧巖 入元嗣千巖元長之法而歸。

良樹 雪村友梅之弟子。撰其師之語錄入元。請名僧題跋。

椿庭海壽 入元事天寧之穴海念，月江印等。明太祖命諸僧點大藏經時，曾與其事。歸國後，足利義滿請住京都之真如寺。

信中自敬 入元參天寧之了堂一，歸在尾瀨開正法寺。

寂中元志 在元嗣天寧楚石琦之法。歸後，菊池持朝建成通寺，請其爲開山。

入元之日僧，大概是禪宗僧侶，撰往日本的經論雖少，然多携回大藏經，置於佛寺。如鎌倉淨智寺之太平妙準（高峯顯日之法嗣）於後醍醐嘉應元年，遣其徒安公赴元，求福州版大藏經，置於寺中，即其例也。後東福寺之剛中玄柔使十禪客入明，求大藏經，經三年得二藏而還。一藏大慈寺，一藏東福寺。此殆杭州南山大慈寶寺。自至元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開刻元版之大藏經也。

入元僧又多有許多名僧語錄及詩文集而歸。例如杭州徑山虎堂智愚在世時之語錄與寂後所編纂之後集三卷，由入元僧次第撰往。但此時日本尚未刊行，得之不易。沙彌宗哲乃於花園天皇正和二年（元明宗皇慶二年西元一三一三年）捨財在西京之龍興寺開版。智愚之法孫南禪寺絕崖宗卓曾作跋。又南京鳳台士林清茂之語錄，在當時尚未編次，由入元僧携至日本，森禪人乃纂錄刊行。由滿茂法嗣南禪寺之休懷梵仙作序。乃足利時代，五山僧徒，最愛讀宋明教大師之鐔津文集，亦由入元僧携去，而春房妙葩仙之翻印，由是宋元禪籍詩文集，遂次第流行於日本矣。

入元僧又帶中國僧傳于日本而刊行之。如後村卜正平元年（元順宗至正六年西元一三四六年）源性明起捐資刻感山雲臥記談，是爲日本開刻僧傳之始。正平三年，前伊勢守玉峰大居士，又開刻景德傳燈錄，置於建仁寺。華嚴寺之則川三曾欲刊行佛祖統紀不果，其弟子山叟繼其志刊行之。入元日僧，往往帶其先師之語錄詩文而來。諸元代名僧作序作跋或作行狀（塔銘等而歸，計有二十三種。

佛光國師（無學祖元）行狀 淨慈寺之靈石芝撰。

佛光禪師塔銘 翰林學士偁撰，資政大夫全岳柱篆額。

一山國師語錄序跋，太覺寺之靈石芝撰，永福寺之古林茂，育王山之東山明，天目 之中峰本跋。

大圓禪師（西澗士曇）行實 天童禪之雲外軸撰。

佛燈國師（約翁德儉）語錄序跋，圓通寺之竺田心，道場之月江印序，淨慈之靈石芝跋。

佛燈國師約翁和尚無相塔銘 上天竺之匡道大師本無撰。奉議大夫趙雍書、中奉大夫王都中篆額。

本源禪師（鐵庵道生）語錄序，育王之月江印，雪峯之樵隱逸序。

佛日焰惠禪師明極峻大和尚塔銘 天臺國清寺之文懿大師夢堂墨撰。

東明和尚語錄跋 天童山之雲外軸跋。

大鑑禪師舍利塔銘 金山之契了撰文並書篆。

高山照禪師塔銘 天寧之楚石琦撰，資善大夫周伯琦書并篆額。

竺僊和尚語錄序跋 紹興崇報禪寺之番陽至仁序，靈巖之了菴欲及四明之楚石琦跋。

竺僊和尚行道記 靈巖之了菴欲撰。

竺僊和尚塔銘 翰林學士臨川危素撰，資善大夫周伯琦篆額。

來來禪子（竺僊梵仙）歌 鳳台之古林茂撰。

來來禪子集跋 長汀之祖銘，薦福之定山一，妙果之南楚悅，圓通之竺田心，江左之思菴敬跋。

月林和尚語錄跋 鳳台之古林茂撰。

孤峯和尚塔銘 淨慈之用章俊撰。

月堂宗規語錄題跋承天之新中銘，天寧之楚石琦，淨慈之用章俊，靈隱之用貞良題跋。

圓通大應國師塔銘 中天竺之延俊撰。

鈍鐵集（鐵庵道生之詩集）題跋 育王之月江印題，雪峯之樵隱逸跋。

禪居集（清拙正澄之詩集）題跋 淨慈之德海，仰山之希陵跋。

南游集（別源圓旨之詩集） 天童之雲外軸，本覺之靈石芝題跋。

觀此等序跋，行狀，塔銘之輸入日本，對於日本之佛教及日本之五山詩文學，大有影響。

入元日僧，歸國後，對於日本佛教之影響固大，至赴日之元僧，對於日本佛教之影響尤大。

赴日元僧一覽表

姓 名	來 日 年 代	時 日	示 寂 年 代
一山一寧	元成宗大德三年（伏見可安元年西元一二九九）		花園力保元年（元仁宗延祐四年西元一三一七）十月二十五日
西澗十曇	同上		後三條道治元年（元成宗大德十年西元一三〇六）十月二十八日
石梁仁恭	同上		後醍醐建武元年（元順宗元統二年西元一三二四）十二月十八日
東里弘會	元武宗至大元年（日本延慶元年西元一三〇八）		文保二年（延祐五年西元一三一八）八月二十八日
東明惠日	元武宗至大二年（日本花園延慶二年西元一三〇九）		後村上興國二年（元順宗至正元年西元一三三一）十月四日
靈山道隱	元仁宗延祐六年（後醍醐元應元年西元一三一九）		正中二年（元泰定元年西元一三二四）三月二日
清拙正澄	元泰定三年（日本嘉應元年西元一三二六）		延元四年（元至元二年西元一三三六）正月十七日
□ 永鎮	同上		

明極楚俊	元天曆二年日本元祿元年西元一三二九	建武二年（元至元一年西元一二二五）九月二十七日
竺僊梵仙	同上	正平三年（元至正八年西元一三四八）十月十六日
懶牛口融	同上	
東陵永璵	元順宗至正十一年日本正平六年西元一三五一	正平二年（元至正七年西元一二四七）五月六日

（一）一山一寧 本普陀寺僧，元成宗時，賜號妙慈弘濟大師，因蒙古屢征日本不服，念日人之倭佛，欲以佛教感化日本，乃遣一山一寧於大德三年（日本正安元年西元一二九九年）附乘慶元府日本商船赴日，到博多，赴京都，下關東。當時日本人甚為歡迎。濟北集上一山和尚書有說：『伏念堂上和尙（一山）往己亥歲，自大元國來我和域，象駕僑寓於京師，京之七庶介波瞻禮，藤杏像迹，惟恐其後。公卿大臣未必傾於禪學，遠聞師之西來，皆曰大元名衲過於都下，我輩曷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軒曰，嘶駟馳，盡山干城郊，見者如堵，京洛一時之壯觀也。其時懷一香隨衆拜伍而展拜，當時人正多兵，料想師之不必記焉。』此文是德治三年虎關師練所上的，這樣看來，足見日本對他非常傾慕。一山一寧到了日本後，北條貞時，聞其為有道之士，乃迎至鎌倉，使住建長寺，後遷於圓覺寺，再返居建長寺，又住淨智寺，後多宇上皇慕其風，特下詔關東招之。使住南禪寺，屢問法要。後以老病，常請退隱不許，乃游遍越州，上皇時下書，慰諭使歸，文保元年秋有疾，上皇時至其寺慰問，及其寂也。賜國師號，使首推大納言源有房作文祭之，又勅建塔於龜山廟旁，賜『法雨』之額，上皇親製像贊曰：『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一山一寧之在日本凡十七年，縉紳士庶之來拜訪者，其門如市。入元僧如龍山鶴見、雷村友梅、無著良緣、嵩山居中、東林友丘等，皆是他會下所出的人材，其對於京都佛教之裨益，極有

影响。因爲日本當時的禪宗，祇是以鎌倉爲中心的武家禪而已，而京都的天台教徒，反禪頗烈，故公卿大臣，對於禪宗頗懷反感，及一山一寧去鎌倉而往京都之南禪寺，於是禪宗乃由鎌倉而轉移於京師矣。所以他對於日本之禪宗，影响極大。他不但深於佛學，而且對於儒學書畫及神官小說亦無所不通。他著有語錄二卷傳於後世。

（二）清拙正澄 是杭州淨慈寺愚極智慧的法嗣，住於松江之真淨寺。他的佛法很高，與當時的名僧古林茂，東嶼海，竺田心，斷江恩，稱爲一時之秀。因之入元的日僧如天岸慧廣，無著良緣，平田慈均，寂實元光，古先印元，入元時，皆慕其風，參其法會。是以名聲遠播於日本，北條高時使人來招，乃同入元僧無隱元晦，明史齋折等赴日本，自抵多經白都下鎌倉，高時請住建長寺，又主持淨智圓覺二寺，又奉醍醐天皇之命，居建仁寺二次，南禪寺一次。信濃之小笠原貞宗又請創開善寺，爲開山第一祖。日本僧人極爲推崇。故本朝高僧傳正澄傳之著者師變說：『大凡東渡宗師十有餘人，皆是法中獅也，而大鑑師（正澄謚號）可稱獅中主矣』。

正澄對於日本佛教之規矩，亦大有影响。蓋中國叢林所行之規矩，乃唐憲宗時南昌百丈山懷海所定。名叫百丈清規。其後人加以臆解，南宋時，已無所適從。至唐宗咸淳中，一山，晦機，雲屋三僧，同加刊正，遂成一代之典章。至元文宗在金陵創大龍翔集慶寺，開山笑隱大猷，同欲行百丈清規，時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之住持東陽德輝所編之，德輝採集百丈古清規而不可得，乃參酌宋崇寧中真定之宗頤，咸淳中金華之惟勉，元至大中東林，式咸所集的崇寧清規，咸淳清規，至大清規，修改之，至至元二年（日本延元元年西元一三三六年）告成，名曰勅修百丈清規。正澄赴日，這書尚未修成。但他對於百丈清規很熟，并崇拜百丈懷海。他到了日本之後，每以日本叢林未設百丈忌爲憾。他對無隱元晦說：『我滅當在百丈忌辰，小師等宜同設齋』。後果於百丈忌辰，正月十七示寂，世稱百丈再來云。他欲日本叢林，舉行百丈清規，故居日本的建長寺時，即仿杭州靈隱之制，定東寮之規矩，故謂日本禪林之規矩，由正澄始行肅清，實非過言。至其從古鏡

明千始入元携回勅修百丈清規，後在京都真如寺刊行。

正澄對於日本武家之禮法，亦有影响。如小笠原貞宗是武家禪禮法之祖。他特爲正澄創開善寺，就之剃髮，號曰泰山。專心學禪，當其定武家諸禮法時，因喜禪林嚴肅之規矩，盡行採入，故日本武家禮法，是由禪宗規矩而來，即由正澄的百丈清規而來。

(三)明極楚俊及竺僊梵仙，這二僧赴日本之原因、竺僊和尚住建長寺語錄說：「一日在徑山，忽日本文侍者至，言歸船在福州，以明極和尚有宿昔之約，欲取之。時明極欲挽山僧（梵仙）偕行不可，乃謂文曰：若能化仙公共往，行矣，否則不然。且又自謂山僧曰，汝於此，但此國人識汝耳，有何利益，亦可去彼，行汝古林和同一枝佛法於外國也好，此乃佛天在上，余不誑言。又曰：我之老大昏耄，尚且欲去，況汝後生，精明百倍，而又事事敏妙。且聞彼之船不一二年間必必來此，就回亦可，亦望託汝寄附鄉書也。時日本亦有數人在彼，余乃問文等曰：可得回否？文曰：此船一去，明年即便又來，但隨意耳。昔元菴亦回，西澗回復往，但自貪我國之好者，自不回耳云云。佛乘禪師（天岸慧廣）曰：我觀此土，皆無叢林，看不上眼，今唯我鄉間尚有，不與百丈在世時也。如或不信，則同往一觀而回。又曰西堂和尚（明極楚俊）之言是也。當去行佛法，而今佛法流東，凡我鄉間無不敬信者，順緣而行，今正是時，大丈夫何自凝滯而不決邪？先是昔在保寧（金陵之鳳台）爲侍者時，寮宿兩浙鄉曲外，有日本三十二人，鳳台老人（古林茂）每見則戲之曰：此日本國師也！又曰：汝若誠能一往，則大化於彼。余曰：去則不辭，慮不得返。曰出家兒遇緣即宗，何且慮此？於是感其先言固戲之耳，而又誠也。但一行之遂至於此，迄今不覺十九年矣，禪師（天岸慧廣）之化去又十三載。觀此則明極及楚俊，是由日本文侍者邀請而去的，而梵仙又是由楚俊勸導而去的。楚俊本是金陵之奉聖，慶元之瑞巖普慈，婺州之雙林等寺之名僧。在日本住建長建仁南禪各寺。他在南禪寺時，奉勅以此寺爲全國第一山，位在五山之上，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卿中就明極受法的，有四條隆資，萬里小路藤房，坊門清忠等。明極

在攝津所創之廣嚴寺內，建即心院，往還必宿此以參禪。楠正成到該寺參見，曰：『生死交謝時如何？』明極曰：『兩頭俱截斷，一劍倚天寒』，正成曰：『落處作麼生？』明極震威一喝，正成上起三拜，通身流汗，明極曰：『爾徹矣』。可知當時武士，就明極楚俊學禪是不少的。

梵仙是古林茂的弟子。在日本住淨妙淨智高禪真如建長等寺，大倡禪風。他又受足利尊氏，直義之皈依，亦得武士之信仰。

赴日本之元僧，最有影响於日本之教佛的，只一山一寧，清拙正澄，明超楚俊和竺僊梵仙四人而已。

入元的日僧與赴日的元僧，對於日本佛教之影响，已說明其梗概了。茲列入明日僧一覽表如下。

姓名	入明年代	歸國年代	在明年數
絕海中津	後光嚴應安元年即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	後圓融永和四年即洪武十一年西元一三七八年	十
汝霖良佐	同上	同上	十
興東		應安三年即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七年	
中端			應安三年在明
祖來	應安四年即洪武四年西元一三七一年		
權中巽		應安六年即洪武六年西元一三七三年	
宣閑溪	應安七年即洪武七年西元一三七四年		

仲芳中正	等 聞	靈 昆	鄂隱慧齋	志 滿	如 瑤	(入明二次)	廷用文珪	(入明二次)	中山法額	大年祥登	伯英德俊	無聞聰
應永八年明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	應永十年明永樂元年西元一四〇三	明德時	至德三年洪武十九年西元一三八六		一次永德元年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 二次至德元年洪武十七年西元一三八四	一次永德元年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二 二次永德二年洪武十五年西元一三八三	一次永和二年洪武九年西元一三七六	應安時	同上	應安中入明		
	應永十一年明永樂二年西元一四〇四								同上	約在永和二年	約在應安七年洪武十年西元一三七四	
	一			永德三年在明								

貞 堯	如三芳貞	東洋允澎	永 頤	恕中中誓	瑞(書記)	龍室道洲	中 立	明室梵亮	明 空	祥菴梵雲	堅中圭密
同上	同上	享德二年明景泰四年西元 一四五三	同上	永享六年明宣德九年西元 一四三四	同上	永享五年明宣德八年西元 一四三三	應永十三年明永樂四年西 元一四〇六	應永十一年明建文四年西 元一四〇二	同上	應永十年	一次應永十年 二次應永 十三年永樂四年西元一四 〇六 三次應永十五年永 樂六年西元一四〇八
同上	異年歸		同上	永享八年明正德元年西元 一四三六	同上	異年歸	異年歸	異年歸	同上	應永十一年	一次應永十一年 二次應永十四年 三次應永十六年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共三年

紹	本	肅仁二年成化四年西元一四六八	文明元年成化五年西元一四六九	一	
春	洋	同上	同上	一	
壽	敬	同上	同上	一	
通	懌	同上	同上	一	
提點永扶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	
全	案	同上	同上	一	
性	春	同上	同上	一	
桂恭玄樹	肅仁二年成化四年西元一四六八	文明五年成化九年西元一四七三	五		
雪舟等揚	同上	文明元年成化五年西元一四六九	一		
純(識主)	同上	同上	一		
松、侍者	同上	同上	一		
良	心	同上	同上	一	
良	意	同上	同上	一	

首 龍	同上	同上	同上
金 溪 梵 輝	同上	同上	二
金 融	同上	同上	二
免 夫 壽 冥	明應二年明弘治六年西元一四九三 明應五年弘治九年西元一四九六	三	
古 川 勳	同上	三	
文 成 發	同上	三	
育 英	同上	三	
了 菴 桂 悟 (佛日禪師)	永正八年明武宗正德六年西元一五二一 永正十年正德八年西元一五一三	三	
光 亮	同上	三	
光 悅	同上	三	
玄 衛	同上	三	
省 佐	同上	三	
永 賢	同上	三	

宗棟	同上	同上	同上
勝康	同上	同上	同上
安範	同上	同上	同上
友竹貞	同上	同上	同上
桂軸久	永正七年正德五年西元一五一〇		
宗設謙道 (入明二次)	一、永正八年 二、大永三年明嘉靖二年 西元一五二三	一、永正年正德八年西元一五一三 二、同年歸	共二年
月渚永象	大永三年	同年歸	一
鸛岡瑞佐	同上		一
湖心碩鼎	天文八年嘉靖十八年西元一五三九	天文十年嘉靖二十年西元一五四一	二
東秀周良	一、同上 二、天文十六嘉靖二十年西元一五四六	二、同上 二、天文十八年嘉靖二十年西元一五四八	二
釣雲	同上	同上	二

德	陽	弘治三年嘉靖三十七年西元 一五五八
清	授	同上

其不列入表內有至弘道，元音周郁，山卜人，龍岩，恕侍者，恰雲，亮哲，朝之惠風，大志道，仲明察，得志，久巷道可，白雲聰，笠端片然，靈南，陽谷等。

絕海中津 即佛智慶照淨印翼聖國師，夢窗疎石的弟子。入明參由天竺之季潭泐，道場之清遠，靈隱之良用貞，天堂之了道一。歸住甲斐之惠寺，在阿波國寶冠寺，後義滿請住京都之等持相國等寺。

汝霖良位 與純海中津同時入明。在蘇州之承天寺堂書翰，在鍾山與五山期老點校大藏經，長於詩文，給林學士宋景濂賞識其文稿，為之作跋。歸住撫磨之法雲寺，義滿於城西關寶幢寺時，以春月妙蓮為開山，以良位為主持。

大年祥發 與法兄伯英德俊同入明，歷訪各名利，歸住建仁南禪寺。

郭隱慧藏 即佛慧正續國師，絕海中津之弟子，善楷書，工文藻，歸住土佐之吸江菴，細賴川之招住阿波之寶冠寺，後住相國天龍寺。

龍室道淵 為達明正使入明，宣宗授以僧錄司右卿儀之職，原係明寧波府人，四十歲來日本，嗣傳多聖福寺宏旨記之法，歷住長門之安國寺聖福寺天龍寺。

恕中中誓 為達明正明正使入明，天龍寺物先周格之法嗣，歷住相國天龍寺。

九淵龍暉 為達明土官入明，歸國，以勸忍百箴考鏡二冊，贈瑞溪周鳳，歷住建仁南禪二寺。

桂菴玄樹 長門永福寺僧，為達明土官入明，遊於蘇杭之間，亦學朱子之學，歸在薩摩開桂樹院，談朱學，後住建仁寺。

中山法顯 歸住壽福建長寺，後管理天龍及南禪寺。

雪舟等楊 爲遣明使入明，就長右驛 車在學設色之旨，破墨之法，明帝見其畫珍之，命爲天童山第一座，歸住周防靈谷寺，後住石見太喜菴。

金溪梵釋 爲遣明居座入明，住相國高禪寺，又任僧錄司。

了菴桂悟 東福寺僧，三十八歲爲遣明正使入明，謁宗慈其德，使住育王山廣利寺，賜金襴袈裟，歸時，王陽明作詩送之，歸住南禪寺。

月渚永乘 爲遣明副使入明，就桂菴玄樹學宋學，以門下之秀見稱，住日向之安國寺。

策彥周良 天龍寺僧，入明二次。第一次爲遣明副使，第二次爲遣明正使，歸時，從奈良天皇大加優賞，賜遠行慰勞之宴，信長聞其後望，常招致城中，詢異地之風光。

入明之日僧，實無傑出之人物，其歸國時，對於佛教之影响亦不甚大。然入明僧，每就明之大儒，作頂相贊，塔銘，行實，語錄之序跋而歸，以此爲無限光榮。其攜歸之物類如左。

一，日本建仁禪寺月篋見禪師塔銘 此銘是洪武八年九月杭州靈隱寺德禪寺之豫章來復撰，但携返之僧未明。

二，日本天龍禪寺開山夢窗正覺心宗普濟國師碑銘 應安元年，絕海中津入明，義堂周住草其書夢窗疎石之行狀付之，托呈明宋景濂作碑銘。中津入明後，托與逸古，勸請宋景濂作之，因因事來得携返，至應永十二年，始由遣明使明室梵亮帶返。

三，義堂和尚空華集序 此序是杭州中竺之季潭宗泐撰。携返之僧未明。或云是絕海中津。

四，汝霖文稿跋 宋景濂撰

五，肥後正親寺大方元恢和尚頂相贊，大方元恢寫，其弟子曇曉持其師之頂相入明，請天寧楚石琦作頂相贊。

六，傳法輪藏禪寺記 廷用文珪中興京北寧福寺，建經藏，後光嚴院曾賜傳法輪藏禪寺勅額，天

授二年爲征西府使者入明，請宋景濂撰寺記，歸而刻之堅珉。

七，天龍寺獨芳清墨經聖頂相贊，獨芳清墨寂後，其弟子帶昆持聖頂相，請天界也率潭宗泐作贊

八，絕海和尙語錄序 淨笑道聯撰。

九，絕海和尙燕堅稿序 僧錄司左尊世道行撰。

十，絕海和尙薛堅稿跋 杭州天竺如蘭撰。

十一，鞠之和尙竹居清寧跋 張式之撰，由蘭院摩撰述。

十二，瑞溪和尚塔銘語錄外集序跋（作者不明）

十三，了菴桂悟語錄序 黃隆撰

入明之日僧，對於日本文學及儒學，均有極大影響，其影響於佛教的，祇上所述的塔錄之類而已。

除入明的日僧，輸入中國的佛教外，而赴日的明僧，對於日本的佛教，亦有影響。此日本的明僧，人數不多，其可考者如下。

江 喜 他是明代杭州天目山中峯明本的孫 俗姓李氏，後歸日本，住鎌倉長壽寺，該寺藏有喜江禪師頂相。

仲猷祖國 明洪武六年（日本文中二年四元一三七三）使日本，在京都住了兩個月，和五山僧侶交遊，見了長安周信的诗文，滿口稱贊，書見空華集。

無逸克勤 他與仲猷祖國同路赴日本，在京都住了兩個月，亦交遊五山僧徒。

道彝天倫 位於建文四年（日本應永九年西元一四〇二）同教僧一菴一如赴日本，在京都住了六個月，和五山僧徒往來，遊歷高麗神護寺，吟詩作歌，並見臥雲日仲錄。

赴日本的明僧，雖是寥寥無幾，然對於日本的佛教，定有多少的影響。到了德川時代，即明末清初的時代，中國赴日本的僧人頗多，赴日之明清僧一覽表

姓 名	來 日 時 代	歸 國 時 代	居 年 數
真 國	明光宗泰昌元年日本元和六年西元一六二〇	日本安永元年（明永歷二十年）西元一六四八	二十八
覺 海	明崇禎元年（日本寬永五年）西元一六二八	日本安永十四年（明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三	八
超 然	明崇禎二年（日本寬永六年）西元一六二九	日本正保元年（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	十五
如 定	崇禎五年（寬永九年）西元一六三二	日本明歷三年（明永歷十年）西元一六五七	二十五
普 定	崇禎十二年（寬永十六年）西元一六三九	日本明歷元年（明永歷九年）西元一六五五	十六
逸 然 性 融	崇禎十八年（正保二年）西元一六四五	寬文八年（清康熙七年）西元一六六八	二十三
百 拙	明唐王隆武元年（正保三年）西元一六四六	慶安二年（明永歷三年）西元一六四九	五
淨 蓮 覺 聞	同上	明歷元年（明永歷九年）西元一六五五	九
蘊 謙 成 璣	明永歷四年（慶安三年）西元一六五〇	日本延寶元年（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	二十三
道 者 超 元	明永歷五年（慶安四年）西元一六五一	日本寶治元年（明永歷十二年）西元一六五八	七
澄 一	明永歷七年（日本承應二年）西元一六五三	日本元祿四年（清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九一	三十八
獨立性易	同上	寬文十二年（康熙十一年）西元一六七二	十九

悅山道宗	千呆性安	即非如一	慈岳琛	木菴性瑄	喝禪	惟一	南源性派	獨吼性獅	獨湛性瑩	慧林性機	大眉性善	隱然隆琦
永歷十二年（明歷四年）西元一六五八	同上	明永歷十一年（明歷三年）西元一六五七	同上	明永歷九年（明歷元年）西元一六五五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明永歷八年（承應三年）西元一六五四
寶永六年（康熙四十八年）西元一七〇九	寶永二年（康熙四十四年）西元一七〇五	寶永十一年（康熙十年）西元一六七一	元祿二年（康熙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八九	貞享元年（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四	同上	日本天和三年（康熙二十三年）西元一六八四	元祿五年（康熙三十二年）西元一六八四	日本元祿元年（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七九	日本寶永三年（康熙四十五年）西元一七〇六	日本天和元年（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八一	同上	延寶元年（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
五十一	四十八	十四	三十四	二十九	同上	二十四	二十九	三十四	五十二	二十七	十九	十九

高泉性	康熙八年（寬文九年西元一六六九）	元祿八年（康熙三十四年西元一六九五）寂	三十四
曉堂	永曆十五年（寬文元年西元一六六一）		
軸賢	同上	寬文八年（康熙七年西元一六六八）寂	七
東瀾澤	康熙十二年（延寶元年西元一六七三）		
西意	同上	延寶三年（康熙十四年西元一六七五）寂	二
五岡	康熙十四年（延寶三年西元一六七五）		
雪堂	同上	延寶四年（康熙十五年西元一六七六）寂	二
心趣異傳	康熙十六年（延寶五年西元一六七七）	元祿九年（康熙三十五年西元一六九六）寂	十九
慧雲	同上		
東岸	同上	元祿元年（康熙二十七年西元一六八八）寂	十一
悅峯遺章	康熙二十五年（貞享三年西元一六八六）	享保九年（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寂	三十八
靈源海脈	康熙三十二年（元祿六年西元一六九三）	享保二年（康熙五十六年西元一七一七）寂	二十四
澹林	同上		

大成照溪	竺菴淨印	伯珣照浩	大鵬正鵠	果堂元利	道本寂傳	旭如蓮坊	一貫全風	智勝	別光慈微	喝浪	聖重方炳	大衛
	清雍正元年（日本享保八年西元一七二三）	同上	康熙六十年（享保六年西元一七二一）	康熙五十八年（享保四年西元一七一九）	康熙五十八年（享保四年西元一七一九）	康熙五十八年（享保四年西元一七一九）	康熙四十九年（寶永七年西元一七一〇）	同上	康熙四十八年（寶永六年西元一七〇九）	康熙三十三年（元祿七年西元一六九四）	同上	同上
天明四年（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八四）寂	寶曆六年（乾隆二十一年西元一七五六）寂	安永五年（乾隆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七六）寂	安永三年（乾隆三十九年西元一七七四）寂	享保十八年（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寂	享保九年（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寂	享保四年（康熙五十八年西元一七一九）寂					寶永六年（康熙四十八年西元一七〇九）歸	寶永六年（康熙四十八年西元一七〇九）歸
	二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二	十二		八					三十二	十六

德川時代初年至享保年間，中國之僧赴日的，比足利時代爲多，是因爲那時長崎有三唐寺，皆由中國僧主持。所謂三唐寺。即興福寺，俗名高京寺，福濟寺，俗名漳州寺，崇福寺，俗名福州寺，因此那時赴日的僧人，遂有表中所列之多。

真國 江西饒州人。因日本元和九年，他行長崎之志，京船主等建議在長崎建寺，以便市船往來時。藉此寺祈求海上之平安，遂創建東明山的興福寺以置國爲開山。真國住長崎二十八年而寂。覺海 他於日本寬永五年，同僧了然覺老等赴日本。漳州船船主等願興福寺之例，在長崎分築山建福祿寺，即俗名漳州寺，以覺海爲開山。覺海在日本住了九年，寂於日。

超然 寬永六載赴日。當時福州船船主等在聖壽山建崇福寺，俗名福州寺。以超然爲開山。他在日本十五年而寂。

逸然性融 杭州人。正保元年赴日。住興福寺，並畫。爲日本漢畫之祖。承應元年，以幕府許可，遺古石，自起二僧。招漳州普賢山僧人逸元隆琦赴日。逸然性融在日本二十三年而寂。

道孝超元 福州興化人，應安四年赴日。住崇福寺，後又住平戶之普門寺，余澤之天德寺，到中鼓吹禪風，頗引起社會之注意。他在日本住了七年，萬治元年歸國。

獨文性易 杭州人，原名戴竺，字曼公，慨明室之亡而赴日，赴日時年五十八。到日後，爲隱元的弟子。隨隱元到攝津津門寺。寬文五年，即北如一在豐前關福聚寺時，曾扶助其法化。他精書術，備詩文篆刻，其俗弟子高玄代傳其書法。他在日本十九年而寂。

隱元隆濟 即太光，華嚴佛慈慶齋國師，太福州普賢山之僧。逸然性融之赴日，在興福崇福兩寺講法。明歷元年，移居攝津津門寺。萬治元年末下江戸，謁將軍。翌年賜寺地於宇治，創興福山萬福寺以開禪宗。他在日十九年而寂。

大眉性善 承應三年赴日。興福寺開創時，他主理工程，後於山內開東林菴。延寶元年，因幕府所募之七藏經無收藏處，遂以東林菴爲藏經地。他在日本十九年而寂。

慧林性機 又名獨知，福州人。隨隱元赴日。曾住長崎之崇福寺，攝津之佛口寺。住龍山萬福寺之第三世，在日二十七年而寂。

獨湛性瑩 福州莆田人，隨隱元赴日，開遠江寧林寺，上野之國瑞寺，後住萬福寺之第四世，在日五十二年而寂。

獨吼性獅 漢州人，隱元弟子，隨隱元赴日，在龍山內建漢松院居之，在日三十四年而寂。

南河性派 福州福清人，隨此師隱元赴日，在龍山內開華藏院居之，後住攝津國分寺，又復興祖內之正圓寺，在日二十九年而寂。

木菴性瑠 泉州人，隱元之弟子，在日住福海寺，後住龍山第二世。再開創江戶白金之瑞聖寺等至十處之多，為蘭學宗之最有力者。

即非如一 又名雪峯，福州人，嗣隱元之法，在日住崇福寺，與當時在福海寺之木菴性瑠同稱為二林而門，後至黃山萬福寺，扶助隱元之法化。小倉之小笠原氏請他開慶雲山福聚寺，他長于書法。在日十四年而寂。

千足性安 又名晏端，福州人，隨即非如一赴日，住崇福寺，為龍山第六世，在日四十八年而寂。

悅山道宗 泉州人，住長崎之崇福寺及大阪之八利寺，為龍山第七世。

高泉性激 姓名為雲外晏華道人，又名大圓庵慧佛知常國師。即福州黃山之慧門，隨隱元赴日，在宇治開佛國寺，靈元上皇賜以教額，又為龍山第五世，受上皇之皈依，時在宮中說法，著書頗多，以扶桑禪林僧寶傳為最佳。

心越真侍 又名夷皋，今華人，應澄一之招而赴日，後在永戶開祇園寺。

悅峯道章 在日住興寺，為黃山第八世。

靈源海脈 在日住住崇福寺，為龍山第十一世。

聖垂方炳 又岩獨文。泉州開元寺僧，爲黃檗山第十一世。

旭如蓮昉 爲黃檗山第十世。

靈覺元昶 杭州潮鳴寺僧，在日住興福寺。爲黃檗山第十二世。

大鵬正鯤 即清微見儼，泉州開元寺僧。在日住福濟寺，爲黃檗山第十五世第十八世。

伯珣照浩 在日住崇福寺，爲黃檗山第二十世。

竺庵淨印 在日住興福寺，爲黃檗山第十三世。

大威照漢 爲黃檗山第二十一世。

純日本之明清僧人，雖於佛教無特殊貢獻，然道者超元鼓吹禪風，隨元隆琦在日開創黃檗宗派，使這宗勢力一時澎湃于日本，其功可謂大矣哉。

總計佛教之輸入日本之後，已有一千四百餘年的歷史了。今佛寺之在西京者五百三十九區，統海內寺宇，禪宗一萬九千三百八。密宗一萬一千一百一。通教六萬七千一百。源空教十四萬二千。融通派一千五百一。向派本願門徒四萬五千。東本願門徒八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專修門徒七千五百二十。日蓮教八萬三千二十，合共四十六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寺（此寺數是據，萬延元年德川齊昭所卜防海疏而來的。維新以後，頗有減損）。然考北魏時，中國祇有一萬三千寺，唐武宗即位，庶澤屠法，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宋景德中，天下寺宇四萬五千。元祐時，三萬九千寺，見孔平仲知死。元至元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日本文獻通考，尚不及日本十分之一。故今日之佛教，實以日本爲最發達。中國印庠戶墮平虛後，士語說：禮失而求諸野，不其然耶？

第八章

醫學之輸入

據會紀所載。允恭帝害了難治之病，日本醫師。束手無策。於是召新羅醫師金武來日。痊愈之。
○新羅醫術。是得自中國，這是中國醫學傳入日本之始。推夏時，又有百濟使醫來日，其子孫世居難波。因號難波藥師。欽明十五年（梁元帝承聖三年西元五五六），百濟使醫檀十本卒。百濟設官院，採藥師法後濟學。因德丁有院。撰醫書藥品來日。（考三韓紀畧，魏景元年，百濟設官書六品，第六品曰奉卒，八品曰流後，九品曰固德）。又有吳王昭淵孫名差卿。撰儒經醫書來日。帝禮為和藥博士。考日本雖有其原始的醫術。但那時醫術與神道混而為一，天神可作醫師，神意即是藥方。因無所謂醫理，自得了中國醫學之後。遂漸脫離迷信而有醫理了。推古時，百濟又使僧觀勒訪新羅方術之書，於是推古在難波四天王寺設立醫院及療病院。至孝謙天平勝寶六年（玄宗天寶十三年西元七五四）唐僧鑑真同建法不至日。鑑真精於醫學。當時日人分不出藥品之真偽，鑑真辨之以鼻，無一謬誤。後光明皇太后不豫。鑑真投以藥石，即有奇驗。（事見日本續紀）
○至天平寶字二年（唐肅宗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淳仁帝詔伴醫士講大素甲乙脉經本草。針灸講素問針經明堂脈訣，延真式說。講醫經大素經，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二百十日。明堂二百日，八十一難經六十日。凡大素經准大經，新修本草准中經，小品經堂八十一難經准小經。○照日本人研究中國醫學，仍未足見發達。乃于唐使中，設有醫師及藥師等職。○醫師一方面是醫治疾行人之病，一方面又為入唐，曾問疑義，例如藤原姓成爲唐醫師，乘以醫藥益之務，于仁明承和元年（唐文宗大和八年西元八三四）而入唐。故唐原提成事傳說「提成古京人也。素練醫術，最解皮膚，成和元年從唐使渡海，朝廷以担成明法醫經，令其請益疑問」，便是其証。
日本此時。雖學得中國的醫學，然不惜精益求精，入唐精益求精，則其醫學之進步可知。而清和貞觀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西元八六二）日僧宗叡入唐，於貞觀七年（唐咸通六年西元八六五）携有秘錄藥方一部十卷歸國。於是日本之醫理更爲精，藥物更爲辨識，應用甚爲合理。試看延喜式三十七典藥寮條所載遣唐使備之藥品如左。

「唐使十一種，犀角九，大戟九各四劑，七氣丸，八味理冲丸，百毒散，度嵒散，各十二劑，伏苓散十六劑，神明膏六劑，萬病膏，升麻膏各八劑，齒良膏四劑。所須藥種各本方。」

「草藥五十九種：芍藥，白朮，地榆，桔梗各八斤。獨活，前胡，升麻，夜干，桔梗，牛膝，茯苓，柴胡，烏頭，附子，天雄，商陸，蜀椒，黃芩，松脂，石南草，各六斤。大戟防己，黃蘗，紫苑，苦參，菖蒲各四斤。石葶澤瀉，玄參，橐本，熟艾漏蘆，蘭茹，甘遂，蛇銜梨蘆，干地黄，枳實，桑根白皮，丹參各二斤。杏仁五味子，兔絲子，葶藶子，蛇床子，半夏，蒲黃，麥門冬，儀柰，各四斤。練胡麻一斗六升，桃人一石二斗。黃芩，麻黃各八斤。黃連，茵芋，吳茱萸，防風橘皮各六斤。白薇四斤。威靈仙韓櫃四合（著錄）裡櫃席八枚，黑葛四斤，麻繩四斤。粉四支。」

這麼一來，足見當時中藥之齊備了。所以中國醫學輸入日本，實以唐代爲盛。日本學校遂設有醫科的專門研究。在各州的國學裡，也有醫師講授醫學，且又設有典藥寮，爲研究藥物之所。典藥寮設有典藥頭，有助，有允，有醫博士，女醫博士，針博士，侍醫，權侍醫，醫師，醫師得業生。施藥院使，及主典史生等職。至村上大歷元年（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又詔課試醫道學生，蓋醫有專官，官有世業，故所業較精，著述亦多。當時大村直福著治濟記一卷，物部廣貞著攝生要訣二十卷，菅原岑嗣等奉敕撰金鑑方五十卷，藥經，和氣廣世撰。醫心方三十卷，丹波康賴撰。一日雅忠集註太素經三十卷，小野藏根撰。大同聚類方百卷，安部貞定出雲廣貞等奉敕撰。難經開委一卷，出雲廣貞撰。養生鈔七卷，掌中方一卷，倭名本草，皆大醫博士源輔仁撰。萬安方五十七卷，賴醫方十卷，梶原性全撰。靈鑑集，細川勝元撰。以上書目，見于日本本朝醫考，皆是當我北宋以前之書籍。又據百鍊抄所載，後冷天皇治歷二年（宋徽宗治平三年西元一〇六六）有宋商王滿携有靈藥來日本。到了六條天皇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西元一一六八）四月癸酉入京得宋醫口傳，歸國著喫茶養生記，以言茶之效力，亦可以看做傳授養

生術之醫師。遺書說：『今得唐醫口傳，治諸病無不得效驗矣。』又說：此等錄記，皆有稟承於大國乎，若不審之輩。到大國詢問無隱與如此，可知榮西在宋時，曾學過醫方的。至後掘河貞應二年（宋寧宗嘉定十六年西元一二二八）據訂補建摺記謂僧木下道正（即藤原隆英）入宋，學得解毒丸之製法而歸。又在北條時宗時，有宋醫郎元房做北條時宗的侍醫，在鎌倉住了三十餘年，對於日本醫學亦有相當的貢獻。四條天皇嘉貞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西元一二三五）圓你辨圓（聖一國師）入宋携返魏氏家藏方十一冊（一書慶三年之繫本）這是宋代藥方之傳入日本者。

當我元明時代，又有許多日本僧侶傳入中國的醫學。

○竹田昌慶 明太祖洪武二年（長慶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入明，就道士金翁學醫，金翁以女妻之，授以醫方秘訣。洪武十一年（長慶天皇天授四年西元一三七八）歸國。其孫竹田定加傳其術。

○四代三喜 明憲宗成化三年（後土御門長享二年西元一四八八）入明。就李東垣朱丹溪二人學醫。在明十二年，歸倡醫學，為日本李朱派醫學之首倡者，他的弟子曲直瀨一溪傳其術。一溪名正慶，平安人學既成，人爭乞治。正親帝町召入診病，大為信任，特賜予翠竹院之號。又將一溪所著之啓迪集一書，勅贈博彥作序，以行于世。將軍侯伯，莫不崇敬。年老，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皆尊重之。四方問業甚多，幕府醫官，皆為執贊。其子瀨正紹傳其學。著有醫學正天記一書行于世。其孫親純，堀江琳，泰中巴，亦有名。于是朱李的醫學，風行于日本，駁駁乎取宋醫席而奪之矣。

○阪澤運 明孝宗時（後土御門天皇時西元一四八九至一五〇五）入明，傳張仲景的醫術而歸。因診治後柏原帝而著名。

○島虎首座 本由福寺僧，受島山義宣之命，入明求藥方。世宗嘉靖八年（後奈良享祿二年西元一五二九）同明人鄭舜功至日本，舜功乃教以明代妙方。日人乃叫畫工土佐光信畫藥品種類之形

狀譯其名爲日本，語叫九條通植寫之，明之藥方遂傳入日本。

⑤金持垂弘 精於針術。明世宗時入明，以求進步，故其術更精。

⑥吉田宗桂 又名意安。於世宗嘉靖十八年（後奈良天文八年西元一五三九）及嘉靖二六年（天文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入明二次。在明時，曾診愈明世宗之病，世宗御賜醫書多種而歸。

以上是日本人來中國學醫的。元明時，亦有中國人在日本業醫，如明室初興，元人陳順祖不願仕于明，乃往日本九州行醫。將軍足利義滿慕其名，召之診症，順祖却之。其子陳大年傳其術，懸壺於京都，日本人稱他爲陳外郎。大年之孫祖田，繼其業，亦有陳外郎之稱。

醫學傳入日本既如此之多，遂促進日本醫學之進步。故大名細川勝元，編一大醫書名叶隱蘭集。此書分門別類，是根據中國醫書而成，并雜以倭文，以便日本人閱覽。又中國的醫書大全十卷，亦于此時由阿佐井野宗瑞傳入爲之翻印，是爲日本醫書開板之始。

明代中國藥品又大量輸入日本。據蔭涼軒日錄載花園天皇長祿二年（明英宗天順二年西元一四五八）有『西蕃藥膏一器』之語。翰林五鳳集的序文中載有清隱友派之言說：『人參，甘草，麝香，龍腦之類，吾土不產，必待南船而用之。苟無南船，則急病之傍，不可不袖手。豈不慨哉！吾今附貢船入大國而求藥材矣。』又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說：『由明輸入之藥材，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十七兩，此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足見中藥輸入日本之多了。

清初之時，赴日本僧人促進日本醫學之發達者有獨立。獨立最精醫術，於明永明王大歷七年（後光明天皇承應二年西元一六五三）赴日本，傳其術于池田正直，高天將，北山道長等。尤以正直爲第一高足，所傳有生理病理之圖七種，及六部九卷之書，其中以痘科之痘科鍵爲最著名。池田正直以此顯名於當世。光格天皇寬政年間（清高宗時乾隆五四至仁宗嘉慶五年西元一七八九至一八〇九）幕府醫官始置痘科，使正直之孫瑞仙任之。高天將學醫於獨立，於靈元天皇延寶中

入京，因答太上皇養生保命之勅問，上養生編一篇，名聲籍甚。北山道長他字壽安號友松，即寬永四年任爲唐通事之明人馬榮宇之子。後因避亂，家于長崎，至道長改姓北山。他學醫於黃檗僧化外獨立，後赴大阪行醫聲譽甚顯。著有北山醫話方考評議名醫方考絕癰刪補衆方規矩醫方大成論抄，首書纂方考首書醫方口譯集等書。心越於康熙十六年（肅元天皇延寶五年西元一六七七）來日本，傳其術於石原學魯。澄一於明永明王大歷七年（後光明天皇承應二年西元一六五三）來日本，傳其術於石原學魯，國立貞，今并弘濟等。

以上是就僧人而言。至於清初對日本醫學有影響者以下寧宇爲甚。下寧宇於明永明王大歷年間至日本，在江戶白金町業醫，日人就學者頗多，因其門人有在幕府任醫官的，故其一派最盛。至康熙四二年（東山天皇元祿一六年西元一七〇三）又有杭州醫師陸文齊留日本傳醫學。迨吉宗爲將軍，注重醫學，給清商人以臨時信牌，使招致中國良醫，一時馬醫及華騎射者，多隨之至日本，茲錄其著名的人物如下。

陳德明 浙江金華人，精於小兒科，於日本後光明天皇慶安中來長崎，投藥奏效如神，長崎人留之，不使歸，乃改名額入德，在長崎業醫，著有心醫錄。

吳歲南 本蘇州醫師，康熙五八年（中御門享保四西元一七一九）至日，住福濟寺，是年六月病歿。

陳振先 蘇州醫師，康熙六〇年（享保六年西元一七二一）至日本。

朱來章 福建汀州府醫師，康熙六〇年至日本，住於長崎通町彭城宣義家，巡視長崎的病者而診之。曾歸國一次，再同朱子章朱佩章來日本，於雍正四年（享保十一年西元一七二六年）歸國。

朱子章 福建汀州府醫師，雍正三年來日本，住彭城宣義家，翌年病歿。

朱佩章 同朱來章來日本，曾歸國一次，又於雍正四年與陳采石沈大成劉經光來日本。

周岐來 蘇州醫師，雍正三年來日本，住於柳屋治左衛門之家，雍正五年歸國。

趙松陽 蘇州醫師，雍正四年赴日本，住於河間八平治之家，雍正九年歸國。

陳采若 杭州騎士，雍正五年赴日本傳醫，雍正九年歸國。

范大成 寧波騎士，與陳采若同時赴日本傳醫，雍正九年歸國。

劉經光 蘇州馬醫，與陳采若同時赴日本，同時歸國。

沈燮庵 杭州儒士，雍正五年赴日本傳醫，雍正九年歸國。

上述十餘人中，以陳振先及朱子章為最著名。陳振先來昇崎時，途中採集藥草一百六十二種，并作成一本功效書，說明其功用。向井元成又以倭文解釋，朱子章是赴日本中極優秀的醫師，他到日本的時候，幕府發出布告，使大家對醫書有疑難的準備向他質問。幕府醫官今大路道三，栗永瑞見贈以書，以療養教事請教。

清初赴日本之醫師是以上文所述之時期為最多，雍正以後，清醫師至日本的甚少。至仁宗嘉慶八年（光緒天皇享保三年西元一八〇三）有胡兆新至日本，幕府命太田南畝從兆新受藥方，小川汶庵，千賀道隆，吉田長積等從之學醫，這班人都是幕府中著名的醫官。

第九章

繪畫之輸入

據雄略紀所載，當雄略七年（宋武帝大明七年西元四六三），天皇聞西漢才技歡因知利說，謂帶方郡藝術優美的漢人，多留居於百濟，天皇乃任命吉備弟君為使，徵因知利為副使，往百濟招致那班藝術的人才，當時古畫部部长因斯羅我和他的部屬數十人，被招致於日本。這是中國繪畫輸入日本之始。

自因斯羅我等到了日本之後，便引起雄略天皇對於藝術上的興趣，日本那時的藝術便具有雛形了。因斯羅我的子孫，克紹箕裘，世仕於日本之朝，對於後來推古朝的藝術，多協助發展，故木

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說：『畫部與推古朝之藝術。有密切之關係，此點亦堪重視』。至天智天皇時代（唐高宗龍朔二年，至咸淳二年，西元六六二至六七一）天皇遂把畫部的子孫賜姓爲倭畫部。至稱德天皇，復把他們賜姓爲大岡忌寸。可見在雄略朝之畫部，影響日本後世的繪畫之大了。總之日本初期的繪畫，是以中國人爲開山祖。哥濕的日本歷史大綱說：『日本早期藝術家，實際都是中國人，他們用了日本人的名字，作成了日本藝術界的開國元勳。在奈良法隆寺的牆壁上，有日本最古的圖畫留存著，這就是那些人中一個人的手蹟』。以此而觀，若果沒有中國畫家於初期跑到日本，恐怕日本繪畫就沒有後來燦爛的結果哩。到了推古朝，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至唐太宗貞觀二年（西元五九一至六二八）。日本的藝術，一方面因受了貴顯子孫的幫助，一方面又因爲佛教的輸入，同時繪畫也因之而輸入。那時又有高麗僧曇來日本，教以筆墨彩色的工作。故據古事紀所載，那時輸入的，不但有金鑄的佛像，也還有畫的佛像。在那些畫像之中，有的大可丈餘。所以推古時代的繪畫，有黃書畫師之名，山脊畫師之名。這時的繪畫，真似春花勃發，怒不可止了。

唐時，唐畫又輸入日本。孝桓武天皇延歷元年至文德天皇仁壽三年間（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宣宗大中六年，西元七八二至八五三），有百濟太子阿佐跑到日本寫山水人物之畫。阿佐太子所畫之聖德太子像，與唐之間立本所之畫帝王圖同一法式，且附以陰影，這是爲開日本山水畫之風。至延歷二十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西元八〇四），空海入唐，於桓武武同元年（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歸國時，撰有曼荼羅五鋪、并金剛智，並無畏、不空金剛，惠來，一行等，五師的真像而歸。這些真像都是唐代有名的畫工所描寫的。試看空海的請來目錄說：『真言秘藏經疏隱密，不假圖畫，不能相傳，則喚供奉丹青真等十餘人，圖胎藏金剛界等大曼陀羅等十一鋪。』便知真言五祖像是由代畫家率真繪成。至於率真的畫法，按段成式的京洛寺塔記說：『描寫此像之畫家率真，畫長安諸寺院之壁畫最多，名震一時，其描法周詳，濃淡之間，極見意匠，形容

畢肖，筆力渾雄，是唐代人物畫之唯一標本。」足見其真畫法之在唐代地位了。至於五祖像中之金剛智，尊無畏及不空金剛，通是印度的僧人，這三個像的旁邊，是用飛白體書，各寫有梵漢西文的名字，惠來及一行是唐代的僧人，只寫有漢名，沒有梵名，五像之下位，則各記其行狀。這五個像，後藏於京都教王護國寺。因文物換星移，除了不空金剛像稍為完全外，其餘四像，通已體態模糊，朽蝕剝落了。後來，神護寺所藏之兩界大曼陀羅，是淳和天皇長年間（唐穆宗長慶四年至文宗太和七年，西元八二四至八三三）空海為天皇及國家祈福，特使書家描繪的。是完全由模倣唐畫之風而來的。

圓仁入唐，亦攜返唐畫。考圓仁於仁明五年（唐文宗開成三年西元八三八）入唐，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西元八四七）歸國。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會昌元年四月條說：「十三日。喚畫工五惠商量書胎藏幃工錢，十五日，晚間，博士王惠來，畫幃工錢，同商定了，五十貫錢作五副幃。二十八日：始書胎藏。」又圓仁入唐歸來目錄謂：圓仁在揚州長安二地求得之畫，有四十餘種。都是由唐畫工給成的。其最著者，則如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記開成四年（承和六年西元八三九）正月條說：「三月始畫南岳天台兩大師像兩鋪各三副，昔梁代有韓幹，是人當梁朝為畫手之第一，若畫鳥獸像，及平著其眼，則能飛走，尋南岳大師顏影，寫著於揚州龍興寺，勅安置法花道場瑞殿兩壁上。乃今大德備從采田家繼寫此取，無一虧誤，遂於開元寺令其家繪圖，絹上容貌衣服之禮也，一依韓幹之樣。可見其輸入唐畫之多。其他如常曉，圓珍及宗敏，亦多攜佛之畫像而歸。

除上兩人所携返唐畫之外，其他如新羅寺的吉祥天女畫像，正倉院御物的於下美人圖、當麻寺的極樂曼陀羅等像，都是由摹倣唐人筆法而成。唐畫影響於日本的藝術，豈不是很大的嗎？

至於唐日兩國之貿易品來說，由我國輸入日本的畫，也是很多的。所以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所載，貿易品之輸入日本圖畫也佔有重要的位置。

到了宋代，宋畫之輸入亦多，自禪宗傳入之後，因為禪宗好行頂相授受之禮，因此，便無形中注下肖像畫，所以入宋求法的僧往往把僧人的肖像攜回日本。齊重源於六條天皇仁安二年（宋孝宗乾道三年西元一一六七）入宋，明年歸國，携唐本十六羅漢像十六軸而歸。他又受法然上人的請托，携有淨土五祖（老鸞，道綽，懷感，少康，善導）的畫像而歸，這幅淨土五祖像，後來藏於京西慈峨二尊院。其鑒法及朱衣金紋的特徵，確是南宋時代的畫品。後於土御門正治元年（宋寧宗慶元五年西元一一九一）入宋，於順德天皇建歷元年（寧宗嘉定四年西元一二一一）歸國，携石南山靈芝真影各一幅，十六羅漢二大北三十二幅，水墨羅漢十八幅而歸。宋宮惠彥的中日交通史記其得水墨羅漢之事說：「禪月大師（五代時人，名貫休，居石霜和尚會下掌知客職，嘗夢遊西竺，親拜維摩羅漢，覺後描之，為水墨羅漢十八幅，久為宋室所藏。臨安府開化寺之比丘尼正大師，宋之王姓也，見後彷彿，謂其容貌似第十七度友尊者，乃贈之。即寶都高台寺現藏之羅漢像也。此面貌甚奇，頭長無耳，耳過肩，頭顱凸出，極力整頓所謂禪月式樣。此禪月大師羅漢像，對於後世所繪之羅漢畫，影響頗大。可知所謂水墨羅漢像，是由五代時人禪月大師描寫而成。至後携入宋，遂輸入日本。辨圓於四條天皇嘉祐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西元一二三五）入宋，師事杭州徑山之無準師範。請畫了齋畫師範的像（普常圓持，手持藥叉）於四條天皇仁治二年（宋理宗淳祐元年西元一二四一）帶返日本。後藏於東福寺。這幅像的面貌，着有淡薄的陰影，表示寫實的作風，是南宋畫之特式。又足為肖像畫的模範。宋畫特式之點，是色彩淡薄，用筆巧妙，描寫入神。如奈良藥師寺之佛涅槃像，色彩雅淡蕭洒，臉上眉高清秀，腮頰豐滿，輪廓多變化，這是受了宋代新藝術的影響的。

總之，入宋禪師，歸國時，不注重帶回經典，只注重帶回頂相以掛於禪室，以為精神修養之刺激，因此，遂開日本廳堂掛畫之風，而日本禪師亦多自行模寫頂相了。

日本既深受中國繪畫的影響，於是形成了日本人繪畫的創造性。所以當我南宋時代，日本始有

所謂大和畫。那時大和畫分巨勢與土佐二派。巨勢派的鉅子，那是鉅勢的金剛。他長於畫馬。有一次他畫一匹馬，非常活動。相傳這匹馬竟命脫了羈絆跑到御園裏去吃荻草。（一種叢生的金花草）。他又長於山水畫。他畫一幅那智的瀑布，彷彿直流泉飛瀉一般。他留下來的作品，有十多種，其中有一種曾於一八八二年在羅伐（法國古宮名，後爲巴黎藝術博物院）展覽著。

但大和畫雖然發達，可是當北條時代（土御門正治元年至後醍醐元弘三年宋寧宗嘉元五年，至元順帝元統元年西元一一九九至一三三三）日本的繪畫形成了兩大勢力。在京都地方的繪畫，則受大和畫土佐派的影响，因爲京都與大陸隔膜，所以此處的繪畫，仍爲中國作風。故中國畫盛行於鎌倉，大和畫則盛行於京都，春色平分，各逞門閥爭妍之勢。

當我元代之時，中國繪畫在日本的勢力又驟衰乎日上。元人與日本人之貿易，據木宮孝彥中日交通史所載，亦以唐畫爲重要的輸出品，而入元的僧人，攜返的鐘書尤多。因爲入元僧，常攜其日本先師的頂相入中國求贊詞。這種頂相，有的是由日本帶來的，有的是在中國諸畫工繪成的。這種頂相，對於日本的肖像畫大有影响。入元僧攜返釋迦、觀音、文殊、祖師、十王、羅漢，達摩、布袋、寒山、拾得等畫，並有山水動物花草等宋元的名畫。這是於日本繪畫進化史上極堪注意的。南北朝時代（元順帝至元二年至明太祖洪武二五年西元一三三六至一三九二），禪寺與上流社會，盛行唐式之茶會，茶亭之畔榻上，多掛有宋元名畫，喫茶往來一書，會謂飾以思恭之釋迦，牧溪之觀音，文殊、普賢、寒山、拾得、竹林七賢，商山四皓，龍虎白雲等的唐畫云云。禪林小歌也說掛壁的有思恭之釋迦三尊，因念羅（楚人）之羅漢，吳道子，月臺（金山寺長老）牧溪之觀音，米元暉，陸清，李堯夫之山水，文與可，東坡居士，檀之瑞之竹，仲華光之十梅，楊補之之梅，韓幹李伯時之馬，戴嵩舒悅之牛，牧溪之虎，所翁龍，張僧繇之龍，胡直夫之人物，陸信忠之十王等名畫。考此種名畫，現仍留存，茲舉其著名的如下。

(一) 山水圖 相傳爲唐吳道子筆，但頗似南宋的作風，存于京都府受宕郡高桐院。

(二) 釋迦文殊菩薩像 相傳爲吳道子筆，但亦似南宋的作風，今藏於京省東福寺。

(三) 楊柳觀音像 相傳爲吳道子筆，但似元代的作品，今存於京都大德寺。

(四) 觀音猿鶴圖 南宋牧溪筆，足利義滿所珍藏，今存於京都大德寺。

(五) 蓮華圖 五代徐熙筆，今存於京都智恩院。

(六) 十六羅漢 圖中有良詮筆，是倣北宋李龍眠的筆法而成的。今存於京都建仁寺。

(七) 維摩居士像 李龍眠派之畫，但似南宋的作品，今存于京都東福寺。

(八) 五百羅漢 南宋周季常林庭珪等筆，一幅五羅漢，原六幅，遺失六幅，十二幅藏於美國波斯頓博物館，現存二十八幅，存東京大德寺。

(九) 十六羅漢 南宋陸信忠筆，但中國無傳，不見信忠之名。今存於京都相國寺。

(十) 十六羅漢 趙孟頫筆，趙亦逸傳之畫家。由古風推之，似係南宋人，今存於千葉縣東葛飾郡法華經寺。

(十一) 十王像 陸信忠筆。今存於讚岐法然寺。

(十二) 夏景山水圖 此與金地院裏之秋冬山水圖二幅，並所在不明之春景山水圖，共成四季聯幅。足利義滿所珍藏，相傳係北山御室筆，惟無確實證據。現存於甲斐久遠寺。

(十三) 秋冬山水圖 見前。存於京都南禪寺金地院。

(十四) 藥山車軸問答圖 相傳爲南宋馬公麟筆。今存於京都南禪寺。

(十五) 雙賢菩薩像 相傳爲南宋馬麟筆，無釋迦文殊像並成四幅。今存於京都妙心寺。

(十六) 蝦蟇鐵拐兩仙人像 元顏輝筆。今存於京都府受宕郡知恩寺。

(十七) 出山釋迦像 有可翁印記，狀似元畫。今存於京都鹿王院。

以上所舉，不過就其最著者來說而已。其他如雪村友梅入元，學習繪畫。可翁宗然入元，亦曾

學習繪畫。至於元僧一山一寧赴日本，對於繪畫也有多少影響。一山一寧讚許溫玉山的葡萄為說：『書與畫非取其逼真，大體取其意。故古人清雅好事者，只貴清逸簡古，畫以古人高逸者為重』。要之，這些宋元名畫，對於日本的藝術實有猛烈的刺激。譬如京都嵯峨二尊院之十王像，是足利時代初期日本人繪畫而成的，但完全是由於模倣南宋陸信忠所繪的十王像而成。又如東福寺僧明兆（亦名兆殿）模倣李龍眠與元代顏輝，在佛畫中開一生面。

當我明代，日本輸入中國名畫亦不少，據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明成化十二年西元一四七六）相阿彌的君臺左右帳記中舉出唐五代宋元等名畫家至一百五十六人，并各記其所長。所以至義政時代的繪畫，成於此等畫家之手的名畫很多，可見其一斑了。這等畫是由日本南北朝時代次第輸入的，但在明代輸入者亦不少。

明初日人模倣中國的繪畫亦多。例如雪舟等入明，受尚書姚公之囑，描寫親部院的壁畫，憲宗見之，稱為稀世珍寶，命為天童山第一座。雪舟在明從學於畫家長有隆與李在二師，試看他贈其弟子宗淵之自畫破墨山水詩曰：『余曾入大宋國，北涉大江，經齊魯之都，至於洛，求畫師，雖縱揮染清技之者稀也。于茲長有聲并棲在二人得時名相隨傳設色之方兼破墨之法，』可見他是學習明人設色及破墨之法的。雪舟又倣高彦敬之畫風，以寫山水。遂成名了日本最著名的山水畫家。又如日本畫家周文及如拙（如拙學牧溪之筆法）極力模倣宋元畫法，以水墨代色彩，手法簡易，尊氣韻而重含蓄。影響所及，於是土佐派的纖細艷麗無法及濃厚的色彩因之而衰。又日本大和畫家土佐派的鉅子元信及狩野派的鉅子正信（元信之弟）也參酌宋元畫風而創成和漢折衷派。正信最長於畫中的風格，所以能得到極大的聲譽。據說正信有一次畫某種山水，因為失望，竟把畫鏟棄了。後人稱那棄畫的地方為擲筆舍，可見他學畫幾費苦心。總之，日本畫家自周文，如拙，雪舟，元信，正信等出世後，學宋元的畫法，於是宋元墨畫遂支配日本畫界。

清代赴日本的僧人，影響於日本繪畫的，有逸然。他因明末之亂，於清世祖順治二年（後光明

正保二年西元一六四五）遷居日本的長崎好寓園畫。當時有渡津秀石及經道光（河村若芝）傳其術，開近世漢畫之風。又清僧隱然及心越赴日本也以畫見稱。心越尤善作禪門緣起之圖。其他在德川時代尚宗畫關山祖祇國南海、柳里恭等，他們的目標，則在乎繪寫華壁諸師書法。

除可僧人之外，赴日本的清人影响於日本的繪畫的有下列的人物。

陳元興 他於明永明王永曆八年（後光明天皇永應三年西元一六五四）同僧人隱元赴日本。他是於水墨的佛畫。

陳清齋 留居於日本，專寫華壁諸僧的頂相。

伊卓九 於清聖祖康熙五十九年（中御門天皇享保五年西元一七二〇）載良馬二匹赴日本。他載

良馬赴日本的原因，因為當享保三年，某政府輸入中國的良馬，於清人伊崎吉以臨時信陳，使招良馬。後來伊崎吉因故不能赴日本，叫他的弟弟卓九代替，卓九是於尚宗的山水畫，風景清秀，馬兒可愛。他直接教授弟子，雖然僅有長崎畫堂清水逸（室伯民號碩翁）等數人，但間接學其風趣的，有池大雅與謝燕村兩大家。在日本形成了尚宗派的勢力。

沈南蘋 他受了西洋畫的影响，遂發展而成寫生派的大師家。他好寫花、草、翎羽，他寫生之精緻，著色之艷麗，與從前的作風，絕不相同。他於清世宗雍正九年（享保十六年西元一七三一）赴日本。當時雪舟狩野而派雖已衰落了，於是沈南蘋之來，大為日本人所歡迎。有長崎譯官熊代緒江（名斐字淇瞻號緒江）首學於其門，因此，日本遂有尚宗派的寫生畫。圓山應舉亦是南蘋的私淑弟子，頗得其寫生的真諦。南蘋於雍正十年歸國。

高鈞 沈南蘋的弟子，與南蘋同赴日本。

高乾 沈南蘋的弟子，與南蘋同赴日本。

鄭培 沈南蘋的弟子，與南蘋同赴日本。

費漢源 於康熙雍正年間到日，好寫山水畫，是屬於文人畫派的。他的門下有楊君山竹橋竹雲。諸葛晉 約於乾隆九年至十二年間（櫻町天皇延享時，西元一七四四至一七四七）赴日本。他是屬於南禪派的。江戸之清水靜齋慕其畫法，因改名爲諸葛監。

宋紫岩 約於乾隆十六至二十八，桃園天皇寶曆時，西元一七五五至一七六三）赴日本，他長於花木翎毛着色之畫，江戸畫家楠本雪溪學之，因改名爲宋紫石。

方西園 至日本之時與宋紫岩相同。他長於畫水墨之花、草、翎毛，文兆與華山皆學其筆意。程亦城 至日本時間與宋紫石同。在日本傳畫學。

用雲張秋谷帶晴湖 約於乾隆四六至五三年（光緒天明年間，西元一七八一至一七八八）至日本傳畫法。

一七〇江戶開至日本年間，約在仁宗真慶九年至二十一年（光緒天皇文化年間西元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七）江戶開與伊牟九張秋谷帶漢源世稱爲舶來四士家。其門下有游龍、梅泉、鐵翁、木下逸雲。

一七〇江戶開與伊牟九張秋谷帶漢源世稱爲舶來四士家。其門下有游龍、梅泉、鐵翁、木下逸雲。清雲鳴木柳橋江芸間 約於真慶二二至道光九年（仁孝天皇文政時，西元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九）至日本傳畫法。

一七〇江戶開與伊牟九張秋谷帶漢源世稱爲舶來四士家。其門下有游龍、梅泉、鐵翁、木下逸雲。一七〇江戶開與伊牟九張秋谷帶漢源世稱爲舶來四士家。其門下有游龍、梅泉、鐵翁、木下逸雲。

一七〇江戶開與伊牟九張秋谷帶漢源世稱爲舶來四士家。其門下有游龍、梅泉、鐵翁、木下逸雲。一七〇江戶開與伊牟九張秋谷帶漢源世稱爲舶來四士家。其門下有游龍、梅泉、鐵翁、木下逸雲。

第十章

書法之輸入

日本學者已承認秦末漢書前，徐福曾傳書籍於日本。如果事實不謬，則中國的文字也自然由徐

傳到日本。但那时的鐘繇，是用篆書寫的。則是篆字已由蔡福傳入日本了。後漢光武時代，光武賜倭王之一「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及魏明帝賜卑彌呼的「親魏倭王」印。都是用小篆刻成的。則是小篆字體，又於漢光武及曹魏時輸入日本了。但日本人那時對於中國的書法未有人注意。至神祿時代，有百濟國王仁來日本教十千字文一卷，日本史家遂認為中國字書正式傳入日本之始。至於唐代，歐陽詢的書法，亦由高麗傳入。因是新唐書歐陽詢傳說，他的書法傳入於高麗，故可由高麗傳入日本。歐陽詢的書法傳入之後，那時日本人視為書法之範本。競相仿效。文武天皇時，日，寫經生抄錄金剛經陀羅經，宛似歐陽詢之筆法。可見歐陽詢氏書法為日本人所珍視了。至玄宗不寶十三經鑑真攜有王右軍真跡行書一帖。小王真跡正帖，天竺朱和等雜體書五十帖，更引起了日本人書法的興趣。平安朝（起于西元八〇〇）日僧最澄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入唐。于貞元二十一年歸國，携回碑銘拓本與真跡甚多。最澄於其法門道且等目錄內，特標明書法目錄凡十七種如左：

趙模千字文	（大唐石榻）	安西內出碑
真草千字文	（同上）	開元神武皇帝書法（魏錫大唐石榻）
梁武帝評書	（同上）	王羲之書法（大唐石榻一枚）
大唐聖教序	（同上）	天台佛窟和上書法一枚（真跡）
天后聖教碑	（同上）	兩書本一卷（此間書）
古州龍興寺碑	（同上）	古文千字文（此間書）
潤州牛頭山第六祖師碑（同上）		真草文（此間書）
王羲之七帖	（同上）	
褚遂良集一帖	（同上）	
歐陽詢書法	（大唐石榻二枚）	

其他入唐之留學生及僧人在唐亦學得書法而歸，或攜回書法真跡，影响所及，書法遂大行于日本。故學生孫逸勢以長於隸書見稱，學問僧空海，以長于草書見稱，嵯峨天皇，以善學衛夫人的書法而著名，故播逸勢空海與嵯峨天皇當時有書法三傑之稱。至五代時，唐明宗天成二年據扶桑略記延長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條載：日本福興寺僧寬建携有小野道風的行書草書各一卷來中國。使流布于各地。至于宋代，據宋史日本列傳所載，日僧南然及寂照入宋，南然善隸書，寂照書法亦妙。又皇朝類苑第四十三條載：日本多習王右軍書，寂照尤能傳其法，又載日本國王之弟野人若愚（具平親王，）左大臣藤原道長，治部源從英寄書于寂照事，并許曰：『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又參天台五台山記謂宋神宗熙寧五年，日僧成尋來宋，携來慶耀所寫之梵字不動，梵字文殊真言一卷，尊勝真言一卷，以誇示日本人書法之端麗，當我宋代，日本人之好書法者固多，然由中國攜返之書法亦不少。據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說：『泉涌寺俊祐偕其弟子安秀及長賀于寧宗四年入宋，宋寧宗嘉定四年返國，帶有法帖御書堂帖等七十六卷而歸。』

至於明代，據補菴京華集說：日僧仲芳中正於明惠帝建文三年入明。仲芳中正最善于楷書，明成祖勅命他寫永樂通寶之新錢文，頗蒙贊賞。明清時入日本之明僧如隱元，木菴，即非，高泉，心越及獨立等無一不善書。其中即非以草書著名，心越以篆書著名，獨立則提倡唐式書法最爲有力。獨立原名藏竺，字曼公。在明時著有永陵傳，信錄，流寇編，年錄，殉國彙編等書。悲明之亡，乃入日本，以五十八歲之高齡爲隱元弟子，改名宗易，字獨立，傳其書法於長崎。高天濤，至江戶，所書之江戶淺草觀音堂施無畏之額，久爲書家所欣賞。然當時華人留居長崎者有林道榮，書法與高天濤齊名，世稱爲長崎二妙。高天濤善草書，林道榮則楷行草隸兼長。大宰春臺評此二人云：林不及于高，在筆法與變化，但林兼善各體，高祇能作草書，此又高不及林之處。足見兩人之書法，各擅其妙了。又寶歷明和天和時以真書聞名的有趙陶齋，他是居于長崎之清人趙某

之子。并就黃蘗僧竺法學書。得其法。其他如朱舜水陳元麟居三崎。對于日本人之書法亦有影響。至于俞立德則助長日本，近代唐式書法之風，與獨立不分軒輊。俞立德本是杭州人，字君成，號南湖。傳得文徵明之書法，日本東山天皇寶永初日貿易往來長崎三次，宿于北島雪山之家，雪山幼聰敏，立德愛之，教以書法，故雪山成爲書法大家，爲當時唐式書法之第一人。又當光格天皇寬政年間渡日本之胡兆新，徐荷舟，劉培泉等，都是以書法見長，江戶人泰不馨（字星池）學得其筆法，至爲日本人所歎賞。

第十一章

音樂之輸入

據日本史載：允恭帝登遐之時，新羅國王送八十個樂工到日本以表哀樂。新羅音樂是由中國傳入，由新羅傳入哀樂，是中國音樂輸入日本之始。推古天皇二十年，又有百濟人味摩元傳入伎樂舞於日本。聖德太子把他用之於佛會，嗣後音樂又隨佛教而輸入。故文武天皇時，曾奏唐樂於中廷，而大寶令中亦規定有雅樂師之設置。聖武天平七年，與問僧去修直僧由唐歸國，帶有銅律管一部，載如方响寫律管聲十二條，及樂書要錄十卷而歸。天平八年有唐人與甫朝東及皇甫昇女到日本，對於唐樂多有貢獻。皇甫朝東於稱爲天平神護二年十月與皇甫昇女共奏唐樂於舍利會，教從五位下。後爲雅樂員外助，兼花鼓司。仁孝親征少朝，口有故邑之樂，由佛微（人名）傳入日本，故當神護景雲元年二月，稱德天皇幸山階寺時，曾奏五樂與林邑樂。光仁天皇寶龜元年，口樂師永忠入唐學音律，帶古律呂旋宮圖，口月圖各二卷，口管十二枚，口壺一枚而歸。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准判官良岑長松並吹彈琴。藤原貞敏入唐，學琵琶于劉二郎，劉二郎妻以女，贈以紫檀琵琶，紫藤琵琶各一面。因爲朝廷重器，後來日本特者定爲琵琶俗謂之琵琶法師，總之，當我唐代，凡唐之樂曲，樂器，樂律和管色，無不輸入日本。今先就樂曲來說。

由唐代傳入的樂曲，有：萬歲樂，回波樂，鳥歌，承和樂，河水樂，菩薩磧武德樂，蘭陵王安樂。鹽三臺，鹽三州，胡渭州。慶雲樂，想夫憐夜半樂，扶南小娘子，越天樂，林歌，孔子琴操，王昭君，折楊柳，春庭樂，柳花苑，赤白桃李花，喜春鶯，平蠻樂，千秋樂，蘇合香，輪臺，傾杯樂，打球樂，還京樂，蘇芳菲，長慶子，一團嬌，採桑，拔頭，秋風樂，賀皇恩，玉樹後庭花，泛龍舟，太平樂，破陣樂，太平樂及蘭陵王破陣樂，皆是舞樂，破陣則戴假面具上場，有發揚蹈厲之概。太平樂四人對舞，皆緋衣，佩金魚袋，俯仰揖讓，瀉瀉乎雅音，樂作時，伶人十數，披襦道衣，跪坐席外，旁列樂器。鼓傳，舞者四人出笙簧管箏諸樂雜作，一人吹笛，抑揚抗墜，極和而緩，舞止。樂亦止，此樂在日本流傳于後。等。然僅傳其譜，不傳其辭，所謂制氏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且樂工多不識字，以致曲名多有謬誤，如白紵誤爲白柱，張胡子誤爲朝小子，景德說作雞穗，烏臼說作烏尚，蘇幕遮說爲蘇莫者，西涼州說爲最涼州，康老子誤爲小老子，大酺樂誤作大補樂，小飲酒變爲胡飲酒，安世樂變爲安城樂。至日本之五常樂。村瀨之熙謂是舜之韶樂，其言曰：『古來常讀如韶，韶舜樂也。五卽虞字之轉訛，吾邱壽王，水經注作虞邱，王應麟詩考曰：騶虞或作騶五，見劉芳詩義疏，五常卽虞韶之誤也。南齊書樂志曰：凱容無本舜韶舞，漢改曰文始，魏復曰大韶，又造成熙爲之舞，晉傳元六代，舞有虞韶舞，宋以凱容繼韶爲文舞，卽此五常舞也。』以此看來，是日本之五常樂，卽是虞韶了。日本又有荆山樂，物茂卿謂卽是唐之慶喜樂，又有賀殿，和名類聚鈔曰：『承和宋遣唐判官藤原貞敏以琵琶傳此曲。然唐時樂府沒有這曲，村瀨之熙曰：疑是何傳，以國音同，黃遵憲說：『按今郭茂倩樂府詩集雜曲歌辭，有金殿樂，當是金殿之訛也。』是日本之賀殿，卽我之金殿曲。又有春鶯囀。日本國志說：『大春鶯囀，唐虞世南及蔡亮作，又有小春鶯囀，并商調曲。轉當是囀字之訛。』又有何羅，是黃鸝之訛。又有酒胡子，卽酒家胡之訛。又有勇勝，日本國志謂卽是戰勝樂。

樂器 唐之樂器傳入日本的有尺八。尺八有五孔，一孔出其背，各孔有專名，一日真懷，二日角

錄，三日誓仁，四日舌擇，後一乳曰後器（音寄）。日本之尺八，與馬融所賦的長笛形制相同。馬氏長笛賦說：「西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管按記云，似即今之尺八。是日之尺八，與馬融之長笛相同也。然日本尺八之制有六：曰黃鐘切，曰黃越切，曰雙調切，曰平調切，曰新黃鐘切，切者，即律調裁管也。最短的是黃越切，長曲尺一尺一寸，最長的是平調切，長曲尺一尺四寸。考日本之曲尺，同與明之營造尺相同，即唐之常用尺。最長的平調切，以晉後之尺校之，恰當一尺八寸弱。然既名爲尺八，則黃越切祇有尺一者何也？考唐書呂才傳稱呂才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據此則尺八之，樂器，確有長短之不齐，不因其長尺八，故謂之尺八也。日本既傳入我國之尺八，後來大森宗動真于吹尺八。日本人物史說：「大森宗動號策翁，自幼好音律，特以尺八著名于時，嘗登講奏曲，有黃鳥來和之。天正中（明萬曆時）奉詔制五調之尺八，至今言尺八者，以宗動爲法。除了尺八之外，日本又有笛。大和法隆寺所藏上宮太子遺物有笛管，長曲尺一尺四寸五分，六孔，其一在背。南都東大寺又藏聖武孝謙遺寶圖，有笛凡四管。其一六孔，長一尺四寸五分，與法隆寺所藏相似。按西京雜記云：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五笛六孔，則日本之六孔笛，是由中國傳入去的。笛之外又簫，笙，琵琶，箏，有一絃。胡琴，二絃，大鼓，摩尼而短，有小鼓，即細腰鼓，有三絃，琴，鼓。有拍子。這都是中國唐代的樂器，傳入于日本的。

樂律 日本的樂律，一越調，二斷金調，三平調，四勝絕調，（別名下無），五龍吟調，（別名下無），六雙調，七鳧鐘調，八黃鐘調，九鸞鏡調，十般沙調，十一神仙調，十二風音調，（別名上無），伶工相承，以越爲黃鐘，斷金爲大呂，平調爲太簇，勝絕爲夾鐘，龍吟爲姑洗，雙調爲中呂，鳧鐘爲蕤賓，鸞鐘爲林鐘，鸞鏡爲夷則，般沙爲南呂，神仙爲無射，風音爲應鐘。這些樂律是得自中國，但名稱微有不同。物茂卿說：「稽諸華夏，燕樂有越調，雙調般沙調，仙呂調。皆調名，而非律名也。龍吟樂即唐長鳴三腔之一，摩尼乃琵琶彈破曲之名，而斷金勝絕，鳧鐘，純無所考

，然當字誤。上無下無。爲此方所命。獨巢笙平調子爲林鐘，仙呂管爲夾鐘者。實以命律，然不復與此方所傳者合。』。是中國叫做調，傳入日本則爲律，稍有不同耳。物茂卿又謂日本的音樂，得有周漢的遺音。他說：『謹按本邦之樂，原周漢遺音，律亦周漢之律。而第八黃鐘調聲，乃周漢黃鐘也。惟昔黃帝軒轅氏，命伶倫始制律呂，而度量衡皆生焉。三代相承，歷秦漢莫有改作，後漢以來，尺度訛長。魏杜夔承喪亂之後，並所稽考，其制律以應鐘爲黃鐘，律始變矣。晉時荀勗妙解音律，取協古器，釐正復舊。宋齊暨陳，一皆因之。中間梁武時，曾議訂正，尋值亂離，未及改造，比終江南之朝，周漢音尚存也。此時中原沿胡，而胡尺長大，胡音重濁，拓拔氏乃以夷狄屈強之習，事不師古，妄意制作，以新一時耳目，東魏以中宮爲黃鐘，蓋互換歌奏也。宇文周以南無少間爲黃鐘，隋承周統，因以黃呂爲黃鐘，皆以協胡音也。及其平陳之後，始獲宋齊舊樂，高祖善之，謂爲華夏正聲，別置清商署以管之，號曰清商三調，所以謂之清商者，其樂以南呂爲黃鐘，則宋齊黃鐘爲夾鐘，五音之序，大簇爲商，夾鐘高一律，故謂之清商，此以其樂視宋齊舊樂故云爾。唐以字文周玉尺造律，亦以南無之間爲黃鐘，始變古制爲八十四調，又演清樂爲燕樂二十八調，于是周秦遺音遺制，皆亡，滅不傳焉。其後五代周時，王朴造律，其黃鐘在黃鐘大呂之間，宋建隆時，相視以應鐘爲黃鐘，崇寧時，魏漢以夷則爲黃鐘，明洪武時，有冷謙以中呂爲黃鐘，此歷代改律之大概也。其未施行者，宋孝昭范鎮以林鐘爲黃鐘，劉幾同唐制，明鄭世子同崇寧制，此皆在古樂散亡之時，莫有所稽考，妄以己意，飾以累黍者也。』村瀨之照依物氏之說，亦以古樂正聲，宋以來諸儒所未嘗識，特傳于我邦，而古音得復明，豈非千古大快。然考日本之傳華樂，實始于唐，自隋文帝平陳，得華夏正聲，置清商署，以爲古音尚存清商調，唐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則古樂于唐時傳入日本，留存于後代，不爲無理。

自唐之後，中國音樂輸入日本似爲沉寂。至于清代有清僧心越來日本，攜有一琴，名虞舜琴，傳其技於人見竹洞，杉浦翠川及小田野東等。翠川著有東皋琴譜五卷（東皋即心越之號。）久

也。中國之日本學法，自心越來後，又復興盛。

第十二章

印刷術之輸入

中國印刷術是於唐時輸入日本的。據三國傳記所載，唐僧鑑真同其弟子赴日本傳授佛教，在日本刊印律書三大本，是爲日本開版事業之始。至宋太宗時，日僧裔然歸國，携有宋太宗御賜之印本大藏經而歸。考中國大藏經之全部刻版，實自宋太祖開寶四年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凡歷十二年而成。而然入宋時，正是開寶勅版告成之日，故太宗所賜的大藏經，乃是開寶勅版之初本。其後宋太平興國重源於宋孝宗乾道四年由宋歸國，亦携印本大藏經而歸。故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說：「此等輸入宋版之大藏經，對於鎌倉時代以後，日本印刷事業之發達，直接間接以刺激」。但大藏經輸入日本，何以能給予日本印刷術之刺激？因爲宋之禪林常以刊印經典爲功德，往往募捐刊印，以給各僧使廣爲傳播；即居在日本之法傳弟子，亦設法贈閱。如宋理宗淳祐二年，天童山僧以如淨禪師語錄送給日本，越前永平寺僧道元，宋成宗大德八年，徑山僧以虛舟和尚語錄送給日本，京東草河勝林寺之主堂昭林，是最顯著之例。日本既得中國印版的佛經，即在日本發展其印版事業，故入宋僧法忍淨業及開陽湛海由宋歸國，淨業入宋二次，後一次於宋理宗淳祐元年歸國，湛海入宋二次，後一次於宋理宗淳祐三年歸國。曾在泉涌寺覆刻宋版律書七種。

- (一)比丘六祖圖 宣元四年十月開版 發願者道玄 (二)梵網經盧舍那經說心地法門品菩提戒本 寶治二年十二月開版 發願者湛海 (三)孟蘭盆經疏新記 永仁六年六月開版 發願者寂禪 (四)資持記 建長四年四月開版 發願者寬靜 (五)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 建長四年四月開版 發願者寬靜 (六)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 正安元年九月開版 發願者覺阿 (七)新刪定四分僧戒本 元享二月開版 發願者會源

其後刊印禪書頗多，繁尾順敬博士之鎌倉武士與禪文中，曾列其目錄：

(一) 瀧山七圓禪師警策 (二) 宋明州育王山之拙菴德光(佛照國師以此贈日本攝津三寶寺之大日能忍能志刻版流布之，是為日本刊行禪書之始。(瀧山七圓禪師警策與書) (三) 大覺禪師(華嚴道隆)語錄 道隆弟子首翁智侃於龜山天皇文永元年(道隆之語錄入宋，揭大川濟求其校正，歸國後，刊行之。道隆之弟子禪忍亦曾撰大覺禪師之語錄入宋，於宋理宗景定三年請宋臨安府上天竺之佛光法師法照作序，又經過當時居於淨慈之虛堂智愚校對，於元世祖至元元年在中國刊行。(見大覺禪師語錄序并與書) (四) 元菴(普寧)禪師語錄 普寧住建昌寺時，寺中為之開版，刻禪師語錄。普寧歸時，自謂在日本之語錄，無可觀者，乃盡毀之，投之於火。(見東巖(安禪師行實) (五) 普寧希運禪師傳心法要 此條顯時，刻唐本流布之，正念為之作後序。源福師語錄) (六) 圓覺了義經 北條時宗於道隆忌日出版，祖元為之供養而講說之。(佛光國師語錄) (七) 佛光國師語錄 佛光國師無學祖元，祖元寂後，其弟子刻其語錄帶入於宋，學者爭相傳誦。(佛光禪師塔銘) (八) 佛源禪師語錄 佛源禪師即大休正念，此語錄於後宇天皇七年刊行，大休正念有自序(佛源禪師語錄) (九) 徑門密訓集 此集於弘安十年刊行，施入建長寺之正續茶寮而流布，大休正念為之作序及偈。(佛源禪師補遺) (十) 傳法正宗記 弘安十年刊行。(傳法正宗記與書) (十一) 虛舟和尚語錄 京東草河勝林寺之圭堂瓊林曾入宋，師事虛舟師度，憂其語錄之湮滅，乃命工鐫梓布行。(虛舟和尚語錄序) 除此之外，其他的禪籍刊行亦多。大休正念之遺囑希運禪師傳心法要序中曾說：「以唐本模刊」可見雕刻之時，概做宋版。自此之後，日本印刷盛行，計有春山版，高野版之別。

當我宋代，日本所印的書籍，大多是禪籍。對於儒書之刊刻，則在後深草實治元年(據田中數氏圖書學說論：「實治元年，有一人匿其姓氏，署名『陋菴子』，從印宋版本論語集注十卷」，此為日本開始儒書之濫觴。

當我元明兩時代，日本五山版之印刷，極爲精良。對於五山之學，發達極有影響。例如杭州徑山虛堂智愚在世時之語錄及其寂後後人編纂的後集三卷，由入元僧前後帶來。其時在日本尚未刊行，得之不易。沙彌宗哲乃於花園天皇正和三年傾財在西京之龍翔寺開版，智愚之法孫南禪寺僧紹崖宗卓作有題跋。又余陵鳳臺古林清茂之語錄一書，在中國尚未編次，由入元的日僧帶回日本。因爲得之不易，森禪人乃募刊印。由清茂法嗣南禪寺僧竺仙梵仙爲序。但那時五山僧徒，亦直請宋明教大師契嵩之語津文集，由入元的日僧帶回。日人森屋妙範亦翻印行於世。至入元的日僧，又帶回中國許多僧傳，在日本刊行。後村上天皇正平元年，源性明起捐資刻印感山雲臥記談，是爲日本有僧傳之始。正平三年，前伊勢守王峯大居士刊印景德傳燈錄，藏於建仁寺之塔中天潤菴。華嚴寺僧則川三曾校刊印佛祖統紀不果，其弟子生光繼其志刊之。此等中國僧傳之刊行，血虎關師練所撰的元亨釋書同於正平十五年奉勅入藏，上梓頒行。此皆於研究日本佛教史方面頗有貢獻。至中國儒書之在日本亦于此時次第刊行。如七內義隆之大內版，刊行十八史畧，四書大全，山谷詩注，杜工部集，五經正文及聚文韻覽等書，大原雪齋之今川版，刊印歷代序畧，伊地知爾貞之薩摩版，刊印大學章句，便見其一斑了。

至於赴日本之明人，有善於雕版者，對於日本印刷術之改良，亦有莫大之貢獻。空華日工集載明代雕工來日本說：「唐人利字工陳孟千陳伯壽二人來，福州南其橋人也。丁未年（北朝後）光嚴天皇負治六年，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二二年元順吉至正二上年（西元一三六七年）七月到岸，大元失國，今皇帝改國爲大明，孟千有詩，起句云，吟亭月兔月中毛」。可知陳孟千陳伯壽二人，因元末之亂故來日本。當時日本的印刷以五山各寺爲好，而臨川寺之版，尤爲第一，他的雕工，皆是赴日之明人，其中以陳孟千陳伯壽最爲有名。而刻有宗鏡錄，平石如砥禪師語錄發求等書，古版宗鏡錄第百卷之識，皆有明：「應安辛亥結制日，天龍東堂春屋妙範命工雕之，江南陳孟榮刊刀」。陳孟榮爲空華日下集中的陳孟千陳伯壽同姓。又同時，其同族同時而至日本者。當時至日本

之雕工，又有俞良甫，良甫是福建興化路縣德仁里人，到日本後，曾在京都嵯峨聚助天龍寺開版事業，刻有般若心經，月江語錄，碧山堂集，李善注文選，南柳先生文集等書。李善注文之跋選說：「於日本嵯峨自辛亥（北朝後光嚴應安四年，南朝長慶天皇建德二年明太祖洪武四年西元一三七一）四月起刀，至今苦難始成矣。甲寅（應安七年長慶文中三年洪武七年西元一三七四）十月謹題。」據此便知他努力之極了。但他又于困迫之際，抽去自己的私財，於北朝後圓融天皇至德元年（南朝後龜山天皇元中元年洪武十七年西元一三八四）四月刻傳語正宗記，其書跋說：「福建道興化縣仁德里住人俞良甫於日本嵯峨寓居，憑自己財物，置版流行，歲次孟夏四月謹題。」他雖是一個亡命之徒，然對於日本印刷術之貢獻，是值得日本人永為紀念的。此外如福才，林，沈，元古等，其名字雖未能完全留傳，然也是幫助陳孟榮俞良甫等從事印刷的工作。

當清初之時，赴日僧獨立心越千呆高泉及大鵬正鯤，對於日本之印刷術亦有影響。獨立長于篆刻，為日本人所珍視，後傳其法於高天將。心越曾携清陳策的韻府古篆彙選至日本，東山天皇元祿年間，（清聖祖康熙時）曾把他翻印出來。千呆高泉長于印刻，唐武書家細井廣澤曾學其術。大鵬正鯤則著有印章篆說行於日本。這班僧人到了日本，誠足以促進日本印刷術之進步。到了清代中葉，中國唐本書籍之輸入，影響于日本之印刷，亦復不少。時長崎為華人居住之地，日本政府特於長崎設置書物目利之官，以精於鑒別唐本書籍的人充任，使司檢閱，長崎輸入唐本書籍中，有一部份稱為御文庫用，特別藏於楓山文庫，後由官印翻印出來，以資大家研究。計用官版翻印的中國書籍，據德川幕府時代書籍考附關係事項出版史所載，共有一百九十三部，其他入於好學的諸侯之手的唐籍，有許多是在藩國翻印的。至仁孝天皇天保十三年幕府命令十萬石以上的諸侯，獎勵翻印書籍（見天保撰要類集）這些翻印的書籍，一入於日本文人學士之手，以致各地文風振起，而清代學者考証之風氣，因之亦風靡於日本的學術界了。

第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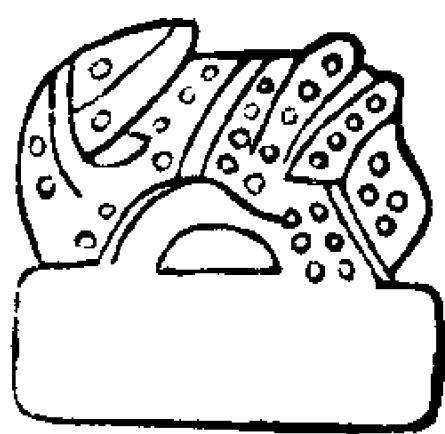
雕刻品之輸入

這裡所說雕刻，是包括金屬的，玻璃的，和木質的雕刻品與佛像來說。考中國雕刻品輸入日本，實以銅鐸爲始。銅鐸輸入的時期，學者主張不一。日本喜田博士的銅鐸考（見歷史地理第三十二卷第二期）謂日本盛行銅鐸之時期，似在二千一百餘年前至一下八百餘年間。梅原末治氏的由考古學上考察出來之古代日鮮關係（朝鮮什志第百號）說：『在畿內大和發掘之銅鐸形狀，頗似先秦之古鐘。近年在朝鮮慶尚南道慶州入室里發現四寸許之小銅鐸及新羅綠細紋鏡，與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在大和國高城郡吐田鄉發掘者相同。其製作技術，似受中國文化之影響，恐此先行於辰韓，後傳至於日本』。他又斷定銅鐸之輸入是在前漢中期至王莽後之三四百年間。栗山周一日本國史時代研究謂：銅鐸民族之興盛時期，概以西元前二百年左右爲中心。和辻哲郎曰：古代文化則謂銅鐸年代，在西元前三世紀時。是銅鐸之輸入，雖不能確定其年代，但漢明然至少當在下葬以前。而銅鐸傳入日本所經之路，則似由日本海旋回流，先傳于山陰及北陸之地，次第傳徧于各地。觀梅原末治氏的銅鐸一覽表謂銅鐸分布區域，東以加賀越前，美濃，三河，遠江爲界，西以石見，安藝，讃岐，阿波，土佐爲界，多數無異謂：型式較新，狀小面厚，右流水紋者，多在山陰，北陸，至畿內之地。型式較新，狀大而薄，有交叉線紋者，多在畿內至東海南海一帶。總之，在銅鐸未輸入之前，未曾有雕刻品之輸入，所以銅鐸是中國雕刻品輸入日本之始。

近代學者又在博多灣沿岸地發現許多中國式的銅劍。在筑前國，筑紫郡發現許多中國式的古鏡與璧玉。又在筑紫郡海邊，發現王莽時代的貨泉。所謂銅劍，古鏡，璧玉貨泉，都是王莽時代產自日本的人們輸入於日本的。

到了後漢光武中元二年（五仁八六年西元五七）光武御賜王奴國王一顆金印，方七分八釐，厚

三分，高四分，重二兩九錢，至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光裕天皇天明四年西元一七八四）才發現
于福岡筑前國，那珂郡志賀島叶崎地方，後存於黑田侯家。這是印刻輸入日本之始。這印的式樣
如下圖。



到了魏明帝景初二年，賜卑彌呼的親魏倭王之印，及銅鏡百枚。這顆印現雖未知存在與否，但
宣和集古印史中却拓有樣式，存于日本的好古目錄裡。這印的樣式如下圖。



這是中國金印及古鏡傳入日本的第二次。

到了南北朝時代，雄略天皇與南朝常有交通，那時曾輸入中國的古鏡，此鏡大多數為盛行於六
朝時期的神鏡。這種鏡表示象獅等熱帶地方動物，與苗族所造的銅鼓相似。殊有南方色彩
。這是中國古鏡輸入日本的第三次。

到了梁元帝承聖元年，百濟王把金銀鑄成的佛像獻于日本，是為中國佛像輸入日本之始。欽明
天皇也做明鑄佛像，他曾以一條梓木雕成一佛像。以後的天皇也因之而做。到了崇峻天皇時

有百濟造鏡盤博士將德（百濟官名）白味臨來，日本始習鑄工。可知雕塑學影響於日本的情形了。

到了唐代，佛像之雕刻品輸入更多，佛像遂偏布于日本各寺。當唐玄宗天寶十三年，鑑真同其弟子赴日本，當是時隨鑑真而來的，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雲，台州開元寺僧思托，揚州興雲寺義靜，衡州靈耀寺僧法載，寶州開元寺僧法成等十四人。蘇州通惠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潘仙童，胡國人安如寶，崑崙人法力，勝波國人善聰等二十四人。至其弟子之顯名者，有仁韓，法進，曇靜，法顯，思托義靜，智威，法載，法成，靈耀，懷謙，如寶，惠雲，惠良，惠達，惠常，惠喜，道欽等十八人。鑑真赴日本時，攜來的佛像有不空四韻索像，赤樹檀丈殊像，昆首羯磨作釋迦像。鑑真在日本建唐招提寺，除把這像置于寺裡外，并建造許多佛像（一）太尊丈六金色盧舍那佛坐像 這像內爲竹筐，外以布及漆塗之，凡十三層。這種有謂是義靜作的，有謂是思托或曇靜作的。（二）左脇侍丈六藥師像 這像是如寶或法力或思托作的。（三）右脇侍丈六千手觀音像 如寶作。（四）丈六彌勒像 法力作。（五）不動明王像 義靜作。（六）地藏菩薩像 空海所雕刻。（七）鑑真和上像 思托作。以上都是唐招提寺的主要佛像。又據流記資財帳所載之法興寺之九面觀音像，有『檀像一具，養老三年從請坐者』之語。考元正天皇養老三年即唐玄宗開元七年西元七一〇—一九年，則此九面觀音像，是由唐輸入無疑。

再就鏡的雕刻品來說。當唐之時，在東大寺正倉院所藏的唐鏡，亦甚有名。這裡所藏的鏡共計五十六面。其中帶唐代藝術色彩最濃的，是千螺細鏡。這鏡的背面全部是寶相花紋，花邊處以飛簷，下施色彩，全體有光澤。這鏡大約是唐人造的。其次爲金銀平脫鏡，這鏡背面全部刻以鶴雁及其他鳥獸草木的形狀，并帖以金銀薄片，用平脫法雕刻而成。其平脫的技術該米脫羅保利坦博物館所藏之唐鏡相同，則這鏡是由唐代輸入無疑。又面倉的銀背八角，背面帖以銀板，內部刻有花鳥及山上仙人彈琴圖，外部刻以鳥類篆書五言律詩八句及八卦，這是表示儒道思想合一的象

微，也是由唐輸入的。

自唐鏡輸入之後，日本人多奉之爲神物，或爲還寺鎮地之用，或懸掛佛前，叫衆僧崇拜。後來中國造鏡法，遂傳入日本了。所以當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六年四月，東大寺鑄鏡用度文中曾載有鑄徑一尺之鏡四面，其所需工匠四名，秦姓工匠二名」之語，足以證明鑄鏡法是由赴日之唐人傳入去的。

當我五代時，日本比叡山延曆寺僧延於朱雀天皇天慶間來中國，於村上天皇天歷末歸國時，曾攜密篋印塔而歸。這座塔是吳越王弘徽倣阿育王塔的故事，雕成八萬四千個塔，內藏密篋印心咒，遍頒行于各地，現爲明白這塔的由來起見，不妨抄錄村上天皇康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僧道喜所記由密篋印經記的全文如下。

『去應和（村上年號）元年（宋太祖建隆二年西元九六一）春，遊右扶風，於時肥前國刺史（多治比實相）稱唐物出一基銅塔示我。高九寸餘，四面鑄佛菩薩佛，德宇因角，上有龕，龕形如馬耳，內亦有佛菩薩像，大如薤核。捧持瞻視之頃，自塔中一囊落，開見有一經。其端紙注云：『天下都元帥吳越王錢弘徽捐本密篋印經八萬四千卷之內安密塔之中，供養迴向已畢，願德三年丙辰歲記也』文字小細，老眼難見，即僱一僧今寫大本，一往觀之，文字落誤，不足耽讀。然而粗見經趣，肝動胆奮，淚零涕併。隨喜感悅，向弘細意。於是刺史答曰：由先願文其意難。但知當時沙門日延天慶年中入唐，天歷之稍來歸。即稱唐物。付囑是塔之次談云，大唐願德以往，天下大飢，黃中結黨，抄劫邊州，煙塵漲天，殆及封畿。弘徽意爲大將領天下兵，征伐凶黨及九年比，血賊合戰二十四度，斬首五萬餘級。願德元年春，人彌飢荐，烏合蟻結，罄食靡郤。弘徽麾其師旅，應响交擊，賊飢不戰，立以大敗。衆勝追北，至汶水邊，洪水頓漲，激浪鼓怒。津渡無船，賊徒知甘回脫，各投深水。暴虎憑河之輩，追捕溺殺，其數不知幾億萬，汶水爲之不流。自爾以降，天下清肅。弘徽得命之日，主

上大喜，作九錫命，封王吳興越。弘微不幾坐殺若干人罪，得重病遂數月，常狂語云：「刀劍刺胸，猛火纏身，展轉反側，舉手謝罪。爰有一僧，告云：汝願造塔者，當鑿印經，安其中供養。香、弘微咽中得佛願兩三度合堂禮謝，即得本心。」時真感嘆云：「願力無極，重病忽差。」於是弘微與阿育王塔，鑄八萬四千塔，捐此經。每塔入之，是其一本也云云。妙哉！大國僧有此優識，惜哉！小藝之客無意精勤。爰我僧某身命，訪求正本。京中郊外踴躍徧問，適於江都禪寂寺得件經，其本亦多誤。然兩本相合，互檢得失，終獲其真。然後日分轉經，終日無倦。夜至誦咒，每夜不眠。漸經二個月，于時空中有聲，告曰：汝于此經殷重渴仰，但此經有兩譯，師所持者先譯，多除梵本，其後譯者爲之具足也。其本在伊豆國禪院，天下無二本，我常與二十八部大將等守護彼經，我獨感汝精誠，當迴汝邊，亦告此事。于時小僧，就國司使謁觸可書贈彼經之狀。遂以康保二年四月十三日送件經。披閱其卷，功能絕妙，就弄其文，深理染肝。十二分教悉備，是經其中如意珠。八萬法藏爲砂。是經其中紫磨金，一句之味如醍醐，百病萬惱，一般消滅，一字之光越日月，鐵圍沙界，俱皆照明。豈可忽重罪，速証佛果者，何記得是經典。聞斯妙理哉？康保二年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甲午釋道真記。

吳越王錢弘微仿阿育王故事，雕成了八萬四千個塔，藏印經。這種雕刻技術，真是精微之極了。日本人得此銅塔，宜其嘆賞不已。

到了北宋時代，輸入日本之雕刻品，最著名的就是南無觀世音菩薩的檀像。而然於開禧天皇永觀九年入宋，於花山天皇寬和二任歸國時，攜有現存於嵯峨清涼寺之檀像。當時迎在世時，夫世傳填下叶昆首羯摩雕刻這像，後傳於西域龜茲國。前秦符堅使將軍呂光伐龜茲，搬至中國，歷代王室珍藏之。宋太祖藏於東京開元寺永安院，太宗時迎入大內的乾福殿，後移入勝聖祥院。雖然入宋時拜其像，命佛工張恭校對造像。當時携來的，仍有十六羅漢像，顯于清涼寺。

南宋時代，僧重源於六條天皇仁安三年歸國時，除書像之外，攜有中國所雕的觀音勢至像而歸，至建榮東寺時，又招致宋人陳和卿等參加鑄佛像。所以東大寺造立供養記謂：東大寺的大佛像是陳和卿陳佛彝及宋丁七人鑄塑而成，南大門的石獅子及四天王像是宋工字六郎等四人雕成。是宋代的雕刻法傳入日本無疑了。

明代末祚，有歐陽重惠（又名六官）居于長崎。雲臺於明正天皇寬永十二年被日本政府任命為唐年行事。雲臺善于雕刻漆器，世稱為雲臺雕云。至後光明天皇承應元年，明人元隱之帶有一位佛工范道生至日本。范道生長于雕刻之術，黃檗之雕像是由他刻成的。一時松雪及江戸等處的佛工都受了他的影响，時稱之為黃檗風，其作風與唐宋又迥然有別。

以上是中國雕刻法輸入日本的大概情形，因之對於日本之雕刻技術，發生極大之影响。至其他如夾紵像紙塑像也是由中國輸入的。現在不必贅述。

第十四章

織造品之輸入

中國的織造品輸入日本，是始於漢光武的時候。後漢書東夷傳說：『建武中元二年奴國力恭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所謂綬，即是織造品。這是中國織造品輸入日本的第一次。又魏志倭人傳說：『景初二年六月，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帶方），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至京師。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表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今以絳地（裴松之以地應為絳，漢文帝著皂衣，謂之戈絳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交龍錦五匹，絳地縹綵十張，絳絳五十匹，紺香五十匹，答汝所貢獻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二匹，細班華縹五張，白絹五十匹。……』魏明帝御服與彌呼的，有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縹綵十張

。絳緋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及白絹五十匹。魏朝的織造品輸入日本，可謂多了。這是中國的織造品輸入日本的第二次。

但在西魏時代，雖有大量的織造品輸入日本，然對於改良日本織造的問題，尚未曾引起新刺激。迨至當我南北朝時代，有秦人漢人到了日本之後，遂促進日本織造品的發展了。秦人弓月君帶了一千數百人，于應神天皇十四年到日本，漢人阿知使主與其子都加使主帶了一千數百人，於應神二十年到日本。由是對於日本的養蠶織絹法，發生極大的影響。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應神朝，因繼浪帶方二郡之秦人漢人來歸，日本之養蠶織絹事業，頓形發達。至少，畿內地方之貴族社會衣服，面目爲之一新。』又說：『自秦人來歸，日本養蠶織絹之業，頓形發達。據姓氏錄仁德天皇時，分置彼等于諸郡，使從事養蠶織絹。因彼等所獻之織物，觸肌膚而覺溫暖，乃賜姓波多父公，秦字之所以讀爲（八夕）者，由機（八夕）人之意而出，抑由肌（八夕）字而出。雖未可知，但彼等來歸未久，養蠶織絹之術，遂開一新面目，則可想見也。後至雄略天皇十五年集合臣連等所曾驅使而已分散之秦人等九十二部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賜姓秦酒公，使從事養蠶織絹，未幾彼等所獻之絹繒日廷聚積甚多，因賜姓大秦公。又同十六年分置秦人等於適植桑之地。天皇之意，無非利用彼等之技能，振興日本之產業，使國民生活日益向上耳。而漢人織絹技術之優，亦可由『綾人』之名而知之。蓋因彼等中多善織中國式美麗之綾者，故名曰綾人。斯時彼等似又兼營養蠶。』

應神帝雖因秦人漢人發展自己的養蠶織絹事業，至雄略七年復有帶方郡的新漢人錦部安定那錦率同數十人來日本。安定那錦到了日本之後，不但對於雄略朝的織造事業有所影響，即對於推古朝之正服色，製衣冠的革新行爲，也有很大的幫助。雄略復向宋招致織造的人才。雄略紀說：『十四年正月戊寅，身狹村主青等，使吳國（即宋），將吳所獻手末才伎漢織吳織及衣縫兄媛弟媛等，泊於住吉津。』又說：『三月命臣連迎吳使即安置吳人於檢限野，因名吳原，以衣縫兄媛奉

大三輪神，以弟媛爲漢衣縫部也。漢織吳織衣縫是飛鳥衣縫部，伊勢衣縫之先也。」

紀中所謂漢織吳織，所謂兄媛弟媛，不過因書紀好用這種連稱的名詞而已，其實所謂漢織吳織，即中國的織機人，所謂兄媛弟媛，即中國的縫衣女。織機人又分爲吳與漢兩名，也因為他們有兩人，而爲之分別而已。這種織造人才到了之後，對於日本的影響怎樣呢？木宮泰亨的《中日交通史》說：「漢織吳織由吳國來，中國南部之華麗織物，亦次第產生。兄媛弟媛來，裁縫之技術，亦日益進步改良矣。」因爲如此，所以直至仁賢天皇之時，派挑文錦到各州教以織紋之法，因之後來遂有雲欄（彩色生暈）之發明，而尤以製錦爲多。計有暈潤錦，軟錦，兩面錦。其餘有縹羅白羅等。這種東西，後來藏蓋奈良倉院裡。沿至於武烈天皇時代，遂用大量的綢緞做衣服，用錦綴做坐墊了。到了推古時，聖德太子由中國得來許多織布。聖德太子把這布造作僧侶法衣之用。井用爲堂中的裝飾品。桓武時連都平安，經營大內，裝飾錦繡，燦然奪目。當時并令織造工費集中平安從事織造的工作。又強制各州不能織造粗惡絹品，故那時織造品進步極速。迨至仁明天皇初年，錦繡羅綺極爲精緻，與中國織造的沒有差別了。總之：自那時的日本，已學得我國的織造品。日本國志說：「自遣使隋唐，學爲蜀錦，如真紅天馬錦，真紅飛魚錦，雙窠錦，青綠瑞草雲鶴錦，青綠如意牡丹錦，宜男百花錦，穿花鳳錦，鵝黃水林檎錦，并沿其名，西京所產，最爲美麗。制錦之外，能爲縹緋絢縮緬（如今之縐紗），縮緬者引之則伸，放之則縮，多繪爲柳絲梅點，竹竿桃葉，清麗宜人。別有一種名縹緋，其法不用大機，取熟色縹于木檣上，作花草禽獸樣，以小梭先織其處，用絳色線綴于縹緯之上，合以成文，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亦如中國刺繡法。」可見日本織造之精美了。

到了我國五代之時，後周太祖廣順三年，吳越王弘徽使蔣承勳赴日本，并贈日皇以錦繡的珍物。五代時中日貿易，中國亦以錦繡爲輸入日本的主要品。

到了北宋時代，即當日本藤原氏全盛的時代，北宋的船舶日本人貿易的亦以輸入錦繡爲主要品。

南宋時，宋商品輸入日本的，也以織造品爲主要。南宋時據再表鏡文治元年十月廿日條（即後鳥初年當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西元一一八五）源範賴以庚錦十端、唐綾絹羅等百十端，上於後白河法皇，但南宋之時，廣東的織造法也輸入日本。據博多記說，當四條天皇真禎二年（即元入宋時，有彌三與之同往，在中國傳習廣東織法，綾子織法而歸。在博多地方，創興博多織。

到了元代，中日兩國雖然國交斷絕，但船舶之往來，仍然絡繹不絕，那時輸入日本的貨品，據宋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所載，有金襴，金紗，唐錦，唐綾，毛氈，等織物。

到了明代，惠帝濬文四年明使道彝天倫及一巷一如，同日本使者祖阿等來日，據其鄰國寶記所說，謂他們携有錦綺二十四匹來日本。明成祖永樂二年趙居任使日本，據大明別幅并兩國勘合所載，他携來日本之物中，關於織造品的，有紺絲五匹，紗五匹，絹四十匹。永樂四年潘陽等使于日本，據皇明寶錄卷四十所載，携來日本之物中，關於織造的，有織金及諸色綵幣二百匹，綺縠衣六十件，綺縠紗帳衾褥等。永樂五年明使赴日本，携來的織造品，據大明別幅并兩國勘合所載有錦十四匹，紺絲五十匹，青二十八匹，羅三千匹，紗二十四匹，骨朵雲紅三匹，素八匹，綵絹三百匹，褥子五床，被二牀，大紅絨繡梧桐葉綵絲枕頭一個，青紗銷金涼帳一頂，桃紅花綾暖帳一頂，大紅圓線襪一條，大紅線繫腰小圓縵二條，皂線繫腰小圓二條，大紅線穿紅縵一幅。

又道彝天倫等出使於日本時，明成祖賜日本國王源道義的物品中，關於織造的，據其鄰國寶記及續其鄰國寶記所載有：粧花絨錦四匹（即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細花綠一匹，細花紅二匹）紺絲二十匹（即織金胸背麒麟紅二匹，織金胸背獅子一匹，織金胸背白獐緣二匹，暗花骨朵雲青一匹，暗細花綠四匹，暗細花紅一匹，暗細花青一匹，素青三匹，素紅二匹，素綠三匹）羅二十四匹（即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織金胸背海馬藍一匹，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素紅五匹，素藍三匹，素青三匹，青柳條二匹，素柳青一匹，素砂綠石一匹，素茶褐一匹）紗二十匹，（即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織金胸背白獐青一

匹。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暗花骨朵雲紅一匹，暗花骨朵雲青一匹，暗花骨朵雲藍二匹，暗花骨朵雲綠二匹，暗花八寶骨朵雲綠一匹，素綠一匹，素紅一匹，素青一匹。○彩絹二十四匹（即綠七匹，紅七匹，藍六匹。○）明皇帝又賜日本王妃的織造品如下。粧花絨錦二匹（細花紅一匹，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絳絲十匹（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織金胸背海馬青一匹，暗花八寶骨朵雲青一匹，暗細花紅一匹，暗細花青一匹，暗細花綠一匹，素青一匹，素紅二匹，素綠一匹。○羅八匹（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織金胸背虎豹紅一匹，素藍素紅各二匹，素素素柳各一匹。○）紗八匹（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暗花骨朵雲藍及暗花骨朵雲青各一匹，素紅二匹。○）彩絹十匹（紅三匹，綠四匹，藍三匹。○）除了上述之外，又特賜的物品中有：大紅織金絳絲得二個。大紅心青邊織金花絳絲得一個。脚踏褥二個，大紅心青邊絳絲坐褥二個。渾織金絳絲十匹。渾織紗十匹。渾織金羅十匹。彩絹三百匹。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據異國日記所載，有泉州客商許麗定來薩摩貿易，翌年七月有明船十艘至薩摩所載的有織造物有緞綾，青紬，素綾，紬，素紬，光素，絲紬，藍紬，帽料合計六百三匹，此外尚有毛氈，天鵝絨，胡索，扣線等物。

至於由明輸入日本的貿易品據海關編纂二所載有：絲，所以爲織絹絳之用，因爲日本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後用。中國絹絳，但充裏衣而已，如中國船隻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值銀五六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絲綿，髡首裸首的人，非此不煖，每百斤值銀至二百兩。布，爲常用之服，因爲沒有綿花之故。綿綢，染回日本國的花樣，爲正衣服之用。錦綉，爲優人戲劇之用，衣服不用。紅線，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爲刀帶書帶畫帶之用，每百斤價銀七十兩。針，女工之用。若中國船隻不通時，每一針值銀七分。此外復有馬背氈（王家用碎色，官府用紅色）及氈毯。

清代由康熙元年至道光十九年，中日兩國以長崎爲貿易的中心。西川如見的華夷通商考曾把中

國十五省輸出日本的貿易品，列舉出來。今攝下列四省輸出日本的織造品列于后。

南京省 白絲紬綾子，紗綾縐紗，羅，紗，紵，閃綾，雲縐，裏縐，金縐，五絲，柳條，襪襪，縐，紬，綿布，絲棉布，絲綿，縐綿布，絲縐。

浙江省 白絲，縐紗，綾子，縐縐，紗羅，雲縐，縐，金絲布，葛布，毛氈，羅，棉，裏縐。

福建省 布，葛布，白絲綾子，縐紗，縐縐，八絲五絲柳條，縐縐，紗，紵，羅，紬，縐紬，閃綾，天鵝絨，裏縐，縐縐，綿布，哇布，縐縐，天鵝絨。

廣東省 白絲，黃絲，錦金縐，二彩，五絲，七絲，八絲，閃綾，天鵝絨，鎖服，柳條，綾子，縐紗，縐縐，縐紬，縐，縐，袍。

第十五章

他種文化之輸入

(一) 歷學

據魏志倭人傳說，日本的原始時代，沒有歷書，祇以春耕秋收的次序，記年歲而已。到了欽明天皇十四年六月，敕令百濟以歷本為送付。明年二月，百濟算歷博士王保孫到日本，計算歷之書，是為中國歷書傳入日本之始，然當時只聽用漢歷而已，實未嘗學習歷法。至推古十年十月，又有百濟僧觀勒來獻歷本，及天文地理等書。觀勒兼通歷學，帝乃命諸生就學，陽湖史至陳傳其歷法。是為日人學習漢歷之始。因為觀勒所獻的是宋何承天的元嘉歷。至持統四年十一月，始行元嘉歷，兼用儀鳳歷。兼儀鳳是唐高宗的年號，亦即所謂麟德歷也。至文武元年，遷唐元嘉歷，專用儀鳳歷。聖武天皇天平七年，吉備真備由唐歸國，携回大衍歷經一卷，大衍歷六成十二卷，測影儀尺一枚，鈞律管一部，鐵如方響等律管十二條。大衍歷是唐僧一行于開元十六年撰成的。自吉備真備携返大衍歷之後，孝謙天皇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令歷算生講習漢晉律歷志，大衍歷議

九章六曹周髀定天論等書。明年八月，乃廢儀鳳歷，專用大衍歷。光仁寶龜十一年，遣唐錄事從五品下行內膳正羽粟臣翼獻寶龜五紀歷。曰：今大衍歷唐既不用，用此新法。五紀歷凡十四卷，是唐寶龜元年所作。然因當時日人無習推步學，卒格不行。仁明承和三年，頒歷以七月爲小月，博士等議互有參午，廷議遂據七曜歷法改爲大月，餘亦改其大小。上曜術本後漢光和中劉洪所作。自後陳隋所述凡二十九家。廷議兼採其法。承和十四年，學問僧圓仁歸國，撰返上曜樣災決一卷，七曜二十八宿歷一卷，上曜歷日一卷，以咨研究。至文德齊衡三年，陰陽頭從五品下兼行歷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又奏請用寶龜五紀歷。廷議以爲國家據大衍法造歷，尙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清和貞觀元年，有渤海國大使馬孝順獻長慶宣明歷。奏稱爲上唐新法。三年六月，真羽麻呂復奏曰：以彼新歷，比較大衍五紀二經，且察天文，且參時候，二經之符，實自粗疏。今朔節氣，均有差誤。臣有唐開成四年大中十二年鄭歷，詳加參校，實用新法。知渤海大使所言不謬。儀歷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夫上唐開元以來，三改歷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思事理，似不宜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始用長慶宣明歷法。到朱雀天皇承平六年十月，權歷將士葛木宿彌茂經奏議，以博士大春日朝臣宏範所呈明年丁酉本，殊多錯謬。七年十月，乃令宏範茂經共議。二人所議不合，因命太宰府寫呈唐歷，依照而行。自唐亡後，天下大亂，太宰府司歷不精，祇有賀茂保憲傳其家學，編纂歷法，分歷與天文爲二而已。然入宋之日僧，多好研究歷學。時日本叫造歷僧爲宿曜師，稱其道爲宿曜道。其造歷之精，遠在歷博士之上。如三條天皇長和四年，歷博士賀茂守道請仁統法師參造歷法，便是其例。然皇寶式微，歷官失守，民間所行，惟宣明歷而已，迨至後西帝寬父末，始有人建議改行陰法。至重元貞享元年十月，取用元授時歷，以造新歷，名曰貞享歷。自長慶宣明歷法通行至是凡八百二十三年而遂廢了，貞享歷行了七十年，將軍德川吉宗頗習天文，特于江戸神田建天文台，制簡天儀，知授時法，又有差違，奏請考驗。至後桃園寶歷時，頒行寶歷歷，時已兼用

西法了。

(二) 陶術

據垂仁紀載，垂仁天皇的時候，有一個陶人名叫野見宿彌，自出雲偕同土師百人到京都製造陶器。當時製成的陶器，帶有赤褐色彩，質頗鬆疏，這種土器，叫做土師器，是由石器時代進化而來的。這是日本原始時陶術的情形。

據雄略紀說，雄略天皇七年，天皇聞西漢才技，徵因知利言，帶方郡藝能優秀之漢人多留於百濟。天皇乃遣吉備第君使百濟，以徵因知利為副，使招此等漢人，於是陶部高貴遂至日本。（高貴是部長之名），同他來的約數十人。他們製造陶器，質較堅固，外表呈灰鼠之色，這是中國陶術輸入日本之始。帝于是高貴等教國工造陶器。這種陶器在日本極有價值。當時日本人所用的食器，多是這陶器造成，而以前的土器，僅用於祭葬而已。雄略十七年，宋廢帝元徽元年，帝始命土師連造清器，即陶器也。及崇峻時，隋開皇九年，百濟人麻奈父奴陽貴文昔麻帝彌四人來日，稱瓦博士，世亦習其法。自這次之後，關於陶器輸入日本之事，史無記載。到了鎌倉時代，有加藤四郎左衛門景正因為憤激他的父親製陶器之失敗，於是于後堀河天皇貞應二年（隨永平寺僧人道元入宋），就天目山學習陶器製造法，於後堀河天皇安貞二年而歸，在京都附近開窯，不幸又失敗了。後由其濃跑到尾張瀬戶的地方，發現清器的良土，於是那裏開窯，製造陶器極為良美，從此瀬戶燒之名傳遍於當時，而在日本的陶器上遂開一新紀元了。此事見於日本訂補建曆記。至後堀河天皇寬喜二年，復有日本人春慶入宋學陶術，從此之後，日本便有鶉斑黃陶等器的名稱了。

據桂林漫錄說，後柏原天皇永正八年，有伊勢松阪人五郎太夫祥瑞羨慕江西景德鎮的瓷器，來學中國專學青花，於後柏原永正十年而歸。他歸國時，四明李春亭曾送以詩說：「敬將玉帛觀天顏，回首扶桑杳渺間。紅帕古鄣三佛地，杯傳新酒四明山。梅黃細雨江頭別，帆引清風海上還。明聖賢王應有問，八方職工溢朝班。」大明正德癸酉夏六月朔，四明李春亭。他歸國後，在肥前

之伊萬里附近開窯，造出著名的肥前瓷器。又在本良附近之鹿脊山製陶器其所製之器，刻有最瑞科或玉郎太主瑞祥的字樣。未幾復有朝鮮人宗慶到日本開窯，他的長子次郎在日本製造樂燒之法。到後隆成天皇時，聖臣西吉往伐朝鮮，班師之際，朝鮮的陶工多人攜帶了許多陶器隨日本軍隊而東渡。聖臣西吉於是利用那班陶工製造多量陶器，以補充日本前時陶器之缺點，自此之後，日本陶器遂日形發達，與中國并駕齊驅了。

(三) 貨幣

魏志辰韓傳說：『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皆用鐵，如中國用錢』。是知日本原始時，是與韓濊兩國同以鐵為交易之媒介物。據考古家謂在筑紫郡沿海發現王莽貨泉，此雖為中國貨幣傳入之始，然未見日本使用或仿造。故當我三國時，日本仍是以前鐵為交易之媒介物。至日本顯宗時（當我南北朝齊武帝時），乃效中國而造銀錢，其式如銅錢，中有孔，無文，外無輪廓，徑一寸，重一錢八分，行日本錢之名。其上有開國天皇與唐代，日本文武帝乃造銀錢，元明帝之和銅元年銀銅并鑄。文曰和銅開珍，銀錢徑八分，重二錢一分強，金銀錢八分重一錢。帝大炊時，復造金錢，文曰開基勝寶，徑八分，重三錢一分強。同造銀錢，文曰美年通寶，徑八分，重一錢二分。稱德帝之錢曰神功開寶，和武帝曰隆平永寶，嵯峨帝曰富壽神寶，以上皆徑八分重一錢或八分。仁明帝曰永和昌寶，曰長壽大寶，清和帝曰保元神寶，曰貞觀永寶。宇多帝曰寬平大寶，醍醐帝曰延喜通寶，村上天曰乾元大寶。這些都是模倣唐之錢式而鑄的。因唐之錢面上，另刻上皇帝的年號及通寶二字的，日本雖倣唐制鑄造金錢，但以新錢當舊錢之十倍，遂引起金融之不穩定，因此錢價低落，貨物騰貴，發行的新幣，不能充分流通，多退還於發行者之手。且又錢法不精，同幣的貨幣，往往有大小輕重之異。金融極爲紊亂，以至於不能為貨物之確實標準，沿至花山天皇及一條天皇兩時代，日本貨幣遂全不通用了。十世紀花山天皇寬和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說：『從去年九月中至於今，一切世俗錢不用，交關之間不通，人民無不嗟歎』。日本紀

第一編大鑑永延年十一月二日條說：『仰檢非違使，加制止上下，人人不用錢貨事』。百練抄與扶桑略記也有同樣的記載。這種情形，繼續頗久，所以日本的貨錢，祇能夠按照銅價使用，欲作法幣流通，極爲困難。這是日本當元明天皇至一條天皇三百餘年間貨幣的情形。日本人既不信仰日本政府的貨錢，於是宋錢盛行輸入。考宋錢之流出以開國之初爲甚。當宋太祖開寶三年曾下過禁止的命令，不得宋錢流出日本。後至神宗熙寧七年王安石解除這種禁令，於是宋錢流出的更多。張方平曾痛陳其弊。事見宋史張方平傳，至哲宗元祐六年再下禁令，但未易實行。沿至南宋之時，宋國遂有錢荒的現象了。高宗紹興十年，於是強制禁止，對於船舶東渡之時，特派官吏親臨檢查，使不得私運銅錢。又至港口，因送船舶放洋，以防其海上的私運，可見宋錢流入日本之多，甚堪憂慮了。宋錢輸入日本之後，遂盛行於民間。玉葉的高倉天皇治承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條說：『近代源氏土之錢於此朝，悉買賣。私鑄錢者處八虐，雖不私鑄，所行旨同私鑄錢，尤可致傳止事與』。後鳥羽天皇建久四年七月四日御旨說：『應自今以後，永從停止宋朝錢貨事。右左大臣宣太勅云云自非止鐵貨之交關，爭得定直法於和布，仍仰檢非違使并京職自今以後永從停止』。據此可見宋錢流通之一斑。到了元代，輸入日本的貿易品是以銅錢爲主要品。元史日本傳說：『十四年（元世祖至元）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元人憂銅錢流出海外，於至元二十三年禁止以銅錢與外國貿易。但日本之鑄造錢幣，自村上天皇天德二年以來，久已中絕，故前代多輸入宋錢。朝廷雖屢發禁令，民間對於宋錢依然通行。

到了明代，錢幣輸入日本，也是很多的。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由明輸入日本者，不得不推銅錢爲第一。對於使臣自進物，國王附塔品，明人給價，概用洪武永樂宣德等錢。前後十二次勘合船輸出之刀劍總額二十萬把，一把給價平均二千文，合計達四十萬貫。他和硫黃，銅，蘇木等貿易品之給價，義政哀懇明朝特賜之錢幣，可知銅錢輸入日本者，爲數甚多。此等錢幣，對於日本國內錢幣之流通，影響甚大，日本貨幣史上經濟史上所最宜注目者也』。又據大明別幅并

兩國勘合所載，謂成祖永樂五年成祖允許日本的要求，賜義滿銅錢一萬五千貫。但正使天與清啓歸國時，被大內氏襲擊，全被搶奪。後來義政於第五次派遣明使時，又謂國庫空虛，請援永樂事例，再賜銅錢。又據籌海圖編卷二所載，謂明代復有古文錢輸入日本。因爲日本不自鑄錢，但用中國的古錢，每一千文值銀四兩，福建私鑄的新錢，則每千值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日本銅錢既少，但在貿易上又不得不用錢，所以在復四條天皇萬治二年七月，在長崎設立鑄錢廠，專鑄渡往中國的銅錢，錢文用古文的文字，但不准鑄上寬永年號（後水尾天皇年號）至東山天皇元祿八年，因銀減少，專以錢爲代替。但錢又不足用，乃用俵物諸色爲副幣。所謂俵物，即是海參、鮑魚、魚翅、昆布等海產物，自是日本海產遂爲中國人所珍視了。

第十六章

日本人生活之中國化

中國文化，自從徐福輸入日本之後，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了。經過這二千餘年的歷史當中，漢、唐、宋、明、清各朝，日本人的生活式樣，遂漸同化于我國，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飲食

日本人飲食的器用同化于我國，即實始我三國時代。魏志倭人傳說：『飲食用簋豆』。按說文：『簋，竹器也。豆，古食肉器也。竹器叫做簋，木器叫做豆，兩者都是我古代飲食的器具，是用以盛肉食的。周時雖有五案，但僅用以齊集粟而已，故考工記所謂玉人之事，案十有二寸，粟十有二列，是其証也。自漢以後，始以案盛肉食。故楚漢春秋載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又後漢書梁鴻傳。載舉案齊眉，是也。東晉以後，簋器盛行，簋豆遂完全廢棄了。當我三國時代，日本人用簋豆以盛肉食，是日本人的飲食，已在那時同化于我國了。當我南北朝時，即雄略天皇時代，有許多新漢人由帶方郡到日本。即班新漢人中，內有穴人部。穴人部又叫做害人部，害

與割字通，即是烹割肉食的人。他們到了日本之後，使日本的烹調法，漸同化於中國。

隋唐之後，日本的留唐學生，羨慕中國飲食之甜美，往往學得中國的烹調法而歸。據日本紀畧所載，桓武天皇二十二年三月，天皇親別遣唐藤原葛野麻呂及副使石川道益時，採用唐人的烹調法。日本紀畧又載：嵯峨弘仁四年九月，皇太帝淳和設宴於清涼殿，亦用唐之烹飪法。可知唐式之飲食法極爲日本所贊許了。

自兩宋以至于清代，入中國之日僧，及赴日之中國僧人，皆傳飲食法于日本。所以日本人的飲食，除有其特殊形式之外，大多已變爲中國化。現在可以分條說明如下。

煮 我國古代有煮之名。玉篇：冷水和飯也。釋名：煮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李時珍云：煮水飯也。是用水沃飯叫做煮，所以字從水旁。冷同煮，因爲古人一日一炊，夕不炊飯，祇把朝所餘的飯留到飯上開水泡來食，所以煮又從夕作煮。今日本民間多沿一日一炊之制，晚上不再炊飯，祇把朝上所餘的飯用木泡來食，這是成國古代煮的遺法。

饊 以羹沃飯叫做饊。今日本所食之冷飯，即我國古代之所謂饊。

饊 古叫蒸飯爲饊。又作饊。日本古時亦作蒸飯。復則罕用。

搏飯 古有搏飯之名，是取其成搏也。今日本以充旋食者有搏飯。

膾 說文云：細切肉也。今日本喜食膾。凡計有鯉，鱸，鰻，鯛等膾。

糖 古之糖字作飴，後變作糖。我國之有砂糖，始於宋太宗時，見老學庵筆記。砂糖於明時輸入日本。考義堂國信之空華日工集，後陽城慶長三年八月一日條，載有一八朔之僧品有砂糖一壺。之語，這是砂糖見於日本文獻之始。又慶長十四年，有明船十艘至薩摩，由鹿兒島與坊津兩地入港，內中貿易品有白糖黑糖。據約翰塞利司航海日記，謂慶長十八年，有中國民船二艘載砂糖來長崎之事。後水尾元和元年閏六月三日，有漳州商船載多量砂糖往紀伊之浦津。據西川如見之華夷通商考，謂福建有砂糖輸入日本。中國之糖雖輸入日本。然日本那時未晚製糖。故日本國志謂

慶長中有大隅國大島人直川智深入漢土，攜蔗歸，始學製糖，亦未得法，中御門享保年間，（康熙時）德川氏命薩摩國徵薩苗於琉球，始今栽種間東東海西海南海諸國，亦走諸製糖法。至桃園寶歷中，（乾隆時）有讃岐人研究其術，製糖較精，光格帝寬政中（乾隆時）讃岐人向山周慶所製尤佳。自後爭相倣倣，而吃糖遂風行於日本了。

豆腐 是由於我明代由禪僧傳入日本的。考後小松天皇應永二十七年，日本刊行之海人藻芥及七十二番職人歌合中，均載有豆腐之名，這是豆腐見於日本文獻之始。又據宗長手記，後柏原天皇大永六年十二月餘，又載有「夜深置膝於爐旁，而食田樂豆腐」之語。所謂田樂豆腐，是把豆腐加以醬燒成的，而與我國之黃醬豆腐相似。至于清代，赴日本傳教之清僧，他們在日本的飲食，全用中國式，在日本好製豆腐而食，故一時有胡麻豆腐隱元豆腐及唐豆腐之名。今日本所食的豆腐，據日本國志說：「豆腐以烟炆之使成片為炆豆腐，條而切之為豆腐串，成塊者為豆腐乾。又有以醬料同炆者，或加雞蛋及堅魚脯，謂之豆腐雜，炊缸面上凝結者。搗取晾乾，名豆腐衣，並經腐磨，以其屑充蔬食日雪花菜」。

點心 陶南村輟耕錄說：「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哺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德為江南留侯，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汝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唐時已有点心。自禪宗傳入日本後，日僧學得中國之茶會，茶會的食品是唐式的，食品中有点心，最初的點心，有包子、羹類、餅類、麵類。至清代赴日本之僧人，仍喜唐式點心，今日本吃點心之風遍于全國。

餅 據日本後醍醐所載，仁明天皇嘉祥二年十月，天皇四十壽辰，嵯峨大皇太后所賀之禮物，內有二十個黑漆櫃子，裝以唐餅，此為唐餅見於日本文獻之始。今日本以蒸米搗為糰，通謂之餅，正月三日，貴賤皆食餅。日本之餅，雖有其特制，然多數是本諸中國。據和名類聚鈔所載：日本之餅名有：

餅 日本國志云：「和名布止，即齊民要術所謂饅頭，東晉餅賦名曰饅頭。蓋以水蜜澆煎發酵而蒸之，即炊餅也。」

總數 亦中國之餅，謂以蜜和米煮之。

孔餅 陶隱居本草注云：「孔成酥，酥成饅頭，色黃白，作餅甚甘美。」

我國古代已有饅頭，今日日本以粉米或黍，以紫包之曰外郎饅頭。

饅頭 當南宋時，禪宗傳入日本，日本人的飲食生活，又是模倣宋式的。據佛重源禪師語錄所載，謂圓覺寺開堂之齋，曾用饅頭。然而日人之用饅頭，其初只用於禪僧，後則推行於上流社會。入元之日僧又多用中國的烹調法。當中農圓月的弟子子建淨業入元時，（歿於元）據上村觀光氏五山詩僧傳，曾引出他所詠的詩有「不識何山松竹底，又添一個土饅頭」之句。可見他是吃過饅頭的。不但如此，當元順帝至正十年，日僧龍山德見入元，有元人林淨因隨德見赴日本，改姓監，在奈良居住，製造中國式的饅頭，叫做奈良饅頭，於是日本人始知饅頭的製造法。所以日本七十二番職人職裡有「豆腐饅頭」和「菜饅頭」的記事。而又另有黃壁饅頭之名。但日本人初時祇好吃素饅頭，不好吃肉饅頭。到了清代，清僧如道者，超元，獨立性教，逸然性融，隱於隆琦，即非如一，心越興傳等到日本傳教，都吃饅頭，影响所及，日本僧人及上流社會的人如士大夫等，都以吃饅頭為風尚了。

總之日本人的飲食同化於中國，在我三國時已開其端，至元明清而大盛。所以大內義隆記說，遣明船歸國時，設中國茶飯式之酒宴，與正使副使終夜宴飲，并操中國語以助興，可見日本人的飲食，更完全中國化了。

二 服飾

日本原始時代的服飾是極其粗惡的。至應神及雄略時，始漸漸地同化於中國。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當未受中國文化影响時代……大概以麻、楮、穀等植物質之纖維，織成極粗惡之布

耳。筑紫之倭人、其時受中國文化之影響，雖多且早，然據魏志倭人傳，不過用橫幅作衣，而以線連續之，或以布一幅中穿一洞，貫於頭上耳。……其後至應神朝，因崇浪帶方二郡之秦人漢人來歸，日本之養蠶織綢事業，頓形發達，至少畿內地方之貴族社會衣服，面目當為之一新。迨漢織吳織由吳國來，中國南部之華麗織物，亦次第生產。兄媛弟媛來，裁縫之技術，亦日益進步改良矣。觀此可知在應神時代有秦人漢人到了日本，蠶織為之發達；在雄略時代有漢織吳織到了日本，而織造為之振興。

迨至推古天皇時代，日本人的服飾，更有進步。隋書倭國傳說：「其服飾，男子衣裙綉，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所謂「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這是中國服飾的樣式，因為中國在漢以後，婦女始嫁時，造成漆畫的屨，用五采色為系。所謂系，是用屨繩繫於脚趾之上面的。足見當我隋代，日本人的服飾，大染有華風了。又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裴世清等入朝，上方物并國書。是日聖德太子命諸王，諸臣，悉戴金髻華於頭。衣服用錦紫繡織及五色之綾羅，其禮儀之盛，可以想見」。所謂錦繡綾羅，這四種服飾，也是同化於中國的。又隋書倭國傳說：「……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飾」。所謂以錦綵為冠，以金銀鏤花為飾，這樣一來，日本的衣冠制度，雖然間有其特質，然大體上已是中國化了。

當我唐代，日本人的服飾，極力模倣唐式。舊唐書倭國傳說：「……貴人戴錦帽。……婦人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數枚，以明貴賤等級」。舊唐書日本傳說：「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散，以帛為腰帶」。所謂「貴人帶帽」及「帽頂有花分而四散及婦人佩飾有等級」，這是中國衣冠制度的樣式。因為中國古代是主張衣服有章，貴賤有別的。又當唐之時，日本留學生在唐既久，全服唐人同化，與唐人營同樣生活，并傳入唐之風俗習慣，對於日本之衣食住等種種方面，皆有極大的影響。茲就服飾方面來說：據續紀元正天皇

養老元年正月己亥條所載：「養老二年遣唐大使多治比羅守歸國，三年正月行朝見禮，歸守服唐朝所賜的衣服。」由此可以推知其他歸國的留學生，也是有相同的情形。所以上流社會的服裝，漸漸變成唐風。至養老三年二月，元正天皇遣通令全國民衆，通做唐式，皆六襪。又續記：「淳仁天皇太平實字六年正月丁未條載有吉備在太平宰府任大貳時，爲南海東海兩海諸節度使，造綿質襪各二萬二百五十具，其制一如唐式。像五行之色，以畫甲板之形，碧地加朱，赤地加黃，黃地加朱，白地加黑，黑地加白，凡四千五十具，皆按其方向之色云云。」照這條看來，是日本的軍服又同化於中國了。又續紀承和九年十月丁丑條載：「嵯峨天皇弘仁九年，管原清公爲式部少輔時，奏請令天下之儀式，男女之衣服，悉依唐式，改五位以上之位記，皆從唐式云云。」可見日本的衣服，在當我唐時，已完全中國化了。

當我南宋之時日本入宋僧人，在中國學禪宗之學。他們的日常生活，多模倣宋式。因此影響於日本人的生活樣式甚大。茲就服飾來說：如榮西所穿的宋式禪衣，便是很好的例証。試看沙石集卷十建仁寺本願僧正條說：「故建仁寺之本願僧正（榮西）：歸國後，有志建寺。其時適有風災，世人謂此風有異國之狀，與着大袈裟，大衣之增，共見於世。衣袖之廣，袈裟之大，已漸成一種風氣。」據此可知榮西與其弟子皆穿着宋式的大袈裟，影響所及，一般日本僧人的服飾，也染成此種風尚了。

迨至我元明清各時代，因爲兩國僧侶之往還，及在清初時一班華人居留長崎之故，對於日本人的裝服式樣，也是有大影響的。清代五臺徐松翁環瀛志里引海國聞見錄說：「男女皆大領開袖，女加長以曳地繪染花卉，裱裏帛幅，著短襪，曳絲履。」這便是華土裝服的風度。

總之日本人的裝服中國化，是曾經過長久的歷史的。直至現在，還可以把幾件具體事實，以爲日本人服飾的中國化之顯著的証明。

衣裳 考我國古代的衣服制度，據古籍所載，是先知其上以制其衣，後知其下以制其裳的。今日

本的衣服和我國古代相似，這是中國古服的遺制。

寢衣 我國古代有寢衣，寢衣即是被。漢以後始有被之稱。今日本人的被有領有袖，即是我國古代寢衣的遺制。

襦 我國古代用以遮蔽下體的布叫做襦。說文：「襦，小衣也，所以蔽首者，鄭註禮曰：古者網魚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首，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玉藻曰：「襦，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這是襦之制度。」今日本人男不穿袴，但用布遮蔽下體，男子用白布，女子用紅布，這是我國襦之遺制。又我國襦之制度，至六朝時變為犢鼻褌，日本人的無裯衣袴，也是由中國的情鼻褌變化而來的。

草屨 中國之有草屨，是常見於古書的，日本人之草屨，其樣式傳自中國。

木屨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風俗通說：「延熹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屨。婦女始嫁，在漆室履五采色作系。」是戰國的木屨始於漢時的，今日本人的木屨與中國古履彷彿。

羅 崔豹古今注曰：「唐武德貞觀中，宮人騎馬，多著羅，而全身蔽障。其象類今之方巾，全身蔽障，俗常爲之。」日本國志曰：「今日太婦人出門蒙單衣以蔽障全身，即詩綱衣，儀禮加采，唐羅之類也。」

幘 漢書周勃傳曰：「太后以幘繫提文帝。」應劭曰：「陌頭繫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幘。』師古曰：『幘，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日本國志說：『今日本或有以紮爲幘者，漢史始謂冒紮也。』

帷帽 唐書車服志曰：「初婦人施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頸。武后時帷帽益盛。中宗後，乃無復羅矣。宮人從駕，皆相帷帽，海內倣之，至武顯中，而帷帽亦廢矣。」孔氏雜志曰：「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若今之笠頭。」事物紀原曰：「唐永徽之後用帷帽，後又戴笠，方五尺，亦謂之幘，今日笠頭。」清波雜志曰：「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

通街，以方幅紫羅襪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日本國志曰：『有老婦尼姑，所著稱花帽子，乃唐帷帽宋蓋頭之類也。』

附子 日本國志曰：『或以幅紗打疊，自額繞兩鬢，交加蓋髻者，亦謂之鬘子。其小裁蓋髻者，謂之阿條鬘子。方言所謂紗續，郭璞謂之結籠，燕京謂之雲髻，古謂之鬘者蓋此。』

面衣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昭儀有面衣，今日本婦女亦有面衣。』

領巾 戒恭漫錄曰：『宮女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取其潔也。』類書纂要曰護領，又曰護袖，通雅曰恤領，曰偃領。日本常神紀：有取天香土熏于領巾之語，延喜四時祭式云：領巾紗八尺，今國額以護寒中，概長數尺，領下結之，半垂于胸，乃中國之遺制。

涎褂 我國古時有小兒之涎衣，說文謂之涎，方言謂之格，日本之涎褂，乃我國之遺制。

曳地衣 漢書文帝紀：『慎夫人衣不曳地。』蓋言其儉，然則古之貴人，衣必曳地可知矣。今日本女子成飾，衣長曳地或二三尺，室必有席或氈，故不患塵污。

腰帶 古今注曰：『襪肚謂之腰巾，以僧爲之，宮女以絲爲之，名曰腰綵，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襪肚。今日本婦女有腰帶寬咫尺。圍腰三四匝，復倒捲而垂之。』

臂繩 今日本會賤女子或用小帶巨繩繫袖于臂，乃因女子多習操作，袖長有碍之故。此謂之臂繩。老臂繩即古之綵。漢書控券注孟康曰：『與綵通，攬臂繩也。』

三 語言

自徐福到了日本之後，對于日本的語言，定有影响，這是無可疑義的。據後漢書東夷傳所載，漢光武時，倭奴國表貢朝賀，使者自稱大夫，自稱是秦伯之後，這是日人了解漢語的表現。

至曹魏之時，卑彌呼遣使朝賀，細看魏志倭人傳所載，也可以知道日本裡也是有人能操漢語的。所以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在應神以前一世紀之卑彌呼時代，倭女國王似已畧解中國語。稍識漢字矣。如魏人素知之難升米，使魏二次之掖邪狗等，實有此等知識之人才也。魏志倭人

傳所載「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倭使詣郡（帶方）說相攻擊」魏使到女王國「爲報告諭之」，等語，雖不無文飾之辭，然已證明倭人內有能解中國語稍識漢字者矣」。可知在曹魏時代即日本卑彌呼時代。日本人能操漢語，是有歷史的證明的。至日本應神天皇時代，有帶方樂浪兩郡的秦人漢人到日本，對於漢語的傳播，也是不可忽視的。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秦人漢人等，對於日本人的文化之影響，亦不可忽視。彼所用之語言，文字，乃以數千年之漢人文化爲背景，而有複雜之內容者，彼等帶來之思想中，蓋含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陰陽五行與識緯思想等，因之使日本語之內容益深，國民之思想益富。是時日本人習得來之漢字非常困難而秦漢人等則深與漢字相親，故處理政治上之事務，概屬彼等之職」。可知秦人漢人不但傳播漢語，并且傳播漢字。後來至雄略天皇時代，赴日之新漢人諒亦必有同樣的情形。因爲這班漢人，能通漢語的緣故，所以出使中國都叫這班漢人担任，如雄略時使漢人身稜青，檜隈博德出使於吳（即宋）便是其例。不但如此，到了隋時，日本推古天皇時派學生使漢直福因，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闢，新漢人曼，南洲漢人請安，志智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入隋留學，是因他們能懂漢語漢字的。

當我唐代，即日方奈良時代，又有一班入唐留學的僧侶及學生歸國時把中國語言傳入於日本，至赴日本的唐僧，也致力於漢音的傳播。試看續紀元正天皇養老四年卯條說：「釋典之道，教義甚深，轉經唱禮，先傳恒規，理合遵承，不須輒改。比者，或僧尼自出方法，妄作別音，遂使後生之輩，精習成俗，不肯變正，恐汚法門，從是始乎！宜依漢沙門道榮學問僧勝曉等，轉經唱禮，餘音并傳之」。所謂「宜依漢沙門道榮轉經唱禮，餘音并傳之」足見那時僧侶大家都要學道榮的唐音。

當時歸日唐僧，在日本講經，似概用漢語。唐大和上東征傳說：「唐道璿律師講大和上門人思託曰：所學有基緒，瑤弟子閑漢語者，令學迦璿并鎮國記，幸見開導。僧思託便受，於大安唐院，爲思基等四五年中，研磨數遍。寶字三年，僧思基於東大唐院，講疏記，僧善俊於唐寺講件疏

記，僧惠忠於近江講件疏記，僧真法於興福寺講件疏記。從此以來。日本律儀漸漸嚴整，師資相傳，遍於寰宇。因唐俗之講疏記，遂用日本廣用漢語，於此可見。

到了日本平安時代，以爲留學生待入唐留學時纔習漢語，殊爲不便，於是在未入唐時，先在日本熟習漢語，然後入唐留學。所以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是期（平安時）之留學生，無在中國學漢語之餘暇，故先在本國學之。濟銓曾學漢語，入唐時，竟揭圓珍，詢問唐人之風俗，即其一例也。又有相當之位置者，皆携熟悉漢語之譯者同行，最澄入唐時，因其徒義真自幼學漢音，畧通漢語，以之爲譯者而同行，圓珍留學時，以圓仁之行者，在唐九年之丁雄萬爲譯者，與之偕行』。由此，當唐時代，中國語盛行於日本足見一斑了。又據續紀所載，唐人袁晉卿于日本聖武天皇天平八年赴日本，續紀寶龜九年十二月庚寅條載，袁晉卿精於文選爾雅之音賜姓清村宿彌，叙從五位上爲大學音博士歷任京蕃頭，大學頭，安房守等職，是袁晉卿對於日本之音學上極有幫助的。

到了宋代，禪宗輸入中國語在日本極爲流行。所以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宋僧與入宋僧，……日常生活，亦多模倣宋式，此事影响于日本之生活樣式者甚大。例如日本僧舉揚經之宗旨時，特用中國語，又寄托其見解時，必用中國語之偈，觀其語錄自知。日本國語之語彙，由此遂逐漸豐富。據此便知那時日本人的語言有許多是同化於中國的。』

到了我元代時，日本人也熟悉中國語的。據延寶傳燈錄卷十九智明傳載，智明幼喪父母。時適有元人萬戶將軍降日。智明爲己子，操鄉音教以四書，故智明通中國語。然一山一寧赴日本，用智明爲書記禪冊中有不明者，不須他人通譯，能直接用中國語來詢問。

這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例而已。然而當我元代，因中日兩國僧徒之往來，日本人對於中國語，一定是很熟識的。

到了明代之時，據大內義隆記載，明船歸國時，設中國茶飯式之酒宴……并操中國語以助興。

○這是當我明時漢語通行的日本的証據。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清僧如獨立隱元和心越等在日本用中國語說話，用中國語誦經，日本人率多倣效。又居于長崎的明清人士，稱為「住宅唐人」。因為他們通中日兩語，故幕府任他們為唐通事。唐年行事等担任貿易之職。日本又于中御門天皇享保元年在長崎聖堂設立一個唐韻勸學會，使長崎華人的子孫學習中國語，因此便有許多人嫻熟中國語的。所以留居長崎劉一水的子孫名彭城宣義（字耀哲號文閣）在貞享元祿間最為著名，凡方言土音，無不通曉。長崎遂成唐語的中心地，凡文人學士想學中國語的，必須跑到長崎學習，因此，遂使日本學界流行水滸傳紅樓夢金瓶梅等唐本稗史小說。在學術上又成為崎派，主張唐音直讀之法。即因此時而起，如狄生徂徠就是。狄生徂徠原來是就岡島冠山學唐音的，因為冠山是當時最長于中國語言學的。迨徂徠精于唐音之後，因提議：不應用前時之和訓倒讀法去讀漢文，應以唐音直讀為合理，且易于收效云云。

這麼一來，可知中國語言當清時在日本有極大的力量，且影响到日本文學方面了。

四 習 尚

日本人的習尚往往同化于中國。現在先就茶會來說。

茶 中國唱茶的風尚，盛行于唐代。至日本奈良朝，據日吉社神道祕藏記謂初由傳教大師櫻茶種于日本。這是中國茶種輸入日本之始。但那時日本以茶當作藥用而已。至平安朝之後，日人喝茶之風漸開。考日僧承忠于桓武天皇延歷初年歸國時，已經有了喝茶之癖。後紀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四月癸亥條所載謂嵯峨天皇於弘仁六年四月幸近江梵釋寺，寺僧永忠親自煮茶以奉，於是以御後賜永忠。并於是年六月，命令畿內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種茶，以為每年的貢品。又據凌雲集所載謂：嵯峨天皇行幸秋日皇太弟的池亭時，有御製詩兩句：『蕭然幽興處，院裡滿茶煙。』夏日行幸藤原冬嗣的閑居院時有詩兩句：『吟許不厭搗香茗，乘興偏宜聽雅琴。』這樣看來，可見茶在平安的時代，已漸成為風雅的新象了。在平安時代貴族階級與僧侶等雖漸開喝茶的風尚，可是到

了後來，這種風尚漸漸低減了。故延喜式所載各地的貢品沒有茶這名稱。所以日本人對於喝茶絕不注意。然就宋人看來，宋人喝茶的風尚，則比唐代爲盛。賓客相至，煮茗相待，固不待言，即江南都市有在街頭賣茶以謀生的。每茶一椀，售錢一文。這是在入宋僧成尋著的參天五臺山記已說過了。入宋的日僧，好講求中國生活樣式，所以喝茶的風尚，復由入宋僧人傳于日本。試看榮西于六條天皇仁安三年入宋，同年撰有多數茶種而歸。初時把茶植於筑前的鶴振山，又把一部份贈與明惠上人（高辨）。明惠上人植於梅尾山中，所以梅尾明惠傳記并遺訓謂：「建仁寺長老（榮西）贈茶，問于醫師，知茶有通困消食快意之效。然此物日本不多，乃尋得其實，植兩三株。誠有醒眠舒氣之功，亦使衆僧服之。或謂此茶子，乃建仁寺僧正御房（榮西）由大唐携來植育而成的。」明惠上人在梅尾山所種的茶甚美，故自鎌倉至室町時代中葉，梅尾茶爲日本第一。他的茶叫做『本茶』。其後則以山城的宇治爲日本第一的種茶處。

榮西著有喫茶養生記二卷，說茶有養生延齡的功效。又喝茶能解悶，覺睡，爲修禪之資，天龍寺開山夢窗疎石的夢中問答有說：「我朝之梅尾上人（高辨）建仁開山（榮西）皆甚愛茶，以其能解悶覺睡，爲道行之資，誠寶物也。」至順德天皇建保二年將軍源實朝害了病，榮西獻茶一盞及所纂巖茶德之書一卷（即喫茶養生記）稱稱爲良藥。見吾妻鏡。自西茶傳入茶種後，日本人多植茶樹。于是吃茶之風，行於禪僧之間。故後世日人贊茶有「神禪一味」之語。其後并遍於普通人矣。

到了日本南北朝時代，共五十七年禪宗盛行於日本。禪寺與上流社會盛行唐式的茶會，所謂茶會又名茶寄合，是集合多人吃茶的意思。茶會的情形，詳見於叡山僧玄慧所作的喫茶往來一書及傳道院開山聖同（了譽上人）所作的禪林小歌一書。兩者均是南北朝時的作品。喫茶往來述茶會的情形說：

「抑彼會所爲體，由容殿懸珠簾，前大庭鋪玉沙，軒牽幕，窗垂帷，好士漸來，會衆既

集之後，初水續酒三秋，次索麵茶一返，然後以山海珍物勸飯，以林園美果甘哺。其後起坐，退席，或對北窗之築山，避暑于松柏之陰，或臨南軒之飛泉，放棹于水風之涼，寔有奇殿，峙棧數于二階，排眺望四方，是則喝茶之亭，對月之砌也。王思恭之色彩釋迦，靈山說化之粧薔蕊，右牧溪之黑繪觀音，普陀示現之姿蕩蕩，普賢之殊為脇侍，寒山拾得駕面鑄。前重陽，後對月，不言丹果之唇吻吻，無睡青蓮之眸妖妖。桌懸金欄，置胡銅之花紙，機數錦繡，立鑰石香匙火箸。婢娟兮瓶外之花飛，疑于吳山千葉之粧，芬郁兮爐中之香，誤于海岸三銖之煙。客位之胡牀軟豹皮，主位之竹倚臨金沙。加之虎踞子，饌種種之唐繪，四皓遁世于商山之月，七賢隱身于竹林之雲，龍得水而昇，虎靠山而眠，白鷺戲與花之下，紫鴛遊柳絮之上，皆非日域之綾素，悉以漢朝之丹青香臺並銜。朱銜紅之香箱，茶壺各稱尾高，雄之茶袋，西廂前置一對之鱗棚，而積種種珍菓，北壁下建一隻之屏風，而構色色懸物。中立鑪子而練湯迴井飲物而覆巾。會眾例坐之後，亭主之息男款茶菓，梅桃之若冠通建蓋，左提湯瓶，右曳鉢，從上位至末坐款茶，次第不什亂。茶雖無重請，敬教返之禮酒雖用順點。未及一滴之飲，或四種十服之勝負，或都鄙善惡之批評，非帝推當坐之興，將又生前之浩計，何事加之。盧同云：茶少湯多則雲脚散，茶多湯少則粥聚云云，誠以有興有感，誰不翫之哉。而日景漸傾，茶禮將終，則退茶具，調美肴。勸酒飛杯，先三遍而論戶。引十分而勸飲。醉顏如霜葉之紅，狂粧似風樹之動。式歌式舞，增一座之興，又絃又管，驚四方之聽，夕陽沒峯，夜陰移窻，堂上挑紅蠟之燈，簾外飛紫屏之畫，慈慈遊宴，不申盡。」

又了魯上人的禪林小歌說：

「近來片部聚落有號唐樓，饌室集眾催興之宴。……先客殿引物華綾敦絲木棉，四季屏風有之。思恭釋迦三尊，因多羅羅漢懸。吳道子月壹觀音，米元輝、陸清，李堯夫山水，文可興，東坡居士檀芝瑞竹，仲華光十梅、楊補之梅有哉？韓韓、李伯時馬形、戴嵩舒悅牛畫，牧

溪虎。所翁龍。張僧繇畫，雲雨時必有鱗甲動不思議。胡直夫人形。陸信忠十王，有日觀
雪窗。梁楷筆猶又其外名鑑畫數。其首多立車，金襴打散。金紗水引，燭臺。燭切。香匙，
大箸，胡銅，紫銅，錢深銅，金琉璃茶碗，並錫石香爐，花瓶立華，微笑梅花含雪潔，半枯
枯木帶苔綠，古木奇木脚花色色見。……各次第著座，最初受湯，先點心次第，水昌包子，
臘腸羹。水精紅羹，雞齊羹，蟹羹，豬羹，甫羊羹，寸金羹，白魚羹，骨頭羹，都落羹，黃
數差差也。有乳餅，茶麻菜，饅頭，捲餅，溫餅等。饅頭，螺結，柳葉麵，桐皮麵，煙帶麵
，打麵，三什麵，素麵，雞葉麵，冷麵，更互誣之。取菜子，龍眼，荔枝，榛，林檎，胡桃
，柏子，松子，棗，杏，栗柿，柑子，温州橘，著鹽，蘸上物綴高折數無買處見。犀皮盤，
胡蒜盤，建多居。油滴囉下，建甌，胡蓋，湯蓋，幅（福）州蓋，天目立茶出處。先四攝名
坊，田中，山木池，閼伽井，尾時深淵，佛洲，乘一畝，小島。天狗窟。禪賀院御堂之，
故驛。取東山清水寺，靜閑寺，北北野，和仁寺，高雄，紫室。宇治，八幡淀山崎寺般若
寺，山階，醍醐，勸修寺。取國伊賀，大和，都鄙各所無錢。膳瓶湯瓶取持。度度立迴之。
彼玉泉七杭是憶達焉。其後退座旦偃息山水向會處。置書棚機。硯竊眼鳳味筆鷄距紫毫落囊
孫色墨松油煙碧雲三脚蝦蟆水滴。又見傍真壺胡壺瓶。百花金花瓶茶花牡丹龍壺。觀乳定
州冬炭、清炭。東陽瓶井置。鈞軒風鈴順風。其響滴滴東了。酒酒東了鳴心，細乎曲祿孤林
。靠備。椅子脚踏副。柱杖。竹杖。拂子扇子有之。敷花氈。豹虎皮，或有偃牀臂爲枕。或
有幾椅子學坐禪人思思誘……漸齋（齋）出來，皆又竟本座，青漆椀光明朱影圖計也，維摩
鉢瓶現白雲晴雪蒸飯。海雲汁。苔汁。山菜，野菜，海藻，無殘菜，老少共並居食受有樣。
○曾經恐哉……見二三臺。有訪飯冰薄麵水團等哉。齋（齋）了菓子時景物無殘。其後取香火
。思思燒香。香合何何，桂昌，金紫，金花堆紅。九蓮絲黃九，紅花綠葉。銀絲，犀皮堆
漆。燒香何何。一水至仙。萬安亭，鴨鳴嶺，宇治山陰伽羅木，有海岸泥哉。當世早香。春

桂藥。松風夕星。羅襪，法華經，滿室黃香其覺。……猶又應餘波集喫茶曲，本非新古引合。●亭容合。無試十服茶。無名批判。二種四服。宋郭名所清茶。雅州。茂山，浮梁，田畝。●鄉園。打六札唐茶名之香。隣梅。夏木立。秋草，初雪。契應應。四季三種是。其外萎葉，秋藥無殘風情，……是此日暮思還。」

我們讀了這兩篇文章，便知日本當時的茶會，是用中國式的。茶會則用宋代的清茶，雅州，茂山，浮梁，田畝，鄉園等名茶，點心有乳餅，饅頭，捲餅，溫餅等，麵有柳葉麵，桐皮麵，饅帶麵，打麵，三什麵，素麵，冷麵等，生菜有龍眼，荔枝，林檎，棗，柿，柑，杏，栗，胡桃，榛等，菓實。温州橘，酒餚，有鹽鴨羹，水精紅羹，鰻脊羹，鶯羹，豬羹，羊羹，十金羹，白魚羹，骨頭羹，都廣羹等。用器有犀皮盤，胡荽盤，建盞，福州盞。室內的裝飾，有思恭，吳道子，牧溪月壺，文可與，東坡居士，仲華先，楊補之，韓韓，李伯時，戴嵩，所翁，張僧繇等中國名家的畫，以效中國掛畫之風。井懸有金欄之帳，張金紗之幕，置有胡銅花瓶，紫銅燭臺，鑲石香爐等，可知當時日本的茶會全是唐式的。

又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所引的宋唐唐門茶記則中國自宋代已有門茶之名。日本人于茶會的餘興中，又有所謂四種十服茶，無試十服茶，頗類中國門茶的性質。所謂四種十服茶，是用三種茶各包成四服，先各試喝一服，其餘將三種之各三服共有九服，再加客茶一服，共有十服，一點出，使喝的人辨別茶之出產地。所謂無試十服就是不先試喝，其取茶三種各三服，加上客茶一服，共為十服便是。四種十服茶，又叫做貢茶，是取子貢聞一知二之意。無試十服茶又叫做四茶，是取顏子聞一知十之意，當時常用此以賭物之勝負，所以太平記卷三十九道譽大原野花會事條說：「飲百圓之本。非彩物如山積矣。」所謂「本」是梅尾之茶，因為山城梅尾之茶，叫做「本之茶」。梅尾是高辨所植之茶，為日本最好之茶。所謂「非」是非梅尾之茶。所以海人蒸芥說：「所謂本之茶者，梅尾也，所謂非者，宇治等茶也。」

日本人對於茶會之事。因陳設之奢，飲食之侈，費用甚大。甚至有費至數十萬錢的。所以達武式日第二條，曾宣布禁止。

又因當時茶會之盛，所以庭院之內，築有特種樓閣，名爲茶亭。按中國嘉興府天寧寺（報恩光孝禪寺）有月波樓。凡中國宋代的禪地，往往有亭閣，日本多倣效之。是以當時京都的天龍寺有龍門亭，後村上天皇正單元年三月太上天皇光嚴院曾到那裡臨幸觀花。又鎌倉瑞泉寺中當後醍醐天皇嘉歷三年，夢窗疏石在那裡建有覽亭。關東管領基氏與氏滿常在那裡約會禪僧，開觀櫻觀楓之會，這就茶亭之一種。

日本人對於茶最爲重視，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引著海國編卷之二說：「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啜茶，啜已即以茶壺懸之，不許著物，極以爲重也。」這是日本人當足利時代，即我明代，對於茶重視的表現。

到了明末清初之候，清僧獨立，心越，即非等到日本常從中國習尚，好喝茗茗，吃饅頭等，日本僧人常被同化。當清時，中國南京福建兩省輸入日本少貿易品，據西川如見的華夷通商考都有茶的輸入。

總之自中國茶輸入日本之後，以至於今，一般的日本人，沒有不好喝茶的。除了茶會之外，尚有許多其他的習俗，之是同化于中國的。

屠蘇酒 我國在元旦時有飲屠蘇酒之例。自六朝以至於宋代，此風極爲流行，至今仍然沿著不改。○日本人自我唐代以至於今，也倣效此例。屠蘇是藥名，日本藥房多有出售。是用紙包成三角形狀，沖入酒中來飲的。

出水宴 我國自漢代起，在陰歷三月三日已有所謂出水宴，至晉代則極爲盛行。如王右軍的蘭亭修禊是。自我唐代時，此風已傳入於日本。

浴佛 陰歷四月初八日爲佛誕生之期，我國古代定是日行浴佛之禮，此風又是于唐代傳入日本的。

菖蒲酒 我國於陰歷五月初五日慣飲菖蒲酒，家家懸掛菖蒲于戶旁，以示斬絕妖邪之意。此風也于唐代傳入日本。所以哥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男孩子五月五日生的，要採取似劍的菖蒲表示戰士的勇氣。』這麼一來，日本掛菖蒲的意義與中國雖不甚相同，然也是倣效中國而來的。

乞巧 我國在七月（陰歷）初七之夕，婦女對織女之星，穿針乞巧。此風自唐代傳入日本。

孟蘭會 我國習俗爲紀念目蓮救母事（見張華博物志）在陰歷七月十五，有孟蘭會之舉。日本於奈良時代也倣行此習俗。

重陽節 我國九月九日的登高節是爲紀念晉代桓景避災的。此風後亦盛行於日本。

離禮 我國於除夕有所謂離禮，雖是驅逐不祥的鬼神之意。自我周代已有此風了。後來又傳于日本。所以木宮泰齊的中日交通史說：除夕之離等，概起自秦漢時代，經六朝，隋至唐而完成者。荆楚歲時記事書，曾詳載之。此等風俗，日本自飛鳥奈良朝以至平安朝之初，亦次第仿行。其大部份當由留學生傳來者。』

舞劍 我國古代有舞劍之風。所謂項莊舞劍便是。後來日本人也學得此風。

懸樗蒲 我國古代有懸樗蒲之戲。不樗蒲之戲則盛行於晉代。日本人也學得此習。所以隋書倭國傳說：『倭人好棋博，樗蒲之戲。』

走索戲 這種戲本出於西域，後漢時傳入中國。晉書樂志說：『後漢天子受朝賀，舍利從西來，戲於殿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尺，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又通典謂梁有高巧伎，即走索戲也。今日本亦有此戲，繫繩于柱，飄然凌空，處女脫兔，索上相連，摩肩而過，勢若不容。』此由中國傳入者也。

卜筮 日本原始時雖有卜筮，但到了欽明天皇十五年，有百濟國歷博士保深獻卜筮之書於日本。於是日本的卜筮受了中國的影響而加以改良。

姓名 日本之來中國，有從中國式的姓名的。如入唐留學生阿部仲麻呂改名爲晃卿，便是其例。

又中國古代是因所生之地以爲姓的。此風亦通行於日本。如隋時高麗漢人玄理因住在河內的高向，故以地名爲姓。

又中國古代有以龜爲人的名字的。如唐有陸龜蒙事龜年，宋有楊龜山等。日本人也常有以龜爲人名的。

席地 我國古代是席地而坐。後來椅子盛行，席地之風漸廢。今日日本人也是鋪席于地而坐。用尻筍躡，用膝隱地。是古代席地而坐之風，今不見于中國。反見於日本了。

几 我國的几，是用以凭之而坐的。因爲中國古代沒有牀，所以祇有隱几而臥而已。篆文几字上平。像其可居之狀。又几字從尸從几，今其可居之意，孟子所謂「隱几而臥」便是。今日日本人坐則用席，凭則用几，也是我國古代的遺俗。

木枕 我國古代是用木做枕的。周易說：「坎險且枕」鄭康成注：「木在首曰枕」今日日本人的榻也有許多是用木做的。

脫屣戶外 我國古代因爲席地而坐，所以存在入室之前，必脫屣于戶外，以保存室內之清潔。今日本人亦席地而坐，故亦學得此種習慣。

總觀日本人因受了中國文化二千年陶染之故，所以他們的飲食方式服飾方式習俗方式語言文字方式，無不同化於中國，所以現在的日本人，確是中國式的日本人。

馮瑤 著 述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

日本朝貢中國考

黑格爾羅輯

老莊哲學及其比較

廣州方言故訓

離騷研究

周秦列國之地理文化